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戴高乐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出版说明

套书《将军—总统》是我社畅销书《二次大战三元凶》和《二次大战三巨头》的姊妹篇。该套书仍以读者喜闻乐见的章回体形式，生动地描述了二次大战时是将军、战后都成为总统的戴高乐、艾森豪威尔和铁托的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本套书共分三册：

第一册为：《坚韧不拔——戴高乐》；

第二册为：《大器晚成——艾森豪威尔》；

第三册为：《如钢似铁——铁托》。

作者前言

夏尔·戴高乐将军是继拿破仑之后，在法国历史上又一位重要的传奇式人物。

戴高乐于 1890 年生于法里尔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1912 年于圣西尔军校毕业后，以少尉身份参加阿拉斯城第三十三步兵团，开始了他的军事和政治生涯，此后一直在军队和军事机关供职。1940 年晋升为准将，并在雷诺内阁中任国防和陆军部副部长。

1940 年 6 月中旬，在贝当卖国政府向希特勒德国投降前夕，戴高乐决定离法赴英，并于 6 月 18 日在伦敦发表著名的广播演说，号召法国人民为挽救民族危亡继续斗争。贝当政府投降后，他毅然与它断绝关系，高举反法西斯战旗，发起“自由法国”运动，后改名为“战斗法国”运动。1943 年，他在阿尔及尔领导成立“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为光复法国、重振法兰西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第四共和国期间，法国政局不稳，政府屡次更迭。

1958 年，国民议会授权戴高乐组织新政府，并通过新宪法，成立第五共和国。戴高乐在担任总统期间，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反对强权政治，反对美国控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反对美帝称霸世界。他响亮地提出“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的口号。并冒着国内军政界顽固坚持殖民主义势力的强烈反对，逐渐引导法国民众舆论从支持阿尔及利亚“自决权”，转而支持“阿尔及利亚人的阿尔及利亚”，进而支持“阿尔及利亚共和国”，最后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从而“圆满地完成了非殖民化进程”。这是戴高乐顺乎历史潮流的一大壮举。

1970 年 11 月 9 日，戴高乐逝世。11 月 11 日，毛泽东主席在致戴高乐夫人的唁电中，称戴高乐为“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戴高乐为法国人民留下了丰富的遗产，特别是他那无畏无惧、顽强不屈的奋发精神，受到法国和世界人民广泛的称颂。

1990 年，是戴高乐号召抵抗法西斯侵略的著名“六一八”讲话发表 50 周年，也恰是他诞生 100 周年和逝世 20 周年。法国出于对戴高乐将军的敬仰，把 1990 年称作“戴高乐年”，从政府部门到各社会团体都举行各种纪念活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在 11 月份举办“戴高乐在他的世纪”国际日活动，以表达世界人民对这位将军的深切怀念之情。

法国“戴高乐研究所”副所长皮埃尔·勒法兰先生，对戴高乐将军的丰功伟绩作了这样的概括：“戴高乐将军在世界上树立了法兰西的崇高形象，在他去世 20 年后，他仍然活在法国人民的心里，在法国这样一个意见纷坛的国度里，戴高乐被公认为法国本世纪最伟大的民族英雄，”

勒法兰说，在他和戴高乐将军共事多年的岁月里，他感触最深的是将军那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品格。他历经坎坷，却从未动摇过自己的信念，始终朝着他的目标奋进。另外，将军俭朴无私的作风，也给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戴高乐始终以法兰西民族的利益为最高利益，在国家困难的日子里，他不愿迁居豪华的总统别墅，自费租赁了一所住宅；他拒绝了授予他的元帅军衔和勋章，只保留了将军中最低的一级即准将军衔；辞职后，他拒绝了总统年金，而只靠撰写回忆录的稿酬生活，并把除维持生活之外的大部分稿酬捐献给残疾人基金会。

笔者怀着对戴高乐将军的敬仰之心，根据多年积累的材料撰写了这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曾参阅了国内外出版的法国反法西斯战史和有关戴高乐将军生平的书籍和文章，还和一些研究法国问题的专家交换过意见，现于本书出版之际，谨对给予帮助的朋友们深表谢意，并欢迎读者多多赐教。

解力夫
1990年岁末于北京

坚韧不拔 戴高乐

第一章 教师之子

报效祖国双亲愿，教导儿子记心间；
发愤图强怀大志，为国为民创新篇。

夏尔·戴高乐，这位令人敬畏的将军，在法国反法西斯历史上曾经大放异彩。当你读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传奇式的经历时，戴高乐将军定会成为你敬慕的英雄。

1890年11月22日，戴高乐将军出生在一个世代殷实的法国北方市民和下层贵族之家。这个家庭具有恪尽职守、为国效忠的传统。戴高乐家族原先居住过佛兰德、香已尼以及布尔戈尼等地。15世纪，戴高乐家族中有人和英国国王打过仗。18世纪，有一个后裔曾担任过巴黎议会的检察官。1835年，戴高乐将军的祖父，朱利安—菲利普·戴高乐与若泽菲娜—安娜—玛丽·马约联姻。若泽菲娜虽然家在敦刻尔克拥有一家烟草工厂，却是里尔市人。这样，布尔戈尼的戴高乐家族又恢复了他们的祖先和法国佛兰德地区的联系，这是一桩颇力有趣的婚事，从社会地位看，它使布尔戈尼一个贵族文官家庭和以勤劳著称的佛拉芒人居住的北部地区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结为姻亲。从个人角度看，它使一位史学家和一位作家成为眷属。

戴高乐的祖父有他非凡的一生。他致力于历史的研究，潜心阅读中世纪的证书，辨认和收集巴黎教堂的铭文，1839年出版了《巴黎及其近郊新史》一书。朱利安—菲利普是保皇分子和天主教徒，他认为在正统遭受严重的破坏之后，历史应该恢复其连续性，祖国应该重建。他的巴黎史是对已退休的国民会议员迪洛尔的巴黎史的回击。他认为：“迪洛尔扬起世纪的尘埃，只是为了寻找点燃他仇恨之火的干柴，他祭起历史的亡灵，只是为了把它变成魔鬼和怪物。”朱利安—菲利普·戴高乐属于这样一种人：对于他们来说，法国历史应该使法国人团结在一起，正如宗教使圣徒们团结在一起一样。

戴高乐将军的祖母在事业上超过了她的丈夫。她是文学界一位杰出的女性。那时，一般富家女子，最多只不过是艺术稍事涉猎，没有人赞成她们去干什么更有抱负的事情。但不受；日思想束缚的若泽菲娜却担任了一家名为《家庭通讯》刊物的主编。她在这个刊物上大胆地发表了革命社会主义者朱尔·瓦莱斯的一些文章。然而，若泽菲娜本人并不是社会主义者，她是一位热忱的天主教徒，写过十余本虔奉宗教的著作，书中浓厚的宗教道德色彩，在当时深受称赞，她思想活跃，才思敏捷。使她一举成名的小说《阿代马尔·德贝尔卡斯托》至今仍然吸引着不少读者。此外，她的著作中还有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勃里昂的传记和名为《爱尔兰解放者奥康内尔》的传记。这两部传记对她孙子夏尔·戴高乐的志趣产生了奇妙的影响。因为戴高乐后来极为钦佩夏多勃里昂，而她在奥康内尔传记中所阐明的主题则与戴高乐的毕生活动并行不悖。若泽菲娜在《爱尔兰解放者奥康内尔》中赞扬那位爱尔兰的爱国者进行了一场不流血的革命，用尊重法律和秩序的办法解决了问题。

这对夫妇，虽然性格各异，但关系十分和谐，他们生养了三个儿子，其中两人即是戴高乐将军的伯父。三个儿子在父母的教导下都有其不平凡之

奥康内尔（1794—1855）英国宪章运动的领袖之一。爱尔兰人。早年参加爱尔兰独立运动。183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后参加宪章运动，为“暴力派”领袖之一。1837年创办《北极星》报，宣传暴力改革思想。晚年成为合法主义者，不再主张暴力斗争。

处。长子夏尔，患有痼疾，毕生从事凯尔特人 问题的研究。他学会了威尔士语和布列塔尼语，并发表了一些用布列塔尼语写的诗歌，使用的笔名是巴兹·戴高乐，在布列塔尼语中意为“吟游诗人戴高乐”，他还写过一部关于19世纪凯尔特人的书，他既是学者，又是幻想家。他曾幻想把布列塔尼人同威尔士人、爱尔兰人以及苏格兰人联合在一起，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凯尔特人的联邦。夏尔不仅是一位有影响的诗人，而且还是凯尔特人的一名坚强的战士。他在一首战斗的诗篇中写道：“在每一个遭到夜袭的军营里，每个人都在与敌人激战，他们是不问举起军旗发出第一声集合令的人的军衔高低的。”这句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曾引起他的侄子夏尔·戴高乐将军的强烈共鸣，并以此勇敢地向法兰西人民发出了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战斗号召。

诗人夏尔的弟弟是位昆虫学家，他对法国5000多种黄蜂和蜜蜂进行了分类编目。法国自然博物馆里至今还陈列着他的肖像。无论是凯尔特战士还是昆虫学家，他们都和他们的父母一样，把生命寄托在自己所钟爱的事业上。

第三个儿子亨利生于1848年，这就是戴高乐将军的父亲。1886年亨利和表妹让娜·马约-德拉努瓦结婚。让娜是一位虔诚信教的女子，她的两个姐姐都是修女。在她的近亲祖辈中有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亨利·戴高乐身材修长，器宇轩昂。他选定了军人职业，并考取了为陆军训练技术人材的巴黎工艺学院，1870年，他22岁。当时，在和德国战争中，法国正面临失败，亨利·戴高乐响应甘必大的号召，志愿加入了“国民别动队”，在巴黎被围时，他是陆军少尉，率领一排人参加了斯但斯和布尔歇的战斗。后来父亲朱利安-菲利普突然去世，家庭重担落在他的肩上，因此他改变了原先的计划，最后选择了教育为终生职业。亨利先作教师，后来当了沃吉拉尔耶稣会学校的学监和校长。亨利是一个知识渊博并有坚定道德信仰的人。他没有古怪的嗜好，他爱上帝，爱国王，爱祖国，爱青年，他把上帝和国王的思想灌输给青年一代。

亨利·戴高乐是一位穷教士，为了抗议法院对他一位同事的不公正判决，他辞去了公职，来到一所初级中学教授文学和数学。他神情严肃，长着一双象牙一般的手，常常创作希腊哀歌。在政治观点上，他自称是“一位悔恨的君主主义者”。亨利夫妇有五个孩子，四个儿子，一个女儿。饭前祝福经念过之后，全家人边吃饭边用拉丁语就各种问题发表议论。星期四下午，他们常去拿破仑墓或在凯旋门前静默志哀；星期天教师带着他的孩子们去凡尔赛，有时去斯但战场。

1871年巴黎被围困的时候，亨利是别动队的中尉，有一次在驻军突围中受伤。

1871年的失败，对夏尔的童年来说就像一张痛苦的蜘蛛网经常困扰着他的心。戴高乐将军在《回忆录》里专门提到在他童年的心灵上形成的某种“思念法兰西”之类的教育，它是通过方形王旗和简练的碑文，通过对光荣或牺

凯尔特人，公元前1000年左右居住在欧洲莱茵河、塞纳河、卢瓦尔河流域和多瑙河上游的部落，语言属印欧语系凯尔特语族，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初期间，创造了拉登文化·能制造陶器和精美的金属品，其后裔今散布在法国北部和爱尔兰岛等地。

甘必大（1838—1882），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第二帝国时期共和派左翼领袖。1870年9月革命后任国防政府内政部长，巴黎被围后曾到外地，企图组织新军抗击普军。曾领导共和派反对保皇党恢复帝制的阴谋，捍卫了第三共和国。后任议长和总理，主张对德进行复仇战争。

牲的回忆，通过罗斯丹·特泰依等著名作家的作品以及史诗歌曲等进行的。总之，王冠、祭坛、军队和教会构成了戴高乐一家的正统思想。

夏尔·戴高乐是亨利的第二个孩子。父母俩把他们的长子起名力格扎维埃，这次他们较为明智地把次子称为夏尔，希望夏尔长大成人之后，要与公众的命运，与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1890年，夏尔·戴高乐诞生于里尔市公主街上玛约的故居。在这幢房子的正面有一个壁龛，位于高大正门上方的左侧。龛洞里塑了一尊圣母德拉福伊的小雕像，人们从铁栅外几乎难以看清。正门外围毫无修饰，这与四周各种豪华的建筑物形成鲜明对照。戴高乐家这些孩子们长大后将知道生活并不是一场游戏。法国著名作家拉古都尔说，戴高乐的世家根本不是什么“资产者”，而是一些笔墨文人、教士和国家办事人员，他们多是一些自食其力的知识分子。

1962年，戴高乐将军也为他的家世辩解说：“资产者？我从来就不是，资产阶级，就是财富，就是占有财富的意识，或是攫取财富的欲望。我的家庭和我，一直是贫穷的……我从未感到与这个阶级的利益和愿望联系在一起。”

戴高乐诞生的时候，正是路易一拿破仑亲王进行彼拿巴主义实验的时候。这个身材矮小、盛气凌人的拿破仑三世，之所以能成功地取得政权，固然因为他长于权术，善于自吹，但同样重要的也是由于他的名字所具有的魅力以及人们川昔日拿破仑帝国光荣历史的怀旧之情。在八年左右的时间内，他使法国人有了一个隍全的、有权威的政府，在经济上获得了发展，甚至还在国外取得了胜利，特别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与英国结盟，打败了俄国。他像拿破仑一世那样扼杀了人民的政治自由，但也像拿破仑一世一样，由于帝国声威大振而颇得人心，第二帝国初期的稳定，无疑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路易一菲力普国王（1830—1848）曾在法国建立了铁路网，而拿破仑三世则把它扩大了两倍多，到1870年，法国已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工业强国。

法兰西第二帝国为了维持金融贵族和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实行反动的军事独裁。对内残酷镇压人民，对外竭力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多次参与欧洲的争霸战争。它吞并了意大利的萨伏依和尼斯，远征墨西哥，完成了对阿尔及利亚的征服。它还发动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并把侵略魔爪伸进了越南和柬埔寨。

1866年，普奥战争和北德意志各邦统一后，法国和普鲁士统治集团各怀鬼胎，加紧进行战争准备，路易·波拿巴力图通过战争，阻止德意志的统一，掠夺莱茵河左岸的德意志领土，扩大法国在欧洲大陆的势力，摆脱帝国内部危机，扼杀国内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巩固波拿巴王朝的统治。俾斯麦则打算通过战争，自上而下地建立一个由普鲁士容克地主领导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并想占领法国矿产丰富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双方剑拔弩张。

1870年7月19日法国首先向普鲁士宣战。由于路易·波拿巴的反动统治早已腐朽透顶，人民不支持，因此战争开始后，法国连吃败仗，它的虚弱本质很快就暴露无遗。8月中旬，法军主力被分割成两部分：一部分被围困于北部要塞梅斯；一部分由路易·波拿巴自己率领，被包围在色当要塞，9月1日色当一战，法军大败，路易·波拿巴成了普军的俘虏。10月27日，由巴赞元帅率领的17万法军也在梅斯向普鲁士军队投降，最后导致了第二帝国的解体，就这样，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又有一个拿破仑为法兰西带

来了“光荣”，也使它蒙受了屈辱。

法国问题专家、戴高乐传记作者布赖恩·克罗泽说，第二次的灾难给法国造成的后果比1815年更加悲惨，教训该是够大的了。1871年1月28日，法国“国防政府”同普鲁士签订了卖国的停战协定。随后国民议会抬出梯也尔充当政府的首脑。梯也尔是一个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客。在七月王朝时期，他曾担任内务大臣和首相，残酷镇压过1834年里昂起义和巴黎共和派起义。在1848年革命中，他成为复辟君主制度的拥护者，支持路易·波拿巴为总统候选人。第二帝国后期，他又加入了温和的自由主义反对派。他是一个背信弃义、卖身变节的老手，私人生活和社会活动同样卑鄙龌龊。马克思说：“他的社会活动编年史就是一部法国灾难史，”梯也尔上台后加快了卖国投降的步伐，很快同德国订立了对法国来说极其苛刻的和约，不仅赔款50亿法郎，而且还割让阿尔萨斯全省和洛林省的一部分，以便腾出手来对付他所面临的革命风暴。

然而，第二帝国的失败，却没有阻挡住另一次波拿巴主义的冒险——布朗热将军的冒险。布朗热将军，1886年当上了第三共和国的陆军部长，一度大出风头，并发表过一些哗众取宠的讲演。

他还有一个表面上的消极资本，普法战争失利，巴黎战斗刚刚开始，他就负了伤。这使他免于卷入对革命的巴黎公社社员的镇压。因此，他不仅能被军人所接受，而且得到了下层民众的欢迎。

但是，在反普情绪达到最高潮时，布朗热身上就出现了波拿巴主义了。他使民众的复仇主义情绪具体化了。他的“共和化了的”军队可以成为法国对德国人复仇的工具。

1889年1月，俾斯麦在国会的一次讲演中称布朗热为建立德法两国间良好关系的最大障碍。于是，布朗热一夜之间就成了“复仇将军”。但是，到5月份，内阁垮台了。布朗热立即搞起了阴谋活动。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法国共和时期的丑闻之一——威尔逊事件给布朗热提供了机会。格雷维总统的女婿达尼埃尔·威尔逊一直在进行勋章和奖章的交易，从中大发其财。此事牵连到许多高级人物，事情败露之后出现的长期危机，使总统和他的政府不得不辞职。在此情况下，保皇党人和波拿巴分子断定只有布朗热才能拯救法国。1889年1月，布朗热以相当多的选票被选入国民议会。扶他上台的政变也已准备好了。如果布朗热真的像他在演说中所表白的那样坚定果敢，政变也许会获得成功。然而，他那轻浮和懒惰的本性却占了上风。布朗热在慌乱之中抛弃了他的追随者。过了不久，眼看要受到起诉，他逃到布鲁塞尔去了。

30个月以后，他在情妇的墓旁自尽了。

就在布朗热危机达到高潮时，又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巴拿马运河公司倒闭的事件。该公司董事长费迪南·德莱塞普斯和他的同事，被控告犯有贪污罪。1892年，丑恶的贿赂内幕被揭开。该公司为了掩盖它的真实财政状况和滥用新筹集的资金，曾广泛收买议员、部长、官员和报刊编辑，不仅共和党温和派头子被收买，连激进党的首脑克利孟梭也在受贿之列。在政府的庇护下，法院竟宣判受贿人“无罪”释放。臭名昭著的巴拿马丑闻向世界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资本主义生意人的共和国；在那里，政治同其他一切一样，只不过是一种买卖。”

在共和政府的统治下，帝国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日益明显地暴露在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政局不稳，执政头目频繁更换，是法国政治腐朽的一

个表现。在法国议会中，并没有一个持久稳定的资产阶级大政党，而是党派众多，有所谓“多党政治”之称。各党派在选举前夕很容易联合，又很快散伙。党派之间的不断斗争，引起内阁频频更迭。

1873至1890这18年间，先后更换了30多个内阁，平均每届政府执政时间只有6个多月。

巴拿马丑闻、威尔逊事件和布朗热的未遂政变，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保皇派和一些资产阶级反动政客，为了转移人民的斗争视线，又制造了一个所谓“犹太军官德雷菲斯向德国人出卖情报的案件”，煽动沙文主义情绪，从而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反犹太主义的恶浪。几年后查明，德雷菲斯是无辜的，真正的罪犯是一个法国籍的匈牙利军官，但共和党温和派政府极力捂住真相，不愿重新审理，这一系列丑闻，使广大选民认为共和国的政治家们已经腐败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尤其是面对着普鲁士作为最强的大陆国家在欧洲崛起，感到形势危机，不少人心中滋长着一股强烈的复仇情绪。

夏尔·戴高乐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听父亲讲述他在德国人包围巴黎时负伤的经过，听母亲回忆她的双亲在得知踌躇满志的巴赞元帅率领全军投降的消息时潜然泪下的情景。亨利向儿子指出，理想中的法国庄重威严，笃信宗教，国势强盛，而如今道德堕落，国难当头，问题丛生。尤其是由于排犹引起的对年轻的犹太军官德雷菲斯的陷害事件，引起了全社会的不满。这一事件严重损害了军队的威信，不少军官辞职，报考圣西尔士官学校的人数也减少了。年轻的戴高乐痛恨军、政界的腐败，若干年后，夏尔·戴高乐对德雷菲斯事件写下了如下一段文字：

“正当民众的感情开始与军队疏远的时候，由于命运的摆布，爆发了一场最有可能加深各种恶意的危机。在这场可悲的审讯中、足以毒化民众情绪的做法无所不有。控告者伪造证据，不负责任，恣意攻击，更增加了司法方面错判的可能性；但是，有些人或出于信念，或为了国家利益，决心维护为国效力的统治集团的一贯正确性，他们惶恐不安地拒绝承认司法上有什么错误。案情越来越扑朔迷离：一大堆纠缠不清的事件，各种各样的阴谋诡计，又是坦白交代，又是撤回证词，又是互相决斗，又是自杀事件，还有辅助审讯，使对立的双方都火冒三丈，并常常把他们搞得晕头转向。这时出现了一股有害的疯狂情绪，不分青红皂白地破坏了法国人对自己力量象征的起码尊重（分裂的法国人正在用这种力量使自己团结起来），同时也破坏了人们的信念、友谊和相互尊敬。”

一位专门研究戴高乐生平的作家说，要完全理解当时的情况，夏尔·戴高乐还小了几岁，不过他那时的年龄倒足以使他在后来认识到，德雷菲斯事件对他父亲那一辈人意味着什么。国耻和失败，爱国和祸国，信念和宗教，这些都是亨利·戴高乐对儿子教诲的内容。在父亲的教导和影响下，夏尔·戴高乐从小就立下了报效祖国、重振法兰西的宏愿。

戴高乐除了受惠于父亲的教导外，还受到一些进步作家和政治家的影响。夏尔在童年时代，最喜欢读诗人罗斯丹的作品。在他十岁生日这天，父亲带他去看罗斯丹的《小鹰》。他被这出爱国主义的戏剧迷住了，一回到家就说他将来要当兵。后来，他把这位诗人的作品《西哈诺》全都背了下来。佩居伊是戴高乐青少年时代崇拜的文学家和爱国者，这种崇拜后来毕生不衰。这位严肃而神秘的诗人，深受柏格森的影响，他与柏格森一样对陈旧思想厌恶之至。他写诗笔法细腻，精巧娴熟，大部分都以圣女贞德为主题。诗

中表明他理想中的法国是基督教美德的化身。在他看来，法国是母亲，她的儿子们的责任就是为她效劳，这个观点对夏尔·戴高乐一生都有很大影响。

戴高乐从小就喜欢博览群书，不仅读罗斯丹的作品，对获得诺贝尔奖金的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作品也十分喜爱。他认为柏格森的作品蕴藏着无穷的智慧，给人以启迪和力量。他曾阅读了这位哲学家的《物质与记忆》和《创造性的进化》等著作。当时的柏格森被称为思想自由的代表，是直觉主义的捍卫者。他提倡一种“思念法兰西”的教育和对伟大个人命运的坚定信念。他成了这位早想脱离凡俗的年轻人心目中的武器和旗帜。后来，当戴高乐成为军事理论家和政治实践家的时候，他还常常以柏格森为动力。

在这位富于幻想的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历史小说和名人传记也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在父亲的指导下，他不仅从历史中认识过去，而且也要学着从历史中展望未来，为此他阅读了大量的历史作品，尤其对战史和战斗英雄故事十分感兴趣。从阿莱西亚军营到色当军营，从加洛林王朝教育法到著名政治家法鲁的教育法，从龙格维尔夫人的武装出征到贝雷公爵夫人的鲁莽行动，从法国古时的盐税改革到当今的国家财产法，他都能通今博古。戴高乐还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就从法兰西 15 个世纪的历史中得出两大教训，并以此作为他的理论基础，如同把柏格森思想作为他的方法论基础一样，作家拉古都尔说，这是夏尔·戴高乐坚信不移的两种不可多得的思想：从菲利普·奥古斯特到布朗基，法国历史是一个整体，法兰西民族也是一个整体；除非出现“分裂主义分子”，否则人人都可以为国效劳。他对法兰西延续性的坚定态度，使他兼容各种学说，他认为排他性只会危害不可分割的民族整体的生命。然而这个民族在他看来应是坚定的民族！他后来在《法国和它的军队》里写道：“我当圣西尔军校生是为重新夺回阿尔萨斯地区，也是要让法兰西旗帜发出耀眼的光芒！”他认为为了祖国的振兴和繁荣富强，每一个公民都应作出自己的奉献。

夏尔·戴高乐在童年，除了爱好书籍外，就是喜欢玩打仗游戏，而且他玩得似乎比谁都认真。一天，小弟弟皮埃尔哭着跑回家来，妈妈问他出了什么事，他说：“夏尔打我了。”妈妈追问根由，皮埃尔说：“我们玩打仗，我装特务，送情报时被抓注了。我没有执行司令官的命令……”

“哪个司令官？”妈妈急着问。

“就是夏尔！”弟弟说，“我没有把情报吞掉，我把情报交给敌人了。为此，夏尔把我痛打一顿。”

还有一次，夏尔的哥哥格扎维埃由于一直装扮德国皇帝而感到腻烦了，想换着当一回法国国王。但夏尔不答应，他生气地喊道：“不行！不行！法国是我的！”

凡是见过 1900 年间夏尔·戴高乐的人，都能记起，他是个眼睛里显露出勇敢精神的瘦弱儿童。有的人说，他是个非同寻常的孩子。他的老同学说，他总是垂下眼睛，然而他对自己十分自信。十几岁时，他像同龄的孩子们一样，喜欢从楼梯扶手上滑下来，曾摔倒过一次，大家把他扶起来，问他：“你心里不怕吗？”——“怕？难道我丧失了火花？”

布朗基（1805—1881）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曾积极参加 1830 年的七月革命和 1848 年二月革命，组织过四季社等秘密团体，领导过多次秘密起义，但他不了解组织工人革命政党和依靠广大群众的必要性，认为通过少数革命家的起义和专政，即可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

夏尔·戴高乐 14 岁时，他在父亲的告诫下更加用功学习，成了班上的尖子。15 岁那年，他又在诗歌创作上作了一次尝试。他偷偷地写了一短诗剧，取名《苦相逢》，剧中描述了一个天真的过路人被一个奸诈的恶棍骗走了钱财的不幸遭遇。他把稿子寄给一个文学刊物。这家刊物让他选择，要么接受 25 法郎的报酬，要么发表他的作品。他的禀性使他选择了后者。

戴高乐中学快毕业了，他已经下决心要当军人，他对父母说：“我打定主意了，我准备报考圣西尔军校，我要当个军人。”夏尔认为，在国势日衰的情况下，投笔从戎是报效祖国的最好的方式。他在巴黎准备了圣西尔入学考试。

1909 年 8 月，他得到通知，他已经被录取了。他的军人生涯就要从此开始了。

第二章 立志从军

四分五裂国势衰，热血沸腾心潮来；
立志从军报祖国，来年迎春花盛开。

戴高乐从小受父母影响，笃信宗教，他当时曾在校刊上撰文捍卫神父，年轻的戴高乐已属于那些主张在凶悍者面前决不后退的人。他对有些人指控教皇的士兵唆使青年抛开祖国的事业，义愤填膺。因此，他引用了德维拉尔元帅对路易十四说的一句话：“当我是军队首脑时，我从未见过比属于教会组织的士兵更积极，更雷厉风行，更英勇无畏的士兵。”

夏尔·戴高乐 14 岁左右就有志于军事，他十分认真地培养自己的记忆力。他热爱文学，爱读雨果、罗斯丹、萨曼等人的作品。他在家演出了亚历山大诗体短剧《著名的相会》。当时，观看的人从中发现，“威慑”的理论在这个年轻人身上已经萌芽，发现他对武力和计谋的颂扬令人担忧。这些无疑是不成熟的追求权势欲表现出的言论和感想。他的父亲见此情况担忧他说：“夏尔这孩子很聪明，但想入非非……天哪！我宁愿他有三个情妇，也不愿看到他丧失宗教的信仰！”

跟随戴高乐 23 年的奥利维埃·吉夏尔说，“夏尔·戴高乐对宗教的信仰是无懈可击的。然而军事思想培育了这颗伟大的心灵，造就了这位巨人。”许多材料说明，戴高乐所以决定从军，主要是受“复仇主义和爱国思想所驱使”。法国在被普鲁士打败后的 25 年间，整个法国热爱军队，把它比作一切希望所在的“圣约柜”。人民应征入伍，热血青年云集于圣西尔军校。著名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当时曾大声疾呼：“如果人类社会里有人人都赞赏的神圣东西，那就是军队。”当时法国政治派别林立，政局不稳，在动荡不安的共和国内，军队成了“正统派的避风港”，这是诗人保罗·戴鲁莱德的观点。夏尔的父亲亨利·戴高乐在家中向孩子们朗诵了这位诗人的诗篇：

在四分五裂的法兰西，
哪个法国人把这作为座右铭：
人人为大家，大家为国家？
答案是——士兵。

保罗·戴鲁莱德大约在 1885 年向士兵，向愿意“在各派角斗中放下武器、恢复秩序、重建民族大团结，把国家从外来威胁中解放出来”的人发出了呼吁。

当时，军队和官方的文职人员。政治家组成的法兰西之间的蜜月结束了，无论从报刊上还是在大学里，开始了反对军国主义的漫长的历程，个人主义者、人道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都嘲笑复仇，“不再为阿尔萨斯—洛林沦陷而悲伤”。就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还是要立志从军。他所以如此，主要从父亲书库中找到了根据：

法国作家朱尔·勒梅特尔说：“军队捍卫着有形的东西——边疆，无形的东西——祖国，即主根于人民之中的法兰西。”

法国教育家埃米尔·法盖说：“军队是祖国的灵魂，即祖国本身。”

夏尔·莫拉斯说：“没有国王，军队便是各派力量统一的唯一因素，它具有稳定和统一两大优点。”

但是，进圣西尔军校，对于 1909 年的这位年轻人来说，再也不像他童年时代梦想的那样简单，那样容易了。他的许多同学都犹豫不决，自暴自弃。

戴高乐后来在《法国和它的军队》一书中回忆说，“1900年到1911年，圣西尔军校的考生从1895人减少到871人，”面对着这种形势，戴高乐意志坚定，他坚持认为：“军队是堡垒，它将决定一切。如果堡垒倒塌，只有依靠它本身才能把漏洞补上。在这动荡的四分五裂的国度里，如果有复兴的希望，这个希望必将通过军队并且首先在军队里产生。”

戴高乐还认为，投考圣西尔军校，就可以回避家庭向他提出这样尖锐的问题：选择共和还是国王？他曾转弯抹角地回答：法兰西，他将到军队中去寻找这个法兰西。他的好友奥利维埃·吉夏尔说：戴高乐“在军队里不为理论问题所干扰，他努力生活在融洽和为伟大目标——战争进行准备的紧张气氛之中。”

1909年，戴高乐虽被圣西尔军校所录取，但按国防部的规定，新生入校前必须先当一年兵，戴高乐的这一年是在驻阿拉斯的第三十三步兵团九连度过的。他不喜欢这种生活，日复一日的军事操练和削土豆皮之类的杂务，使人腻味透了。他唯一可以寻求慰藉的地方是坐落在古修道院里的阿拉斯市立图书馆，那里存有僧侣们精心收藏的图书。有人问他的连长德蒂尼上尉，为什么不把戴高乐提升为中士，上尉答道：“我怎么能把这样的小伙子升为中士？他只有当上大元帅才会称心如意哩！”

这个勤奋好学的年轻人早就选定了军人这一职业，但直到进了圣西尔军校他才感到如鱼得水，由于他个子高大，又勤奋好学，在圣西尔颇引人注目，平常同学们很少称呼他的名字，都叫他“大公鸡”、“大夏尔”。除了关于他身材的绰号外，还有一个取笑他的大鼻子的绰号——“西哈诺”。因为戴高乐喜欢罗斯丹的作品中的“西哈诺”，所以并没有因此而感到不悦。有一次，大家还开他的玩笑，让他站在桌子上背诵了一段《西哈诺》。1912年，他曾装扮成小丑，表演了一个杂技节目。还有一次，在圣西尔为庆祝“胜利日”而组织的歌舞演出中，他扮演了“乡下的未婚夫”。为了启发同学们的爱国精神，夏尔·戴高乐还向同学们发表了多次即席讲演，在这些谈话中，他追溯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年代日期，记忆力令人惊异。他在练习本上摘录了维克托·雨果的一段话：“风格简洁，思想精确，遇事果断。”显然他是严格地以此为座右铭的。

1912年10月1日，夏尔·戴高乐从圣西尔毕业，军衔是少尉。按照学校的规定，学生毕业后可以任选一个团供职。夏尔·戴高乐选中了自己当年见习士兵生活一年的第三十三步兵团。于是，他回到了阿拉斯。那时，团长已经易人，新任团长为后来当了元帅的菲利普·贝当上校。一天，贝当团长在斯卡贝河岸上给他手下的军官们讲解人力的重要性，他的观点在当时的总参谋部里算是“先进的”，因为大部分人仍然认为刺刀比枪炮优越。贝当在讲到孔代王于的一次演习时，年轻的戴高乐立即打断了他的话头，指出蒂雷纳元帅是用炮火压倒孔代而拯救了阿拉斯的。这个下级军官的插话，引起了团长的好感。贝当挽起了戴高乐的胳膊，离开了其他军官，和他讨论起孔代和蒂雷纳两人各自的长处。这是他首次受到贝当的青睐。这种交往后来发展成为一个高级军官和一位有才华的年轻门徒之间的友谊。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德军人侵法国时，由于各自的立场。态度截然不同，他们分道扬镳了。

1913年10月，戴高乐晋升中尉，那年他已经23岁。那时，戴高乐手下的士兵们多是北方人，有加来海峡省的矿工，有来自塔尔德努瓦、蒂埃拉克

和瓦兰西昂努瓦等地区的农民。他们粗犷强悍，自尊心强，吃苦耐劳，喜怒之情常常猛烈地迸发出来。这样的人倒使戴高乐十分中意，官兵关系非常融洽，在一股强烈的复仇情绪的支配下，战士们在加紧训练，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

当时，欧洲正无可挽回地走向战争。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斗争愈演愈烈。英法两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 19 世纪的最后 30 年里，由于技术装备的落后和资本大量输出，经济发展几乎陷于停滞状态，美、德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却由于利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成就，采取大规模的垄断组织形式，向新兴工业部门进行大量投资，较快地提高了自己的工业水平。资本主义各国在世界工业生产总额中的比重迅速改变了，到 19 世纪末，英国丧失了“世界工厂”的地位，美国的工业生产总额已跃居世界第一位，而德国则在欧洲首屈一指，日本的工业生产的绝对数字虽然还较低，但在发展速度上却超过了其他许多国家。

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新的力量对比，同历史上形成的殖民地、市场和势力范围的占有状况，已极不相称，1900 年，英国占有 3271 万平方公里土地，3.67 亿人口；法国占有 1098 万平方公里土地，5000 多万人口；俄国则吞并了相邻亚洲各国的 1728 万平方公里土地，2500 多万人口，英、法、俄三国占有了最广大的殖民地势力范围。连荷、比、西、葡等欧洲小国，也占有了 674 万平方公里土地，6500 多万人口，远远超过后起的资本主义强国美、德、日三国殖民地总和。这种状况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所不能容忍的。在世界还未被它们瓜分完毕的时候，它们之间的冲突，还可能通过宰割和分配新的“自由的”土地来暂时得到缓和，但是，在世界已被瓜分完毕的情况下，它们的冲突就只能通过剧烈的军事较量来获得解决。重新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就不可避免了。

到了 20 世纪初，德法矛盾已十分尖锐。法国人渴望收复阿尔萨斯—洛林，而德国人希望攫取更多的法国殖民地。双方都在加紧备战。尽管 1900 年以后军事预算直线增长，法国的武器装备仍远远落后于德国。德国的军费为法国的两倍。法国普安卡雷政府只得大量增加军队所需的武器装备。到 1912 年，三年之内军队的机枪增加两倍多，野战炮增加了三分之一强。1914 年，法国拥有 136 架正规作战的飞机。这就部分地改变了装备落后的状态。然而，法国军队在人数方面仍然落后。德国刚刚将自己的现役军队增加到 85 万人，法国可以立即动用的士兵只有 54 万人。为了缩小差距，法国必须改变征兵法令并将服务期限延长至三年。

20 世纪初年，国际风云变幻，以英、德为首的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展开了争夺世界霸权的激烈斗争，国际关系极度紧张，军事冲突和局部战争连年不断。帝国主义国家争夺霸权的激烈冲突，导致用战争手段来打击对手，引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萨拉热窝事件便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1914 年 6 月，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前往波斯尼亚检阅军事演习，并访问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这次军事演习是把塞尔维亚作为假想敌人的。这件事引起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愤怒，他们认为这次军事演习是对塞尔维亚的挑衅，认为斐迪南的野心是企图扩大奥匈帝国的版图，强化奥匈帝国的统治，阻挠和扼杀塞尔维亚的民族运动，在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军人团体“黑手会”的组织下，几名塞尔维亚青年于 6 月 28 日在萨拉热窝街头刺杀了斐迪

南。

萨拉热窝刺杀事件，立刻被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利用为挑起冲突、实现它们的侵略野心的借口。德皇威廉二世闻讯后疯狂叫嚷：“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接着就是一个月的紧张的幕后外交活动。德国极力怂恿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发动进攻，保证给予支持；俄、法表示支持塞尔维亚；英国则玩弄狡猾的外交伎俩，向德国表示要尽一切力量防止战争的发生，但私下却加紧备战。蓄谋已久的一场大战就这样爆发了。德国企图从英、法手中夺取殖民地，从俄国手中夺取乌克兰、波兰及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并摧毁英国的海上霸权。俄国则企图占领君士但丁堡和黑海海峡，夺取加里西亚，进而削弱德国的实力。英国企图击溃经济上和军事上最危险的竞争对手德国，夺取德国的殖民地以及土耳其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法国企图粉碎德国的大陆霸权，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夺取德国富产煤铁的萨尔区。日本帝国主义则想夺取德国在东方的殖民地，奴役中国及远东各国人民。帝国主义列强正是想在一场大规模的浴血混战中，凭实力重新瓜分世界，实现和平时期所未能达到的目标。

为了迅速对塞尔维亚采取军事行动，奥匈帝国于1914年7月28日对塞正式宣战。7月30日，俄国下令总动员。8月1日，法、德也几乎同时下令动员。同日，德国借口俄国拒绝取消总动员令而对俄宣战。8月2日，德国向比利时提出最后通牒，要求让德军通过比境，遭到比利时拒绝。8月3日，德国对法宣战，8月4日，德军入侵比利时。同日夜，英国借口德国破坏比利时中立，宣布英、德处于战争状态。一场以欧洲为主要战场的帝国主义大厮杀就这样开始了。

1914年战争爆发后，戴高乐所在的第二步兵师三十三团一营被调到距他的出生地里尔不远的北部边界。九年以前，他15岁时，曾被一个怪梦搅得心神不安——他梦见法德战争在1914年爆发，他在一次战役中，于8月15日阵亡。结果，梦中的事，除了阵亡的结局之外都应验了，8月15日，夏尔·戴高乐在比利时境内马斯河上的迪南附近第一次参加战斗，并且负了伤。自从他在少年时期得到那个预兆之后，他一直以为那一天就是他的末日。据他早期传记作者说，戴高乐这时感到他的生命已不再属于自己，他的余生属于尚待揭晓的某种命运。

在德军入侵比利时之后，在法国边界便展开了一系列激烈战斗，史称边境之战。根据国防部《第十七号计划》，法军总司令霞飞于8月8日发布了第一号命令，规定了法军的作战方案。按照这个命令，法国第一、第二集团军于14日向东北进攻，攻入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头四天，法军进展顺利。面对法军进攻，德军第六、第七集团军边战边退。法国人重新进入40多年前失去的地方，为收复失地感到庆幸。然而他们不知道，德国第六、第七集团军组成的左纵队的主要任务是防御，这个退却是按照计划进行的。就在法军开始进攻的第二天，8月15日，德军以优势兵力突然向迪南杀来，企图夺取那里的渡桥，因此在马斯河畔展开激战，战斗的第一天，夏尔·戴高乐就在迪南负伤了，经过多次较量，法军第十七号计划和霞飞第一号命令遭到破产。法国不仅进攻阿尔萨斯—洛林没有得逞，相反，自己的边境被德军突破，法军被迫向南大撤退。而德军则侵入法国领土，向其心脏地区长驱直入，在此期间，法国的损失相当严重，法国最富裕的北部沦为德国占领区，法军阵亡总数达38万，受伤、被俘和失踪的达60万，战前受过训练的军官80%死亡

和受伤。德军伤亡人数虽比法军少些，但其速决战略的失败，则是其战争前途的凶兆。

夏尔·戴高乐经过三个月的治疗休养，于11月底重返前线。他所在的三十三团，经过激烈的战事，兵员大减。戴高乐重返部队后，勇敢机智，较好地完成了上级交给他的侦察任务。

1915年1月20日，在第二师发布的一道表彰令中，关于戴高乐有这样一段话：“在异常危险的情况下执行了一系列对敌军阵地的侦察任务，带回了有价值的情报。”

以后戴高乐在战斗中又负过两次伤。1915年，西线德军处于战略防御，部署了200万军队，法英联军方面有300万大军，仍以法军为主。德军战线的努瓦荣突出部，离巴黎不到100公里，严重威胁着法国首都。联军企图削平这个突出部，迫使德军撤退。1915年春，法英军队先后在香槟和阿杜瓦地区发动进攻，戴高乐参加了这一战役，并于3月15日负了伤。香槟战役规模很大，由法军第四、第二两个集团军共37个师担任主攻，配备有两千多门炮；第三集团军在马恩河右岸策应。这一战役持续了将近半年。9月20日至25日，法军连续炮轰六天，向德军阵地倾泻300万发左右的炮弹。25日，步兵发起突击。头两天，占领德军第一道防线，俘虏25000人，但以后进攻连续受阻，伤亡达15万人，被迫于11月6日停止进攻。

1915年9月4日，戴高乐的伤势刚刚痊愈就被提升为上尉。10月30日，他受命指挥三十三团第十连。他的部下是来自北方的矿工，团长是布多尔上校。团长对这位下属的勇敢精神印象非常深刻。戴高乐对全连每个士兵的战斗经历及秉性脾气都了如指掌。来到这个连队刚刚三个月，他就要求把他的连队派往激战的凡尔登前线，布多尔上校同意了。他记下了决定中的下面这句话：“鉴于局势严重，而且由于此项任务极端重要，我认为唯有戴高乐上尉才能胜任。”

凡尔登战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之一。

1916年一开始，德军总参谋长法尔根汉就在西线集中兵力，决定选择法国的凡尔登作为进攻的目标。他之所以选在凡尔登，是因为这个地方是协约国西线的突出部分，对深入法比的德军有很大的威胁。同时，凡尔登是法国著名要塞，是通往巴黎的坚固据点和法军阵线的枢纽。如果凡尔登失守，将给法国军民的士气以沉重打击，因此，法尔根汉估计，法国为了保卫凡尔登，必将投入它的全部力量；他认为这次进攻从军事上来说，将成为“碾碎法军的磨盘”。从1916年1月开始，德国就已着手进攻凡尔登的周密准备。德国皇太子亲统德军精锐部队，企图通过凡尔登战役，达到大量歼灭法军的战略目的。

然而，法军总司令霞飞认为，凡尔登要塞已经过时，于1915年将其各炮台弃置不用，而代之以战壕、掩护体、土木障碍和铁丝网等野战工事。部署的军队远远不敷防御之用。在得到德军准备进攻的情报之后，又没有给予应有重视，因此法军处于明显的劣势，在开战前，法国驻凡尔登的兵力只有4个师10万人，270门大炮；而德军进攻的部队有10个师27万人，1000门大炮。

2月21日，德军以猛烈的炮击拉开了凡尔登大战的帷幕。从早晨7点15分开始，持续到下午4点45分，集中了前线所有大炮，对凡尔登附近狭窄的三角地带连续猛轰，把这一小块地方的战壕完全摧毁，把森林烧光，山头削

平，整个法军防线笼罩在浓烟烈火之中。据当时的记载说：“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猛烈的炮火。”与此同时，德国的飞机也对法国的铁路进行了轰炸。当天晚上，德军以六个步兵师在马斯河东岸宽仅十公里的前线上开始向南推进。

2月25日，占有重要地位的都蒙炮台由于完全没有设防，被德军占领。法军阵线被切成数段，与后方的交通也全部断绝，这样，凡尔登的命运和整个法国战线的防御体系均处于千钧一发的危险境地。为此，法国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急忙增派援军，并委任第二集团军司令亨利·菲利普·贝当为凡尔登地区的司令官。贝当已经60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没有打过仗，担任过军事教官和团长。战争开始后迅速由团长晋升到旅长、师长、军长、集团军司令，受到霞飞和卡斯得诺的赏识。贝当受命后，于25日夜里来到凡尔登。他给前线部队划定了一条督战线，要求士兵用一切手段顶住德军进攻，不许退过这条线。并立即组织抢修道路，组建了一支9000人的运输队，每昼夜有6000辆汽车到达凡尔登，平均每14秒有一辆汽车通过。因此，法国人称这条公路为“圣路”。当时法军提出决不让德军通过凡尔登的口号，而德军则决心要攻占凡尔登，于是双方反复冲杀，形成拉锯战，戴高乐所在的部队，就是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被调在凡尔登前线的。他们虽然英勇冲杀，坚守阵地，终因寡不敌众而战败了。

1916年3月2日，德军重炮猛轰戴高乐军阵地。突然间，有人高喊“援军来了！”戴高乐上尉颇受鼓舞，转过身去，看见一群戴着法军蓝色钢盔的士兵。这些钢盔刚才还戴在阵亡了的法军士兵头上，现在却戴在打死他们的德国人头上了。戴高乐恍然大悟，知道受骗了，马上命令全连上刺刀冲锋。几乎就在同一瞬间，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大腿，他昏倒在地。布多尔上校眼见他中弹倒下，遍体鲜血，以为戴高乐上尉死了，战斗结束后就写信通知他的双亲，说夏尔已经阵亡了。贝当将军接到报告后，立即“追授”这位年轻的上尉一枚最高荣誉十字勋章，并写了下面这段话：

“指挥该连的戴高乐上尉素以其在德智训练方面的优异成绩著称，是日，其所在营遭敌猛烈炮击，伤亡惨重，同时敌人又从四面向其连队逼近。该员率部勇猛出击，与敌展开激烈肉搏，这是不违背其军人荣誉感的唯一抉择。该员在激战中以身殉国，不愧为在各方面均无与伦比的军官。”

其实，戴高乐并没有死，他负伤晕倒在地后，被德国人俘虏了。他经受了两年零八个月的囚犯生活。起初，他被关在弗里德贝格的战俘临时收容所，他刚刚恢复健康，就开始挖地道。并通过地道逃到了荒郊。可是他个子高，躲不住，又被逮住了。第二次尝试也失败了，因为他偷来的德国制服短得几乎连肘部和膝盖都遮盖不住。第三次试图逃跑也未成功。此后，戴高乐被转押到因戈尔施塔特的惩罚营。他在那里结识了其他一些逃跑未遂的勇敢人物，如雷米·鲁尔，此人后来成了《时报》的专栏作家，经常撰文支持戴高乐；贝尔热-莱弗罗尔，未来的戴高乐著作出版商；卡特鲁少校，他在1940年任法属印度支那总督，他最早响应了戴高乐将军对全体法国国民的号召。第九号城堡关押了200多名军官，有法国人，还有英国人和俄国人。俄国军官中有一个23岁的年轻人。他结实、漂亮、傲慢不逊，名叫图哈切夫斯基，后来成为苏联红军元帅。

两年零八个月的德国监狱生活，的确令人沮丧，但对戴高乐来说却非虚度。他以德文报纸当材料，精通了德语。他又自告奋勇给难友们讲授战略学，

在讲课中他高度赞扬坦克的出现在军事上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发展。同时，他还作了大量的笔记，这些笔记后来构成他的第一部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的基础。

关于戴高乐在狱中的表现，他的同狱难友雷米·鲁尔写道：“这位冷漠的年轻人有坚强的意志，他善于克制自己的精神危机和感情冲动。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法国人的沉着、理智、自我克制的优点，司汤达活着的话，一定喜欢这种性格。”

非人的囚犯生活，更加磨练了夏尔·戴高乐的坚强意志。他在日记上曾经这样写道，“这场战争后的好多年里，人们将会感到害怕和耻辱……但是他们的心灵丝毫不会改变。恐怖将被忘掉。人人都将歌颂自己的光荣业绩。夙怨之火将再次被点燃，人们将再次交战，并在上帝和人类面前大声发誓：他们对流血不负责。让我们想一想吧！法兰西的前途将通过我们的劳动来创造。”

1918年11月11日的停战，终于使他重获自由。欲知戴高乐出狱后的情况，且看下文分解。

第三章 喜结良缘

苦辣酸甜共同尝，相亲相爱两鬓霜；
喜结良缘得内助，治家严谨美名扬。

夏尔·戴高乐从德国俘虏营获释后，在“卢瓦尔河别墅”全家正等他回去大团圆。然而，家庭生活的欢乐和舒适并不足以补偿那失去的良机，夏尔在庭院里和三兄弟合影留念。四个年轻人身着戎装，胸佩十字奖章，表情都很高兴。夏尔还戴着最高荣誉十字勋章，站得离其他人稍远一点，比他身旁的格扎维埃高出几英寸。他目光严峻，显得很有抱负。

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结束了，但是英、法、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又组织了对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武装干涉。戴高乐应招前去华沙同苏联红军作战。他在那里仅参加了一次战斗，就被波兰军事学院聘为教官，他的任务是教授战术学。他和以往一样认真从事教学工作，但却完全摆脱了他在国内受到的种种约束，享受着“华沙的自由生活”。每月的头两周，军官的薪金使他得以过着“贵族”的生活。他出入于高级的餐厅，特别是那家文人墨客常去的利埃夫斯基饭店，并且涉足于波兰社交界的第一流沙龙，他是罗塞·蒂什基埃维茨伯爵夫人豪华的市内住宅的常客，并以他那幽雅的法国风度而出名。人们还经常看到他和另一位波兰贵妇——体态娇小、性情活泼的切待维尔脸斯卡伯爵夫人一起在巴利克尔咖啡馆饱餐油煎果馅饼。

到了1921年10月，波兰前线战事结束，戴高乐回巴黎度假。他绝未料到，这次度假对他个人生活来说竟具有决定的意义。虽然他本人还一无所知，做媒的人却已为他穿针引线了。丹坎夫人自称是他的主媒。她与戴高乐早在孩提时代就已相识，并一直与戴高乐一家相好。她后来搬到加来，结识了当地有名的饼干制造商旺德鲁一家。旺德鲁家的女儿伊冯娜曾经拒绝了一位将军儿子的求婚，因为这位青年是个军官，而她不愿嫁给军人。她宁愿在家乡养儿育女，而不愿常常随军仓促搬迁。

一天，丹坎夫人恰好碰见戴高乐上尉在她娘家吃午饭。她忽然灵机一动，心想这个在少年时自己常开他玩笑的青年军官，如今一表人才，讨人喜欢，很可能会使伊冯娜·旺德鲁对军人求婚者的保留态度改变。她向旺德鲁夫人谈了自己的想法，引起了夫人的好奇心。于是，她们决定精心安排一次“巧遇”，地点定在巴黎“清秋沙龙”。旺德鲁家预定两周后到那里去。就像是巧合一样，两家人在“清秋沙龙”碰上了。丹坎夫人给他们作了介绍。过了不一会儿，夏尔和伊冯娜这对青年男女便走在别人的前面了。他们来到一幅画像跟前，那幅像画的是童年时代的诗人和剧作家莫里斯·罗斯丹。罗斯丹是戴高乐最喜爱的诗人之一。于是，他抓住机会炫耀了一番，显示他熟谙罗斯丹的诗作，有惊人的记忆力。戴高乐大段大段地背诵这位诗人的诗句，伊冯娜听得着了迷。伊冯娜回家后，掩饰不住自己的喜悦，向母亲倾吐了她对这位青年军官的好感。她说：“夏尔是一位惹人喜爱的好青年，他知识渊博，文明礼貌；但是，我觉得他可能认为我个子太矮了。”

夏尔和伊冯娜在“清秋沙龙”会面以后，女方旺德鲁家邀请戴高乐一家赴茶会。戴高乐上尉把他的军帽、手套和手杖都放在两膝上面。当他想往这一堆东西上再搁一杯茶的时候，竟笨手笨脚地把茶水洒到伊冯娜姑娘的衣服上。但是，伊冯娜已堕入情网。她笑了起来。给那个窘迫的大兵解了围。一周后，这一对情侣在凡尔赛宫再度相逢。那天，巴黎工艺学院正在那里举行

盛大晚会。

伊冯娜和她哥哥在一起。哥哥是到巴黎来参加击剑比赛的。戴高乐上尉看到了他们，走到她哥哥雅克跟前，请求允许和他妹妹跳舞。第六场华尔兹舞毕，夏尔向伊冯娜求婚，她同意了。

过了几个月，夏尔·戴高乐再次从波兰回国度假。在加来圣母院教堂里的夏尔马涅和圣·路易的圣像之间，夏尔·戴高乐和伊冯娜·旺德鲁举行了婚礼，时间是1921年4月7日。在他们近半个世纪的夫妻生活期间，无论是在反法西斯战争的艰苦年代，还是在戴高乐担任总统期间，始终相亲相爱，一往情深。

戴高乐夫妇治家很严，谨言慎行。他们严禁子女打着戴高乐将军的旗号谋取私利或借以炫耀自己，他们还教育自己的后代，尽量少在公众场合露面。研究戴高乐家族的法国女作家克洛德·迪隆说：“人们从未看到戴高乐的女儿德布瓦西厄夫人或他的儿媳菲利浦·戴高乐夫人参观时装展览，也从未看到她们在市场上一面笑眯眯地盯着花菜，一面讨价还价。直至戴高乐的逝世才使他的全家人首次在法国人面前露面。当时他们悲痛欲绝，自顾不暇，只好听任新闻摄影记者贪婪地拍摄他们在将军墓前的悲伤场面。”

就是这些摄影记者，当戴高乐将军在世时，他们像追踪难以到手的猎物一样，追踪共和国总统一家。他们终于巧妙地摄下了菲利浦的长子，16岁的小夏尔的形象：他当时在约翰尼·阿利达依的陪同下正坐在一家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上。小夏尔很快就遭到了总统祖父的惩罚。他被召进爱丽舍宫受审。小夏尔像个罪犯似地规规矩矩地站在祖父面前，而将军却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地站在办公桌的后面，活像一尊骑士的塑像。他把那张“无体面的照片”递给他的孙子。并告诫他，今后要把时间用在正道上，要勤奋学习，老老实实的做人，绝不当花花公子！

戴高乐夫人，性格文雅，举止大方，待人温厚，她所受的教育以及她在将军身旁所受的几十年的熏陶，使她养成了这种作风。人们都说她是一位贤妻良母，又是一位典型的军官夫人。虽说戴高乐夫人不拘礼节，平易近人，而她还是让人肃然起敬，她在生人面前十分谨慎，她竭力避免一切可能引起争论的话题，竭力避免发表自己的见解，因为她不愿意冒那种风险，让人评论她的看法，甚至加以曲解或者把它用作反对她丈夫的言论，尤其在他俩的意见不尽一致的时候。然而，只要她感到气氛比较融洽信任，她就会谈笑风生，甚至还具有那种自我嘲讽的高尚的幽默感。有天晚上，礼堂放映电影，将军的一位助手看着装饰天花板的裸体仙女，取笑人们巧妙地用装饰物或飘带来替仙女遮羞。戴高乐夫人说：“这可不是我让搞的呀！”

谁都知道戴高乐夫人不喜欢官场生活，1965年她为戴高乐将军再次参加总统竞选而深感遗憾。爱丽舍宫对她来说是不得不套上的“枷锁”。尽管如此，她并不逃避爱丽舍宫主妇应尽的职责。她做她应该做的事，恰如其分，从不超越。她不是那种大小事情一手独揽的发号施令的总统夫人。她叫人把食谱拿给她看，规定几项节约原则，并且言传身教。她关心人胜过关心物。当总统府工作人员的家里有结婚、增添人口等喜庆事时，她总忘不了送礼贺喜。她乐意负责布置传统的圣诞树，亲自挑选圣诞礼物。总统府内协助她完成这项工作的几位大大也各收到一份小小的礼品。

在国事活动方面，戴高乐夫人可能比历届总统夫人参加得少。她对公众的好奇心和摄影记者的冒昧行动很不习惯，她讨厌在外国元首来法国进行正

式访问时陪同他们的夫人。她总是尽量推让，让总理夫人去承担这个任务。戴高乐夫人从不要求任何特殊照顾。当她陪同丈夫去外省视察时，她常常不让侍从预先知道，就去参观某个慈善机构。在国外，这可就是一件必须由礼宾官安排的事了。当她陪同丈夫在苏联访问时，苏方派人问她希望参观什么地方时，她回答说：“最好能看一个收容残疾儿童的机构。”可是苏方外事人员说，苏联不存在残疾儿童，这是她怎么也预料不到的！

戴高乐夫人绝不要求新任部长们的夫人对她作礼节性的拜会；只有当她们找到了合适的时机，并且事先提出要求，她才接待。这种会见一般是在底层套问的小客厅里进行。戴高乐夫人坐在长沙发的一头，请来宾们坐在另一头，她们之间谈些孩子们的事情，如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等。

戴高乐一家的审慎态度，只不过是戴高乐夫妇要求全家人具备的谦逊和无私的品德的外部表现，他们教育全家都持有这种态度，以至审慎变成了他们的第二天性。戴高乐将军入主爱丽舍宫后，立即向礼宾司宣布：“你们每年只需邀请我的儿孙们参加两次招待会。”对外出打猎也作了同样的规定。戴高乐夫人对这些规定又作了一点补充，她给礼宾司写了一份手谕，嘱咐他们不经她的许可，不得邀请她的任何家属进宫。如果外甥们要见戴高乐将军，他们必须事先提出要求。

尽管戴高乐认为他的亲属进入军界或政界供职是合乎情理的，尽管他允许他们（他自己的孩子除外）参加竞选，但从来不询私提拔他们，更不用说任命他们担任政府或总统府的职务，从而让他们在这些职务中得到任何好处了。戴高乐的妻舅雅克·旺德鲁虽然在两次大战中身经百战，后来又是一位干练而出色的国民议会议员，也只获得了荣誉勋位团骑士级勋章。至于菲利普·戴高乐，当他的家属外出度假时，他有时也睡在爱丽舍宫，不过只住三层的一间很简朴的卧室。虽说他父亲在十年中曾两次带他出国正式访问（德国和苏联），那也只是作为他的副官去的，也就是说代表团中级别最低的官员。戴高乐深知，以权谋私，不仅败坏社会风气，而且也是人民深恶痛绝的。因此，他谆谆教导自己的儿女：“要自食其力，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不要靠父母作威作福！”

在爱丽舍宫之外，总统的亲属也很少利用他们与总统的关系谋取什么好处。他们之所以在公开场合露面甚少，不仅仅是为了躲避人们的好奇心，也是为了避免有人对当权者及其家属溜须拍马，引诱拉拢。一天，戴高乐将军的一位助手的妻子，向戴高乐夫人讲了她的孩子要去参加为圣诞节而组织的冬季运动会，戴高乐夫人告诉她：“我的儿孙们本来也很想去参加冬季运动会的，但是他们未能解决交通和住宿问题。”听了这句话，这位夫人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采访这一消息的女作家克洛德·迪隆说：“总统夫人压根儿就没想过要向国营铁路公司或某个旅馆老板施加压力。”

克洛德·迪隆继续写道：“还有一件更能说明问题的事情。1962年12月，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来到朗布依埃，试图取得戴高乐的同意，让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戴高乐夫人陪同麦克米伦夫人参观游览。星期六，她带着麦克米伦夫人去参观当彼埃尔城堡。在那儿遇到的一件难以预料的事情，最有力地印证了我在前面提到过的她的审慎和谦虚。”

当彼埃尔城堡虽说是历史古迹，但它属于路易纳公爵私有。公爵时常在城堡里接待朋友，并邀请他们在他的猎场里打黄鹿。那个星期六，正好赶上他邀请客人打猎，并设午宴款待他们。上午11时光景，戴高乐夫人和麦克米

伦夫人同乘一辆 DS 型小汽车来到了城堡，她们让汽车停在铁栅栏门前，护送她们的便衣警察，像普通的游客一样，走到看门人的小亭子跟前买门票。看门人毫无恶意地回答说：“公爵先生今天有客，谢绝参观！”戴高乐夫人二话未说就放弃了原来的参观计划。而麦克米伦夫人见此情况，当然也就不再坚持一定要游览城堡了。于是两位“第一夫人”只是在花园里溜达了几圈就返回了。

此时，公爵的客人们正在城堡进午餐，他们只是从餐厅的窗口影影绰绰地看见两位妇女的身影，并且很快就消失了。看门人翻来覆去地思考了这件事，心里感到忐忑不安，直到下午吃点心时，他才向公爵的大儿子说明了两位参观者的身分。路易纳知道后颇感不安。因为他被世界上公认为是最好客的人，而且他的客人也拐弯抹角地吓唬他说，他对历史建筑物免税所抱的希望，这下可落空了。这句话使他的沮丧情绪升到了顶点。当然这不过是句玩笑话罢了。这类报复的念头在戴高乐夫人的脑海里从未闪过，就像她丝毫未曾想过要不顾一切地闯入城堡一样。

戴高乐将军对他的妻子，如同对其他所有的妇女一样，总是彬彬有礼。每逢外出，戴高乐将军等夫人坐下后他才坐下，等她上车后他才上车，他把右座让给妻子，除非当他们一起去参加官方集会。可是回爱丽舍宫时他又坐在左边的位置上，认为国家元首的特权随着礼仪的结束而告终了。尽管戴高乐夫人当众总是称丈夫为将军，可是戴高乐却始终称她为“我的妻子”，甚至在正式的祝酒词中也是如此。伊冯娜喜欢这样的称呼，因为首先“戴高乐夫人”可能是某个店主对其妻子的称呼，而“我的妻子”包含着一种亲切的相当高尚的占有，具有不寻常的特殊意义，他们相亲相爱，无论环境，政局如何变幻，他们总是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同甘共苦。正如戴高乐夫人所说的，愈是环境艰难，对于一个赴汤蹈火的英雄来说，更加需要爱情的支持和灌溉。

戴高乐夫人在暗中时时关心着丈夫的身体健康，她向膳食总管暗暗下达指示，可是这些都瞒不过将军。有一次在餐桌上没有给他斟白酒，他相当大声地对他的邻座说，“哟，你倒有白酒，看来，我是个受管制的人啊！”在朗布依埃的一次打猎午餐会上，夫人们未被邀请，戴高乐的邻座看到将军是那样毫无节制地将菜肴装满自己的碟子，不由得一下愣住了。戴高乐转过脸，心领神会地对他解释说：“在这里我可以这样做，妻子不在，我可以自由地饱餐了！”

但有时也可以觉察到将军的态度里会带有几分反抗的情绪。在一个星期五，戴高乐将军设便宴招待总统府几位工作人员。他看到上了一盘鱼，便转向妻子，略带愠怒地对她说：“亲爱的朋友，我早就对你讲过，在军人的餐桌上星期五不是非得吃鱼不可！”按照西方天主教徒的习惯，星期五是不吃肉的。戴高乐夫人低声应道：“好吧，我的朋友！”其实，这完全是表面上的顺从。她认为，星期五不准吃肉，但为了丈夫的健康，弄些鱼总是可以的。将军这次发火，可能是因为他不愿意使人觉得，不管在哪一方面，他侵犯了客人的信仰自由。对于丈夫的意见或批评，戴高乐夫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表示尊重的。

戴高乐夫人不仅关心丈夫的用餐、休息，而且尽量使他精神愉快。因此，在戴高乐外出时，无论多么疲惫劳累，她总愿前往陪同。一次戴高乐在科西嘉岛视察时，骄阳似火，真叫人难以忍受！一路上车子停了无数次，每次戴高乐将军都到村里去同村民们握手。而总统夫人不愿跟随将军张扬自己，总

是呆在汽车里，忍受着火辣辣的太阳的折磨。随行的一位部长想对她表示同情，竟不随同其他官员去簇拥总统，而来到戴高乐夫人的车子跟前问道：“夫人，你不觉得大累吗？”戴高乐妻子回答：“不，一点都不！我高兴极了。每当将军带我出来旅行，我总是非常高兴的。”跟随总统的一位女记者说：“的确，她显得非常高兴，她戴着一顶非常合适的帽子，精神抖擞，端端正正地坐在 DS 型小轿车里。她就坐着这辆车子旅行，但是跟在她丈夫后面，中间相隔五辆车子。直到就寝时戴高乐才回到夫人身边。”

戴高乐夫人对丈夫的关心是多方面的，她不仅关心他的健康。而且也非常关心他的事业。每当戴高乐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她都为他高兴，每当他受挫，她都为丈夫难过。为了丈夫的健康和安全，到了晚年，她总希望戴高乐早日退出政治舞台，1969 年 4 月 28 日，戴高乐将军宣布“停止执行总统职务”。戴高乐派在伤心之余想道：“至少有一个人将会感到高兴。”的确，她很高兴，丈夫又属于她了，她终于又可以和他同乘一辆车了，可以与他肩并肩地在绿色的原野上散步了。她同丈夫一起面临死亡的考验毕竟有过三次了，当然每次她都以外露的勇敢精神经受了考验，在小克拉玛刺杀事件发生后，曾有人问她有何感受，她回答说，“哦！对我的女婿来说，这也许太可惜了，可是对于将军和我，这倒是一个好的结局。”

专门研究戴高乐的女作家克洛德·迪隆说：戴高乐夫人是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她对丈夫关怀备至，对子女谆谆教导。让他们自强自力，不要依靠父母。她经常说：“聪明的父母是不会对孩子们娇生惯养的，让子女躺在父母身上是不会有作为的，只会使他们像藤萝一样，离开大树就永远站立不起来！”

夏尔·戴高乐为有这样一位贤内助而颇感幸运，1921 年 4 月 7 日他与伊冯娜·旺德鲁结婚之后，就辞去了波兰军事学院教官的职务，而另谋自己的前程去了。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章 初露锋芒

潜心研究有名堂，五年成果放亮光：

初露锋芒遭人嫉，痛苦磨难又备尝。

夏尔·戴高乐与伊冯娜·旺德鲁结婚不久，就辞去了波兰军事学院的职务，于1921年10月1日到圣西尔士官学校教书去了。这时戴高乐已经31岁了，可在他的军事生涯中还没有什么显著的成就。他想：像他这样的年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已经征服了半个古代世界，拿破仑已经当了好多年将军，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奥什已经有四年当大元帅的历史可以回顾，而此时，他戴高乐自己得以发挥军事才能的机会太少了。然而，他深感时运正在向他招手，他决心在现有的岗位上，勤奋工作，潜心钻研，在军事科学方面作出自己的奉献。

戴高乐性格刚强，办事认真，他的倔强的性格与人不好相处，几乎使他周围的人难以忍受。他的这种为人熟知的性格是在圣西尔士官学校以及后来在法国军事学院里定型的。正是在这两所学校里，他那演说家的才能初露锋芒。他讲战史和战术，娓娓动听，滔滔不绝，具有不可抗拒的说服力。后来，这种说服力竟把伦敦电台变成了他的作战武器。此外，他滑稽的摹仿，他那熟练的手势，后来通过电视荧屏使他获得几百万张选票，当选第五共和国总统。

1921年12月8日，戴高乐夫妇生了一个男孩，婴儿有点早产。他们以贝当元帅的名字给他取名菲利普。后来他们又生了两个孩子，曾经表示不喜欢军人生活的伊冯娜·戴高乐已经逐渐习惯了，她除了精心地抚养孩子外，还在家里为丈夫安排了一个舒适的工作和学习环境。

圣西尔军校的年轻教官，一般都要准备参加法国军事学院的入学考试。因此，人们预料，这位年轻的教师，为了更好地为国效劳，会再会当一次学生，不出人们所料，夏尔·戴高乐于1922年11月考入了军事学院，他在军事学院学习期间，结交了几个朋友，但是他们的友谊都没有经受住法国沦陷的严峻考验。其中有一个叫乔治·皮克的，1940年在叙利亚同戴高乐对立，后来又在阿尔及尔和巴黎反对他。另一个叫布里社的，后来当上了维希政府的陆军部长，于1945年被戴高乐政府缺席判处死刑。还有一个叫卢斯托诺拉科，他先支持维希政权，后来见抗战快胜利了又倒向戴高乐，是个反复无常的投机分子。

且说戴高乐一进入军事学院，就与院长穆瓦朗上校格格不入，因为这位院长的战术思想基本上是静止不变的，是形式主义的。穆瓦朗上校认为一个司令官的职责就是订出最详尽的计划，并且不管情况如何都要坚持按计划行动。可是锋芒毕露的戴高乐却拒绝接受这种先验论。穆瓦朗上校还自以为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认为炮火的威力有利于防御，而使发动进攻的代价惨重。然而戴高乐却深信，大战的真正教训是，下一场战争将是坦克战，机械化程度的日益提高意味着战争将是运动战。结业时，戴高乐考完笔试后，还得通过战术实地考核。他立意借这次考核说明他是正确的，而穆瓦朗则是错误的。

1924年6月17日，戴高乐在最后一次演习中受命指挥“蓝军”。他率领高度机动的地面部队，进行了一次闪电式的进攻，打得“敌人”狼狈不堪，彻底推翻了穆瓦朗的消极防御理论。更使院长难堪的是，戴高乐拒不回答穆

瓦朗上校向他提出的一个问题。而让战术演习中的一名下属去回答。穆瓦朗怒不可遏，大声斥责道：“戴高乐，我问的是你！”戴高乐泰然自若地答道：“上校，你已经把指挥一个军的任务交给我了。如果除此之外我还得承担属于我下属的任务，那我就顾不上考虑怎样完成我的使命了。杀鸡焉用牛刀！”戴高乐说完，又对部下命令道：夏托伊厄，请你回答上校的问题。”

经过这次事件，戴高乐名扬全校，当然也就围绕着他的结业考试的评分问题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军事学院的学生毕业离校时，分别按“优秀”、“良好”，“尚好”三个等级进行评定。评委会认为，戴高乐是一位天赋极高的军官，他部非凡的记忆力，渊博的知识，果断的作风和迅速判断形势的能力，无不令人赞叹。但是，多数委员认为他难以共事，自命不凡，不听批评，甚至不愿与人商讨问题，这使他的优点大为逊色，因此，大多数委员坚决表示最多只能给他评三等，最后经过副院长迪菲厄将军给委员们反复做工作，才给戴高乐评了个二等。

夏尔·戴高乐的毕业成绩报告单是院长穆瓦朗上校签署的。结尾部分写着这样的评语：“是一位理解力强、富有学识而又严肃认真的军人，才华出众，精明能干，颇堪造就。遗憾的是，过分自信，好对他人意见吹毛求疵，而且举止俨然像个流亡的国王，大大损害了上述无可否认的优秀品质。”

戴高乐听到这一消息暴跳如雷。他大声骂道：“军事学院那些狗娘养的！我不当上校长就不回这个鬼地方，你们瞧着吧，总有一天我会给它来个天翻地覆！”学校评定的等次，对学员的分配至关重要。如果戴高乐评上“优秀”，他就会被调到向往已久的总参谋部的作战计划局，把他研究的战术和战略思想付诸实践。没有去成这个局，使他闷闷不乐。如果加上他在德国遭受监禁的蹉跎岁月，这已是他军人生涯中所遭受的第二次挫折了。最后他被派到运输供应局去工作。戴高乐认为，这是对他那不受欢迎的独立精神的一种侮辱性的惩罚。

军事学院的评判虽然伤了戴高乐的自尊心，但丝毫也没有影响他继续发奋自强，他被派往美因兹军区后勤部，虽不遂心愿，但这件事却从两个方面得到了补偿：这使他有机会在自由的条件下重新研究德国的军情和国情；同时也使他有根据机械化战争的观点就创建机动装甲部队进行深入的探讨，机械化战争的观点最初是埃斯蒂安将军的，但是戴高乐上尉在被俘期间又独立地发展了这个观点。从离开军事学院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之后，戴高乐一直利用业余时间核对和改写他的狱中笔记，其成果就是他的第一部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于1924年出版了。这是戴高乐第一个值得纪念的成就。戴高乐的传记作家布赖恩·克罗泽就此写道：“假如他在写成这本书以前就离开了人世，萦绕在他的亲友心头的他，将是一个看法很怪、不一定有多大前程的年轻人。可是，如果在这本书出版以后，死神夺去了他的生命，他的名字就会使人想起一个目光敏锐、切中时弊的军事思想家。”

《敌人内部的倾轧》是一部思想严谨、分析深刻的军事著作。戴高乐认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是民族和国家，而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有其自身的特点。戴高乐通过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亲身体验和经历，特别他在德国身系日圈的遭遇，对德国的国情、军情和民心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说，德国人对超人，较普遍地存有崇拜思想。戴高乐选择对尼采的崇拜作例子，他在书中写道：

“札拉图斯拉所要求看到的超人的特殊性格、权力意志、嗜好冒险以及

目中无人，在那些喜怒无常、居心险恶的德国人看来，就是他们应该达到的理想。他们随心所欲地自称是这种令人生畏的尼采式的杰出人物，他们一味追逐自身的荣誉，却又坚信是在为大家谋利，他们恣意役使‘成群奴隶’，却又对他们极端蔑视，他们在人类的苦难面前决不止步，反而称道人们受苦不但是必不可少，而且是正合我意。”

在书中，戴高乐还就德国人和法国人的性格、情趣作了比较。他认为，德国人“生性好高务远，狂热扩张个人权力以至不惜任何代价，而且对人类经验、常识和法制的约束根本不屑一顾”；而法国则是他一贯梦寐以求的思想境界。他写道：“在具有法国情调的花园中，没有一棵大树想以自己的浓荫窒息其他树木；花坛都是按几何图形建造而成；池塘无另增瀑布的分外之想；塑像也不求独占人们的赞赏。花园里有时会发出一声长叹。也许这是出自这样一种感情：园中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如果独自存在的话可能会更加明媚动人。但是，这样一来必然有损于整体，而漫步园中的人看到花园里井然有序，永葆优美的和谐，自会感到十分欣慰。”

在这本由五个章节组成的书中，分别揭露了德意志帝国军事当局对民权的蚕食政策，从中找出了德国在1918年末崩溃的深刻原因。关于1914年9月，冯·克劳克将军拒绝服从德军参谋总长小毛奇的命令问题，戴高乐上尉写道：“在战争中，除了情况规定的战略以外，没有其他的战略；对军人来说，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可以普遍采用的体系，而决定的只有情况和性格。”

《敌人内部的倾轧》一书的出版，大大提高厂戴高乐上尉的声誉。

1925年10月，贝当元帅下令委任戴高乐为他的幕僚，这时，贝当已是最高军事会议副主席和作为三军首脑的法军总监了。被大战拖得精疲力竭的法国，正力图维护对德胜利的成果。虽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结束多年，但欧美列强，勾心斗角，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安定的因素，贝当急需调一些年轻有为的军官辅佐他。

根据凡尔赛和约，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莱茵区由协约国占领并实现非军事化；大幅度削减德国武装力量；并且允许法国保持一支巨大优势的军队。为了预防德国军国主义势力再起，就在凡尔赛和约签订那天，1919年6月28日，法、英、美三国订立了防御条约，规定一旦德国发动侵略，英美将援助法国，可是美国参议院不仅全盘拒绝接受凡尔赛和约，而且拒不批准三国防御条约。于是英国政府也撤销了对法国的承诺。这样，在凡尔赛达成的解决方案，一下子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支柱，而根据凡尔赛和约创建的国际联盟，失去了一个主要发起国，这也表明，英法协约并未给欧洲安全提供坚实的基础。

法国人遭此挫折，只得另谋出路。在以后数年中，陆续与比利时和东欧小国建立了一个防御联盟体系。为了向德国显示战胜国的权威，1923年1月11日，法国和比利时的军队开进鲁尔盆地。作为强权政治中的一着，占领鲁尔地区的行动成败参半，但失败是主要的，教训极为深刻，1923年，法国获得的战争赔款比前一年几乎毫无增加，而付出的占领费用却远远超出了所得到的物资的价值。至于企图在鲁尔和莱茵两区怂恿分裂主义运动的秘而不宣的目的，也基本上没有达到。诚然到1923年底，柏林新上台的斯特莱斯曼内阁不再企图逃避赔款，而且果真同意恢复支付，但那时德国马克已不如印钞票的那张纸值钱了。实际上，金融危机像瘟疫一样蔓延到了法国，法郎贬值大约20%。而使法国人更加喘不过气来的是。普安卡雷政府不得不增税20

%以弥补东征鲁尔的耗费。

1924年4月的道威斯计划虽说坚持要求赔款，却贷给德国人大量黄金，以帮助他们支付和复苏。在此情况下，普安卡雷政府辞职了。这就是夏尔·戴高乐到法军总参谋部供职的政治背景。

戴高乐作为贝当元帅的幕僚，来到总部所执行的第一项任务含有一定的讽刺意味。这项任务是就工事和要塞在法国国防中的作用问题写一篇研究报告。几个月前，戴高乐在《法兰西军事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国战争原则的方向》的文章，比较直言不讳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现在，作为司令部的官方理论家，他奉命给静止防御的理论寻找历史根据。他不同意以静止防御作为机械化战争的一个样板。后来的马奇诺防线就是根据这种静止防御的理论建立起来的。虽然他对这项任务不感兴趣，但他还是像往常那样，迅速而出色地在一个月內完成了，他的报告以《法国设防城镇的历史作用》为题仍发表在《法兰西军事评论》上，日期是1925年12月1日，尽管戴高乐认为提醒公众注意法国边防上的薄弱环节是他的职责所在，但是他清楚地看到，最高军事会议以为沿边界建立一条永久性防线将会力防御入侵提供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这显然是危险的，他认为加强国防最重要的是提高军队指战员的素质，加强装备，建立一支现代机械化的部队。

贝当元帅对戴高乐上尉的工作感到满意，他认为军事学院对戴高乐的结业评定是不公正的，现在到了该给他平反的时候了。一天，元帅对新上任的军事学院院长埃兰将军说：“我越想越觉得给戴高乐评分这件事就像乱断公案一样荒谬。”这位新院长是个颇有眼光的阿尔萨斯人，他和戴高乐一样，也是法国第一个认识到机械化战争巨大潜力的军界要人巴蒂斯特·埃斯蒂安将军的门徒。

在菲利普·贝当元帅的命令下，军事学院组织了一轮讲座，由戴高乐主讲，讲座由贝当主持。像这样的事，的确闻所未闻，其意图是非常清楚的。一个小小的上尉，竟然应邀回校讲学，单是这一点就不寻常。更何况他居然选择领袖人物的品格作为讲座的主题，这简直是蓄意侮辱。法军总监贝当元帅竟决定亲临主持，这就使得整个场面带上权威的印记。在1927年4月7日开讲那一天，在军事学院犹如一颗炸弹轰然爆炸。教授们聚集在圆形会堂附近的办公室里。贝当在埃兰将军的陪同下抵达，戴高乐也来了，但独立一厢。教授们竞相后退给元帅闪开一条路，元帅却让戴高乐先行。这简直像演戏一样。戴高乐全身戎装。圆形会堂座无虚席。戴高乐登上讲台，慢条斯理地摘下军帽放在桌上，又将佩剑置于一侧，从容不迫地摘下了他那副白手套，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夏尔·戴高乐上尉第一讲的题目是《战争行动与领袖人物》。戴高乐笔挺地站着，口若悬河，开始了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表演。他不用讲稿，大量引用了古往今来杰出的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和作家的警句。许多人为之倾倒，但也有许多人感到恼火。不少听讲的人暗自发问：戴高乐所精心描绘的具备各种美德的理想领袖究竟指的是谁呢？

戴高乐第二讲的题目是《领袖人物的性格和纪律的含义》。其中有一段话，许多人认为他是指桑骂槐。因为他赞颂了诸如佩利西埃将军和利奥泰这样一些人物。前者在塞瓦斯托彼尔包围战中，接到拿破仑三世的电报连看都没有看就装在口袋里，虽然违背了命令，却为法国打赢了一场战争，并为他自己赢得了公爵的爵位和元帅的官杖；后者于1914年置上级指令于不顾，反

而为法国保住了海外殖民地摩洛哥。

戴高乐第三讲的题目是《威望》。在这一讲里，他又提到领袖人物的品质。他说：“事实上，有些人几乎从初生之时起，就具有权威的气质，这种气质视之不能清楚见其形，但其影响则往往令人惊讶不已。”接着讲的是他后来收进《剑刃》一书的一段“名言”。

“首先一点，无神秘感就无威望可言，因为过于熟悉就不能产生尊敬。主在仆前非英雄，神屠深庙方显威。因此，无论是运筹规划，还是处事和思维的方法，都要令人捉摸不透，引起人们的好奇心，打动他们的心弦，使他们跃跃欲试。这并不是说，应该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对下属不理不睬，令人无法接近。恰恰相反，要想征服人心，就要体察人情，使人人都觉得自己受到器重。但是在这样做时，对人们决不能过于迁就，而必须保留某些随时可以抛出来的惊人秘密。这样，大家的信任之心就会油然而生，办事就无往而不胜了。”

戴高乐上尉在军事学院的这番讲演，虽说是在“权威”的命令下进行的，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以致整个三部曲也显得很平淡，有些话令人费解。那些奉命出席的听讲者，在听完第一讲后感到愤慨，第二讲后怒不可遏，现在则显出一副对整个讲演十分厌烦的样子。戴高乐的朋友沙文上尉建议把这些讲演汇集成册，发给立志从军的青年人，对此，只有少数人点头表示同意。另外，戴高乐获得贝当元帅的批准，还到巴黎大学等非军事院校去讲演。戴高乐的传记作者拉古都尔说：“在军队内部凡是能说会道的人自然都会遇到这样一堵不信任的厚墙，夏尔·戴高乐要绕着它前进。”由于利用元帅办公室的优越地位，他还得以在非军人听众中施展自己的才华。若在索邦大学的巨大阶梯教室里重复他的讲演，若参加的听众是些作家、教授、政治家和法兰西研究院的学者，这对“廉洁”中学校长的儿子，对约瑟芬·马约的孙子来说，无疑是心灵上的最大满足。他的成功要比他的同辈军官显得格外突出。

经过这次轮番讲演之后，戴高乐出尽了风头，1927年晋升为少校，并被派在驻守在特雷夫的轻步兵第十九营担任营长。根据惯例，这种精锐部队的营长，只有当过轻步兵的优秀军官充任。步兵总监马泰将军为了培养这位新少校而违背了传统，他曾对夏尔·戴高乐的一位知己说，“我派去的那个人是一位未来的大元帅！”

1928至1929年之交，凛冽的寒风横扫着德国占领区，气温下降到摄氏零下25度。一场流感袭击了整个地区，这是1918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仅是驻莱茵区的法军就有143人丧生，戴高乐营也死了30多人。公众舆论为之哗然，愤怒的国会要求予以追究。经过调查，戴高乐少校对士兵照顾周到，管理出色，在得知一名无亲无故的士兵死亡时，还坚持亲自为那位年轻的士兵服丧。因而戴高乐被免于处分。

对戴高乐和他的夫人来说，这是又一个凄惨的冬天。痛苦的阴影笼罩着全家。戴高乐一家迁到特里尔时，第三个孩子即将出世。有一天，离预产期还有几个星期，戴高乐夫人被汽车撞倒，虽未受伤，却深受惊吓。之后，伊冯娜·戴高乐生了个不健全的女孩，是个白痴，取名安娜。戴高乐夫人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只要安娜能和别的女孩一样，我和夏尔甘愿舍弃一切，健康、财产、升迁，前程，所有的一切！”

在这以后，欧洲风云变幻，形势趋向紧张。戴高乐少校1928年底在写给友人纳香的信中描绘了十年后给欧洲带来祸害的那次危机。他写道：“事态

的迅猛发展，正摧毁着欧洲仅存的几个公认的和平屏障。吞并显然即将到来。德国将使用武力或通过条约重占割让给波兰的领土。尔后，德国将向我国要求阿尔萨斯。”面对着法国萎靡不振的绥靖气氛，戴高乐忧心忡忡。他在 1929 年 6 月 20 日给纳香的第二封信中写道：“现在当个军人可真是活受罪！但又不得当。过不了几年，他们将紧曳我们的军服后摆，央求我们拯救国家……到那时，首先出来央求的是那些群氓。”

1931 年底，戴高乐回到巴黎休假期间，把他的第二部书稿整理就绪，准备出版。翌年，《剑刃》一书问世。戴高乐在这本书中阐述了他的哲学观念，同时给他自己描绘了一个英雄形象。他通篇引经据典，文体十分高雅，有些典故使那些法国历史知识不如戴高乐渊博的读者难以理解，书中明确指出，领袖人物应该具备哪些品质，在什么情况下必须履行职责，以及对个人野心应予以何种限制。在当时国际危机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他呼吁要强化军队的建设，并主张如果发生全国性危机，军队领导人应当挺身而出，挑起治理国家和领导人民战胜危机的重担。

然而，事与愿违，国家政局日益败坏，国际风云动荡不已。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章 忧心忡忡

经济令人大沮丧，官场角逐且疯狂；
抵御外侮无人问，风雨欲来急断肠！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法国的国际地位虽有所上升，但政治、经济情况仍令人焦心。从1924年到1926年的两年时间里，法郎与英镑的比价从70：1下跌到240：1，一再使那些对之错寄希望的人感到沮丧。为了解决经济难题，安德烈·塔迪厄等人曾设想通过实行英美的选举制度来复兴共和国的经济，并竭力寻求公众对他这一计划的支持。大约与此同时，夏尔·戴高乐也在致力于研究在建立防务体系中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在为法国日益恶化的政治经济情况大伤脑筋。

夏尔·戴高乐从地中海东部地区返国后，在贝当元帅主持的最高国防委员会里担任秘书一职。他接受的第一桩差事是与伊冯少校合作，撰写“驻地中海东部地区部队的历史”。这次，他又受命就战时动员和组织国家人力与物力问题作一研究。戴高乐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1923年就曾起草过一项议案，但经过长达五年之久的唇枪舌剑之后却不了了之。正如戴高乐的评论家所指出的，经济问题对他虽不是特长，但他在30年代受命所写的那篇研究文章倒不乏真知的见。该文刊登在1934年1月1日的《法兰西军事评论》上，题目是《海外的经济动员》。

戴高乐认为，面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特别是德国的重新崛起，法国首先要稳定经济，并使之发展，此外还必须尽速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国防军。为了更好地动员群众和发挥国力，他主张既采取墨索里尼的强制措施又采用美国的自由体制。他说：“法西斯政权使执政当局得以不受限制地、随心所欲地利用现有资源所能提供的一切条件。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利益，人人按照要求遵守纪律；领袖通过个人的作用强使各部门紧密合作；最后，在人民中保持一种随时可以迸发出来的高昂情绪……所有这一切对于巩固国防极为有利。”

戴高乐又说，如果按照法国的具体情况实行美国的那套方法，就有可能使法国那样一个受到潜在的外部敌人威胁的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迎刃而解。但是，法国的政府机构过于臃肿，而且效率极低，他在《法兰西军事评论》上发表的这篇文章，目的在于引起一场公开讨论，如果可能的话，唤起公众舆论支持通过一项战时动员法。这篇文章向公众透露了他为最高国防委员会所完成的那项正式任务的内容。该任务是起草一个行动纲领，一俟上述法案获得通过，即可付诸实施。可是，事隔一年半之久，一项新的议案才提交国民议会。直到1938年3月22日才付诸表决。等到参议院批准成为法律时，已是慕尼黑会议那年的7月11日了。这时，希特勒上台已经五年，距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也只剩有一年零一个月。

戴高乐的一些传记作者普遍指出：这五年是夏尔·戴高乐幻想破灭的五年，是法国灾难重重的五年。全国陷入了厌倦、消沉、悲观失望的情绪中。政权极度不稳。赖伐尔于1931年和1932年先后组成的两届内阁，是第三共和国的第七十九和第八十届政府。爱德华·达拉第于1934年1月执政九天，他的政府是第八十七届。到1940年法国崩溃之夜又有十一届政府相继执政。贝当元帅在法国战败后应召出山，组成了创纪录的第九十九届政府，最后埋葬了第三共和国。

就在这个时候，位于莱茵河彼岸的日耳曼人正正挣脱凡尔赛和约的枷锁，而它的宿敌法国和英国都没有提出什么反对意见。在 1932 年 4 月举行的第二轮总统选举中，暴戾疯狂的国家社会党取得了 1300 万张选票，为阿道夫·希特勒上台铺平了道路。第二年 1 月，希特勒登上了总理的宝座，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上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相对和平时期。这个和平只是前后两次世界战争之间的“暂时休战”，它实际上是下一次世界战争的准备时期。通过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建立的所谓“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帝国主义列强完成了一次对世界的重新瓜分。这个划分是和当时的实力对比相适应的。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很快地发生了变化，它们在战后形成的相对均势被打破，重新瓜分世界的问题必然再次提上日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分割势力范围、分享利益和分割殖民地，是以分割者的经济、金融和军事的实力为依据的。

这个时期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德国实力的迅速恢复。德国虽然因为战败而被严重地削弱了，但它还是一个欧洲大国，拥有 6000 多万人口，有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和巨大的经济潜力。但是，单靠德国本身的力量，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实力是不可能的。德国的再度崛起是和美、英垄断资本的扶持分不开的。大量的外国资本，德国巨大的工业潜力，加上先进的科学技术，使德国帝国主义很快东山再起，回到争夺世界霸权的行列。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头几年，由于战争的影响，加上大量的赔款负担，德国经济处于严重危机。凡尔赛对德和约，不仅剥夺了德国的全部海外殖民地，而且还重新划分了德国的疆界，使德国丧失了 1/8 的领土、1/10 的人口、65% 的铁矿、45% 的煤矿、大部分的海外投资、商船和海军舰队。德国还必须交付 1320 亿马克的巨额战争赔款。特别是 1923 年 1 月，法国和比利时占领了德国的煤铁基地鲁尔以后，德国的经济陷入了瘫痪状态，工业生产水平降到战前的 40%，工厂成批倒闭，全国 60% 以上的工人处于失业状态，通货膨胀极为严重，劳动人民陷于饥寒交迫的境地，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德国帝国主义决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更不会长期容忍凡尔赛条约的束缚。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和地主，从战败的第一天起，就下定了复仇的决心，随时准备伺机再起，夺回失去的殖民地，实现称霸世界的野心。同时，美英等国资产阶级担心德国资产阶级的统治会被革命浪潮冲垮，于是对德国进行大力扶持。

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各怀鬼胎，他们既相互争夺，又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美英统治阶级所以扶持德国，主要是企图利用德国作为推行霸权主义政策的工具。美国想利用德国来牵制英、法；英国则推行它传统的保持欧洲均势的政策，扶持德国去牵制它在欧洲大陆上的主要对手法国。同时，它们还利用德国的经济困难，把德国变成美、英垄断资本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和推销商品的市场，控制德国经济，剥削德国人民。此外，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反动目的，就是妄图阻止德国革命，并把德国变成反对社会主义苏联的反动堡垒。

1920 年 1 月，美国驻德国占领军总司令亨利·艾伦在日记中就这样写道：德国是最成功地击败布尔什维主义的国家，德国到俄国领土上去扩张，能长期把德国人引向东方，从而可以缓和他们同西欧关系的紧张气氛。艾伦的这番心里话说出了美、英扶持德国的重要的政治原因。

美国垄断财团对德国军国主义的扶持是多方面的，特别是“道威斯计划”

起了重要作用。这个计划是以美国银行家道威斯为首的协约国赔款委员会所属的一个专家委员会提出来的，于 1924 年 8 月在伦敦会议上通过。“道威斯计划”为外国资本（其中 70% 是美国资本）进入德国打开了大门。除了根据计划向德国提供的八亿马克贷款外，大量的外国资本通过购置德国企业股票等方式流入德国。据统计，在 1924—1932 年间，投入德国的外国资本达 318 亿多马克，而这期间德国支付的赔款只有 114 亿多马克，在偿还贷款方面交付了 78 亿多马克。德国利用这些资本恢复了信贷制度和商品流通，恢复了生产，更新了工业设备，实现了主要工业部门的现代化。德国很快地恢复和发展了自己的重工业，首先是冶金工业和军事工业，重建和加强了经济和军事实力。

美、英垄断资本还在技术、装备、燃料和原料方面支持德国。从 20 年代起，美英垄断资本就开始帮助德国获得提炼人造汽油和人造橡胶的先进技术。

1933 年 2 月 1 日，美国军人托拉斯杜邦·德·尼·摩尔公司，不顾凡尔赛和约关于禁止德国输入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的规定，同德国缔结了一项出售军人的协定，把飞机发动机和战斗机出售给德国。不久，英国的维克斯—阿姆斯特朗公司也同德国签订了出售军火的合同。英国及其自治领向德国提供了它所急需的有色金属、稀有金属和合金等战略物资；美国向德国大量供应石油；德国需要的生铁、废铁、铁矿石也是英、法等国提供的。

在美、英垄断资本的支持下，德国的经济从 1925 年起就开始迅速发展，并以比英国快得多的速度增长。在 1921 年至 1929 年间，德国工业生产平均以每年 7.1% 的速度增长，而英国在同一时期的年增长率只有 1.7%。到 1927 年，德国的工业生产已经达到战前的水平。

1929 年德国的工业总产值以及钢、铁、铝、电力等的生产已经超过英法，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位。与此同时，德国资本的集中和垄断有了很大的发展，蒂森、克虏伯、法本等一小撮垄断巨头完全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他们对德国重新军国主义化和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起了重要的作用。

德国统治阶级在逐渐恢复经济实力的同时，还竭力摆脱凡尔赛和约的束缚。他们要求归还德国的殖民地，修改德国的东部边界，废除赔款和取消对德国的军备限制等。德国对东方邻国怀有侵略野心，它借口保护国外日耳曼人的权利，阴谋把日耳曼人聚居的地区合并到德国，并为进一步侵略制造借口。德国外长斯特莱斯曼声称，德国对外政策的一个目的是“保护在国外的日耳曼人，保护生活在外国桎梏下的一二千万同胞，改变我们的东部边界——收回但泽、波兰走廊和修改我们的东部边界”。

1925 年，他还说，争取归还和获得新的殖民地是德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德国政策的迫切任务”。1924 年 8 月，德国政府正式向战胜国提出下列要求：接纳德国加入国际联盟并给予行政院常任理事席位，解除德国的战争责任，给德国殖民地委任统治权，修改凡尔赛和约有关军备条款等。

1925 年 10 月，在瑞士罗迦诺召开的英、法、德、比、意、波、捷七国会议，对助长德国的扩张野心也起了很坏的作用。在这次会议上，德、法、比、英、意草签了莱茵保障公约，规定各方单独地或集体地维持德法、德比边界的领土现状，三国保证互不侵犯和互不进行战争，遇到争端通过调解和仲裁解决。但是罗迦诺会议不顾法、波、捷三国的要求，拒绝对德国东部边界的现状提出相应的保证。这表明，罗迦诺会议向德国敞开了向东方邻国和

苏联侵略扩张的大门。会议还决定让德国加入国联。

1926年9月，国联第七届大会根据罗迦诺协定，通过关于接纳德国加入国际联盟和关于给予行政院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决定。这样，德国就在政治上取得了和战胜国平等的权利。罗迦诺会议是帝国主义列强企图在凡尔赛和约的基础上调解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的矛盾，在政治上纵容德国向东方扩张的会议。这次会议是德国军国主义复活的里程碑。

德国加入国联以后，关于修改凡尔赛和约的喧嚣越来越高。德国统治阶级的各种代表人物及其喉舌开动宣传机器为归还德国殖民地大肆鼓噪。战前的各种殖民主义组织又重新复活，并产生了一些新的殖民主义协会。1930年5月26日，在一次德国银行代表和金融界、工业界大亨的会议上，制定了一个名为《关于德国殖民地问题的主要原则》的文件，叫嚣“必须致力于德国独立自主的殖民活动”，还说“不能认为凡尔赛和平条约关于不许德国参与解决殖民地问题的状况是一成不变的。……德国有权利在殖民地活动和独立自主地开发不发达的海外国家”。德国对殖民地的要求，不能不加剧它同两个最大的殖民帝国英国和法国的利害冲突。

德国军国主义在恢复经济实力的同时，还采取种种手段重整军备。它不顾凡尔赛和约的限制，变相地保存了总参谋部的班底，在各种“俱乐部”、“民间组织”的名义下，为建立空军和扩充陆、海军作准备。它秘密地或公开地储存了大量有战争经验的军官，作为扩充军队的骨干，并非法地组织和训练非正规的军队，以作为战时扩军的基础。到1930年，德国的军队和半军事部队已达37.4万人。在军事装备方面，早在1922年，德国国防部就和克虏伯公司签订了一项研制大炮和坦克的协定。

1928—1929年间，德国开始秘密地建造飞机、装甲车和坦克。到1929年底，德国已有12个飞机制造厂，6个飞机发动机制造厂，在研制坦克方面也取得了成果。它还秘密地在西班牙等国建造潜艇和其他军舰，并积极从事军用化学、人造汽油等方面的研究。

面对着德国军国主义的重新崛起，戴高乐少校忧心忡忡，他与一些与自己见识相同的人努力唤起法国公众舆论警惕日益增长的外来危险，竭力主张建立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以便抵御即将临头的、来自莱茵河彼岸的进攻。但是在军内军外，阻力很大，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在这个期间，戴高乐结交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每到星期一晚上，他就到离蒙帕纳斯大街不远的迪梅尼尔酒家同几个朋友聚餐。参加这个小小聚餐会的并非全是军人。他们的当然主席是埃米尔·梅那上校。这位上校在1932年与戴高乐初次会面时，已年过八旬，但仍然精神焕发，妙趣横生。尽管两人年龄很不相当，但却情投意合，一见如故。在当时面临德国军国主义新的挑战的情况下，两人都主张唤醒国民的国防意识，尽快建立一支十万人的机械部队。戴高乐准备把他们讨论的意见写成一本书，但梅耶却表示异议说：“不，那样太慢了。书可以后出。眼下写一篇文章就满不错啦，但必须是一篇爆炸性的文章。至于题目嘛，戴高乐今晚提到过，就叫‘建立职业军’吧！”

1933年5月10日，戴高乐的文章发表在《政治与议会评论》上，那时，希特勒已上台三个多月了。戴高乐和他那几个知己曾对这篇文章寄予莫大希望，但结果却使他们大失所望。文章除了使军界统治阶层大为恼火而外，影响微乎其微。有人警告戴高乐，他必须作出抉择，或者珍惜自己的前程，或者沿着他所选择的道路继续走下去。戴高乐不怕威胁，他把唤醒民众的使命

看得重于他的军人前程。在他看来，要打动那些控制着法国军事机器的顽固派，仅仅一篇文章是不够的，得写一本书，并进行一番个人的游说活动。在那一年的下半年，戴高乐一有余暇，就致力于完善和充实他那篇文章的观点。一年后，即 1934 年 5 月，他的书问世了，题目和那篇文章一样：《建立职业军》，但是，这本书和他以前的著作一样，引起的反响不大，在法国只销售了 750 本。

戴高乐在这本书中，一开头就描绘了法国的地形，令人信服地指出与比利时接壤的法国边界是个明显的薄弱环节。正如他所说的，英国和美国由于海洋阻隔，难以进攻；德国的权力中心和工业中心十分分散，不易一举摧毁；西班牙有比利牛斯山为屏障；而意大利则受到阿尔卑斯山的保护。相比之下，法国的核心巴黎却对任何来犯之敌敞开着大门，因为巴黎周围的平原开阔平坦，不易防守。戴高乐说，处在这样的情况下，唯一可靠的防御措施不是构筑要塞，而是建立一支由十万人组成的分编成六个机动装甲师的精悍的职业军。六年之后，德国军队用事实说明他们懂得并且乐于接受戴高乐的建议，而法国最高统帅部却对此熟视无睹。

国际问题评论家布赖恩说，戴高乐之所以值得大加赞扬，并不是因为他发明了前人已经开创的一种战术，而是因为他具有远见卓识，能够抛弃旧观念，接受新思想，预见到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拥有最精锐的装甲部队的一方将取得胜利，并不顾别人的不理解或者敌意，以坚韧不拔的勇气坚持建立机械化部队的主张。

如果 1934 年担任陆军部长的贝当还是当年的贝当的话，可以想象法国以后十年的历史就会大不相同。

20 多年前，贝当和军界的同僚在上刺刀冲锋和火炮威力孰优孰劣的问题上曾进行过激烈的争论，那时的贝当有独立性格，能接受新思想，并敢于提出新建议。

1934 年的贝当已是 78 岁的人了，尽管身体还很健壮，并给偶尔会见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他的思想早已僵化，注意力越来越难以集中，而且接受新思想的能力也日益减弱。当年的贝当在戴高乐心目中是位英雄，以后的贝当成了民族的不可饶恕的千古罪人。

菲利普·贝当任陆军部长期间，在提高法军抗击德军的能力方面毫无作为，而此时德军却正在努力实现现代化并准备大举进攻法国。起初，贝当倒确实想让戴高乐充任他的幕僚，但他身边的那些人进言劝阻，使他改变了主意。法国问题专家克罗泽说：“本来，凭着贝当的声望，加上戴高乐才能出众，精力过人，富有远见，在杜梅尔格执政期间，是可以大有建树的，但结果却一无所成。”

当时戴高乐上校既无权，又无势，只能不停地进行游说。1934 年 6 月，他结识了一个名叫让·奥比坦的年轻人。此人在权势人物中间交往甚广，他把戴高乐介绍给两位政治家，一个叫加斯东·帕莱夫斯基，一个叫保罗·雷诺。帕莱夫斯基后来成了忠实的戴派元老。而雷诺呢，以后的事实证明，他是坚决而又雄辩地为戴高乐的主张辩护的一位议员。后来他在法国处于崩溃之际出任总理。戴高乐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我认为保罗·雷诺先主特别适合于这项工作。他的智慧足以通晓事理，他的才能足以动员舆论，他的勇敢足以使他坚持到底。此外，他虽然已是遐迩皆知的人物，仍然使人感到他还有更远大的前程。我见了他，说服了他，

并从此和他合作。”

当时，在国民议会中充斥着一种对国防满足现状和漠不关心的情绪，因此国民议会对戴高乐的观点持敌视态度。

1934年6月15日，大约就在戴高乐结识奥比坦和雷诺的前后，国民议会就防务问题进行辩论，虽然爱德华·达拉第政府已在那年2月的骚乱中倒台，但达拉第依然左右了这次辩论。在此之前，他已四度出任陆军部长，后来又在1936年至1940年重任此职，他的激进社会党追随者喜欢称他为“沃克吕兹公牛”。他看起来是个强有力的人物，并对担任陆军部长一职非常感兴趣。但他却把精力耗费在执行一项软弱的绥靖政策上，主张采取防御性战略，鼓吹构筑要塞工事，即马奇诺防线。

直到将近一年之后的1935年3月15日，当国民议会就一项把服役期延长到两年的法案进行辩论时，雷诺才找到机会为戴高乐的观点进行辩护。前财政部长雷诺宣称，他将投票赞成这一法案，条件是议会通过他起草的一项修正案，建议最迟在1940年4月15日之前建立起一个装甲军。如果这一建议得以实现，那么，德军在那年入侵时就会遭到强有力的阻击，而不至沿法国北部平原长驱直入，所向披靡。雷诺身材矮小，长着一双机智的眼睛。他是一位雄辩的演说家。他对议员们说：“止我们假设，明天德国就宣战，比利时遭到侵略。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没有先例的。如果我们没有能力立即支援比利时，帮助它守住东部边界，那么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历史的悲剧也许会重演，比利时军队可能被迫朝海岸退却。那样，我们就不得不保卫法国北部无险可守的长达350公里的边界。在坐的哪一位能同意不经一战就眼看着我们最富饶的省份再遭侵略，我们的祖国再受肢解呢？不建立这个装甲军，我们就会丧失一切！”

雷诺虽然振臂高呼，但响应者寥寥无几，当时法国政界、军界一些领导人，目光短浅，害怕战争；他们对德国法西斯头子一味迁就，妄图将祸水东引。他们错误地认为，退让就可以求和，妥协就可避免战争。但是，与他们的愿望相反，欧洲正愈来愈迅速地走向战争。根据凡尔赛和约，1935年1月，萨尔区举行公民投票后，归还德国。这一来希特勒胃口愈来愈大。于是，正式宣布废除和约中有关限制德国军备的条款，重新实行了征兵制，而且宣布德国军队将增加到36个师。这是3月间的事情。到了秋天，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国联大为震惊，这也暴露了法国人和英国人的软弱无能。事到如今，要使欧洲这两个独裁者住手，已经不可能了。正是：

德国重新崛起，

英美输血打气；

纳粹疯狂扩张，

矛头首指西方！

欲知希特勒下一步如何动作，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章 德国剑出鞘

侈谈和平诡计多，扩军备战紧敲锣；
法英受骗搞绥靖，引火烧身遭战祸。

虽说戴高乐多次呼吁“加强国防，警惕德国军国主义的重新崛起！”但是法国当权派，无论军界和政界，都无动于衷。法国外长白里安说：“只要我担任外长，大炮就去它的吧！”可是国际形势使他的“高尚目标”越来越难以实现。经济衰退波及全欧，希特勒上台后咄咄逼人，只要不是神经错乱的人都认为战争越来越逼近了。即使这样，在法国还到处流行着这样一句宽慰人心的滥调：“法国军队是世界上最精锐的军队，何必庸人自扰！”

在战后法国军队的组织中，最高军事机构是军事委员会，由陆军部长担任主席。军队没有总司令，指挥权由兼任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总监和总参谋长共同掌握。军事委员会本身包括全体元帅，在大战期间指挥过一个军或一个集团军的将军，马克西姆·魏刚将军说：“这种选择方法保证了军事委员会的称职。”事实上这种领导班子的组成助长了军事委员会的思想僵化。魏刚的看法只说明，他没有从亲身经历的法国军事惨败中吸取任何教训。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军界的三位显赫人物是霞飞，福煦和贝当，他们都是法国元帅。霞飞在战后曾短时担任设防区研究委员会主席，于1922年辞职。福煦担任协约国军事委员会主席，负责实施凡尔赛和约的军事条款。这项任务是他的主要职责。他虽然出席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但在审议问题时没有特别权力。福煦和霞飞都年逾古稀，他们对法国军事组织和政策的影响不久就越来越小了。贝当却不然，他比他们两人小五岁，精力特别充沛。在整个20年代，直到1931年2月，他一直任总监兼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到他放弃这两项职务时，已经75岁，但他仍担任着其他重要职务，仍把着权力不放。他的陈旧的军事理论和僵化的思想体系，为法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唯一值得这些老将们夸耀的是，他们用巨额军事投资建造了一条马奇诺防线。这条防线受尽嘲讽。这条耗资25亿法郎的防线，并没有真正起到军事屏障的作用，正如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威廉·夏伊勒所指出的：“马奇诺防线的麻烦在于设立的地点不对。

……德国人从最早的部落时代起，就采取的入侵法国的标准路线……是穿过比利时。这条路线最短，最好走，因为这条路沿途平坦，没有需要渡过的大河流。德国人在1914年又采取了这条路线。”

法国把几十亿法郎花在马奇诺防线上，而不发展空军，这看来很奇怪，也许他们认为，希特勒上台以后德国还没有建立有组织的空军。法国人被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所麻痹，听任他们的空军老化、削弱。1928年，空军成为一个独立的军种，还设立了空军部和总参谋部，但是组织上的这种变化并没有使空军的建设取得很大的成果。地面的对空防务的情况更糟。到了1930年，还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几百门高射炮。翌年，设立了空防总监的新职，第一任空防总监不是别人，正是75岁的贝当。他刚辞去陆军总监的职务就担任了此职，一直担任到1934年。他在1932年给军事委员会的一封信中反映了他的特别狭隘的思想。他写道：

“如果我有200架战斗机来防御敌人的进攻，有200架强大的轰炸机进行报复，每架载两吨炸弹，航程1000公里，到了那一天，和平就有了保证。”已故英国将军、军事著作家富勒说，马奇诺防线是“一面盾牌，它缺乏一把

剑”，而“法国野战军是一把扫帚柄”。

空军甚至是更差劲的工具。这句评语讲得很尖刻，但却是对法国军队公正的评价。诚然，这支军队多年来号称是“欧洲最强大的军队”，但却远远不能满足法国国防的需要。

与法国统治集团麻木不仁的情况相反，希特勒上台后加紧扩军备战，准备侵略扩张。他的具体目标和方法是他早在《我的奋斗》中就十分露骨和十分详尽地规定了。现在希特勒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以宣传裁军与和平的方法来迷惑德国在欧洲的敌手，同时睁大眼睛寻找他们集体甲冑中的弱点。1933年5月17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了“和平演说”，这是他一生中最漂亮的演说之一，是欺骗宣传的杰作。它不仅深深地打动了德国人民的心，使他们团结在他的周围，而且在国外造成了一种使人有好感的印象。就在希特勒发表演说的前一天，美国总统罗斯福刚刚向44个国家的元首发出了一封动人的信件，概述了美国在裁军与和平方面的计划和希望，呼吁废除一切进攻性的武器——轰炸机、坦克、机动重炮。希特勒很快地响应了美国总统的呼吁，并且加以充分的利用，希特勒说，他的政府对罗斯福总统的呼吁表示热烈的欢迎，德国愿意放弃一切进攻性武器，也愿意解散它的全部军队，销毁它现有的少量武器，如果邻国和有武装的国家也这样做的话。他还强调，德国不想进攻别国，只想谋求安全，愿意同任何国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这篇演说，还有不少温和的辞句和热爱和平的表白，使得忧心忡忡的世界感到又惊又喜。给人的印象是：德国不要战争，战争是“疯狂透顶的事”。它会“造成现有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崩溃”。纳粹德国并不希望把其他国家的人民“德国化”。但是，其中有一个警告。德国要求同其他国家享有平等待遇，特别是在军事方面。如果得不到平等待遇，德国宁可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然而在西方世界同声庆贺希特勒出乎意料的讲道理的时候，这个警告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从这个性格暴躁的纳粹独裁者口中说出来的，竟不是如许多人所预料的蛮横威胁，而是甜言蜜语，全世界都给迷住了。伦敦《泰晤士报》认为，希特勒的平等待遇的要求是“驳不倒的”。法国一些报刊也认为，希特勒已响应了罗斯福总统的呼吁，这个姿态使惶惶不安的世界有了新的希望。

但是，希特勒的警告并不是空口说说而已。当10月初看到协约国坚持要在八年之后才肯把它们的军备降低到德国水平的时候，就在10月14日希特勒突然宣布，由于其他大国在日内瓦不肯给予德国平等待遇，德国立即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与此同时，他采取了其他三个步骤，即解散国会，宣布他将把他退出日内瓦会议的决定交付全国公民投票来认可，最后命令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将军向军队发出秘密指示，如果国际联盟采取制裁行动，就要抵抗武装进攻。

为了肢解协约国，以便将来更好地收拾法国及对其盟国各个击破，希特勒突然对波兰表示“亲善”，宣布用直接谈判的手段来解决德波两国共同有关的问题，并且“为了巩固欧洲和平，在相互的关系中放弃使用武力”。由于诱使波兰人同他进行直接谈判，他就能绕过国联并且削弱它的权威。这样也就能够破坏法国在东欧的联盟关系，而在这种联盟关系中，波兰是个重要的堡垒。

1934年1月26日，也就是希特勒在他执政第一周年纪念日出席国会开幕式的前四天，在德国的诱使下，波兰即开始逐步脱离自1919年复国以来的

保护人——法国，而越来越接近纳粹德国。这是一条导致它在“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远远没有满期之前就亡国的道路。

希特勒口头上侈谈和平，但暗中却加紧准备战争。按照凡尔赛条约的规定，战后德国的军备，必须取消普鲁士的军训制度，解散军官学校，禁止德国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德国军队“只能以志愿服役者募集组织之”，即实行雇佣兵役制度。不许德国进行战争动员，限定其陆军不能超过十万人，其任务是维持国内秩序和巡查边界。同时规定这支军队不能拥有空军，不能使用坦克和重炮。德国的海军只能拥有 36 艘军舰，不能配备主力舰，最大的舰只不得超过 16000 吨，并规定禁止使用潜水艇。最后还规走莱茵河沿岸不能成为德国的军事区，而且还分别由国联占领 5 年，10 年和 15 年。

希特勒在其执政的头几年中，以“砸烂凡尔赛和约的锁链，恢复德国人民的荣誉与自由”，“保卫德国的边界”和“维护和平”等口号来欺骗人民。他侈谈德国人民的“平等权利”，煽动群众对凡尔赛和约的仇恨情绪，为其侵略扩张服务。正如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 1937 年 12 月 10 日所讲的：“政治就是一种赌博。历来赌博是怎样赢钱的呢？就是要下大的赌注。这完全和买彩票一样。谁买彩票买得最多，谁中头彩的机会也就越多。如果有人问我们，40 年计划难道不是战争计划吗？我就这样回答：“是的，是这样的计划！”希特勒分子就是这样，把德国人民的命运视为多数人受害、少数人获利的彩票赌局。戈培尔野蛮地声称：“只要我们，纳粹政府和后台老板能赢，我们就准备把全体人民去作赌注——战争就是这场赌博的最残酷的结局。”

为了打破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军事限制，早在 1934 年，希特勒就命令陆军要在同年 10 月 1 日以前，把它的兵力增加到原来的两倍，从 10 万人增加到 30 万人。还准备公开下令征兵和公开否认凡尔赛和约，海军也得到警告，要加速建造两艘 26000 吨的巡洋战舰，这两艘战舰后来命名为“夏恩霍尔斯特”号和“格奈斯瑙”号。凡尔赛和约所禁止建造的潜水艇，也早在芬兰、荷兰和西班牙偷偷建造。作为民用航空部长的戈林也在忙着建立空军。他命令制造商们搞军用飞机的设计，对军用飞机驾驶员的训练在航空体育协会的伪装下早已加紧进行了。到了 1935 年 2 月 16 日，希特勒公布了一项惊人的法令：实施普遍军役制，并规定为和平时期的建立 12 个军和 36 个师的军队，大约 50 万人。德国的航空工业也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1932 年才生产 36 架飞机，到 1935 年已上升到 3183 架了。这样一来，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军事限制被希特勒彻底打破了。

希特勒扩军备战的步伐是惊人的。

1939 年 9 月 1 日他供称：“我致力于德国国防的重建工作已 6 年有余。在此期间，为建军而支出的费用在 900 亿马克以上。”每年平均 151 亿马克。在、933 年到 1938 年的 6 年中，德国军事预算的开支和军事生产分别增加了 9 倍。军费开支占同期国家预算的 3/5。

1939 年建成位于德国西部边界的长 500 公里，包括 16000 个军事设施的齐格菲防线。

1939 年，德国生产了 8295 架飞机。这一年，德国的军人生产比英、法两国的总和还多一倍。希特勒对大规模扩充军备的目的是直言不讳的。他说：“从原则上来说，我不是为了不打仗才建立国防军的。我一向部有打仗的决心。迟早我总要解决这一问题，”

面对纳粹德国扩军备战的疯狂行动，法国、英国和国际联盟理事会，除

了发出空洞的警告外，没有采取任何实际的惩罚行动。然而，希特勒并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他认定，现在又该来弹弹他那爱好“和平”的调子了，借以麻痹法国、英国和美国，以便乘他们缺乏准备时，打它个措手不及。此外，他还想看看是否能在联合起来对付他的大国中间钻个空子，借以离间他们之间的关系。

1935年5月21日晚上，希特勒又在国会发表了一篇“和平”演说。宣称德国不要战争，战争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是令人极端憎恶的，德国所希求的只是在对大家公正的基础上的和平谅解。他说：“过去300年中欧洲大陆上所流的血，跟这些事件对各国所产生的后果，颇不相称。到头来法国仍旧是法国，德国仍旧是德国，波兰仍旧是波兰，而意大利仍旧是意大利。帝王的野心、政治欲望、爱国偏见，造成了大量流血……如果这些国家仅仅把它们的牺牲的一小部分用在比较明智的目的上，成就无疑会更大而且更永久。”

希特勒继续在和平问题上大做文章。他反复宣称，德国没有领土野心，德国已和波兰缔结了一个互不侵犯协定，“我们要无条件地信守这个协定，我们承认波兰是一个伟大而具有民族意识的民族国土”。至于奥地利，希特勒说，德国既不打算也不希望干涉奥地利的内政，更不想并吞奥地利或者把它合并。为了表示“和平诚意”，希特勒在演讲结束时还讲了一段冠冕堂皇的话：“不论是谁，要在欧洲点起战火，除了混乱外不能希望得到别的任何东西。但是，我们坚决相信，在我们的时代里实现的将是西方的复兴，而不是西方的衰亡。德国可能对这项伟大的工作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我们引以自豪的希望和不可动摇的信念。”

希特勒的和平宣传果然发生了效应。英国最有影响的报纸伦敦《泰晤士报》欣喜若狂，并为此发表评论说，“这篇演说结果证明是合理的、直爽的和全面的。凡是本着公正态度来看这篇演说的人，谁也不能怀疑，希特勒先生所提出的一些政策主张完全可以构成彻底解决德国问题的基础——一个自由平等和强大的德国，来代替16年前强迫它接受和平的战败的德国。”法国军政界的一些显要人物们，也在为希特勒大唱赞歌，他们认为这篇演说“是一篇诚挚而经过周密考虑的由衷之言”，并以此对戴高乐等人加强国防的建议大加谴责，说什么“何必庸人自扰！你看人家希特勒不是一再声明不要战争渴望和平吗？我们实在不应再搞劳民伤财的备战了！”

但是，就在希特勒发表了这篇动人的“和平”演说九个月之后，1936年3月7日，希特勒命令三营国防军，以奇袭行动进入莱茵兰非军事区。两个小时后，希特勒在国会宣布，由于法国和俄国签订了互助协定，罗逸诺公约已经失效。德国人民为了维护他们边界的安全和保障他们的防务的根本权利，德国政府已从今天起重新确立了德国在非军事区的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主权！这时，600名议员，像机器人一样倏地站起来，右臂向上伸出作纳粹式敬礼，口中高呼“万岁”！

希特勒进占莱茵兰的这一冒险行动，却吓坏了德国的将军们。陆军首脑勃洛姆堡在约德尔和大多数高级军官的支持下，要求撤回已经越过莱茵河三营军队，正如约德尔在纽伦堡作证时所说的，“以我们当时的处境来说，法国的掩护部队本来是可以把我们打得落花流水的。”但是，希特勒相信法国人不会进军，断然拒绝了态度动摇的总司令部的一切撤退的建议。即使这样，希特勒的心里也是敲小鼓的。他私下对施密特博士说：“进军莱茵兰以

后的 48 小时，是我一生中神经最紧张的时刻。如果当时法国人也开进莱茵兰，我们就只好夹着尾巴撤退，因为我们手中可资利用的那点点军事力量，即使用来稍作抵抗，也是完全不够的。”但在一些动摇不定的将军们面前希特勒却夸口说：“如果不是我，而是别人当德国的领导人，会发生什么情况？随便你们说，他都会吓破胆的。我不得不说谎，但是我的无可动摇的顽强和惊人的沉着，挽救了我们。”

的确，希特勒此举，不仅得到了犹豫不定的法国人的帮助，而且还得到法国的因循苟安的英国盟友的帮助。法国外交部长皮埃尔·艾蒂尔·佛兰亭 3 月 11 日飞往伦敦，请求英国政府支持法国在莱茵兰采取军事上的对抗行动，他的请求被婉言谢绝。英国不愿冒引起战争的危险，虽然盟国对德国占有压倒的军事优势。然而，根据罗迦诺公约的规定，法国是有权对德军进入这个非军事区采取军事行动的，而且根据这个条约，英国是有义务以它自己的武装部队来支持法国的。伦敦会谈的没有结果，向希特勒证实，他最近的冒险又侥幸得逞了。

希特勒在莱茵兰的冒险成功给他带来的胜利，其重要性超过了当时所能想象的程度。在国内，这个胜利加强了他的声望和权力，达到了过去德国统治者从未达到过的高度。这个胜利确定了他凌驾于他的将领们之上的地位和权威，因为他们曾在一个成败关键时刻踌躇动摇，而他却保持着坚定。这个胜利告诉他们，在对外关系甚至军事问题上，他的判断比他们来得高明。他们曾经担心法国会作战；希特勒则判断法国不会出兵。最后，而且是最重要的，莱茵兰的占领，虽然只是一个很小的军事行动，却为希特勒日后在欧洲寻找侵略的新机会打开了道路，因为欧洲不但由于三营德军驰越莱茵河桥而吓破了胆，而且它的战略形势也因此而无可挽回地改变了。

对法国来说，这是末日的开始。关于这一点，戴高乐早就预料到了。首先，法国在东方的盟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突然面临这样一个事实：法国不愿战斗来反对德国侵略，以维护法国政府自己曾费了很大的劲才建立起来的安全体系。但是，问题还不止于此，这些东方盟国开始了解到，即使法国不是那么因循苟安，由于德国拼命地在法德边界后面建筑一道西壁防线，法国也很快就会无法给予它们很多援助。它们知道，这条堡垒防线的建立，很快就会改变欧洲的战略形势而对它们不利，法国有 100 个师，尚且不敢去击退三营德军，那末在德国军队攻击东方时，它们就更难指望法国愿意让它的青年人流血牺牲来袭击难以攻破的德国工事了。

在希特勒出兵占领莱茵兰不久，1936 年 5 月 5 日，意大利法西斯军队开进阿比西尼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7 月 4 日国际联盟正式屈服，取消了对意大利的制裁。两星期后，7 月 16 日，佛朗哥在西班牙发动了军事反叛，内战爆发。这件事使得法国的边界上有了第三个不友好的法西斯国家。

10 月 25 日，德、意在柏林签订了一个秘密议定书，规定了德国和意大利在外交方面的共同政策。这样一来，希特勒不仅一手打破了凡尔赛和约的桎梏，靠了虚声恫吓而占领了莱茵兰，而且完全打破了最初的孤立状态，现在已有了墨索里尼和佛朗哥作为忠实的盟友，又使波兰脱离了法国的影响。希特勒在军事上和外交上的这些成就，进一步刺激了他的侵略胃口，他决心用武力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希特勒发狂地叫嚷：要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要获得 1200 万德国人！

十年前，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就已经说过，德国必须在东方有生存

空间，必须用武力取得它。不过，那时他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鼓动者。现在，他是国家元首，三军最高统帅，他命令最高统帅部和外交部具体谋划进攻的日期和准备工作。为了便于推行他的侵略扩张计划，希特勒作为国家元首，现在又亲自接管了勃洛姆堡总司令的职务，并取消原来的战争部，新设了武装部最高统帅部，陆海空三军都隶属其下，由希特勒直接指挥。他要向他的祖国——奥地利开刀了。

早在 1934 年 7 月 25 日，也就是希特勒夺权一年半以后，他指示在维也纳的纳粹匪徒，暗杀了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如今，事隔四年，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纳粹德国羽毛丰满，德意修好结盟，英法进一步暴露了当权者眼光短浅、软弱无能。希特勒认为，现在实现他侵占奥地利的“奥托”计划是十拿九稳的了。经过和他的同僚们谋划，他决定先把奥地利总理库特·冯·许士尼格博士骗到伯希特斯加登会谈，胁迫他写卖身契，宣布德奥合并，放弃奥地利独立，否则就大兵压境，用武力取之。

1938 年 2 月 20 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演说，他狂妄地宣布道：“有 1000 多万日耳曼人住在同我们边界接壤的两个国家里……一个世界大国不能忍受它的旁边的同族弟兄遭受残酷的折磨。保护这些不能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政治上和精神上自由的日耳曼人民，是德国的职责。”这是直率而公开的通知：今后解决 700 万奥地利人和 300 万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的日耳曼人的前途，是第三帝国的事情，是他希特勒的事情。四天后，2 月 24 日，许士尼格在向奥地利联邦议会发表的一篇演说中答复了希特勒。他强调说，奥地利已经让步到了“我们必须停止而不能再退”的极限了。他在结束演说时发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号召：“红——白——红（奥地利国旗的颜色），誓死效忠！”

希特勒闻讯勃然大怒。决定要对奥地利实行军事占领，并要许士尼格立即辞职，而且必须在西小时内任命纳粹分子赛斯-英夸特为总理，与此同时，又指示暴徒们在维也纳街头捣乱，狂呼：“吊死许士尼格！希特勒万岁！”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希特勒以“应奥地利临时政府的紧急请求，于 3 月 11 日派军队维持秩序”的名义，武装占领了奥地利，实现了希特勒梦寐以求的目标。

在希特勒武装侵占奥地利的紧急关头，法国、大不列颠和国际联盟又采取什么行动来制止德国对一个和平邻邦的侵略呢？什么都没有。当时法国又处在没有政府的状态中。3 月 10 日，星期四，夏当总理和他的内阁辞职了。直到 13 日德奥合并已经宣布后，才有了莱翁·勃鲁姆组成的法国政府。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加强国防”和“制止希特勒侵略”的建议，仍然没有引起法国权贵们的注意。

英国呢？在 2 月 20 日，就是许士尼格在伯希特斯加登屈服后的一个星期，张伯伦在下院发表演说称，“在伯希特斯加登所发生的，只才过是两位政治家商定了改善他们两国之间关系的某些措施……很难认为，一个国家已为另一个国家的利益而放弃了它的独立，”甚至当英国政府闹清希特勒的军队正源源不断地开入奥地利的时候，也只是发表了一个不痛不痒的“强烈抗议”。

希特勒侵占奥地利后，大肆鼓吹他的“大胆的领导才能”，强调只有他一人才能作出军事上和外交政策方面的决定，陆军的作用仅仅是提供武力或者武力威胁而已；希特勒在强行占领莱茵兰和武装吞并奥地利之后，胃口越

来越大，立即转向他的下一个目标——捷克斯洛伐克，着手实施他的“绿色方案”，欲知希特勒在侵占捷克时，戴高乐的祖国法国和它的盟国英国采取什么态度，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章 达拉第其人

政治好客达拉第，主持国防不尽力；
纵容纳粹行侵略，祸国殃民民愤激。

在希特勒占领莱茵兰和吞并奥地利之后，胃口越来越大，他的下一个征服目标直指捷克斯洛伐克。面对着法西斯德国咄咄逼人的侵略，戴高乐和他的朋友们心急如焚，但百般呼吁无效。当时法国政局不稳，政府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法兰西正每况愈下，实际上法国不再是强国，甚至也不再想成为强国了：凡尔赛政策已经破产了：罗迦诺只剩下不愉快的和很渺茫的记忆：法国在一切外交事务中以热中搞绥靖的英国的马首是瞻。结果人民阵线失去了法国共产党的支持，一年之后完全销声匿迹了。

戴高乐终于得到了一个向荣翁·勃鲁姆述谈他在军事问题上见解的机会。勃鲁姆是法国社会党右翼领袖，1936年至1938年春天，曾两度依靠人民阵线组阁；但他公开违反人民阵线纲领，采取纵容法西斯国家侵略的不干涉政策。这位社会党总理，采纳了和他有多年之交的梅耶上校的建议，召见了戴高乐。关于勃鲁姆和戴高乐两人的会见及其各自的印象，双方在回忆录中都作了记述。勃鲁姆写道：“我看到一个神态自若。举止从容的人走了进来。他的身高、宽度、体格都像个巨人。……他就这样出现在我面前，平静地看着我，用慢条斯理、抑扬顿挫的语调和我谈话。他的一切都表明，在同一时间内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思想、一项计划、一种信念；为了不分散精力，他必须专心致志，全神贯注。他也许不能设想，他的信念竟会得到别人完全赞同。……他一点儿也不像富有灵感的发明家那样陶醉于自己的想象之中。他既没有荒诞离奇的幻想，也没有虚无缥缈的错觉，倒是颇为清醒；他并没有丝毫泄气甚至感到疲倦的样子，毫无疑问，他决心沿着近两年来他坚持不渝的道路走下去，因为他生来就具有不屈服和不妥协的素质。”

但是，在戴高乐笔下，却对这位政治家表示了极大的蔑视。在谈话中，戴高乐反复阐述了自己的意见，他说，如果德国占领奥地利后，又侵占捷克斯洛伐克或波兰，法国就应占领鲁尔区，这使那位社会党领袖大为震惊，他还指出，如果德军突破法军的防线，法国在军事上必将一败涂地，这一预言又使勃鲁姆大为扫兴。勃鲁姆争辩说，他正在提议大幅度地增加军事拨款，其中大部分将用于制造坦克和飞机。戴高乐反驳说，你计划制造的坦克和飞机的型号都是陈旧的，不适用的。谈到这里，勃鲁姆说，“至于如何使用政府拨给陆军部的军费，那是达拉第先生和甘默林将军的事了，”戴高乐回答道：“一点也不错，但必须承认，国防是政府的职责，作为总理是责无旁贷的。”戴高乐接着写道，在他们谈话的过程中，电话铃响了十几次，总理抱怨说，他甚至很难有五秒钟时间来集中精力考虑一个问题。事实上，尽管勃鲁姆对这次谈话印象深刻，但他对这位“古怪人物”的见解却满腹狐疑，到头来还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这次谈话不久，勃鲁姆就下台了，接着上台的是爱德华·达拉第。达拉第是激进社会党的领袖。1919年起任众议员。

1924年起历任法兰西政府的殖民、公共工程、外交、国防等部的部长。1933年至1934年曾两度担任法国总理，1935年参加法国人民阵线。在第三次担任总理时，日益采取反共立场，执行纵容法西斯德国侵略的绥靖政策。在法国历史上写下了不光彩的一页。

爱德华·达拉第在 1938 年 4 月组成的政府，经历了整个慕尼黑时期、波兰的覆灭，一直持续到 1940 年 3 月，亦即法兰西斯战役前的几个星期。达拉第在任总理的整个过程中，一直保留着他从 1936 年 6 月以来担任的国防部长和陆军部长的职务，因此，对于法国在战前那几年中采取的路线，他比其他任何法国人所负的政治责任都大。他的政治绰号是“沃克吕兹公牛”，但是，尽管他的体格健壮，而且常常有些粗暴的举动，但在气质上他并不是公牛，而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

达拉第出身于面包师之家，那是一个外省的小资产阶级家庭。

自幼刻苦好学，才华横溢，且又受过高等教育，他在历史和古典文学方面获得过出色的学位，在进入政界前是一个大学教授。一位法国专家说，“达拉第的才能、勤奋、廉洁和敏锐的政治嗅觉，是他在政治上飞黄腾达的基础。在 1924 年到 1940 年之间，他只有一次失去部长职务。但是，他在 1934 年到 1936 年之间失去部长职务，是他倒霉的第二次短时间出任总理的结果。这也表明他致命的弱点：在紧要关头，他不敢作出强硬的决定，而总是让别人把权力接过去。”

达拉第在社交和工作方面喜欢独处幽居，这或许是他的另一个缺陷。他的妻子死于 1932 年，之后，他没有再娶，而是与他的姐姐和他的两个儿子住在一套不大的公寓里，很少参加娱乐活动。在社会生活中，他似乎有许多熟人，但知己却寥寥无几。他虽然长期担任政府高级职务，但这并没有帮助他开拓对于国际问题的视野。他是个法国“本土主义者”。他不喜欢凡尔赛和约，因为这个和约，使法国与东欧搅在一起。

尽管达拉第和甘默林各自作为陆军部长和参谋长曾有很长时期的交往，但他们并不是亲密的合作者。甘默林只有通过特别的约会才能见到他。常常要在接待室等候，而且，就是进入达拉第办公室以后，他的谈话也经常被电话和来访的政治家打断，达拉第的军事办公室主任布雷将军与甘默林合不来，所以甘默林见到达拉第的机会愈来愈少，有时候要相隔整整一个月才能见到。

社会党人同意支持达拉第政府（这样就可以保持人民阵线的门面），但是拒绝参加这个政府。于是，达拉第便转向“中右”党派。他让拉尚布尔和坎平齐留任空军部长和海军部长，乔治·庞纳接管了外交部。选择庞纳代替保罗·邦库尔是外交气候风向标的一次大摆动，也是导致慕尼黑会议的许多事件中的一个重大转折，总理同这两个人都很熟。在达拉第 1933 年的政府中，庞纳是财政部长，保罗·邦库尔是外交部长，而达拉第选择庞纳担任外交部长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1951 年，达拉第在回答议会调查委员会就这个问题提出的质询时写道，选择庞纳是基于他曾经是 1932 年关于重建欧洲经济的斯特雷扎会议的主席，他在 1937 年任驻美国大使时同罗斯福总统和其他美国要人建立了良好关系，17 年后，达拉第 84 岁时，他在与马塞尔·奥菲尔斯谈话时再次提到了庞纳与华盛顿的联系，但他主要强调了庞纳受到“资产阶级人士、重工业和大财团”的支持，而新政府是需要这种支持的。

保罗·邦库尔在 1945 年的著述中写道，4 月 10 日，也就是新政府成立的那一天，他与达拉第长时间的会晤，专门谈了对外政策问题。达拉第提到了保罗·邦库尔的妥协态度在政治上激起的反对。后者回答说，实行让步政策将导致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两国的覆灭，并且会使法国孤立，听任德国

的摆布。他们就这样分了手。几小时之后，达拉第打电话给他：

达拉第：我考虑过了，你制订的政策是令人钦佩的，也是与法国相称的，但我认为，我们没有实施这种政策的手段。所以我就起用乔治·庞纳。

保罗-邦库尔：如果你想推行另外的政策，你作的选择是再好不过的了。祝你幸运，我的朋友！

事实上，法国议会是以宽慰的心情对待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政权这样一种前景的。议会几乎一致批准了达拉第政府，并在4月13日通过表决给予他的政府以特别财政权力，那是勃鲁姆先前曾经要求而不曾得到的权力。罢工问题得到了解决，法郎稳定下来了。但是法国和捷克的联盟受到绥靖分子的强烈谴责。约瑟夫·巴特勒米教授在《时报》上发表文章说：罗迎诺公约的失效，使法国和捷克的条约在法律上变得过时。约瑟夫以法律权威著称，他的文章给佛兰亭这样的绥靖派发言人提供了一种似乎有理的法律基础。

当时捷克问题，已成了达拉第政府所面临的最棘手的一个问题。希特勒在并吞奥地利之后，决意要消灭捷克斯洛伐克，决心从地图上抹掉这个战后根据凡尔赛和约新取得独立的国家。他对这个国家的新生深恶痛绝，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是由托马斯·迎里格·马萨里克和爱德华·贝奈斯亲手缔造的，马萨里克是个马车夫的儿子，靠自学而成为布拉格大学的哲学教授，并且成了这个国家的第一任总统，贝奈斯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靠半工半读，读完了布拉格大学和法国的三个高等学府。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诞生后，他几乎是连续担任外交部长，在马萨里克于1935年退休后，出任第二任总统。

早在16世纪时，哈布斯堡帝国兼并了古老的波希米亚王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马萨里克和贝奈斯领导了捷克的复国运动，经过长期的斗争，终于在1918年使捷克斯洛伐克从哈布斯堡帝国中独立出来，成为中欧最发达的工业国家之一。

捷克斯洛伐克是法国在东欧的同盟体系的重要成员国，与苏联也订有互助条约。这个国家有1400万人口，其中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950万，少数民族500万，少数民族中有350万是日耳曼居民，主要居住在西部与德国接壤的边界山区——苏台德地区。德国并吞奥地利时，一再扬言希望改善德捷关系，事实上希特勒企图侵略这个国家是蓄谋已久了。

希特勒侵捷，仍然是玩弄“特洛伊木马”的诡计。在开始时，他并不直接出面，而是唆使他在这个国家的代理人、苏台德区日耳曼人党头目康拉德·汉莱因出面闹事。日耳曼入党实际上是德国法西斯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第五纵队”，是纳粹党的一个分支。1935年，它每月从德国外交部领取15000马克的活动经费。汉莱因是希特勒的忠实走狗，完全按柏林的指示行事。

1938年3月28日，希特勒把汉莱因叫到柏林，密令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制造事端，让他们提出捷政府“所不能接受的要求”。汉莱因对其主子的意图心领神会，把它归结为“我们必须老是提出永远无法使我们满足的要求”。因此，所谓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日耳曼少数民族的困境，对希特勒来说，就像一年以后但泽之于波兰一样，不过是一个借口，以便让他用来在自己所垂涎的土地上制造纠纷，进行颠覆，用来迷惑其友邦，掩饰他的真实意图。

尽管有了奥地利的先例，法国和英国的领导人仍然没有憬悟到这一点，由于他们政治上短视，惧怕战争和战后可能爆发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仇视当时的社会主义苏联，所以准备把捷克斯洛伐克奉送给希特勒，作为推动德国

法西斯向东反苏的礼物。

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本来订有同盟条约，当捷克斯洛伐克领土完整受到威胁时，法国有义务给予援助。可是一纸条约，从来不能保证帝国主义者说话算数。达拉第政府虽然口头上多次声明恪守对捷条约义务，背后却同张伯伦搞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勾当。1938年4月底，达拉第前往英国与张伯伦磋商。张伯伦对达拉第说，英国是下会为捷克斯洛伐克作战的，劝法国也这样做。张伯伦和达拉第说什么希特勒的全部要求，只不过是要求为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同胞“申张正义”而已。张伯伦说：“希特勒要求的是民族自治，而不是征服。”

达拉第从伦敦回来十天之后，当有人问他法国是否会为捷克斯洛伐克参战，他回答说：“用什么参战？”他宣称，法国的空军是如此屏弱，使得法国不可能参战。他还说：“从德国吞并了奥地利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就处于完全无望的境地。”5月10日，副总理夏当时美大使布立特说，一旦德国进攻捷克斯洛伐克，“法国除了进行抗议之外，将毫无作为”。

法国领导人的这种态度，立即由一名英国记者转告了柏林，此人是德国驻伦敦使馆的秘密特务。他在达拉第4月28日到达伦敦以后不久就见到了达拉第。据这个特务说，达拉第迫切希望英国立即向布拉格施加压力，因为达拉第预料几个月之内便会最后摊牌。法国被它与捷克的条约“缚住手脚”。这样，英国采取行动就越发重要了：“目前，欧洲的和平可能取决于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以及贵国政府，特别是张伯伦先生，在这方面有何作为。”达拉第还表示：在任何情况下法国都不会卷入军事冲突。

事实上，当春天一天比一天暖和起来的时候，法国和英国政府就开始对捷克政府施加压力，要它给予苏台德的日耳曼人以范围极广的让步。5月3日，德国新任驻伦敦大使赫伯特·冯·狄克森向柏林报告，哈利法克斯勋爵曾告诉他，英国政府不久将在布拉格采取一个步骤，其目的在于劝说贝奈斯对苏台德日耳曼人表示最大限度的和解。四天以后，德国公使向柏林报告说，驻布拉格的英、法公使就在5月7日采取了这一外交步骤，敦促捷克政府“尽最大限度”来满足苏台德人的要求，希特勒和外长里宾特洛甫看到英法政府如此卖力，甚力高兴。

希特勒越来越急于采取行动。5月19日，莱比锡有一家报纸曾发表了一则德军调动的消息。苏台德的纳粹领袖汉莱因曾在5月9日宣布，他的党同捷克政府之间的谈判已告破裂，而且据说，在苏台德发生了开枪射击的骚动。在柏林，戈培尔博士大肆渲染捷克对苏台他日耳曼人的“恐怖行动”有增无已，紧张的局势似乎正在趋向顶点。

从5月25日那一个星期五开始的周末，演变成了一个危机的周末，后来被称为“五月危机”。在此后48小时之中，伦敦、巴黎和布拉格的政府，都惶惶不安，以为欧洲迫近战争之程度为1914年夏天以来所未有。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德军开始在德、捷边境集结和德国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新计划可能被泄漏所造成的，这个计划是德军最高统帅部为希特勒所草拟并且在星期五向他提出的，无论如何，至少在布拉格和伦敦，人们都认为希特勒马上就要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侵略了。从这种看法出发，捷克人就开始动员，而英国和法国政府在迫在眉睫的德国威胁面前，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也曾一度表现了同苏联政府的团结精神，但为时不久，这种精神就消失了，直到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差点儿把它们消灭掉的时候才又重新出现。

在希特勒的恫吓和讹诈面前，法国和英国的政客们吓破了胆。他们对苏台德日耳曼人的友好姿态越来越多，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苛刻。苏台德人要什么，就要捷克政府给什么。希特勒鉴此，便以战争相威胁。在8月里，德国动员数十万军队参加军事演习，德国飞机经常到捷克斯洛伐克领空骚扰。8月23日，希特勒还到基尔湾检阅德国的海军演习，并邀请外国驻德国武官参观，以炫耀武力。戈林还请法国空军代表团“参观”飞机工厂和飞行表演，结果将法国空军参谋长吓呆了。这位患软骨症的参谋长认为，“如果9月底打仗，法国空军将在两周内被消灭，连一架飞机都不会剩。”

希特勒软硬兼施，一方面以武力吓唬英法，另一方面又伪善地宣称，如果满足德国对捷克的要求，它将别无他求，准备同英国达成广泛的协议。张伯伦满口答应，还希望希特勒去同英王一起游览伦敦。英德间就肢解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了罪恶的交易。张伯伦说：“英国在东欧没有重大利益，”“应让希特勒在东欧为所欲为。”因此，英国卖力地帮助希特勒去实现侵占苏台德地区的阴谋。

在希特勒到基尔湾检阅海军演习时，他还在“派特里亚”号邮船上接待了匈牙利的摄政霍尔蒂海军上将和匈牙利政府的成员。希特勒告诉他们，匈牙利如果要想在捷克的宴席上分尝一宵，他们必须赶快采取行动。他说：“谁要想坐席，至少得帮厨。”对于波兰，他们倒是完全相信的。整个夏天，驻华沙的冯·毛奇大使都在向柏林报告，波兰不但不愿让苏联假道以军队和飞机援捷，而且波兰外交部长约瑟夫·贝克上校还对捷克的一块领土特青地区垂涎欲滴。贝克外长的致命短视这时已表露出来，而那年夏天，在欧洲这种短视的观点却是一种流行的观点。到头来将证明，这种短视的观点危害之大是贝克所不可能想象到的。

就在这年夏天，法国人纷纷离开工作岗位，前往阳光充足的海滨度假，而德国人却枕戈待旦，在齐格菲防线一带疯狂备战。这一情景终于使得达拉第不能光是发发牢骚了。8月21日，他在电台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宣布军工企业停止实行40小时工作周，并请求国民返回工作岗位，这一讲话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劳工部长和公共工程部长辞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达拉第选择取代这两个部长的是议会中绥靖思想最严重的两个人。新任公共工程部长阿纳托尔·德蒙泽是有名的猛烈抨击法捷联盟的人，看来，“沃克吕兹公牛”又一次采取了进一步、退两步的做法。

8月24日，韦尔明将军结束对德国的正式访问回到法国，他带回了关于德国加速制造飞机的“可怕消息”，向所有人重申了他第一次在国防常务委员会上所作的令人沮丧的预言：一旦同德国开战，法国空军将在15天内被消灭。更为糟糕的是，当他告诉戈林，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将意味着同法国开战时，那个胖子竟勃然大怒：接着，在8月29日，德国元首在视察法德边境的途中，亲临与斯特拉斯堡隔莱茵河相望的克尔，借以施加压力！

同一天，同雷诺、戴高乐等人一样强烈反对绥靖主义的殖民地部长乔治·曼德尔说，陆军部得到可靠情报，说明捷克斯洛伐克将在9月下旬遭到进攻。第二天，即8月30日，陆军情报局局长费尔南·乔治·戈什上校通知英国武官，德国陆军处在“紧急动员中”，“从军事角度看，德国已作好立即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战争的准备”。

就在战争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法国总理达拉第，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加紧了出卖捷克的罪恶活动，臭名昭著的牺牲捷克的慕

尼黑阴谋就此开始了。正是：助桀为虐，狗行鬼道。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八章 慕尼黑阴谋

张伯伦和达拉第，没有一个好东西；
助巢为虐行鬼道，牺牲捷克罪恶极。

由于戴高乐爱提意见，被认为是个“刺头”，就在慕尼黑会议之前，被调往梅斯地区担任坦克团的上校团长。戴高乐说，这次工作调动，名义上是提升，实际上是一次流放。

过了几个月，戴高乐又从梅斯调动下阿尔萨斯，负责指挥第五集团军的坦克部队。这时戴高乐一面抓紧训练部队，一面静观局势，继续著书立说，在《法兰西和她的军队》这本书出版前几天，戴高乐写信给保罗·雷诺，告诉他，《法国和它的军队》一书即将问世，并希望他抽暇一读。戴高乐接着写道，“至于我，展望未来，看到法国历史上将发生的最重大事件，对此我毫无诧异之感。我确信在这些事件中，你注定起举足轻重的作用。仅有一言奉告：如蒙见爱，不论情况如何，只要我一息尚存，愿效大马之劳。”当时战云密布，尽管达拉第等人热中于搞绥靖，但在戴高乐心里却准备打仗了。

鉴于剑拔弩张的国际形势，这年夏天，法军总参谋长甘默林，在戴高乐等中级军官的促使下，向达拉第提出了一个应急的备战计划。要求增建三个步兵师，扩大新兵的征召范围，并立即给防御空袭计划拨款。十天以后，他对这个计划又作了补充，要求为立即建立三个装甲师，以及此后尽快地为再建立三个装甲师提供经费。这个计划是在捷克斯洛伐克“五月危机”的前夕送交内阁的。然而这个计划，以花钱大多为由被达拉第拒绝了。结果，在慕尼黑会议以前的几个月中，法国的军备计划没有什么扩大，远远不能适应当时的战争形势的发展。

当时达拉第和张伯伦只是醉心于搞绥靖，他们不顾国内外人们的反对，决心牺牲捷克斯洛伐克来赢得“时代和平”。在这方面张伯伦比达拉第更表现出特殊的积极性。

1938年9月13日，当天晚上11点，他急电纳粹头子希特勒，愿前赴柏林屈尊求见。电报说，“鉴于局势日益严重，我提议立即前来见你，以寻求和平解决办法。我提议乘飞机前来，并且准备明天启程，请赐告你最早能在什么时候接见我，并请告会面地点。”就这样，这位掌握着大英帝国命运的人，这位已经69岁高龄而且又从来没有坐过飞机的人，居然肯降贵纡尊，不惮作七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到德国最偏远的伯希特斯加登，去向希特勒央求。这真使纳粹头子喜出望外。“啊，我的天哪！”希特勒在看到张伯伦的电报时这样叫了起来。

英国首相的飞机是9月15日中午在慕尼黑机场着陆的，然后他乘火车前往伯希特斯加登。就在这时，德国所有的电台都转播了汉莱因要求苏台德区归并德国的声明。这是张伯伦下飞机后听到的头条新闻。这显然是有计划地让他在会晤希特勒之前知道这件事。纳粹头子十分肯定：张伯伦此次前来，等于进一步保证，英国和法国将如他一贯认为的那样，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而出兵干涉，张伯伦一到，希特勒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他没有到伯希特斯加登火车站去迎接，而是在伯格霍夫高高的台阶上等候他的贵宾，故意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大国元首的架子。

这次德英政府首脑会谈，希特勒除了吹嘘他的“丰功伟绩”外，就是对张伯伦进行敲诈恫吓。他说：“我现在下定决心，不论用什么方法都要解决

一个问题，即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 300 万日耳曼人必须重返德国。”他警告张伯伦，不要对他的决心产生任何怀疑，他决心不容忍一个小小的二等国家，把有一千年历史的强大德国看作仿佛是次一等的国家，希特勒说，他今年 49 岁，如果德国为捷克斯洛伐克问题而卷入一场世界大战的话，他希望他能以壮盛之年领导德国度过危难。他为此准备迎接任何战争，甚至世界大战。世界上其他各国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他决不会后退一步。接着，希特勒提出了他的建议：“英国是否愿意同意割让苏台德区？还是按民族自决的原则作出割让？”这一建议并没有使张伯伦感到震惊。他回答说，在他同阁员和法国人商量以前还不能把话说死。不过，就他个人来说，他同意苏台德区脱离捷克斯洛伐克的原则。他希望回到英国向政府报告他的个人态度，并且取得政府的批准。

9 月 17 日，张伯伦一回到伦敦，立即召集内阁会议。他建议采取“一项直截了当的行动计划”，即“把以日耳曼人占多数的地区移交给德国”。他深信，只有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才能劝住希特勒不下令侵犯捷克斯洛伐克。张伯伦在他和希特勒会谈时强烈地感到希特勒“充满斗志”。他的内阁也认为法国是毫无斗志的，因此根本谈不到抗拒希特勒向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的要求。在英国内阁会议上，张伯伦还特意介绍了他对希特勒的印象：“我想，尽管我从他的脸上看出他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但我所得到的印象却是：这个人在作了保证之后，还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

现在，当务之急是必须同法国政府取得一致后退的意见。9 月 18 日，法国总理达拉第和外交部长庞纳应邀来到伦敦。张伯伦已经决定在原则上接受希特勒在伯希特斯加登所提出的要求。剩下来的事情只是拟出建议，由英法两国驻布拉格代表向捷政府提出。法国内阁送来了一份确实想得“比较周到”的草案。他们不赞成公民投票，因为他们看到，这样一来，斯洛伐克和露西尼亚地区也可能会提出同样的要求。他们赞成直截了当地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不过他们又说，英国政府应该和法国，加上苏联（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与之磋商过），共同保证这个支离破碎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新国界。

法国和英国政府将他们的决定以最后通牒的方式通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并要贝奈斯总统尽快答复，以便“首相必须最迟在星期三同希特勒先生再举行会谈”。

20 年来，贝奈斯总统始终是法国的忠实的盟友，而且几乎是法国的附庸，在国际联盟和其他场合都支持法国的利益和政策。按照事先达成的协议，一旦战争爆发，捷克斯洛伐克遭到入侵，法国应前来援助，而英国也会立即同法国采取一致行动，而如今，捷克斯洛伐克却被它的法国和英国盟友出卖了。9 月 20 日深夜，到 21 日凌晨 2 时，英法两国驻布拉格公使往访贝奈斯总统，告诉他已经没有希望根据 1925 年德捷条约进行仲裁，并极力敦促他接受英法两国的建议。

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的危机不仅引起了英国、法国朝野的重视，而且引起了全世界进步力量的关注，在 9 月 21 日的国际联盟大会上，苏联外长李维诺夫大奉命提出正式警告“现在，捷克斯洛伐克内政正在受到其邻国的干涉，而且受到公开的咆哮的攻击恐吓，说什么要以武力相加。欧洲最古老、最文明、最勤劳的民族之一，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反压迫之后才获得独立；在今天，或者在明天，也许最后要决定拿起武器为保卫独立而进行战斗了……”李维诺夫外长在谈到苏联政府对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的态度时指出，如果法国恪守其

条约义务，给予捷克斯洛伐克以直接有效的援助，那么“苏联将同法国一起，根据条约履行自己的义务，以苏联所能采取的方法来援助捷克斯洛伐克。苏联的国防部准备立即参加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国防部代表举行的会议，商讨采取适应的措施，”奇怪的是，这样一个有关的大国所发表的公开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声明，竟然被奉行绥靖政策的张伯伦和达拉第粗暴地拒绝了。

最后，捷政府屈从于英法的联合建议，被迫辞职，另外成立了一个由赛洛维将军领导的无党派政府。9月22日，贝奈斯总统对全国发表广播讲话，严肃地呼吁人民保持镇静。此时，张伯伦已飞往德国，和希特勒举行第二次会谈。希特勒见英法软弱可欺，随即提高了价码。他对张伯伦说：“我极其抱歉，由于过去几天内形势的发展，这个计划已经再也没有什么用处了。苏台德区必须由德国武装占领。”张伯伦听了这话吓了一跳，他那猫头鹰似的脸因为又惊又气，胀得通红，张伯伦所惋惜。着急的是，他牺牲捷克斯洛伐克人而如此吃力地建立起来的和平大厦，就像纸牌搭成的一样垮了下来。

9月24日下午张伯伦回到伦敦后，就马上召开内阁会议，企图说服同僚接受希特勒的新要求。不过，这次他碰到了没有料到的反对。海军大臣坚决反对他，外交大臣也提出了异议，这时在丘吉尔等人的活动下，英国广泛开展了要求张伯伦下台、反对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运动。他同样也不能说服法国，后者在9月24日拒绝戈德斯堡备忘录，并在同一天下令全国部分动员，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愤然拒绝纳粹的要求，而且征召入伍的兵员总数达100万人。

面对着这剑拔弩张的形势，张伯伦十分焦急，9月26日晚上，希特勒在挤得满满的柏林体育馆发表的讲话中，对贝奈斯总统进行了恶毒的人身攻击，并宣称无论如何他都要在10月1日拿下苏台德区。27日下午，他又发出了向捷克斯洛伐克边境进击的“绝密”命令。这一下可把张伯伦吓破了胆。就在这天晚上18点30分，这位英国首相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他说：“为了在一个遥远的国家里我们对之毫不了解的民族之间所发生的争吵，我们居然在这里挖战壕，试带防毒面具，这有多么奇怪，多么荒诞，多么不可思议！”为了争取“和平”，他决心到德国进行第三次访问。他说道，“不论我们如何同情一个强邻压境下的小国，我们决不能不顾一切地使整个大英帝国仅仅为了它而陷入一场大战。”

与此同时，张伯伦还给墨索里尼发了一份电报，请他参加德、英、法拟议中的国际会议。这正中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下怀。经过阴谋家们的精心策划，一个臭名昭著的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阴谋会议就这样开场了。苏联没有被邀请参加会议，美国虽然没有正式参加，但被认为是“未出席会议的参加国”，令人奇怪的是，捷克斯洛伐克自己也没有获许出席会议。

9月29日午后12点30分，希特勒在已伐利亚这个城市里，在这个他曾破破烂烂的小咖啡馆的阴暗后室开始其卑鄙的政治生涯的城市里，悍然像征服者一样，欢迎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政府首脑。

将近正午时分，张伯伦乘坐的英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在慕尼黑着陆了，机场上排着仪仗队，外长里宾特洛甫前来迎接英国客人。张伯伦是最后一个到达这里的主要人物，汽车把他和他的一行送到了在柯尼斯广场的元首大厦。会议将在那里举行。

爱德华·达拉第丝毫没有理由像张伯伦那样自鸣得意，他倒是应当对自己有所怀疑。捷克斯洛伐克的盟国不是英国，而是法国，法国有义务援助捷

克斯洛伐克打退进攻。如果战争爆发，不是英国而是法国可以把一百个师投入战场，并将成为作战的主力。无论从责任的角度讲，还是从军事实力的角度讲，重心都是在巴黎，而下是在伦敦。

尽管如此，达拉第还是让张伯伦掌握主动权，一切让他决定。伯希特斯加登会谈，戈德斯堡会谈，这一切全都是伦敦决定的；法国一直跟在英国后头。显然，如果要在慕尼黑摊牌，那么法国人就要受张伯伦摆布，不仅如此，张伯伦在伦敦是当家作主的，而达拉第在巴黎却不能同日而语，法国的总理很少有控制政府的时候，达拉第尽管有“沃克吕兹公牛”这个绰号，在同内阁的关系方面却是困难重重，因为他的内阁是由从主张不惜任何代价实现和平的外长乔治·庞纳，到主张寸步不让的殖民地部长乔治·曼德尔各种色彩的人物组成的。

最后，还有良知和个人责任的问题。看来，尼维尔·张伯伦从未怀疑过自己的方针是明智的，而达拉第却总是在自相矛盾的痛楚中备受折磨。要是希特勒再次一意孤行，这一切会有什么结局呢？要是向布拉格作出的保证没有得到遵守，那法国的三色旗不是要永远受到玷污吗？另一方面，难道只是为了这些执拗的捷克人，就应当牺牲年轻的法兰西这朵花，就应当使巴黎被德国空军炸成废墟吗？庞纳说过，法国同德国交战就等于自杀，难道这话不对吗？

在宣布举行慕尼黑会议的消息时，人们那种近乎歇斯底里的宽慰表示本来应当使上面这些苦恼暂时缓解。巴黎那股欢欣鼓舞的劲头决不亚于伦敦。美驻巴黎大使布立特在给科德尔·赫尔国务卿的电报中说，“今晚巴黎的宽慰感，可同传来签订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协定消息时的那种宽慰感相比。”除了少数例外，所有政界人物和报刊都竞相表达兴高采烈的心情。“希望复活了！”乔治·皮杜尔在《黎明报》上撰文欢呼。而在《人民报》上，前社会党总理莱翁·勃鲁姆写道，“关于召开慕尼黑会议的消息的宣布，引起了一股信心和希望的巨浪，若使谈判破裂或者无法举行，那是对人类的犯罪。慕尼黑会议是在圣炉中的火焰即将熄灭的当儿，投入其中的一抱干柴。”

达拉第在赴慕尼黑之前，于9月28日晚上向全国发表了广播讲话。他说：

“我曾宣布今晚要向全国发表有关国际局势的讲话；但是，我在中午过后得知，德国邀请我明天到慕尼黑去同希特勒总理、张伯伦首相以及墨索里尼先生会晤。我已经接受了这一邀请。

“你们一定能够理解，在进行这样重要的谈判的前夕，我应当把我想向你们作出的解释加以推迟。但是，在我动身之前，我愿感谢法国人民的态度，这是一种充满勇气和尊严的态度。

“我首先要感谢法国人民，因为他们响应国家的入伍号召、再次显示出他们已表现过的镇静和决心。

“我的任务是艰巨的。自从我们现在经受的困难一出现，我就一天也没停止尽我的全部力量为保障和平与法国的切身利益而工作。明天，我将继续进行这种工作。在我继续努力的时候，我知道，我和全国的想法是一致的。”

达拉第也和张伯伦一样，没有提请人们注意这次会议把捷克人排斥在外。法国人也和英国人一样，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全国究竟在哪一点上“完全一致”？总理没有说，但是，在他的讲话的字里行间，人们可以听到这样的话：“和平！不惜任何代价——或者说几乎是不惜任何代价——实现和平！”

据甘默林将军自己的叙述，他当时并不准备出这样的高价。在9月28

日上午同达拉第一起开会时，总理曾问这位将军：“万一割让领土不能避免，应当维护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甘默林回答说：要是防御工事不能留在捷克人的手中，他们的国家就不再具有任何“有效的军事价值”了。

这在军事上是一个明智的忠告，但是，事态的发展早已使这种见解失去了意义。达拉第是在英国人采取了主动之后被送到、或者说是被吸引到慕尼黑来的。现在他没有自己的牌可打。他对随员们说：“一切都取决于英国人。我们只能跟着他们走。”

希特勒十分狡黠，为了使会议完全按着他的意图行事，在9月29日一清早，他就前往德奥边境去迎接墨索里尼，并且为在会议上采取共同行动而打下了基础，在去慕尼黑的火车上，希特勒怀着好斗的情绪，指着地图向那位意大利的领袖解释，他打算怎样“清算”捷克斯洛伐克。他说，要是那天开始的谈判不能立即取得结果，他就要诉诸武力。据当时在场的意大利外交部长、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引用希特勒的话说，“总有一日我们要并肩对英国和法国作战。”墨索里尼对此表示同意。但是，张伯伦并没有像希特勒迎接墨索里尼那样事先去看达拉第，为英国和法国制定一个共同战略，来同两个法西斯独裁者对垒。因此，会议很快就按着墨索里尼提出的方案达成了协议。在9月30日晨2时，由“四巨头”签字的协议文本上，几乎全部接受了希特勒在戈德斯堡提出的最后通牒。苏台德区捷克人从10月1日起分五批撤退，在10天内完成。最后的边界由一个国际委员会来决定。这个文件交给奉命专程前来慕尼黑听候发落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

9月30日，捷克斯洛伐克在敌人和“盟友”的压力下，向慕尼黑的决议屈服了。他们说：“希望把他们对他们不曾参与的决议所提出的抗议在全世界面前备案。”贝奈斯总统辞职了，因为“他可能已成为新国家必须去适应的发展的一个障碍”。他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寄居英国。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就这样根据协定而解体了。但是，抢吃死人肉的兀鹰还不限于德国。紧接着9月30日慕尼黑协定之后，波兰和匈牙利也趁火打劫，在他们盟主希特勒的号召下，“凡是要一起吃饭的人，就得下厨帮忙”。它们也各自分割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块土地。但是，在希特勒收拾了捷克斯洛伐克不久，就又翻脸不认人，向他的小伙伴开刀了。真是绝妙的历史讽刺！

希特勒根据慕尼黑协定，得到了他所要求的一切，他强迫捷克斯洛伐克割让了1.1万多平方英里的土地，上面住着360多万苏台德日耳曼人和捷克人。在这个地区内，有着大量的防御工事，这在当时来说是欧洲最坚强的防线，只有法国的马奇诺防线可以与之媲美。此外，捷克斯洛伐克的全部铁路、公路、电话和电讯系统都被打烂了。根据德国人的统计，这个国家被肢解以后，丧失了60%的煤，80%的褐煤，86%的化学工业，80%的水泥工业和纺织工业，70%的钢铁工业和电力工业，40%的木材工业。好端端的一个富庶的工业国，仅仅在一夜之间就被瓜分豆剖而破产萧条了。

对法国来说，慕尼黑会议是一场大灾祸。法国的统治集团由于他们政治上的短视，居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法国在欧洲的军事地位毁了。原来法国拥有100多个正规师，而且还同东欧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等较小的国家建立了同盟，这些国家加在一起的军事力量是足以制服希特勒的。慕尼黑会议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捷克斯洛伐克被肢解了。原部署在坚固的山地工事中的35个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捷克师，牵制着比这个数目还要大的德国军队，现在法国军队失去了这支力量，无异于失去一

条臂膀。然而，这还不是一切。在慕尼黑事件之后，法国在东欧剩下的盟国还有哪个能对它的旦旦誓言相信呢？同法国的结盟还有什么价值呢？同英国的友好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些国家都争先恐后地想在为时还不大晚的时候，同希特勒搭上桥，谋求保全自己，免遭大害。

然而，对希特勒来说，慕尼黑的结果并没有使他满足。他认为征服奥地利与捷克斯洛伐克，只是在东方大规模夺取生存空间和在西方向法国在军事上决一雌雄的前奏。德军进占苏台德地区还不到十天，希特勒就着手军事部署来并吞默默尔和残存的捷克斯洛伐克了。果然，不出两个多月，捷克斯洛伐克悲剧的下一场就开幕了。3月14日，老态龙钟、不知所措的哈查总统，被希特勒召到柏林，在刺刀逼迫之下写下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卖身契。在所谓双方发表的会谈公报上写着：

“元首和总统（希特勒和哈查）在会谈中，以坦率的精神研究了最近几个星期以来，在目前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发生的事件所造成的严重局势。双方一致认为，必须尽一切努力来保全中欧的这一部分的安宁与和平。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宣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为了实现最后和平，他满怀信心地把捷克人民和捷克国家的命运交给德国元首手中，元首接受了这一宣告，并且表示他愿意把捷克人民置于德国保护之下，并且保证他们的民族能够生活在自治的条件下，按照合乎他们的特定的方式得到发展。”

至此，希特勒的诡诈伎俩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狂妄地宣告：“捷克斯洛伐克再也不存在了！”据他的一个女秘书说，希特勒在签字以后，冲进他的办公室，拥抱了在场的每一个女人。他高声叫道：“孩子们！这是我生平最伟大的一天！我将以最伟大的德国人而名垂青史！”

德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不久，希特勒就从捷克斯洛伐克掠夺了95亿马克的金钱和100多万支步枪，4.3万挺机枪，1500多架飞机，2100多门大炮，500多门高射炮，300多万发炮弹，10亿发子弹和400多辆坦克，占领了当时东欧最大的军人工厂斯科达。并把大批捷克斯洛伐克青年男女掳去当兵和服劳役。由此大大加强了希特勒德国的战略地位，增强了它的战争实力。正如纳粹二号头目戈林一个月后对墨索里尼所讲的：“由于捷克斯洛伐克巨大的生产能力转归德国而产生的经济因素，它显著加强了轴心国对付西方国家的能力。不仅如此，如果发生更大的冲突，德国现在毋需保留一个师的兵力去防御那个国家了。”

在严酷的事实面前，按说张伯伦、达拉第应该接受教训了，但他们仍然执迷不悟。英法政府首脑对苏联加强军事合作反对希特勒的建议，却采取十分不负责任的错误态度。谁都知道，当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发生时，张伯伦同希特勒谈判，亲自出马，飞来飞去。但等到与苏联谈判时，只派去一些无足轻重的角色。最后被派去进行军事谈判的代表，还忘了带全权证书。尽管如此，苏联政府对这一谈判仍然非常重视，一开始就提出缔结英、法、苏二国互助条约和军事协定，并要求保证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所有与苏联接壤的国家的安全和独立。但是，英法政府却非常不信任苏联，也不相信苏联的军事实力。他们只要求苏联单方面承担许多义务，而不对苏联的安全承担任何义务，与此同时，英法还背着苏联同德国进行秘密谈判。既然苏联争取同西方国家建立反希特勒的统一战线没有成功，那么苏联的急迫任务就是百倍警惕西方国家的“祸水东引”政策。在大战迫在眉睫的形势下，苏联利用帝国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在1939年8月23日和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

条约》。从而使苏联赢得了宝贵时间来加强战备，进一步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

却说希特勒经过多次谋划，终于在8月31日中午作出了最后决定，发出了消灭波兰的“白色方案”的第一号作战指令。9月1日拂晓4时45分，150多万德国军队大举越过波兰国境，分北、南、西三路进逼华沙。天空中，德国的机群吼叫着飞向自己的目标：波兰的军队、军火库、桥梁、铁路以及不设防的城市。几分钟之后，这些飞机就使波兰人第一次尝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来自空中的突然死亡和毁灭的滋味。9月27日，纳粹军队攻陷了华沙这座孤立无援的城市。

英法两国同波兰订有同盟条约。根据条约规定，两国应当毫不迟疑地向波兰提供包括军援在内的一切援助，可是英法政府首脑，鬼迷心窍，仍想推行“慕尼黑政策”，但在国内外人民强烈地压力和反对下，才被迫于9月3日对德宣战。从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张伯伦、达拉第之流所推行的绥靖政策也从而彻底破产了。正是：鬼迷心窍，专行歪道，纵虎伤人，不得好报。欲知形势如何发展，且看下文分解。

第九章 痛心疾首

纳粹发兵打波兰，英法对德重开战；
苟安求和成泡影，绥靖政策大破产。

当悲惨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发生时，戴高乐上校本人正在梅斯担任军职，面对着法西斯横行霸道，他痛心疾首，但无力扭转局势。正像他记述的那样，他的政界朋友雷诺在达拉第政府供职，但雷诺埋头于他相继担任的司法部长和财政部长的公务，并且由于要顾全内阁的团结而处处受到掣肘。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的装甲部队越过波兰边界，此时无论是戴高乐和雷诺，还是达拉第和张伯伦，都成了无能为力的消极旁观者了。

9月3日，英法根据法波盟约和英波互助条约，在人民的压力下，被迫匆忙对德宣战。从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大战开始时，双方力量对比大大有利于英法方面，从兵力上看，当时波兰有40个步兵师和12个骑兵师；法国有相当于110个师的兵力。而当时德国只动员了98个师。在经济实力方面，英法有广大殖民地，多数战争资源都不缺乏，而德国则缺乏铁砂、橡胶、石油等战略物资。但是由于英法没有做好战争准备，而且不想真正打仗，行动上磨磨蹭蹭，到波兰战争结束三个星期后，英国才派了四个师在法国登陆；法国军队的出动，事实上也只是一种军事示威的性质，完全是防御性的。在背地里，英法仍然通过美国政府出面“调停”，幻想停战。用张伯伦的话来说，当时的战争叫做“晦暗不明的战争”，所谓“晦暗不明”，实际上是指“战”与“和”还在两可之间。由于英法领导上处于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因此战争初期一直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战争爆发之初，德国估计波兰可以抵挡数周之久，法国估计波兰可以支持到1940年春，波兰军事当局更是盲目自信。不料，德军突如其来的攻势，装甲部队与空军配合的“闪电战”，使波兰猝不及防，飞机来不及起飞，在48小时之内，500多架飞机几乎全部被摧毁。德军很快占领了波兰的主要工业区，把波军分割并就地包围。到9月17日，波兰军队崩溃之势已成定局。

在希特勒的“闪电战”中，海因兹·古德里安将军的坦克部队初次显露头角，整师整师的坦克横冲直撞，在飞机的掩护下，一天推进三四十英里；能够迅速开炮的摩托化重炮，甚至在坎坷不平的波兰道路上也能以每小时40英里的速度滚滚挺进。波兰首都华沙的居民，在反动政府逃亡之后，自动奋起保卫首都，英勇坚持战斗。德国法西斯进行残暴的轰炸和炮击，于9月27日攻陷这座孤立无援的城市。纳粹军队对华沙人民，特别是犹太人，进行了惨绝人性的大屠杀，犯下了滔天罪行。

虽说英国和法国已正式向德国宣战，声明要援助他们的盟国波兰，但当纳粹匪徒肆意践踏波兰国土、残酷屠杀波兰人民时，英法却无动于衷，西线出现了惊人的平静。德国的老百姓开始把这种战争叫做“静坐战争”。在西方，人们也很快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假战争”。正如一位名叫富勒的英国将军所说的：“世界上最强大的法国陆军，对峙的不过26个德国师，却躲在钢筋水泥的工事背后静静地坐着，眼看着一个唐·吉珂德式的英勇的盟国被希特勒消灭了。”

对这种情况，德国人一点也没有感到意外。陆军参谋长哈尔德说，在8月中旬，曾详尽地估计了，一旦德国进攻波兰时，西线方面可能出现什么情况。他认为法国“多半不会”采取攻势。他相信法国绝不会“不顾比利时人

的意愿”，假道比利时出兵。他的结论是，法国方面会继续采取守势。9月7日晚上，他还记下了希特勒那天下午同陆军司令勃劳希契对战争形势的分析。他们认为，西方的动向尚不清楚。从某些迹象来看，英法没有真想打仗的意图。“法国内阁缺乏果敢的气魄。英国方面也开始透露出在进行清醒考虑的迹象。”希特勒正是出于这种估计，过了两天就发出了第三号作战指令，命令作好准备，让陆、空军部队从波兰调往西线。但是，不一定就打。要求部队严阵以待，即使在英国和法国迟疑地启衅之后，“我军地面部队或飞机，每次越过西部国境，以及对于英国的每一次空袭，都必须有我的明确命令”。

按照法国和英国对波兰作出的保证，英国的保证是泛泛的，一般性的，但法国的保证是明确的，具体的。

1939年5月19日的法彼军事协定明确规定，法国方面将“在总动员令下达后不出三天的时间内，逐步对有限目标发动攻势”。总动员令已在9月1日宣布。条约还进一步规定，“一旦德国以主力进攻波兰，法国将从总动员开始后的第十五天，以其主力部队对德国发动攻势”。当波兰副总参谋长雅克林兹上校问到法国能够派出多少部队参加这一大规模的进攻时，甘默林将军曾经告诉他，法国届时大约可以派出35个到38个师。但当希特勒对波兰的进攻眼看就要开始的时候，那位胆怯的法国统帅却告诉他的政府说，要到大概不到两年以后，也就是在“1941年至1942年之间”，他才可能发动一场真正的攻势。他还说，这是假定到那个时刻法国能得到“英国部队和美国装备的帮助”。的确，在战争一开始的几个星期内，英国能派到法国去的部队是少得可怜的。到了10月11日，波兰战事结束了三个星期以后，英国才派了四个师，共15.8万人，到法国去。丘吉尔讽刺为“象征性的帮助”。

那些纳粹将领们在纽伦堡法庭上追溯往事的时候，一致认为，波兰战役期间，西方国家没有在西线发动进攻，是错过了千载难逢的良机。哈尔德将军说：“只有几乎完全不顾我们的西部边境，我们才有可能在对波兰的进攻中取得胜利。如果法国人当时看出了局势的必然规律，利用德军在波兰交战无暇分身的机会，他们本来是有可能在我们无法防御的情况下跨过莱茵河，威胁鲁尔区的，而鲁尔区对德国作战具有莫大的决定性意义。”约德尔将军也说：“如果我们没有在1939年崩溃，那仅仅是由于在波兰战役期间，英法两国将近110个师在西方对德国的23个师完全按兵不动的缘故。”对此，德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将军补充道：“我们军人一直担心法国会在波兰战役期间发动进攻，结果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那么，在西线对德军具有压倒优势的法军，为什么没有像甘默林将军和法国政府以书面保证的那样发动进攻呢？最根本的原因是，法国最高统帅部和法国政府当权者深染失败主义情绪，患了“恐德病”，他们对德国武器和空中优势怀有恐惧心理，在纳粹匪徒进攻面前吓破了胆。果真，法国政府一开始就坚决要求英国空军不去轰炸德国境内的目标，生怕法国工厂会遭到报复性的打击，殊不知如果对德国的工业中心鲁尔进行全力轰炸，很可能使希特勒遭到致命性的打击。许多纳粹将领后来承认，这是他们在9月间最担心的一件事。

从根本上来说，对于法国为什么没有在9月间对德国发动进攻这个问题，丘吉尔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中作了最好的解答。他写道：“这场战争实际上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输掉了。”1938年在慕尼黑的时候，1936年在德国重新占领莱茵兰的时候。以及1935年在希特勒悍然不顾凡尔赛条

约、宣布实行征兵制的时候，就输掉了。由于盟国方面，几次可悲地畏缩逡巡，如今就不得不付出代价，可是巴黎和伦敦却仿佛以为静坐不动就可能把那笔债躲过去似的。

在希特勒疯狂进攻波兰的时候，戴高乐上校率部驻守阿尔萨斯，远离决策中心，深感失意。他目睹风云变幻，忧心如焚。显贵们络绎不绝地前来参观他的第五集团军所指挥的坦克。他向来访者提出警告，但他们依然是不予置理，或表现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其中有一位客人是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勒布伦阁下，他和颜悦色他说：“我知道你的看法，但是，敌人如果想照你说的那样做，看来确实已为时过晚了。”

在戴高乐看来，无论芬兰或者挪威都无关重要。使他忧心忡忡的有两件事：德国运用装甲部队对波兰进行闪电战，风驰电掣，所向披靡；而西方呢？比利时前线不堪一击——它连马奇诺防线那样的屏障都没有——而且政治家们盲目乐观，军队技术落后，缺乏斗志，战斗力日渐衰退。

1940年1月，他作了最后一次努力，以促使法国领导人吸取并正视德国在波兰所发动的闪电战的教训。1939年11月，戴高乐曾写信给总参谋部，和以往一样毫不含糊地、十分有力地阐述了装甲部队的效能，并指出，一条漫长绵亘的战线是极难防守的，总参谋部看了这封信，但没有采取行动。当时担任步兵和坦克部队总监的迪菲厄将军断言：“从此事的目前状况看，这些结论应予否定。”

戴高乐一直保持着与保罗·雷诺的友谊。

1940年1月，他到这位当时担任财政部长的寓所赴宴，另一位客人是社会党领袖莱昂·勃鲁姆，他们心情沉重地交换了对战争形势的看法。在这之后，1月26日，戴高乐写了一份备忘录，题为《机械化部队的产生》。这份备忘录，是根据当时形势和法国军队的状况和需要，建议采取的紧急措施。在备忘录中，戴高乐把德国令人恐惧的打击力量和法国相对的软弱无能进行了一番对比，并把德国军队的强大归于它的机械化力量。他认为，法国当时的防御战略根本无济于事。他写道：“任何守军如果只限于旧式的武装进行静止防御，是注定要失败的。只有使用机械化部队对付机械化部队，采取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术，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奏效。因此，用大规模的空中和地面部队进行反击……是现代防御战中不可缺少的手段。”为了把问题讲得更清楚，他强调说：“在当前这场战争中，像在以往的战争中一样，消极被动必遭失败。”唯一有效的办法是建立一支新式的军队。他要求与英美合作，制定一项“宏伟计划”，建立一支能独立作战的机械化部队。他设想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在反击法西斯侵略的战争中要密切合作。备忘录的结语雄辩有力，预见到战争将蔓延到全世界，他呼吁法国从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但是，戴高乐只是白费笔墨。坦克部队总监凯勒将军写了这样的评语：“即使现在这道工事坚固的防线被突破或者被绕过，看来我们的敌人也不可能像在波兰那样得到进行闪电战的种种有利条件。因此，显而易见，在未来的战斗中，坦克的主要作用将一仍其旧，掩护步兵逼近一个接一个的目标。”戴高乐的建议又被这些短视的将军和政治权贵们否定了。

且说希特勒在基本上消灭波兰主力之后，一方面加紧作入侵西方的准备，一方面又竭力鼓噪“和平”。这位恶魔在9月19日的国会上说，“我无意同英国和法国作战”，“我同情那些在前线上的法国士兵，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最后他祈求“保佑我们取得胜利的万能的上帝让别国人民

认清这场战争是多么的无谓……让他们想一想和平的幸福”。

9月26日，华沙陷落的前一天，德国的报纸和电台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和平攻势，极力表白“德国对西方并无野心”。同一天，希特勒又大放狂言，他说：“假如英国人果真希望和平，他们能在两星期内得到和平而又不会丧失面子。但是，他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波兰已经不可能重新站起来了！”除了这一点必须承认之外，他准备保证“欧洲其余部分的现状，包括保证英国、法国以及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安全”。

为了欺骗人民，麻痹对方，10月6日中午，希特勒又假装诚挚的样子，再次提出“和平”的建议。在这个天高气爽、阳光灿烂的秋日，希特勒又像往常那样，鼓起如簧之舌，摆出伪善的面孔，重弹老调。那是一篇冗长的演说，他先用了一个多小时对历史作了典型的歪曲，并且把德国在波兰的赫赫战功大大吹嘘了一番，然后在快要结束的时候，提出了他的和平建议。“我的努力主要是使我们同法国的关系摆脱一切恶意的痕迹，使这种关系能为两国所接受。”他说，“德国对于法国不再有进一步的要求，我甚至已经不愿再提阿尔萨斯—洛林问题，我一直向法国表示愿意永远埋葬彼此之间的旧仇宿怨，并使这两个具有光荣历史的国家互相接近。”对于英国“我也作了同样多的努力来争取英德之间的谅解以至友谊”。他说：“我从来没有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作过任何违反英国利益的事情。”“我在今天仍然相信，只有德国同英国达成谅解，欧洲和全世界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他反唇相讥，质问英法，为什么要在西方打这场战争？是为了要恢复波兰这个国家吗？希特勒狂妄他说，凡尔赛和约的波兰是不会再出现了；波兰在刚刚诞生的时候，就被一切非波兰血统的人称为先天不足的流产儿；为了重建这样一个国家而牺牲千百万人的生命和破坏价值亿万的财富，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就在希特勒大唱和平经的同时，却又指示纳粹匪徒们对波兰人，尤其对犹太人，横加杀戮。10月18日，希特勒对军需总监爱德华·瓦格纳将军说：“我们无意重建波兰。”“绝不能让波兰知识分子成为统治阶级。必须保持低生活水平。保持廉价的奴隶劳动。”希特勒恶狠狠他说：“必须使波兰彻底解体！德国将给予波兰总督必要手段来实现这一计划。”德国确实这样做了。纳粹波兰总督汉斯·弗朗克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他上任的第二天就宣布：“波兰人应该成为德意志帝国的奴隶”。被他们杀死的波兰人在300万以上。

1939年开春之后，希特勒为了确保从瑞典进口铁矿砂的供应线，按照海军的建议，暂时推迟了向西线发动进攻的计划，挥师北上，向丹麦和挪威开刀了。丹麦和挪威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德国海军长期以来就在注视着北方。德国没有直接进入大洋的出海口，这个地理事实，在第一次大战期间，就已经给它的海军军官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英国用鱼雷和巡洋舰队，从设得兰群岛到挪威海岸，横跨狭窄的北海，布置了一道严密的封锁网，卡住强大的德国海军，严重地阻碍了潜艇突破封锁进入北大西洋的企图，并且使德国商船不能出海。德国的外洋舰队从来也到不了外洋。在第一次大战时期，英国海军的封锁，曾把德意志帝国窒息得喘不过气来，在两次大战期间，指挥规模下大的德国海军的军官们，仔细考虑了这一教训和这个地理事实，认为将来再对英国作战时，德国必须设法在挪威获得基地，这样才能冲破英国在北海的封锁线，为德国海面 and 海底舰艇打开通往广阔海洋之路，从而使德国能够扭转局势，对不列颠群岛实施有效的封锁。

为了实现征服挪威的计划，希特勒已经在挪威找到了前任国防大臣吉斯林作为内奸。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希特勒就于1940年3月1日发出“威塞演习”的正式绝密指令。这样，在1940年4月9日上午5时20分，天亮前一小时，德国驻哥本哈根和奥斯陆的使节，向丹麦和挪威政府递送了德国的最后通牒，要求他们毫不反抗地立刻接受“德国的保护”。这份备忘录宣称，德国是来援助丹麦和挪威抵抗英法两国的占领的。要求挪威、丹麦政府和人民不要抵抗，并威胁说：“任何抵抗将不得不要受到一切可能手段的击破，从而只能导致绝对无益的流血牺牲。”

德国的期望在丹麦实现了；但在挪威落了空。挪威政府复电柏林说：“我们决不自动屈服，战斗已在进行。”就这样经过两个月的周旋苦战。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了。希特勒虽然征服了挪威，但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在20艘驱逐舰中损失了10艘，8艘巡洋舰中损失了3艘。主力巡洋舰“夏恩霍尔斯特”号和“格奈斯脑”号及袖珍战舰“卢佐夫”号都负了重伤。尽管损失严重，但仍然是希特勒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它使德国得到冬季运输铁矿砂的道路，进一步保护通往波罗的海的进出口，使得德国海军能够打开一个缺口进入北大西洋，并为它们的潜艇和海面舰只在英法作战中提供了优良的港口设备。它还使希特勒的空军基地与主要敌人之间缩短了几百英里的距离。

而更重要的是，它大大增加了纳粹德国的军事威望，好像它是不可战胜的。继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之后，现在又加上了丹麦和挪威，都被希特勒的武力征服了。当时在西方上层人士中，流行着一种严重的失败主义情绪，他们苟且偷安，无所作为。他们哀叹：“未来的潮流看来是属于希特勒和纳粹主义了。”

由于英法出兵挪威惨遭失败，达拉第政府于1940年3月21日倒台。不久，伦敦的张伯伦政府也寿终正寝。随之而来的时态令人痛心证明，法国的政党制度应付不了当前的民族危机。达拉第虽已下台，却未离阁。勒布伦总统召见雷诺，请他组阁。但是，如果在议会中得不到激进社会党的支持，雷诺就寸步难行。而激进社会党把达拉第留在战时内阁作为合作的条件。雷诺无奈，只好再一次任命达拉第为国防和陆军部长。刚听到雷诺上台的消息时，戴高乐上校满心欢喜。这位唯一热忱支持过他的机械化战争主张的政治家终于掌握了最高权力。雷诺旋即邀请他去巴黎，更使他喜出望外。戴高乐一到巴黎，便受托为总理起草了向议会发表的第一个声明。那是3月23日。雷诺一字不改地宣读了那篇声明。

然而，随之而来的便是无情的失望。戴高乐应邀出席了沉闷多疑的议会，这是一次糟透了会议。政客们勾心斗角，他们真正关心的不是国家的前途，而是自己党派的私利，雷诺本想请戴高乐在新成立的军事会议任副国务秘书，结果却遭到激进社会党的强烈反对。达拉第并以要辞去内阁职务相挟。雷诺不愿冒新政府垮台的危险，惋惜地撤回了对戴高乐的邀请。由于令人痛心的党派政治的需要，雷诺不得不任用一些与他政见迥然不同的人。他的副总理卡来耶·肖当是激进社会党的领导人之一，本人当过总理，是个绥靖主义者。他的陆军部长达拉第所主张的正是他一向抨击的防御性的军事政策。他的副国务秘书也是一贯反对他的人。雷诺虽属主战派，却受到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的包围，到处受到制约，很难开拓抗战的新局面。

当时，贝当元帅在马德里担任大使，从那里不断传来谣言，说德国人准

备与法国人达成“协议”，让敕戈尔执政，并由贝当出面支持，以保证德国最高统帅部接受停战。几千份折叠式传单，印上三张贝当的像，到处散发。第一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雄；第二张是驻西班牙大使；第三张形象模糊不清，下面写着：“明天？”故意涣散斗志，蛊惑人心。

戴高乐从巴黎返回驻地途中，奉召来到设在万森城堡的甘默林将军的总部。这位身材矮小的最高司令官，心不在焉他说，装甲师的数目将要翻一番，从两个师增加到四个师。戴高乐虽然还是上校，将受命指挥第四装甲师，该师将于5月15日成立。戴高乐表示对这一任命感到荣幸，但禁不住表达了他对当前时局的忧虑。甘默林答复说：“我理解你的满意心情，至于你的忧虑嘛，我认为没有什么根据。”

在形势日益严峻，大敌即将压境之前，法兰西的军政首脑如此昏庸无谋，戴高乐深感痛心。5月3日，他给雷诺总理兼军事会议主席写了下面这封信：主席先生：

波兰之战及其以后的挪威之战均已证明，今日唯有根据现有的机械化部队的能力和规模方能订出作战计划，假定战火明天蔓延到瑞典领土，后天扩大到巴尔干，接着烧向乌克兰、比利时，最后又在西线烧起，不论是烧到齐格菲防线还是烧到马奇诺防线，这一显而易见的道理都将得到证明。

然而，法国的军事体制，从规划组织到装备指挥，都与现代战争中的这条规律背道而驰。彻底改革这一体制是当务之急，决非其他任务可比。“法国的军事问题”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首要问题。但是，如果继续迟疑不决，赶超不前，拖得愈久，改革就愈加困难，从而胜利也就愈加渺茫。

我们必须反复强调，军队由于其固有的特点是服从，因此不会自行改革。改革乃国家之事，且属头等大事，唯有政治家足以膺此责任。法国在这场战争中如果有伟人的话，他将是卡尔诺式的人物，舍此则无伟人可言。

阁下……身居要职，品格高尚，且在过去六年中别具慧眼，深明改革之义，因此唯有你能够而且有责任成就此项事业。我还要冒昧指出，倘若你以此事为内阁要务，必能使政府内外气象一新，并能使这套尚未用过的王牌在你手中发挥威力。从此时此刻起，每过一天，每经一事，时时有事都将有助于证明我们的理论。不过，应予指出的是，它也将有助于正在把这个理论付诸实践的敌人。

自不待言，我最大的奢望莫过于有幸在这一伟大的事业中，在你认为适宜的时候，为你效劳。

顺致敬意

夏尔·戴高乐

就在夏尔·戴高乐把这封信发出一个星期后，1940年5月10日，德军突然侵入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一场大的灾难将要在法兰西降临了。

屡次建议遭否定，
痛心疾首难表忠；
政客权贵谋私利，
救国救民是英雄。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章 大难临头

晦暗不明假战争，坐以待毙不进攻；
有利时机全丧尽，大难临头动哭声。

夏尔·戴高乐预料发生的可怕事情终于发生了。希特勒在征服丹麦和挪威之后，就开始向西线发动进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两个中立小国荷兰、比利时首当其冲。

1940年5月10日，天刚破晓不久，驻柏林的比利时大使和荷兰公使被召到外交部，他们得到里宾特洛甫的通知，德国军队即将开入他们的国家，以“保卫”他们的中立，抵御英法即将开始的“进攻”。这正是一个月以前对丹麦和挪威所提出的同样的站不住脚的借口。德国发出的一份正式最后通牒，要求两国政府不要进行任何抵抗。若有抵抗，一定会遭到粉碎，而流血的责任“完全要由比利时王国和荷兰王国政府负责”。在布鲁塞尔和海牙，德国使节分别将同样内容的电报送交驻在国外交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海牙送交最后通牒的是德国公使尤利乌斯·冯·齐希-布尔克斯罗德伯爵，此人就是曾在1914年公开地把霍亨索伦帝国刚刚破坏了的德国对比利时中立的保证，叫做“一张废纸”的德皇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的女婿。

在布鲁塞尔的外交部，当德国的轰炸机在头上呼啸，炸弹在附近机场爆炸，把窗口震得咯咯作响的时候，德国大使贝劳-许汪特踏进外交大臣的办公室，正从自己的衣袋里取出一张纸来。保罗-亨利·斯巴克阻止了他。

“请你原谅，大使先生，让我先讲，”斯巴克愤怒他说，“德国军队刚刚进攻了我们的国家。德国对信守中立的比利时进行罪恶的侵略，这在25年之中，已经是第二次了。目前发生的事情，较之1914年的侵略，也许更加可恶。既没有向比利时政府提出最后通牒，也没有提出照会或任何抗议。比利时是通过进攻本身，才知道德国已经违反了它自己承担义务的……历史将追究德国的责任，比利时已下定决心要保卫自己。”接着，这个为难的德国外交官开始宣读德国正式的最后通牒，但是，斯巴克打断了他的话。“把文件交给我，”他说，“我愿意免掉你这个痛苦的任务。”

德国人对于这两个低地小国的中立曾作过无数次保证。比利时的独立和中立，曾经在1839年得到欧洲五大强国“永久”保证，到1914年德国背信弃义为止，这个条约被遵守了75年。魏玛共和国曾答应决不进攻比利时，希特勒上台以后也继续重申过这个政策，并且也给了荷兰同样的保证。

1937年1月30日，这位纳粹总理在废除了罗迪诺条约以后公开宣称：“德国政府已向比利时和荷兰进一步保证，它愿意承认和保证这两国领土的不可侵犯的中立。”

然而，希特勒说话从来是不算数的。他虽然在口头上一再声称要保证低地国家的中文，但他从来也没有打算履行自己的诺言。相反，他却要求德国三军尽快做好“通过卢森堡、比利时和荷兰发动进攻的准备”，“目标在于尽量夺取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广大地区。”

就这样，在挪威战役接近“胜利结束”，5月初天气转暖时，希特勒部署了人数众多的强大兵力，在西线待命进攻。单从数量上来看，双方势均力敌，德国136个师，法、英、比、荷142个师。守方工事坚固，南方有难以超越的马奇诺防线，中间有绵亘不断的比利时要塞，北方有荷兰的水上防线。即使在坦克数量方面，盟军也足以与德军匹敌。但他们并没有像戴高乐建议

的那样把坦克集中起来。同时由于比利时和荷兰拘泥于恪守中立，他们没有举行联合参谋会议，以致守方不能充分协调自己的计划和力量。德国的有利条件则是，有一个统一的指挥部，操有进攻的主动权，对侵略行径没有道德上的顾忌。他们还有在波兰作战的经验，德军在那里的战斗中已经尝试过自己的新战术和武器。他们知道俯冲轰炸机和大量使用坦克的价值。同时他们还知道，正如希特勒一直不断指出的，法国人虽然会保卫自己的国土，但对未来的发展却毫无信心，失败主义情绪笼罩着法军。

纳粹元首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决定在5月10日发动进攻。那天深夜21时，希特勒发出代号“但泽”的命令。5月10日，天刚破晓，希特勒就由凯特尔，约德尔和最高统帅部其他人员陪同，到达了缪恩施特莱菲尔附近，他称为“鹰巢”的大本营。德军在西面25英里之外的地方，正在越过比利时的边界长驱直入。在从北海到马奇诺防线之间的175英里战线上，纳粹的部队已突破了三个中立小国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边境，粗暴地违反了德国人曾经庄严地一再作出的保证。

就荷兰方面说，这只是一场五天的战争。至于比利时、法国以及英国远征军，也在这短促的时间里决定了命运。就德国方面说，在战略和战术的执行上，一切都是按计划行事的，甚至执行得比预定的还要顺利，德军的成就超过了希特勒最高的希望。他的将领们都给自己胜利的闪电速度弄乱了章法。就盟国的领袖们来说，他们被一点也没有料到的事态发展弄得不知所措，在一片慌乱之中感到事态不可理解。在战斗的第一天，5月10日，刚刚接任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本人也被弄得目瞪口呆。他在5月15日早晨7点半钟被法国总理保罗·雷诺从巴黎打来的电话叫醒了，雷诺用激动的声音告诉他：“我们打败了！我们打败了！”丘吉尔不相信，伟大的法兰西军队一周之内就被打败了？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简直弄不明白，运用大量快速装甲部队进行袭击这种战术，在上次大战以来会引起这样剧烈的改革。”

法国军队所以陷于如此狼狈之境地，主要是过于麻痹，思想上缺乏战备观念。法国的军政头目们对戴高乐等人的建议束之高阁。在希特勒磨刀霍霍准备在西线发动进攻时，法国却在睡大觉。它的总参谋部不相信布鲁塞尔和海牙传来的警报。伦敦方面当时正忙于应付持续了三天的内阁危机，这个危机到5月10日晚才由丘吉尔接替张伯伦出任首相而得到解决。法国和英国的总部，一直等到德国轰炸机在头上的咆哮声和施图卡式俯冲轰炸机的刺耳尖叫声，冲破黎明前的宁静的时候，才得知德国的进攻。过了一会儿，天大亮了，又从荷兰和比利时政府那里收到拼命求救的呼声。法国是在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极差的情况下仓促应战的。虽然1940年3月23日，保罗·雷诺组织了新政府，出任总理，但达拉第仍担任国防部长和陆军部长。据当时因公在政府里住了几天的戴高乐上校的回忆：“那几天使我充分看到政府腐败到什么程度，在政党、报纸、行政机构和工会组织内，都有有势力的团体，公然散布失败主义情绪，甚至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停止战争。”法国是航空事业的鼻祖，那时汽车产量每年超过30万辆，可是到战争发生时，飞机和坦克都不充裕，其他军事器材也很缺乏。法国统治阶级，认为静坐观望政策卓有成效，不会和德国真正打到底。

法国军需处对工业动员漫不经心。许多军火工厂大战爆发后仍然不加班。制造飞机大炮的熟练工人，被派到地方军营作扫院子或削马铃薯皮一类

的事情。如雷诺工厂,平时雇佣三万多工人,到大战爆发时却减少到不足 8000 人。法军总参谋部迷信他们所谓“坚不可摧”的马奇诺防线,为建造这条防线花了 2000 亿法郎,占法国 1919 年到 1939 年全部国防费用 4000 亿法郎的一半。他们自以为进了保险箱。大战爆发后,几十万法军按兵不动,高枕无忧,听凭希特勒德国把自己的盟国波兰灭亡,然后掉过头来,集中力量对付西欧。

英国张伯伦政府,长期姑息养好,帮助希特勒德国实现军备计划,制造潜艇,发展海军,对于大战同样缺乏充分准备。陆军少得可怜,装甲师刚刚开始筹建。上次世界大战,英国派到欧洲大陆作战的部队达 85 个师,可是 1940 年,它派到大陆来支援的只有 10 个师。皇家空军拥有 1800 多架飞机,但绝大部分要用于本土防御,无法派往欧洲大陆。西欧国家的军事劣势,还因战略计划失算而显得更为严重。英法认为,德国还会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取道比利时发动进攻,因此把主力部队部署在色当以西到海峡的法、比边境上。这条防线从西北到东南,依次是法国第七集团军、比军、英国远征军、法国第一集团军和第九集团军,其余的法国部队部署在面对瑞士、莱茵河和马奇诺防线的背后。他们根本不认为德国的庞大的坦克部队会从马奇诺防线北端法比边境的阿登山区突破,因为那里森林密布,道路难行,因此在阿登山区以南的色当一线防守极差。但这正是希特勒拟用重兵突破的地方。

由于法国和英国政府,长期奉行“祸水东引”的绥靖政策,由于西欧盟军缺乏周密的协作和严格的训练,再加上他们战略上的保守、陈腐,因此在德国法西斯军队的强大攻势下,盟军很快就溃败了。不仅英法空军在开始几小时就遭到严重的损失,而且陆军也处于非常狼狈的境地。从那时起,离心力量很快就表现出来了。比利时国王急于考虑投降,英国远征军总司令戈特忙着准备登船撤退,而法国魏刚将军则想谈判停战。荷兰军队,仅仅到第五天就乖乖地投降了。

其实,希特勒征服荷兰只用了一个师的兵力。这次战役主要是由伞兵和空运部队降落到广大的洪水防线后面而取得成功的。5 月 14 日,希特勒一方面命令比利时前线的第六军团调来一些部队,加速夺取“荷兰要塞”,另一方面命令空军猛炸鹿特丹。在纳粹空军匪徒狂轰滥炸、居民死伤惨重的情况下,鹿特丹投降了,接着就是荷兰武装部队的投降。威廉敏娜女王和政府成员,乘坐两艘英国驱逐舰逃往伦敦。5 月 14 日黄昏时分,荷兰武装总司令温克尔曼将军,命令他的部队放下武器;次日上午 11 时,他签署了正式投降书。只五天的工夫,就一切都结束了。

荷兰既已投降,法国、比利时以及英国远征军的命运也就决定了。5 月 14 日,离发动进攻虽然只有五天,但却是决定命运的一天。前一天的晚上,德军夺取了迪囊到色当之间的河岸峻峭、林木繁茂的缪斯河对岸的四个桥头堡,并且进占了色当。这是 1870 年拿破仑三世向毛奇投降的场所,也是结束法兰西第三帝国命运的地方。这样,盟军防线的中央部分和英法两军的精锐迅速转移到比利时去的重要枢纽地点,就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次日,德军大规模的攻击开始了。一支在数量、机动性和打击力量等方面都是空前未有的坦克部队,由德国边境通过阿登森林出发,其队伍之长,即使分了三路纵队还延展到莱茵河后面 100 英里。现在它突破了法国第九军团和第二军团的防线,迅速地向着比利时的盟军背后的英吉利海峡推进,像

洪水猛兽，遮天盖地向法国北部滚滚而来。情况危急，面对着这个钢与火的队伍，戴高乐受命指挥第四装甲师。但正如他后来记述的那样，这个师其实尚未成立，人员和坦克将从分散在各地的部队调集，然后归他指挥。5月15日，杜芒克将军把他召到总部，面授机宜。为了阻止敌人进犯巴黎，将在埃纳河和埃勒特河上设立一道防线。新编坦克师将在拉昂地区单独作战。但是，谈何容易！当时部队士气十分低落，坦克又分散在各地。东北前线总司令乔治将军向他分配任务后说：“再见吧，戴高乐！敌人正在运用你长期以来所提倡的战术。现在到了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戴高乐上校一到拉昂，就在城东南方的布鲁那设立了他的指挥所，并驱车巡视了周围地区。看上去那里的一切都是匆匆拼凑而成的。一群又一群的难民拼命向南涌去，堵塞了所有的道路，其中许多人是被敌人解除了武装的士兵。当时德国装甲部队正飞速前进，突然出现在这些士兵面前，德国人叫他们放下武器，乘车或徒步南行，以免妨碍德国人向前推进。德国人喊道：“我们没有时间来俘虏你们。”戴高乐听到敌人这样蔑视狼狈不堪的法国保卫者，他的满腹愁绪化作不可遏制的怒火。法军有3000辆现代化坦克和800挺机枪，与德国配备在西线的坦克和机枪数量相当。但是法国装甲部队过于分散，无法发挥作用；德国装甲部队高度集中，所向披靡。这真是愚蠢之极。戴高乐写道，那一天他下定决心，无论打到哪里，无论打多久，不打垮敌人，不洗雪国耻，决不罢休！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直到5月17日拂晓，才有三个坦克营调集到戴高乐这里，天色微明。他就把这三个营投入战斗。他们一路上横扫敌人，迅速到达蒙科尔内。这是一次短时间的、振奋人心的胜利，但是好景不长。坦克到达塞尔河，但由于缺乏后援，无法抢渡，白天又拨来了第四轻步兵营，戴高乐将军立即派这支部队去消灭第一次进击时残留在身后的顽抗之敌。这时，集结在塞尔河北岸的德国炮兵开始轰击，而法国的大炮还没有进入阵地。下午，德国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袭击了法国的坦克和载重汽车。敌我双方力量虽然十分悬殊，但戴高乐将军指挥部队奋勇冲杀。当夜幕降临时，他们俘虏了130名德军，击毙敌人数百名，而法军方面损失不到200人。这一胜利稳定了军心，他们背后的难民也下再向南跑了。

戴高乐的部队虽然在局部地区取得了小的胜利，然而，整个局势已无可挽回，法国军队缺乏作战经验，战前又没有很好进行训练和动员。许多坦克兵的累计驾驶时数还不到四个小时。许多军官还是在这一地区的战场上才和他们的士兵第一次见面。法国人连无线电之类最起码的设备都没有。戴高乐事后记述道，当时他只能依靠摩托传令兵进行联络。尽管如此，戴高乐仍不知疲倦，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指挥部队英勇作战，一星期后，他又奉命来到塞纳河一线率部阻击敌人。戴高乐接到了上级前后矛盾的命令，先是要他向北进击，接着又要他去攻打德军在亚眠的桥头堡，最后又命令他进攻阿布维尔的敌军。这时已经是5月27日了，他的残缺不全的第四装甲师，一直在连续作战。尽管他不可避免地时间和空间方面受到限制，但他又一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取得了胜利。他在三天之内迫使敌军后退了大约九英里，俘虏敌人500多人，并缴获了大量战利品。鏖战正酣时，使他一往无前的勇敢精神，来自他对法西斯强盗的深仇大恨，来自他对祸国殃民的那帮军政头目的满腔怒火，他在枪林弹雨中，抽空给一位朋友写信说：“我希望你像我一样蔑视那些统帅部的老爷们，他们的智力和品格是如此低下，他们长期奉行错

误的政策，使国家和人民遭受如此深重的灾难，他们是千古罪人！”

到了5月30日，戴高乐的部队已经精疲力竭，无能为力了。四天前，布伦已落入德国人手中。比利时国王奥波德三世于5月28日清晨投降。5月27日下午5时，他派遣比利时副总参谋长罗骚将军到德军那里要求休战。

10时，这位将军带回德军的条件。“元首要求无条件放下武器。”下午11时，国王决定无条件投降，并建议于明天上午四时停止战斗。结果在5月28日上午四时停止了战斗。比利时国王的投降，犹如火上加油，给盟军增加了巨大的困难。在绝望的时刻，他抛弃了英法，打开了大门，让德国军队在已经受到很大压力的英法部队侧翼长驱直入。结果是25万英国士兵和10多万法军在敦刻尔克陷入重围。在此危难情况下，在法国政府和统帅部内部，有一些高层军政官员，不是领导军民坚持抗战，而是主张无条件停战。巴黎街头，投降言论甚嚣尘上，爱国者痛惜万分。正是：强敌进攻举国乱，军政头目吓破胆。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一章 法兰西的溃败

法国投降举世惊，贝当之流留骂名；
屈辱事故丢尽脸，力挽狂澜看英雄。

当丘吉尔接到雷诺总理关于法国战场情况危急的报告后，于5月16日下午3点乘“红鹤”式飞机前往巴黎。随行的有帝国副总参谋长迪尔将军和伊斯梅将军。他们一下飞机就看到局势比他们所想象的还坏得多。迎接他们的法国官员对伊斯梅将军说：“预料最多不过几天德军就会进入巴黎。”

丘吉尔在英国驻法大使馆听取了关于局势的报告以后，就乘车去法国外交部。在那里，会见了雷诺、国防部长兼陆军部长达拉第和甘默林将军。大家都站着，一直没有围着桌子坐下来。每个人的脸色都显得十分忧悒。在甘默林面前挂着一幅军用地图，约有两码见方。这位总司令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战场的情况。在色当以北和以南，大约五六十英里的一段战线被德军突破了。迎击的法军已被消灭或被击溃。法西斯的装甲部队和大约十个摩托化师正向阿布维尔和巴黎方向推进。这位将军说了大约有五分钟，中间没有一个人插话。他说完以后，有一段时间相当长的沉默。丘吉尔不禁问道：“战略后备队在哪里？”没有人答话。接着他又毫不在意地改用法语说：“机动部队在哪里？”甘默林将军转过脸来，摇了摇头，耸了一下肩膀说，“一个也没有！”

又是一段长时间的沉默。窗外，在外交部的花园里，几大堆的火冒出滚滚黑烟，隔窗望见官员们正用小车推着档案向火堆走去。他们已经在准备撤出巴黎了。

面对这种情况，丘吉尔说什么也不能理解：这么大的一场战争，而且是关系到法兰西生死存亡的一场战争，竟没有战略后备部队！他们的马奇诺防线是作什么用的？它本来是可以在一长段国境线上使军队得到节约使用的，它不仅可以提供许多局部反攻的出击口，还可以使大批的部队留作后备力量。可是现在却没有后备部队。丘吉尔承认，这是他一生中最使他吃惊的事情之一。

丘吉尔接着又问甘默林将军，打算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向敌人凸出部的侧翼发动进攻。甘默林的回答是，“数量上占劣势，装备上占劣势，方法上占劣势。”然后耸了耸肩膀表示毫无希望。在场的人除了雷诺总理坚持打下去外，其余的人都对战争前途丧失了信心，认为一切都完了。丘吉尔说：色当被突破是严重的，但并不是致命的。

1914—1918年间，曾有过多次的“突破”，可是全都被顶住了，而且一般都是通过对凸出部的一侧或两侧展开反攻来顶住的。他坚决认为，目前局势虽然很糟，但绝不是不可挽救。为了鼓起法国盟邦再战的勇气，他征得伦敦内阁的同意，决定再派遣十个战斗机中队前来助战，希望法兰西战场能有个好的转机。

在国内外积极力量的影响下，雷诺对法国内阁和最高统帅部进行了改组。5月18日，贝当元帅被任命为副总理兼国家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雷诺把达拉第调去主管外交，由他自己接任国防兼陆军部长。5月19日晚7时，他任命刚从近东回来的73岁的老将魏刚接替甘默林将军。雷诺希望新的领导班子能够振作起来，领导人民进行抗战。魏刚当上总司令的那一天，他在广播上乐观地宣布：“贝当元帅将同我一起战斗，直到取得胜利。”但是，事与愿违，年迈的贝当元帅想的却不是胜利。实际上，他在很长时间里好像已完

全没有能力来思考问题了。贝当已经 84 岁，比魏刚大 11 岁。他年事日高，越来越陶醉于他的光荣历史，陶醉于凡尔登的经历。他认为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战败民族的保护人。雷诺所以请他入阁，是因为人们认为他代表了 1918 年胜利的法兰西，还因为正是他在 1917 年使抗命不从的法国军队恢复了士气。他受到任命时，还在西班牙当大使。佛朗哥将军劝他不要接受任命，理由是：贝当没有必要把自己的名字和一场应由别人负责的失败联系在一起。“这我知道，将军，”年迈的贝当说，“但是，我的祖国在向我召唤，我责无旁贷，也许，这将是最后一次为国效劳了。”

魏刚上任后就到前线视察。北方司令部的混乱，法国第一集团军的明显的瘫痪，以及前途的未可预料，都使战时内阁感到极端焦虑。对于德军推进的方向现在已经看得更加清楚了。装甲车辆和机械化师不断通过缺口涌向亚眠和阿拉斯，然后西折沿松姆河推向海边。5 月 20 日夜间，德军越过并切断北方各集团军所有的交通线后，进入阿布维尔。把防线一突破，就很少遇到抵抗。德军的坦克在开阔的田野里自由往来，在机械化运输的协助和补给下，每天前进 30 到 40 英里。它们经过了几十个城市 and 几百个村庄，丝毫没有遇到抵抗。法西斯的军官们从坦克打开的炮塔伸出头来张望，得意洋洋地向居民招手。目击者谈到成群结队的法国战俘跟在他们旁边走着，有许多人还带着步枪。这些步枪不时地被收集起来，放在坦克下面压毁。

令人吃惊的是，德国装甲部队用几千辆坦克会彻底打垮几个强大的集团军，而法军却完全没有同他们进行厮杀，战线一被突破，法国的一切抵抗便迅速瓦解。德军的整个行军路线都是沿主要公路前进的，然而在这些公路上似乎没有一处设有障碍。

对于这种情况，雷诺十分焦急。5 月 22 日，丘吉尔再飞巴黎。在万森法国最高统帅部，魏刚向雷诺和丘吉尔讲述了他的作战计划。他不想让北方各集团军开向南方或向后撤退。他们应该从康布雷和阿拉斯一带向东南圣昆廷的方向进攻，以便在侧翼歼灭目前在他所谓的圣昆廷—亚眠袋形阵地上作战的敌军装甲师。同时一个拥有自阿尔萨斯、马奇诺防线、非洲和其他各个地区调来的 18 个到 20 个师团组成的新的法国集团军，在弗雷尔将军统率下，将沿松姆河建立一道战线。他们的左翼要通过亚眠向前推进到阿拉斯。这样，尽他们的最大努力，同北方各集团军会师，向敌人的装甲师展开进攻。雷诺和丘吉尔对这个计划感到高兴。但是，事后才知道，这仅是纸上谈兵。由于最高统帅部没有下达任何作战命令，战事的演变已使敌人取得了支配权，致使 40 多万英法军队在敦刻尔克地区陷入德军的重围。

27 日下午 2 时，法国第一集团军司令对所属各军发出一道命令：“在利斯河阵地上战斗到底，绝不后退。”电讯到此就中断了。

其实，魏刚将军早就认为继续打下去已经“毫无意义”。5 月 26 日，魏刚对一位内阁部长说：“我想得很多。政府只有留在巴黎束手就擒，再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他的“不再打下去的意见”，得到新任副总理、国家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贝当元帅的支持。

6 月 1 日，魏刚将军在蒙特里城堡总部召见戴高乐。尽管这位总司令也和他的前任一样，对戴高乐本人没有什么好感，但对他的战绩却感到高兴。事实上，他刚刚在—项嘉奖令中赞扬了这位年轻的将军。嘉奖令说：“该师指挥官戴高乐将军英勇果敢，实堪钦佩，他于 5 月 30 日及 31 日率部向敌军—桥头堡发起攻击，突入敌防线 14 公里，俘敌数百，缴获甚多。”

魏刚向戴高乐表示祝贺，接着便征询他的意见，问他怎样才能使现有的1200辆坦克发挥最大的作用。但魏刚对戴高乐保卫巴黎和阻敌南进的详细计划不感兴趣，相反，却列举了一大堆条件，认为若不具备这些条件则无法取胜。魏刚说：“如果事情不致发展得大快，如果我能及时地使敦刻尔克方面退下来的法军恢复元气，如果我有武器供给他们，如果英军在重新装备后回来参战，如果英国皇家空军答应全力投入大陆方面的战争——如果出现上述情况，那么我们还有机会。否则，就没有任何指望了。”戴高乐怀着沉重的心情告辞了。

却说40万盟军在加来地区被希特勒军队团团围住之后，在处境险恶、异常绝望的情况下，英国为远征军和其他盟国军队在海上的突围创造了奇迹。这就是震惊全世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为了挽救这批英法部队，丘吉尔动员数以千计的各种船只，乘着大雾和天黑发动了“发电机计划”。从5月26日至6月4日，共有338226名英法士兵逃出了德军的虎口。

敦刻尔克的突围，挽救了英国的部队。但是丘吉尔6月4日在下院提醒议员们说：“战争不是靠撤退打赢的。但是，在这次援救中却蕴藏着胜利。”接着丘吉尔向议员们发表了气势磅礴的著名演说：

“尽管欧洲的大片土地和许多古老的有名的国家已经陷入或可能陷入秘密警察和纳粹统治的种种罪恶机关的魔掌，我们也毫不动摇，毫不气馁。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上和大洋中作战，我们将具有愈来愈大的信心和愈来愈强的力量在空中作战；我们将不借任何代价防卫本土，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登陆的地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即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于饥饿之中——我从来不相信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在海外的帝国臣民，在英国舰队的武装和保护之下也将继续战斗，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认为适当的时候，拿出它所有的一切力量，来拯救和解放这个旧世界。”

丘吉尔的著名演说，不仅有效地动员英国勇敢战斗，而且对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和人民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丘吉尔发表演说的第二天，6月5日，雷诺任命戴高乐将军为法国国防和陆军部副部长，这是戴高乐首次担任政府职务。他与部队告别后前往巴黎。他到了首都，发现雷诺信心十足，目光犀利，但在内阁中日益陷于孤立。贝当元帅听说要任命坚持抗战的戴高乐担任国防和陆军部副部长，曾百般阻挠，他不厌其烦地宣传他的投降理论。戴高乐回到巴黎后，第一次同雷诺见面时就警告说，他让贝当元帅那样的失败主义者参加内阁，将来会后悔的。戴高乐承认，1940年的战争也许已经打输了；但他又说，仍然有可能打赢另一场战争。

戴高乐向雷诺建议：“我们要尽可能坚持在欧洲大陆作战，同时必须下定决心，准备在法兰西帝国范围内继续作战。这就需要有一个相应的政策：必须把战争资源运往北非；必须挑选有能力的领导人来领导这项工作；而且不论对英国人有多大意见，都必须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戴高乐还建议必须撤销魏刚将军的总司令职务。戴高乐说，只有洪齐格尔将军才能胜任此职。他的双亲，一位是阿尔萨斯人，一位是布列塔尼人，他本人是个足智多谋的军人。在戴高乐看来，洪齐格尔有能力从世界战略的高度来指挥战争。雷诺的回答闪烁其词，他原则上表示同意，但认为那时候进行人事变动是不可能

的。

6月5日，在敦刻尔克陷落后的第二天早晨，法国战争的最后阶段开始了。希特勒在松姆河上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随即以压倒的力量从阿布维尔到莱茵河上游这整个400英里宽的横贯法国的战线上采取攻势。法国的命运已经注定了。他们只能用65个师去抵抗包括10个装甲师在内的德军143个师的兵力，因为最优秀的部队和大部分装甲部队都在比利时消耗掉了。力量薄弱的法国空军也所剩无几。英国能够派出来的只有驻在萨尔的一个步兵师，另外还有一个装甲师的部分人员。英国皇家空军除非把不列颠群岛置于不顾，否则它能力这场战斗提供的飞机也是有限的。再说，目前在贝当和魏刚的控制下，法国最高统帅部已经弥漫了失败主义情绪。虽然如此，有些法国部队还是极为勇敢和顽强地战斗着，在一些地方甚至暂时阻止了希特勒的装甲部队的推进，并且坚决不向德国空军的不断轰炸屈服。

但这是众寡悬殊的战斗。希特勒在消灭了法军的主力之后，德军像潮水一般地涌向法国。6月10日，法国政府匆忙地撤离巴黎。6月11日上午11时左右，雷诺发给丘吉尔一封电报，他也曾致电罗斯福总统。法国的悲剧愈演愈烈。雷诺电告，他能在奥尔良附近的布里阿尔接待英国客人。政府已从巴黎迁到图尔。法军总司令部设在布里阿尔附近。丘吉尔于当天下午2时飞抵指定地点。这是在不到一个月之内，丘吉尔的第四次法国之行。因为这次去主要是了解军事情况，因此随英国首相前往的有陆军大臣艾登先生、帝国总参谋长迪尔将军和伊斯梅将军。他们在一个小机场降落后，就开往指定地点会谈。当时法国人面色阴沉，颇为冷淡。情势恶化，与一周前他们访问巴黎的情况完全不同了。

法方参加会谈的是雷诺总理、贝当元帅、魏刚将军、空军上将维那曼、国防部副部长戴高乐。这次会谈的主题是战与降的问题。英方力劝法国政府保卫巴黎，强调在大城市内进行逐房抵抗对入侵的军队有巨大的消蚀力量。丘吉尔向贝当元帅追述1918年英国第五集团军惨败后，在博韦他的列车中一起度过的那些夜晚。并提醒他，克雷孟梭如何说过：“我决定在巴黎的前面作战，在巴黎的城里作战，在巴黎的后面作战。”贝当元帅回答说，在那个时候他可以调动60个师以上的大军，可是现在一个师也没有。他说那时战线上有60个师的英军，就是把巴黎化为灰烬也不会影响最后的结局。

英方重申了自己的立场，无论在任何险峻的情况下都坚持继续作战，相信他们能够无限期地打下去，而最终能取得胜利。丘吉尔建议法方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开展游击战争。他说：“德军在接触点上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强。如果所有的法国军队，每一个师，每一个旅，在他们的战线上都不遗余力地作战，就可以使敌军的活动全部陷于停顿。但是，贝当却回答说：公路上的状况十分可怕，难民拥挤，遭到无法抵御的德机机关枪的扫射，大量居民成批地逃难，还有政府机构和军事机关在继续崩溃。谈到这里魏刚插话说，法国将不得不要求停战。雷诺立即喝阻他：“那是政治问题！”

看来贝当、魏刚之流投降的决心已经定了。鉴于这种情况，丘吉尔说：“如果法国在苦难中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让它的陆军投降，那就不必为了我们而有所犹豫，因为不管你们怎样做，我们将永远、永远、永远地打下去。”当英国首相提到法军不管在任何地方继续打下去就能牵制或消耗德军100个师时，魏刚将军答道：“即便是那样，他们也可拿出另外的100个师来进攻和征服你们。到那时你们又怎么办呢？”

英国代表团走后不久，贝当和魏刚就擅自宣布巴黎为不设防的城市。6月14日，这个伟大的、具有光荣历史的法兰西首都，就被希特勒的第十八军团占领了。巴黎的铁塔上立即高悬起卐字旗。就在巴黎沦陷的前夕，6月13日，丘吉尔又对法国进行了最后一次访问。法国政府这时已撤到图尔，形势愈来愈紧张。丘吉尔带着爱德华·哈利法克斯和伊斯梅将军，马克斯·比弗布鲁克勋爵也自愿随他们前往。当他们的飞机在弹坑累累的机场着陆时，机场上没有人来欢迎他们，也不像有人在希望他们来。他们从机场卫戍司令处借了一部军用汽车，驱车进城，开往市政府，据说法国政府的总部就设在那里。那里没有一个重要人物，但是据称，雷诺就要从乡下乘车赶来会见他们。

这时已经快两点钟了，他们先到街上一家小餐馆随便吃了些东西，等候这次不祥的会见。这次雷诺显得十分沮丧，魏刚将军向他报告，法国的军队已经精疲力竭了。贝当也认为，应当趁法国还有足够的军队维持秩序到和平来临的时候，要求停战。军方逼迫政府下停战令。

雷诺接着说，内阁会议曾在前一天指示他问一问：如果发生最坏的情况，英国将采取什么态度。他自己深深知道这一庄严的誓约：任何盟国之一都不能单独媾和。魏刚将军和其他一些人则说：法国已经为共同事业牺牲了一切。它已经什么也没有了；不过，它也成功地大大削弱了我们的共同敌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英国不承认法国在力量上已无法继续作战，如果还希望它打下去，从而使法国人民听凭那些玩弄手法牵着被征服的各国人民鼻子走的无情专家们的摆布，陷入必然的堕落和恶化的境地，那将是使人感到震惊的。这就是雷诺现在要提出来的问题。

司令部设在布里阿尔附近。丘吉尔于当天下午2时飞抵指定地点。这是在不到一个月之内，丘吉尔的第四次法国之行。因为这次去主要是了解军事情况，因此随英国首相前往的有陆军大臣艾登先生、帝国总参谋长迪尔将军和伊斯梅将军。他们在一个小机场降落后，就开往指定地点会谈。当时法国人面色阴沉，颇为冷淡。情势恶化，与一周前他们访问巴黎的情况完全不同了。

法方参加会谈的是雷诺总理、贝当元帅、魏刚将军、空军上将维那曼、国防部副部长戴高乐。这次会谈的主题是战与降的问题。英方力劝法国政府保卫巴黎，强调在大城市内进行逐房抵抗对入侵的军队有巨大的消蚀力量。丘吉尔向贝当元帅追述1918年英国第五集团军惨败后，在博韦他的列车中一起度过的那些夜晚。并提醒他，克雷孟梭如何说过：“我决定在巴黎的前面作战，在巴黎的城里作战，在巴黎的后面作战。”贝当元帅回答说，在那个时候他可以调动60个师以上的大军，可是现在一个师也没有。他说那时战线上有60个师的英军，就是把巴黎化为灰烬也不会影响最后的结局。

英方重申了自己的立场，无论在任何险峻的情况下都坚持继续作战，相信他们能够无限期地打下去，而最终能取得胜利。丘吉尔建议法方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开展游击战争。他说：“德军在接触点上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强。如果所有的法国军队，每一个师，每一个旅，在他们的战线上都不遗余力地作战，就可以使敌军的活动全部陷于停顿。但是，贝当却回答说：公路上的状况十分可怕，难民拥挤，遭到无法抵御的德机机关枪的扫射，大量居民成批地逃难，还有政府机构和军事机关在继续崩溃。谈到这里魏刚插话说，法国将不得不要求停战。雷诺立即喝阻他：“那是政治问题！”

看来贝当、魏刚之流投降的决心已经定了。鉴于这种情况，丘吉尔说：“如果法国在苦难中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让它的陆军投降，那就不必为了我们

而有所犹豫，因为不管你们怎样做，我们将永根据英国官方的记录，英法双方进行了如下的谈话：

丘吉尔：大不列颠认识到法国已经遭受和正在遭受的牺牲是多么大。现在该轮到英国来作出牺牲了，英国对此已有所准备。由于在法国北方采取双方所同意的战略，战事遭受挫折，英国发现它目前在地面作战方面的贡献大小，因而感到悲痛。英国人还没有尝到德国皮鞭的滋味，但是完全知道那是多么厉害的。虽然如此，英国人只有一个念头：打赢战争，消灭希特勒主义。一切都要服从这个目的，没有任何困难和顾虑能阻挡英国人民。他确信，英国人民有能力忍受一切，坚持下去、反攻敌人，取得最后胜利。因此，他们希望法国从巴黎以南一直到地中海继续战斗下去，如果必要的话，就从北非进行战斗。要不借一切代价争取时间。等待的时间不会是没有尽头的。……无论情况如何，英国都要继续战斗。英国并没有、也不会改变它的决心：决不讲和，决不投降。对它说来不战胜毋宁死。

雷诺：我从来也没有怀疑过英国的决心。可是，我急于要知道，当遇到某种意外的情况时，英国将怎样反应。法国政府——现在的政府或是另一个政府——可能说：“我们知道你们会继续战斗下去。如果我们看到有胜利的希望，我们也会继续战斗下去。可是我们没有看到有早日胜利的充分希望。我们不能指望美国的援助。在隧道的尽头没有光明。我们不能抛弃我们的人民，让他们永远受德国人的统治。我们必须妥协。我们别无他法……”时间已经大晚了，已不能在布列塔尼半岛建立防御基地。在法国本上上，没有一块地方能使真正的法国政府可以逃脱敌人的俘虏。……因此，要对英国提出这样的问题：“法国已经尽了它最大的努力，贡献了它的青春和鲜血；法国已经无能为力了；法国已经再拿不出什么东西贡献给共同的事业了，因此它有权单独媾和。这并不违背三个月前签定的庄严协定中包含的团结一致的精神，你是否承认呢？”

丘吉尔：在任何情况下，英国都不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非难和互相指责上。但是，这并不是说，英国就同意与最近签订的协定相违背的行为。第一步应该由雷诺先生再致函罗斯福总统，将目前形势如实地告诉他。在考虑采取任何步骤以前，请你们先等一等回信。如果英国打赢了这场战争，法国就会恢复它的尊严和伟大。

虽然如此，我认为这个问题在这个时候提出来，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请求在我作出答复之前，让我和我的同僚出去商议一下。

于是，哈利法克斯勋爵和比弗布鲁克勋爵及其他随行人员就走出来，到一个满布阳光的花园中去，在那里谈了半个小时。他们回来之后，又重申了英国如下的立场：

“不论情况如何，我们都不能同意单独媾和。我们作战的目的是要彻底击败希特勒。我们认为，我们仍然可以做到这一点。因此，我们不能赞同解除法国的义务。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不责难法国；但这和同意解除它履行诺言的责任是两码事。”

临行之前，丘吉尔又向雷诺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请求。有400多名德国飞行员（其中大部分是英国皇家空军击落的）现在囚禁在法国。考虑到目前的形势，应该把他们交给英国看管，雷诺欣然允诺。但是过了不久，他就已经没有权力履行这个诺言了。这些德国飞行员后来又都参加了对下列颠之战。

丘吉尔和他的战时内阁成员，对法国政府的危机一直忧心忡忡。为了阻

止法国单独媾和，英国的一些内阁成员和雷诺总理的特使法国国防部副部长戴高乐将军几经协商，草拟了英法《联盟宣言》。除了总的方面谈到联盟的好处以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给雷诺提出一些活生生的振奋人心的新事实，使他能够把大多数阁员迁到北非去继续抗战。经英国战时内阁批准后，就将宣言草稿由戴高乐将军用电话通知雷诺先生。雷诺回答说，由两国政府发表这样一篇宣言，将使法国政府的决策有所改变。戴高乐将军于6月16日携带副本回法进一步征询意见。

《联盟宣言》草稿如下：

在当今世界历史这一紧要的关头，联合王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谨发表宣言，宣布两国结成永久的联盟，在共同保障正义和自由的事业中有毫不退缩的决心，反对把人类陷入机械生活和奴隶状态的制度。

两国政府宣布，法国和英国今后不再是两个国家，而是一个法英联盟。

联盟的宪法将规定执行国防、外交、财政和经济政策的联合机构。

每一个法国公民将立即享有大下列颠的公民身份；每一个英国臣民也将成为法国的公民。

无论两国领土的任何地方遭受战争的破坏，恢复的责任将由两国分担，两国的资源将同等地并像一个国家似地用于这一回的。

在战争期间，只设一个单独的战时内阁，所有英国和法国的武装力量，不论是陆军、海军或空军，都将归于该战时内阁的指挥之下。最宜于从什么地方指挥，就从什么地方指挥。两国议会将正式合并。不列颠帝国所有的国家已在组织新军。法国将在陆地、海洋和空中继续维持其现有的兵力。联盟将向美国呼吁，大力补充盟国的经济资源，并为共同的事业提供大量的物资援助。

不论战斗发生在什么地方，联盟将集中全力打击敌人。这样，我们必将战胜敌人。

谁知这样一项真诚的建议传到法国之后，遭到投降派的坚决反对。雷诺对于《联盟宣言》所寄托的希望顷刻之间便消失了。以贝当元帅为首的一帮失败主义者甚至拒绝对它加以审查。他们提出了种种强烈的指责，说它是“到最后一分钟才拿出来计划”，是“突然袭击”，是“一个把法国沦为保护国或者夺取它的殖民地的计划”。他们说，这会把法国的地位贬为英国的一个自治领。

除此之外，还提出了许多其他论点。魏刚没有多费唇舌便说服了贝当，认为英国已经完了。法国的最高军事当局说：“不出三个星期，英国就会像一只小鸡似地被人拧住它的脖子。”照贝当看来，同英国联盟无异“同死尸结成一体”。伊巴纳加雷大叫大嚷说：“还是做纳粹的一个行省好些。我们至少明了那是怎么一回事。”魏刚将军的一个亲密朋友、参议员雷贝尔宣称，这个计划意味着法国的彻底灭亡，总之分明是让法国隶属于英国。雷诺虽然回答说：“我宁愿同盟国合作而不愿同敌人合作。”但白费唇舌。在当天夜里，雷诺在投降派的逼迫之下就宣布辞职了，由投降派的首领贝当组织新的政府。

贝当在任职的第二天，6月17日，就通过西班牙大使向德国要求停战。希特勒于同一天答复说，他首先要和他的盟友墨索里尼商量。墨索里尼这个趾高气扬的斗士，在弄清楚法国军队已经受到绝望的打击以后，就像鹰犬一样在6月10日投入战争，企图分得战利品。

希特勒和法国的停战谈判，是在贡比涅森林中的一块小小的空地上举行的。这个地方就是 1918 年 11 月 11 日德意志帝国向法国及其盟国投降的地方。希特勒将在这儿报仇雪耻，因为这个地方本身会增加他报仇雪耻的甜美滋味。

1918 年，法国福煦元帅就是在这里博物馆保存的一节卧车上同德国签订的停战条约。如今，工兵遵照希特勒的命令，用风镐把墙壁推倒，把车子推到空地中间的轨道上，这就是 1918 年 11 月 11 日上午 5 时，德国使节遵照福煦的命令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时，车子停放的确切地点。

6 月 21 日下午 3 时 15 分，希特勒乘着他的曼赛德斯牌汽车来了，同行的有戈林、勃劳希契、雷德尔、里宾特洛甫和赫斯。他们都身穿各种各样的制服。他们在离空地大约 200 码的阿尔萨斯—洛林的雕像前走下汽车。雕像用德国军旗覆盖着，为的是不让希特勒看到那把大剑。那是 1918 年获得胜利的盟国的一把大剑，插在一只有气无力的鹰身上，这鹰代表霍亨佐仑王朝的德意志帝国。希特勒向纪念碑投了一瞥，继续大踏步地走去。他走过这块小小林间空地以后，空地中央升起了他的最高统帅旗。他的注意力给离地约三英尺高的一大块花岗石吸引住了。希特勒后面跟着一些人，慢步走上前去，读着石头上刻着的大字碑文：“1918 年 11 月 11 日，德意志帝国在此屈膝投降——被它所企图奴役的自由人民所击败。”

希特勒读着，戈林也读着。他们站在 6 月的阳光下，在一片沉静中读完了它。周围的人都在注意希特勒面部的表情。他的脸上流露着蔑视、愤怒、仇恨、报复和胜利的神情。然后，希特勒及其随行人员走进停战谈判的车厢，他坐在 1918 年福煦坐过的那把椅子上。五分钟以后，法国代表团来了。这个代表团以色当的第二军团司令查理·亨茨格将军为首，成员有一个海军将领，一个空军将领和一个文职官员利昂·诺尔。利昂·诺尔曾任驻波兰大使，他现在正亲身经历着德军造成的第二次崩溃。他们看起来都精神颓丧，但还保持着一种悲惨的尊严。他们事先并不知道会把他们带到法国人引为骄傲的这个圣地来受这种屈辱。他们的这种震惊，无疑正是希特勒所期望的。

在德国人提出的条件中，最恶毒的一条就是，强迫法国人把法国本土和海外属地上的反纳粹的德国流亡人士，全部交给希特勒帝国；凡是与别国联合对德国作战的法国人，被捕后立即枪决；所有战俘都将被拘留到签订和约为止。对于这样一段文字，法国方面也没有提出异议。贝当肯定认为，英国在三个星期之内将被战败，到那个时候，法国政府即可释放了。这样一来，他就使 150 万法国人在战俘营中呆了五年。

停战条约中最难处理的是法国海军问题。在法国将要崩溃的时候，丘吉尔曾经表示，法国如果把海军开到英国来，过去不单独靖和的诺言就可取消。希特勒决心不让这件事情实现。他在 6 月 18 日对墨索里尼说，他充分认识到，这将大大加强英国的力量。由管德国大军已经压境，巴黎还是歌舞升平，达官要人还是优游终日。无线电台广播的是巴黎名餐馆的菜谱，淫猥的歌声。庞纳和赖伐尔之流关心的只是自己股票的涨落。军人生产无人间津，战争动员无声无息。军政首脑之间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因此，防线一被突破，就兵败如山倒，不可收拾。

但是，法国还是有希望的。在贝当政府投降的第二天，戴高乐将军就在伦敦发表声明，号召人民继续抗战，为反对法西斯暴政，为争取法兰西民族的解放而斗争。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二章 庄严的召唤

国家危亡岂彷徨，匹夫有责勇担当。

庄严召唤如火炬，光复法国举刀枪。

1940年的6月，是一个熬人的6月。就在法国内阁就战降问题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戴高乐找到一个机会问雷诺是否真要求和。雷诺答道：“当然不是！但是，我们必须让英国人震动一下，以便取得他们更广泛的合作。”之后，戴高乐闷闷不乐地返回自己的住地。这时雷诺向罗斯福总统发去电报，呼吁美国出面斡旋，以免法国一败涂地，不可收拾。

在这段时间里，戴高乐焦急如焚，吃睡不宁，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坚持抗战，反对投降。愤慨之下，他打算脱离这个失败的政府。他起草了一份辞呈，但还没有来得及递交，就接到内务部长乔治·芒代尔的一封信。芒代尔是仍然主张打下去的为数不多的政治家之一。他获悉戴高乐打算辞职，便十分严肃地加以劝阻。他说，戴高乐如果辞职，就将失去为法国服务的最后机会，这是投降派们所乐意看到的。现在采取行动或许还为时不太晚，政府还可以作出迁往阿尔及尔的决定。戴高乐被打动了，同意再等等看。他后来承认芒代尔的劝告是非常宝贵的。

6月12日，戴高乐参加了法英两国领导人的紧急会晤。在举行会谈的时候，法国众议院议长爱德华·埃里奥和参议院议长让纳内在隔壁休息室等候消息。会谈后，雷诺陪同丘吉尔和他的随行人员穿过休息室。这两位议长慷慨陈词，力主法国血战到底。通往庭院的过道挤满了人，但戴高乐身材高大，特别引人注目。丘吉尔用法语低声和他打招呼，称他是“应运而生的人”。

到了6月14日，局势进一步恶化。法国领导人开始了又一次长途跋涉，目的地是波尔多。这一次比前一次更令人沮丧，道路也更加拥挤不堪，败兵、难民络绎不绝，秩序十分混乱。雷诺剩下的那点权力正在迅速瓦解。在他的高级阁僚中，全力支持他的只有芒代尔一人。贝当这个庞然大物给斗志涣散的内阁罩上一层忧郁的阴影，魏刚唯一的愿望就是停战，而失败主义影响则几乎无孔不入。当时这伙民族败类，正像蛀虫一样腐蚀着这个非常虚弱的法兰西领导集体。与此同时，雷诺的情妇德波尔特夫人也闯进了法国的历史。她一直闹着要雷诺停战，在她看来，那是当前最迫切、最重要的事情。斯皮尔斯将军写道：“我一生中从未见过哪个女人的双眼射出过像她那样憎恨的目光，她扫视我们时，目光就像镰刀挥过。我心思，这个女人一无动人之处，唯有她在英国人面前摆出的那副丑相还惹人注目。”就是这个风骚的女人，在关键的时刻，也充当了希特勒的“第五纵队”，起了瓦解军心的作用。

面对着丑恶的群体，戴高乐十分憎恨，到了波尔多后，还进行了最后一次努力，想迫使雷诺答应采取一些有利于在海外继续战斗的行政措施。他对总理说：“我曾竭尽绵薄协助你，但那都是为了战斗。我决不同意求和。你要是呆在这里，就会遭到失败而葬送你的一切。我们必须尽快迁往阿尔及尔。”雷诺答应坚持抗战，并同意把政府迁到非洲去。戴高乐对此十分高兴，他说：“那么我得马上亲自到伦敦走一趟，作为你的特使，设法请英国人协助解决运输问题。要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坚持就是胜利！”

谁知当6月16日晚9时30分，戴高乐乘机返回波尔多时，大局已定，无可挽回了。他的助手告诉他，雷诺已经辞职，勒布伦总统已召请贝当元帅组织政府。这只能意味着投降。戴高乐怒火中烧，他毅然决定第二天早晨离

开法国。他恨贝当，恨魏刚，同时也恨雷诺的软弱！他想，天塌下来，有地顶着，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就是粉身碎骨也要战斗下去！

为了预防局势突变，他已经采取了一个稍超出常规的行政措施，这就表明了他继续战斗的决心已经下定。还是在伦敦的时候，这位国防与陆军部副部长就超出职权范围，电令预定驶向波尔多的法国轮船“巴士德号”改变航向，驶往英国港口。这条船上装有从美国运来的1000门75毫米大炮、数千挺机枪和大量炸药。这样，这批军火没有落到德国人手里，而重新装备了从敦刻尔克撤回的英国远征军。

戴高乐在飞离法国的前夜，还去看望他那位失败了总理，雷诺由于绝望和失眠，显得萎靡不振。这位富有才智的总理大臣，当初相当坚决，但此时已毫无斗志。最近一连串事变的巨大压力，加上那些怯懦成性的同僚对他的背弃，使他的意志丧失殆尽。现在再也不能对他寄予任何希望了。不过，雷诺最后还是帮了戴高乐一次忙。他听说戴高乐决定去英国，就从秘密款项下支了十万法郎给戴高乐。第二天，6月17日上午9时，戴高乐在斯皮尔斯将军和德库塞尔中尉的陪同下，飞往英国，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戴高乐初来伦敦，感到自己非常孤单，一切都被剥光了，就像面对着一片茫茫的大海，后退已经不可能了。在他面前只有一条道路，这就是继续战斗。戴高乐已经破釜沉舟了，但是，如何战斗呢？在什么范围进行呢？要走到什么目的地呢？许多人认为，在那些日子里渡过海峡的一小群法国人，想的只是组成一支辅助部队，来帮助正在战斗的不列颠帝国。但戴高乐却怀有崇高的目的，法兰西山河已经破碎，民族存亡未卜。在他看来，当务之急是精忠报国，救亡图存。大国之中如果只有法国放下武器径自退出世界大战，这对他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一想到战败的法国最后竟要靠外国军队来拯救，他就感到痛心疾首。因此，只有一些法国人继续战斗是不够的，应该使法国作为国家重新投入战斗，并最终要取得胜利。

对戴高乐来说，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他虽然信心十足，目光远大，富有胆略，但也意识到任重而道远。他要攀登一座座的险峰，要涉过一道道激流。他知道，敌人势盛力强，而且很快就可以利用业已沦陷的法国的官方机构，使它俯首听命，为之效劳。法国已经四分五裂，许多人毫无斗志。戴高乐此时还是无名之辈，实际上孑然一身，既无部属又无组织，毫无威望可言。说实在的，除了他本人的意志和品格而外，他唯一的便利条件，就是英国首相丘吉尔愿给他所代表的法国提供继续战斗的机会。

经过反复考虑，戴高乐认为当时首要的工作是升起国旗，宣布奋斗目标，号召人民起来战斗。6月17日下午，戴高乐要求使用英国广播公司电台发表讲话。丘吉尔慨然允诺。两人商定等贝当向德国人求和之后进行广播。当晚传来消息说，贝当已经要求停火。第二天，6月18日下午6时，戴高乐来到布什大厦的播音室，坐在麦克风前开始了他对法国的首次广播。那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事实上，从那时起，戴高乐就成了法国的战斗旗手，成了举世闻名的反法西斯英雄。他的讲话震撼人心，激励着法国人民进行战斗。广播全文如下：

许多年来指挥法国武装力量的领袖们，已经成立了政府。

这一政府断定我国军队失败，已经开始和敌人进行文涉，以便停止敌对行动。完全可以肯定，无论是在地面还是天空，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被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压倒。迫使我国军队撤退的是德国人的坦克、飞机和战术，而远

远不是我们人数不足。正是德国的坦克、飞机和战术提供了突袭的因素，才使我国的领袖们落到现在这种不幸的境地。

但这是最终的结局吗？我们是否必须放弃一切希望呢？我们的失败是否已成定局而无法挽救了呢？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不，决不！

我是根据对于事实的充分了解在说话，我说法国的事业没有失败，我请求你们相信我。使我们失败的那些因素，终有一天会使我们转败为胜。

因为，你们要记住，法国不是孤单的。它没有被孤立。在它的后面是一个广大的帝国，并且它还可以和大英帝国结成同盟：大英帝国控制着海洋，正在继续斗争。和英国一样，法国还能够毫无保留地利用美国的取之不尽的资源。

这场战争并不局限于我们这个不幸的国家。法国之战没有决定斗争的结局。这是一场世界大战。错误是犯过的，曾经有过迟延和说不尽的苦难；但是，事实仍旧是，我们来日粉碎敌人所需要的每一件东西依然在世界上存在着。今天我们被机械化实力的无情力量击败了，但是我们还能展望未来，更加强化的机械化实力将给我们带来胜利。世界的命运还有待决定。

我是戴高乐将军，我现在在伦敦，我向目前在英国土地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土地上的持有武器或没有武器的法国官兵发出号召，我向目前在英国土地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土地上的军火工厂的一切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发出号召，请你们和我取得联系。

无论发生什么事，法国抵抗的火焰不能熄灭，也决不会熄灭。

同一天，英国首相丘吉尔本人也发表了一个十分出名的讲演。他回顾了法兰西战役，预见不列颠战役即将开始，并且大声疾呼：“让我们承担起我们的责任，让我们英勇奋战。这样，如果不列颠帝国和英联邦存在 1000 年，人们仍然可以说：这是他们最光辉的时刻。”

戴高乐和丘吉尔两人的讲演曾使过去一代的听众和读者热血沸腾，情绪激昂。戴高乐广播完这篇讲话，他内心感到，他和波尔多政府和军队的关系已经结束了。他已经年近半百，又开始了冒险生涯，就像一个人被命运抛出来，失掉了一切依靠一样。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我开始进行这一史无前例的事业以后，我有责任首先确定，没有比我更有资格使法国和法兰西帝国回到斗争中去，当时停战协定还没有生效；虽然可能性不大，但我们还是渴望波尔多政府在最后的时刻会选择战斗的道路，我们必须加以鼓励和争取。这就是为什么我在 17 日下午刚到伦敦，马上就打电报给彼尔多，表明我愿意继续效劳，在伦敦进行前一天开始的关于从美国运来战争物资问题、德国俘虏问题以及迁往北非的问题的谈判。”

波尔多对戴高乐的回答是一个命他马上回去的电文。为了争取魏刚，劝他继续抗战，6 月 20 日戴高乐还给这位总司令发了一封信，请他来领导抵抗运动，希望这位将军离开法国本土，到海外继续战斗。后来得知，魏刚在投降过程中，已给自己安上了“国防部长”的头衔。戴高乐这封信几个星期之后又给退回来了。6 月 30 日，所谓“法国大使馆”又转来了一项命令，叫戴高乐到图卢兹的圣米歇尔监狱去投降，交战争委员会审判。这个委员会起初判戴高乐一个月徒刑，后来由于魏刚的坚持，把戴高乐缺席判决了“死刑”。

戴高乐虽然发表了广播讲话，但他所处的地位却非常虚弱。虽然他的讲话充满着激情，但听的人并不那么信服。他们怀疑一个不知名的新提拔的年轻准将能领导法国人民进行抗战，更怀疑他在国外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能建立

一支强大的反法西斯武装。不过，他总算已经宣布了自己的奋斗目标，现在他要作出最后一次尝试，看看被他留在海峡彼岸的那些人心中是否尚存抵抗的星星之火，并试探一下海外的法国头面人物的态度，6月19日，他曾打电报给北非总司令兼摩洛哥总督诺盖将军，如果他拒绝投降，他戴高乐愿意在诺盖的麾下效劳。那天晚上，戴高乐又一次代表法国在广播中发出呼吁：“一切仍有武器在手的法国人，继续抗战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放下武器、撤离军事阵地，或同意把属于法国的任何一片领土交给敌人控制，都是对祖国的犯罪。”

6月24日，戴高乐又一次向诺盖将军发出呼吁，同时向地中海东部地区总司令密特奥塞将军和高级专员皮奥先主以及印度支那总督卡特鲁将军发出了类似的电报。电文内容是一样的，即戴高乐正在筹建一个法兰西民族委员会，以协调所有抗战组织的行动，要求收电人参加这个委员会。过了三天，戴高乐发现法国驻突尼斯总督佩卢东的一次讲话，有抗命拒绝投降的迹象，便也给他发出了邀请参加拟议中的这个委员会的电报。但是所有这些人，没有一个人对戴高乐的呼吁作出反响。这些殖民地的总督们，认为戴高乐只不过“是一个野心勃勃、追名逐利、不久以前才被临时提升上来的准将”，他在官场中“唯一足以挂齿的经历只是在已经下野的雷诺内阁中担任过国防和陆军部次长而已”。同时不能忽视的是，在那些令人焦虑不安的日子里，只有少数人与戴高乐观点相同，认为政府一旦投降就丧失了一切权利，而大多数人对贝当政府的合法性并没有认真地提出过疑问。这些高级的旧官僚基于陈腐的等级观念和法统思想，确实感到自己有充分理由保持沉默。但是过了不久，这些人都服从了贝当和魏刚的号召，同意停战协定。唯有印度支那总督卡特鲁和索马里兰海岸军队的指挥官勒让蒂约姆将军坚持抵抗。但他们都被撤换了，他们的部下也没有怎么支持他们。

这时，英国人也为振作法国的抵抗精神而努力，但与戴高乐一样毫无成效。6月25日，丘吉尔派遣新闻大臣达夫·库珀到拉巴特去，想和出走的前内阁大臣芒代尔取得联系，或许还想影响诺盖将军，使他能与在伦敦的法国人共命运，但是，诺盖不让他们和芒代尔接触，并且拒绝接见他们。英国驻北非的军事联络团团团长狄龙将军也被要求离开阿尔及尔。如果说英国人曾经希望动员一个更有名气或更有代表性的法国人士来领导法国抗德事业的话，这种希望正在消逝。6月23日，英国政府宣布，他们不能再把波尔多政府看作一个独立国家的政府，因为它已完全屈从于希特勒，丧失了代表自由法国公民的一切自由和一切权利。同时声明：“英王陛下政府注意到组织临时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提议，该委员会将充分代表决心进行战争以履行法国的国际义务的独立的法国人民，英王陛下政府宣布，它将承认这一临时的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并且只要该委员会继续代表一切决心与共同敌人战斗的法国人，它将就一切与进行战争有关的事项和该委员会来往。”

法国的崩溃震惊了全世界。全世界的人民都惊心怵目地看着这个伟大明星的殒落。作家查理·摩根的诗和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的文章也曾使许多人流出热泪，但各国还是很快就承认了既成的事实。无疑，所有与轴心国家作战的政府，都从法国召回自己的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对坚持抗战的戴高乐的一种支持，没有宝剑就没有法国。面对着接二连三的挫败，戴高乐加紧为自己建立一支战斗队而努力。这时，大约有十万吨法国船舶到英国港口避难，船上至少有一万名水手。此外还有几千名在比利时负伤的士兵正

在英国医院里逐渐康复。这些士兵和水手中的大多数人一心想回家，因为在他们看来，战争已经结束了。贝当政府的命令就是这样说的，绝大多数人都乐于从命。英国当局把白城体育馆借给戴高乐，作为志愿人员集合的地方。但在6月18日的召唤广播后的一个星期，才只有几百人集合到自由法国的旗帜之下。在英国方面，除了丘吉尔本人和斯皮尔斯将军外，与戴高乐打交道的大多数人，始终对他持怀疑态度，不愿与他合作。

但是，在困难面前，戴高乐并没有低头，更没有灰心丧气，他坚信正义的事业一定能胜利。6月29日，他去利物浦附近的特伦特姆公园活动，那里驻扎着阿尔卑斯山轻步兵师。他经该师指挥官同意，招募了外籍军团第十三旅两个营的大部分，200名阿尔卑斯山步兵，一个坦克连的三分之二以及一些炮兵、工兵和通讯兵。几天之后，两艘潜艇和一艘巡逻艇宣布拥护戴高乐。驻在圣阿塔恩的几十名飞行员后来成了自由法国空军的核心。

这时，每天都有志愿者到英国来。他们大都来自法国，有些是乘最后的班船离开的，有些是弄到一只小船之后逃出来的，还有些则是克服重重困难通过西班牙逃来的。他们如果被警察抓住，就会被关进米朗达集中营。有些飞行人员掌握着飞机，没有让它沦入维希政府的控制，并且设法飞离北非而到达直布罗陀。有些商船的海员抓住出航的机会就会开出法国港口，或者甲小船逃出来，如“卡博·奥尔摩号”就是这样。他们都要求为法国的独立和解放而战斗。6月末，有一个渔船队到了康威尔，把塞翁岛上所有能行动的人都带到戴高乐将军的营地来了。这些青年志愿战士的到来，进一步加强了戴高乐反法西斯战士们的信心。与此同时，他们与海外的联系也加强了，每天都收到成千上万封的信件，大大提高了戴高乐在海外的声誉。

正当戴高乐的抗战事业顺利发展的时候，忽然有一件令人悲愤的事情阻遏了这一潮流。7月3日，英国舰队突袭了停泊在米尔斯克比克的法国舰队，给英法关系和反法西斯事业造成了不利的影晌。法国沦陷以后，丘吉尔最担心的问题之一是法国舰队的命运。法德停战协定第八条规定，法国舰队应在德国或意大利的监督下退役并解除武装。诚然，在同一条款中，德方宣称，他们无意在战争中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使用这些舰只。但是，从希特勒的以往作为来看，这一诺言既不可信，也毫无保证。在这种情况下，丘吉尔毅然决定必须摧毁或夺取法国舰队，或者使之失去战斗力。当时，这支强大的作战力量正散泊在英国、地中海、非洲和马提尼克等地的港湾内。7月3日清晨，英国以占压倒优势的兵力突然袭击停泊在茨茅斯和普利茅斯的法国舰艇，俘获战列舰两艘、轻巡洋舰4艘、驱逐舰8艘、潜艇若干，以及大约200艘小型舰只。唯有大型潜艇“苏尔古夫号”进行了抵抗，双方各死一人，三名英军受伤。当天，在米尔斯克比尔海军基地附近的奥兰，法国海军上将让苏尔拒绝了英国的最后通牒。在随后发生的战斗中，从“皇家方舟号”上起飞的飞机炸毁了战列舰“布列塔尼号”，“敦刻尔克号”搁浅了，战列舰“普罗旺斯号”冲上了沙滩。“斯特拉斯堡号”被击伤，但同从阿尔及尔开来的几艘巡洋舰逃到了土伦。

7月4日，丘吉尔向下院报告了米尔斯克比尔行动的经过，议员全体起立，朝野党都报以热烈的掌声。丘吉尔显然对这种显示其无情打击力量的行动感到自豪；然而，戴高乐从报纸和广播中获悉这一消息时，好像突然被人打了一闷棍似的。他觉得这并不完全是出于正当的保障安全的动机，而且还由于“多年海上竞争的积怨、法西斯战役开始后日益加深的不满以及因维希

政权缔结停战协定而爆发出来的愤恨”。戴高乐在回忆录中赞扬了英国新闻大臣达夫·库珀，说库珀“极为明智地”让他在1940年7月8日向法国人民发表广播演说，表达了他的看法。他在演说中谴责了这个“可悲的，可恶的”行动，同时又吁请人们谅解英国人。他说，有朝一日德国人无疑会用法国军舰来打击英国和法兰西帝国。因此，“把它们毁掉还是上策”。不管怎么说，这个事件，对于战斗的法国刚刚萌芽的希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许多军人和平民，本来打算参加到戴高乐这边来，这时都跑掉了。此外，北非法兰西帝国各行政当局以及保卫帝国的海军与陆军的态度，大部分都由犹疑变成反对了。维希政府当然下会不尽量利用这一事件。其后果对于戴高乐争取团结非洲肯定是十分不利的。

然而，戴高乐还是以顽强的毅力继续进行自己的工作。7月13日，他宣布说：“法国同胞们！请认清这一点，你们还有一个战斗的队伍存在。”7月14日在齐集白厅的深为感动的群众中，戴高乐检阅了这支拥有7000多人的队伍，并率领他们在福煦元帅的像前献了三色花圈，7月21日，有几千飞行员参加了鲁尔区的轰炸。戴高乐宣布自由法国重新投入战斗了。8月24日，英王乔治六世，前来检阅了这支队伍。人们看到这支队伍，就看到了法国的未来和希望，并相信它会在战斗中日益发展壮大！

战斗的法国在苦难中挣扎，在战斗中成长。热情的言论从法国大量涌来。许多诚挚的人们用极巧妙的方法，有时就是通过检查者本身，把信件和其他邮件寄给戴高乐他们。其中有一件是7月14日在星形广场拍的一张照片。上面写着那一天德国人到了那里以后，有一群男女在无名将士碑周围沉浸在悲哀里。7月19日，他们把这张照片寄来，并且写了这样几句话，“戴高乐！我们听到你的话了。现在我们在等待你！”另外一张是路过的人献满了鲜花的坟墓。这就是戴高乐母亲的坟墓。她在7月16日向上帝奉献了她的苦难，祈求挽救法国和庇佑她的儿子的使命以后，就在班朋死去了。

戴高乐他们决不辜负人民的期望，他们肩负着祖国的期望，坚韧不拔，英勇向前！正是：精忠报国，救亡图存；任重道远，绝无反悔。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三章 开拓非洲

艰苦备尝搞武装，抗战红旗非洲扬；
有朝一日得反攻，人心向我慨而慷。

戴高乐建立了一支自己的武装后，就把注意力转向了非洲。法兰西帝国在非洲有众多的殖民地，而且非洲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将来反攻时，这里可以作为解放欧洲大陆的跳板。

在早些时候，戴高乐就曾经希望在法兰西帝国会爆发一场反德大起义，这种希望几近实现，结果却成了泡影。在北非，诺盖将军抵制媾和达三天之久，但在6月25日却接受了停战。在印度支那，卡特鲁将军坚持反对投降，但却同意让维希政府委派的总督来接替他。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皮奥总督和密特奥塞将军一直到26日才接受停战，密特奥塞将军的参谋长德拉米纳上校则更为坚决。他设法使科潘斯克将军指挥的波兰旅越过边界进入英国委任统治地巴勒斯坦。德拉米纳打算更进一步，组建一支法国义勇军，但是英国中东总司令韦维尔将军显然担心这种别树一帜的做法会招致麻烦，得不偿失，因而拒绝让德拉米纳使用开罗的各种设施。结果，驻扎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六万维希部队中，投效自由法国的只有数百人。至于停泊在亚历山大港、由海军上将戈德弗鲁瓦指挥的舰队，只有六名军官、二三十名准尉和水兵投靠戴高乐。

虽然戴高乐招兵买马的工作困难重重，但他的号召还是感动了一些有识之士，例如卡特鲁将军就从西贡前来听候他的吩咐。当卡特鲁9月来到英国的时候，戴高乐已去非洲。卡特鲁巧妙地拒绝了英国内阁的建议：希望他能取代一位若明若暗、不合适的准将的建议。英国内阁的那些建议，权衡过这位可爱而闻名的上将在中东所起的作用。同时，勒让蒂约姆将军、德拉米纳上校、达尚利尔海军少校、布洛赛少校、德奥特克洛克上尉都先后前来报到。

戴高乐在圣西尔的老同学贝图阿尔，从挪威率领外籍军团的一个旅在伦敦登陆。他重返摩洛哥时，留下了外籍军团的半个旅，由马赫林·凡纳莱指挥，另由柯尼希上尉和德瓦弗兰上尉从旁协助。后者用巴黎的一个地铁站的站名“帕西”作为化名，为他创建的情报网全体人员树立了榜样。6月底，从直布罗陀海峡来到伦敦投靠戴高乐的还有一位奇怪的人物，他是米塞利埃海军中将。戴高乐的传记作者让·拉古都尔说：“这位海军将军像他的头目达尔朗一样热衷于政治，他那动荡不定的生涯充满了陷阱和冲突，也闪烁着光芒，后来他从伦敦转往圣皮埃尔岛和米克隆岛及阿尔及尔时依然如故。”

至于“非军事人员”前来参加戴高乐运动的倒是络绎不绝。勒内·普利文、卡森教授、乔治·鲍里斯、皮埃尔·奥利维埃·拉比、让·奥贝尔雷、让·马兰是戴高乐将军的第一批非军事人员伙伴。6月30日莫里斯·舒曼来到，夏尔·戴高乐以《今日时报》老友的身分亲切接见他。15年后，这位“人民共和运动”的领导者，在《真实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中，报道了自由法国领袖在伦敦第一次同他会晤时，向他讲的那些令人信服的而又催人奋进的话：“如果希特勒要来伦敦，他也许早已来了；我认为俄国将先于美国投入战争，不过，苏美两国都会介入战争。希特勒想的是乌克兰，他征服不了俄国，而这将是他失败的开始。法西斯的侵略会激起全世界愈来愈多的国家和人民的反对。我们暂时虽说还有许多困难，但是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一定胜利。法兰西这个国家一定在我们手里重新获得解放而进一步发

扬光大。”听到这些言论，当时谁不甘心当个戴高乐主义者呢？

戴高乐的外交活动也逐步取得进展，英国政府承认他是“自由法国的领袖”。8月7日，丘吉尔和戴高乐之间开始交换信件，并达成一个协议。在该协议中，英国首相对戴高乐关于组成一支法国志愿军及其使用条件的建议表示赞同。丘吉尔在当时关于该决议致戴高乐的一封密函中明确指出，如果他公开作出许诺，保证“充分恢复法国的独立和伟大”的话，那么这种说法是“并不涉及领土边界的”，也就是说，并不完全确保法国对其海外殖民地将来的所有权。但是，“我们将更好地作出努力。”戴高乐对这一答复并不完全满意，他在致丘吉尔信中干脆指出：“我希望事情的发展，将有一大使英国政府以较少的保留考虑这些问题。”戴高乐在对外关系，在涉及帝国利益的问题上；一开始就表现了一个“高大的强硬者的形象”。

为了尽快打开非洲的局面，8月2日，戴高乐派勒让蒂约姆将军，带了为数不多的追随者，前赴“非洲三角”的索马里半岛开辟工作。尽管北非法兰西帝国仍在追随贝当政府，但在西非和赤道非洲，整个局势对戴高乐来说似乎较有希望，从那些幅员辽阔，人口稀少的地区，人们给戴高乐将军写来了许多鼓励的信件。

在喀麦隆和乍得，掀起了最强烈的反投降浪潮。在法国委任统治地喀麦隆，人们立刻意识到，要是德国获胜，这块殖民地就会重新落入德国人的手中。尽管布律诺总督不愿表态，但在公共工程局长莫莱尔领导下，成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宣布支持戴高乐，在乍得，被戴高乐称为“热情的法国黑人”的费利克斯·埃布埃总督有许多理由反对希特勒，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对纳粹的种族主义理论深恶痛绝。埃布埃表示他随时准备公开声明支持戴高乐。

法属非洲其他地区的反应不是模棱两可，就是令人泄气。法属刚果总督布瓦松起初反对投降，但当他从布拉柴维尔调往达喀尔，升任更力重要的法属西非各领地的高级专员时，态度大变，倒向维希那边去了。在乌班吉（现称中非共和国），人们是赞成抗战的，但是需经布拉柴维尔方面的同意，看起来不大可能采取什么行动。加蓬的态度令人捉摸不透，但沉默中很可能怀有敌意。

戴高乐决定因势利导，派得力干部前往非洲开辟工作。出发之前，他们认真分析了那里的形势，打算先从形势有利的乍得、喀麦隆和刚果等地着手，而把比较麻烦的达喀尔问题留待以后再解决。首批前往的有普利丈、帕朗少校、勒克莱尔和戴高乐的内阁总管埃蒂埃·德布瓦兰贝尔，第一站是乍得的拉密堡，在那里，他们将会见埃布埃总督，设法使乍得归附自由法国，然后到杜阿拉去帮助莫克莱尔和他的行动委员会发动计划的“政变”，使喀麦隆倒向戴高乐。将军确信，乍得和喀麦隆会站过来，可是赤道非洲怎么办呢？他认为最适宜于派到那里去的人是德拉米纳上校。此人刚从地中海东部地区脱险，正在开罗，给他的任务是拿下这个行政区的首府布拉柴维尔，那里的政权机构不仅控制着法属刚果，而且也控制着刚果、乌班吉和加蓬等几个毗邻的殖民地。戴高乐派出的这五位年轻人都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而且没有流一滴血。到8月底，乍得、喀麦隆、刚果和乌班吉都站到戴高乐方面来了。这是法国反法西斯战士们获得的一个重大胜利。

就在此前后，戴高乐又获悉卡特鲁将军即将从印度支那前来伦敦，因而喜出望外。他本人由于准备去非洲，便给卡特鲁留下了一封非常热情的信，

信上的日期是 1940 年 8 月 29 日，卡特鲁一到伦敦便可看到他的信了。戴高乐在信中写道：

我的将军：您想象不出当我获悉您将在最近到达的消息时，我是多么的高兴。要把法国从深渊中拯救出来，有许多工作要做，像您这样的人才，这样的领导，对于复兴法兰西定能起很大的作用。您也知道，我向来对您非常敬重，并且怀着真诚和崇敬的友谊。您在印度支那所采取的态度，更坚定了这些思想情绪。现在正是需要你发挥作用的时候！

这里和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一切，你很快就会知道的。就我来说，在战争爆发的最后一段时期里我在政府工作，我能够看到敌人对于那些围绕在政府官员周围的人，以及对于政府官员本身的心理做了非常巧妙的工作。我们共同的朋友保罗·雷诺的堕落以及可怜的老元帅的执政意味着投降，我不会有怀疑的。我个人拒绝屈服，从那里来到了伦敦，重建一个战斗的法国。经过我向法国人的呼吁，我已能够开始建立起陆海空军，并打下若干行政工作——外交和殖民事务、财政、宣传等——的基础，同世界的许多部门建立了不少的联系。在法国和帝国范围内潜在着良好的倾向。新赫布里底群岛、乍得、喀麦隆、上象牙海岸已经归正。当你接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带领军队、船只、飞机以及英国的支援部队前往过喀尔。

如果这项计划能够成功，北非洲的大问题立刻会明朗化。按照我的看法，由于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威胁迫在眉睫，这一问题就更会明朗。在当地负责的人们以及那些因听从休战而被取消战斗资格的人们，在我看来，不可能成为“战士”。我说这句话，主要是想到了诺盖将军。他从第一天起，就想出了不少可怜的办法来保持他的地位。一旦我们能够设法解决北非洲，还要有“一个人”承担责任管理这个地方。我的将军，如果您愿意的话，那个人就是您。

您也知道，英国政府在承认我是“自由法国人的领袖”以后，曾经表示同意，凡是有关我们帝国的防务和经济生活的一切问题，只要我组织一个“法国海外防务委员会”，就同它打交道。我的将军，我请您同意在这个委员会上取得“北非洲”的地位。一直到委员会成立时止，对于您在这里会有一个很好的安排，以便准备您的活动。一旦情况许可，换句话说，在实际上只要我们在摩洛哥或在阿尔及利亚有立足点，您能不能在您认为最合适的时候，前往该地，来管理并指挥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同盟？……

从整个说来，我对于最后胜利满怀信心。……我盼望着能再见到您，我的将军，我要求您接受我的尊崇的、最衷心的致意。

戴高乐曾经希望，如果能对达喀尔进行一次成功的远征，就能使塞内加尔和法属西非其他地区聚集到他的旗帜之下。但是出现了种种情况，他的计划失败了。尽管戴高乐从现实出发，痛苦地意识到，要避免法国人同法国人之间的冲突并不总是办得到的，但他决心要避免大规模的战斗。他原计划派一小股自由法国部队在法属几内亚的科纳克里登陆，从后方逐渐逼近达喀尔，并在沿途扩充力量，争取各方支持。然而，要使这一计划获得成功，必须请求英国提供海上支援，否则，这支远征部队就会有被维希海军消灭掉的危险。几经商量，英国方面终于同意派出两艘旧式战列舰“巴勒姆号”和“坚毅号”，四艘巡洋舰，航空母舰“皇家方舟号”，几艘驱逐舰和一艘油船，1940 年 8 月 31 日，在海军上将约翰·坎宁安的指挥下，随戴高乐的远征队从利物浦一同出发了。

不料，倒霉的事情接踵而来。经过漫长而曲折的航程，这支英法混合舰队于9月17日到达弗里敦。在此之前几天，得到了一个令人担心的消息，即一支强大的维希舰队，由“乔治·莱格号”、“光荣号”和“蒙特卡尔姆号”等三艘新式巨型巡洋舰，以及“无畏号”、“幻想号”和“马林号”等三艘轻型巡洋舰组成，自土伦起航，安然驶过直布罗陀海峡，正沿着西非海岸南下。英国和自由法国的舰队到达弗里敦时，这支维希舰队已经到过达喀尔，得到“普利茅斯号”巡洋舰的增援，而后向南驶去。在敌情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戴高乐决心继续执行达喀尔计划，结果失败了。人员和舰只都遭受了损失。伦敦报界怒气冲冲地把这次惨败归咎于戴高乐。维希方面则对戴高乐遭到的挫折幸灾乐祸；并从摩洛哥出动飞机轰炸直布罗陀。

虽然戴高乐在达喀尔遭到了痛苦的挫折，但并没有灰心，仍在顽强斗争。尽管他能调动的力量十分有限，仍计划在乍得和利比亚边境荒凉偏僻的沙漠里建立一个撒哈拉作战基地，以期有朝一日法国部队能攻取费赞，并从那里打到地中海去。他同时还打算派一支自由法国远征军到中东去和英国人配合作战。这些行动的最终目标是夺取法属北非，因此，在受到埃布埃总督的欢迎之后，他由乍得司令官马尔尚上校陪同飞往法亚，然后前往北部沙漠中的前哨据点。那里的部队虽然给养十分缺乏，还是打起战斗法国的洛林十字旗向他表示欢迎。

还使戴高乐意外高兴的是，他一回到拉密堡就遇到卡特鲁将军。这位学识渊博的五星上将是在戴高乐离开伦敦后到达那里的。丘吉尔接待他时对他大事吹捧了一番。据戴高乐猜测，丘吉尔甚至提出让这位将军接替戴高乐。9月22日，丘吉尔电告戴高乐，他已经作主“以你的名义”请卡特鲁将军去叙利亚。卡特鲁到了开罗，感到他最好先去拉密堡听听戴高乐的意见再去叙利亚。在那天的晚宴上，戴高乐向他祝酒，说“我对这位伟大的领导人素来怀有崇敬的友情”，卡特鲁将军的答词十分感人。他说，他接受戴高乐本人的领导。出席宴会的埃布埃总督和其他人都认识到，在卡特鲁的心目中，戴高乐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他的军阶。卡特鲁得到戴高乐的赞同，便返回开罗。

在戴高乐看来，此间最使他不放心的是，丘吉尔和艾登给他发来电报，告诉他维希大使德拉博姆和英国大使霍尔爵士开始在马德里谈判。德拉博姆要求英国保证不阻挠北非供应的物资运往法国，并说德国人已经“保证”他们决不染指。他接着说，如果德国人背信弃义，维希政府就迁往北非，站在英国一边重新参战。戴高乐提醒英国人不要轻信那些花言巧语。果然，10月24日贝当和希特勒在蒙都瓦会晤，表明维希准备积极与纳粹勾结。到11月初，维希和英国之间的会谈也就停止了。

在戴高乐看来，当前仅仅谴责维希政府，拒绝承认它的合法性是不够的。他本人必须成为法兰西民族利益的保护人，自由法国必须在已解放的领土上行使一个主权政府的职责。于是，1940年10月27日，戴高乐在布拉柴维尔，法属赤道非洲的首都，当时也是进行抵抗的法国首都，发表了庄严的宣言。他在宣言中一面谴责维希那个“政府机构”违反宪法，对侵略者唯命是从；一面向人民庄严保证，一旦法国人民能自由地选出自己的代表，他的一切行动将向代表们负责。五年后他确实兑现了这个诺言，向临时议会交了权。为了表示自己的权威，戴高乐将军还在10月27日这一天，颁布了两项法令。第一项法令宣布成立国防委员会，行使政府职权。第二项法令，任命卡特鲁将军、米塞利埃海军中将、德拉米纳将军。埃布埃总督、索托总督、军医西

塞将军、卡森教授、达尔让利厄神父和勒克莱尔少校为国防委员会委员。由戴高乐本人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为了让全体法国人认识到布拉柴维尔宣言和同时发表的两项法令的重要意义，戴高乐在离开布拉柴维尔之前，于 11 月 16 日又郑重地发表了一个“组织宣言”，宣布他掌权的目的是为了解放整个法国，同时根据 1884 年的法律谴责维希炮制的所谓“法兰西国家”是违反宪法的。就这样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戴高乐有了自己的“土地”，再也不是寄人篱下的流浪汉了。在非洲他建立了一个辽阔的作战基地和一个精干的行政机构，这是些实实在在的成就，而达喀尔惨败的耻辱此时已渐渐为人们忘记了。而且，一个以戴高乐为当然领袖的自由法国人的国家业已建立起来了。

戴高乐一回到伦敦，就在考虑和英国一同进军中东的问题，想乘胜扩大战果。他在回忆录中说，“我是怀着简单的想法飞向复杂的东方的。”在他看来，心中想着两点就够了：一点是，那里将发生重大事件；另一点是，法国应该参加这些事件。苏伊士运河是中东门户，又是地中海的门户，因此是控制非洲的关键。所以，戴高乐的头两个目标是争取法属索马里的卫戍部队和亚历山大港的海军部队。他首先在喀土穆着陆，那里是苏丹和厄立特里亚的作战基地。不久，蒙克拉尔上校指挥的自由法国新建旅和一个印度师协同作战，在克仑击溃了意大利军队。但这支自由法国部队随后不久就改编为自由法国第一师、派往埃及了。

中东的地位十分重要，关键在于苏伊士运河。这个地方一失，小亚细亚和埃及就对轴心国家打开了大门。相反地，如果能保持住这儿，总会有一天能从东方进至突尼斯、意大利和法国南部，这就意味着一切都要求他们必须坚持作战，而运河则是战略要冲。戴高乐知道，从的黎波里到巴格达，中间包括开罗、耶路撒冷、大马士革等地，再从亚历山大港到内罗毕，中间包括吉达，喀土穆和吉布提等地，其中的政治、种族和宗教上的情绪与野心，由于战争的刺激而尖锐化了。法国在这方面的地位已经削弱，而且“为各方面所垂涎”。戴高乐认为，当一切都在沸腾的时候，如果法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处于被动，那么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保住其中的任何一块土地。因此，他在这儿的任务也和其他地方一样，那就是行动起来，以代替那些不采取行动的人。

戴高乐在回忆录中写道：“尼罗河流域的角逐使得英、法、意三国近 60 年来一直互相冲突，结果英国胜利了。现在意大利人如果最后被打垮，而法国人又显然一直处于被动和无力的地位，今后的局势对英国在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索马里兰和苏丹等地区来说，将是一个多么难得的机会啊！”

在这一段时期，戴高乐在非洲的部队，捷报频传，连续取得战果。在他的指挥官中战绩辉煌的那位勒克莱尔上校正成为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勒克莱尔骁勇善战，而且是一位天生的将才，但由于装备极差而无法充分施展他的才能。1941 年 1 月，勒克莱尔派出一支部队佯攻木祖克，他的真正目标却是远离拉密堡的库弗腊绿洲，西地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公路。勒克莱尔很明智地征集好了大约 100 辆卡车，运了几百名士兵，带了仅有的一门 75 毫米加农炮，几门口径较小的 37 毫米炮以及几挺不好使的机枪。3 月 1 日，勒克莱尔迫使库弗腊的意大利守军投降，意大利人只是在投降以后才发现，打败他们的那支部队人数少得可怜。

在厄立特里亚和苏丹作战基地，由普拉特将军指挥的部队，不久前占领

了意大利在基朗高地的防线。蒙克拉尔上校的那一旅和阿斯蒂埃·德·维拉特队长的空军在这一战役中建立了奇迹。至于吉布提的维希军队，勒让蒂约姆将军虽然和他们接了头，但他们还没有下决心反正过来。领地长官诺勒塔则用尽一切办法来镇压倾向于归附的人，甚至连死刑也用上了。戴高乐决心解放这一地区。3月29日，他乘机前往厄立特里亚视察，那里的部队正进行着紧张的战斗，他到达的第二天，普拉特的部队就一举攻克多角堡。4月7日，由蒙克拉尔上校指挥的旅，首先攻入城区，并在碉堡里抓住了敌军上将，使蒙克拉尔上校得到了接受敌军红海舰队司令投降的光荣，法国分遣队在战斗中总共俘虏了4000人，到马萨瓦又接受了10000多人的投降。

4月4日，戴高乐将军回到开罗，高兴地读到丘吉尔发来的一份电报。电报就自由法国在非洲最近取得的胜利中所作出的贡献表示祝贺。一周之后，戴高乐写信给韦维尔将军，正式提出把勒让蒂约姆将军指挥的自由法国第一师调往昔兰尼加一埃及战场，协助他作战。但戴高乐明确指出，他认为必须保持该师建制的完整性，并仍由其师长指挥。就在戴高乐的部队在非洲取得进展的时候，自由法国和英国在这一地区的利害矛盾也加深了。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四章 克服内外危机

错综复杂矛盾多，内外危机敲警锣；
独立自主斩荆棘，敌人盟友无奈何。

当戴高乐在他那些幅员辽阔的非洲领地之间来往奔走时，他考虑得越来越多的是地中海东部地区的问题。那里的问题十分复杂，至少涉及到德国人、维希法国人、自由法国人，英国人和阿拉伯人这五个方面截然不同的利益。也许还得加上美国人，因为美国虽然尚未参战，但它与维希政权的来往对这一时期事态发展的影响不可谓不重要。

然而，在这一地区，德国人仍掌握着主动权。虽说英国中东地区总司令韦维尔在同意大利人作战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由于德国人的干预，形势又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1941年4月20日，德国人包围了托卜鲁克。在此之前，即4月6日，希特勒用炸弹夷平了贝尔格莱德之后，出兵侵占南斯拉夫和希腊。与此同时，希特勒在伊拉克的代理人一直在加紧进行策划，拉希德·阿里在得到德国的黄金和许诺之后，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于5月2日宣布成立一个亲轴心的政府，并请求德国给予援助。

维希法国和自由法国以互相敌对的态度卷入了这些事件。5月6日，希特勒在巴黎的代表与维希法国代表经过三天的会谈，达成了如下的协议：维希政府将为人侵中东地区的德军提供武器并给予登陆权。作为交换条件，德国人答应放宽对占领线两侧贸易的限制，为维希法国重新装备六艘驱逐舰和七艘鱼雷艇，把付给德军的占领费从每天四亿法郎减少到三亿法郎，并释放83000名战俘。三天之后，第一批德国飞机抵达阿勒颇。5月11日和12日，维希外长达尔朗前赴贝希特斯加登与希特勒和他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举行会谈。达尔朗回到维希后竭力鼓吹合作。5月27日，双方又签订了三项军事协定书。

这时，戴高乐与英国的关系，正经历着一个痛苦的阶段。5月9日，英方代表斯皮尔斯将军从开罗致电戴高乐称，目前似乎不大需要自由法国的军队继续在这一地区作战。又称，尽管韦维尔将军个人始终乐于同戴高乐见面，但他认为，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不久的将来，戴高乐都没有来开罗的必要。戴高乐憋着一肚子气，第二天回电说，鉴于英国政府所作的单方面决定，他根本无意去开罗。他感到遗憾的是勒让蒂约姆的部队迟迟不能集结，因为德国人一旦从叙利亚登陆，自由法国将因此而无法在那里采取任何行动。戴高乐认为，不管怎么说，中东目前的事态发展，将使在非洲的特别是在乍得的自由法国部队在战略上越来越重要。因此，他决定集中手头所有的人力和物力保卫这些领地。5月13日，戴高乐电召卡特鲁将军返回布拉柴维尔，并要求卡特鲁把这一决定通知开罗的英国人。同时，他任命加斯东·帕莱夫斯基为他在近东的政治代表，勒让蒂约姆将军为总司令。一周以后的5月18日，他在获悉达尔朗的贝希特斯加登之行后，发表广播演说，对“敌寇与通敌派之间的无耻交易”表示愤怒与声讨。

鉴于当时中东的形势，戴高乐以惯有的洞察力注意到，如果不考虑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要想就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前途达成持久而有效的协议是不可能的。为此，戴高乐给自由法国在伦敦的代表团发了一封电报，正式表示愿意承认上述两国的独立和主权，责成代表团将这一决定通知英国政

府，并作为交换条件，要求英国政府公开声明它尊重法国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权利。紧接着，他在两天以后为在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一事给卡特鲁将军发出了详尽的指示。然而，直到1941年6月6日，在法英采取联合行动的前夕，丘吉尔才致电戴高乐，对他保证给予叙利亚和黎巴嫩以独立的决定表示“欢迎”。

戴高乐清楚，要迅速解决叙利亚问题并不是容易的。因为在近东不仅维希法国和德国是他的对手，英国人也有自己的打算，这些打算与戴高乐心目中的法国利益自然是水火不相容的。英国仍然是一个大国，而法国只是一个吃了败仗的国家。戴高乐一向对英国的意图持怀疑态度，因此当丘吉尔建议由英国出面保证自由法国关于叙利亚和黎巴嫩独立的许诺时，戴高乐未予理睬。此时，英国驻开罗大使迈尔斯·兰普森爵士提议卡特鲁将军的独立宣言不仅用自由法国的名义，而且同时用英国的名义发表。戴高乐同样回绝了。他立即反驳说，法国的许诺无需外国保证。戴高乐担心英国人正在制造一种印象，似乎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独立应该归功于英国而不是法国，似乎英国人已经取得了充当自由法国和地中海东部地区国家之间仲裁人的资格，因此，戴高乐径直公布了卡特鲁将军的宣言。使他恼火的是，英国政府公布这个宣言时，竟加上了自己的名义。

1941年7月10日，维希法国在叙利亚的驻军司令邓茨将军准备投降。他下令把军舰和飞机开到土耳其，到那里以后就被扣留了。接着他要求停火。双方将于三天以后在阿克商谈投降条件。但是军事危机眼看要变成一场政治危机，而且是戴高乐与其盟友之间多灾多难的关系中迄今为止最严重的一场危机。

戴高乐获悉，维希法国与英方签订的协定，实际上是把叙利亚和黎巴嫩无条件地让给英国人，法国的权利，不论是现在和将来都只字未提。戴高乐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维希签订这一停战协定，说明它是忠于它那肮脏事业的。英国人则怀着一肚子不可告人的动机来干这件事。显然他们甚至在形式上也把盟友自由法国抛到一边去了。其实我们的倡议和合作，对于他们所获得的战略上的成果是有很大帮助的，他们企图利用维希的因循苟且，把邓茨在贝鲁特与大马士革交给他们的权力置于军事指挥部的掌握之下，他们还准备让东地中海地区的军队尽快走开。根据条约规定，这些军队将由他们的将领下令集中，并送到达尔朗派来的船只上去。同时还不准自由法国和他们接触或争取他们。他们留下的物资只许交给英国。最后所谓‘特种部队’，也就是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的军队，一直是极其忠于法国的，甚至维希在最近的战斗中都不敢用他们来同我们打仗。这些人丝毫没有经过考虑就被置于英国人的指挥之下了。”

为叙利亚、黎巴嫩问题，戴高乐向英国中东事务大臣利特尔顿提出强烈抗议，双方进行了极为严肃的对话：

戴高乐：你们和邓茨签订的协定是无法让人接受的。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统治权不能从法国转移给英国，唯有自由法国才能行使这项权力，自由法国必须为此向全法国作交代。同时我也必须把跟我们作战的维希法国军队尽量争取过来。他们迅速地被成批遣返，而且被集中起来，与外界隔绝，使我们无法对他们做工作。总之，自由法国不能同意自己和法国增援部队的泉源无法接近的情况。尤其不能同意的是，我们共同作战的结果，却让你们在大马士革和贝鲁特建立起权力。

利特尔顿：根据英国和自由法国 1940 年 8 月 7 日的协议，你们应该承认英国最高统帅部的权力。

戴高乐，我所承认的是最高统帅部对自由法国军队的指挥权，但只是在击溃共同敌人的军事方面，我从没有意思让这项特权伸展到法国辖区的主权、政策或行政事务中来。有一天当我们在法国本土登陆的时候，你们是不是会提出最高统帅部的权力来要求统治法国呢？此外，我还要向你重复一次，我迫切要求和维希的部队接洽一下，争取他们反正过来，这样，对你们也有好处。像这一批打仗上了痛的军队，将来我们在非洲或其他地方还可能遇上，如此不加考虑地把他们遣返，实在大荒谬了。最后，战争物资和特种部队的指挥权也应当属于自由法国。

利特尔顿：关于我们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相应地位问题还可以讨论。但是，关于停战协定的问题，由于已经签了字，我们必须执行。

戴高乐：那个协定并不能约束自由法国，我没有批准！

利特尔顿：那么，你打算怎么样呢？

戴高乐：关于英国最高统帅部似乎打算在叙利亚和黎巴嫩行使的权力，为了避免含糊起见，我特此奉告，自由法国从 7 月 24 日起，即三天以后，就不再依靠这个统帅部了，同时，我已经命令卡特鲁，不论遇到哪一方面的任何反对，立即将叙利亚和黎巴嫩全境的政权接过来。我也下令给自由法国的军队，尽量和其他法国部队接触，并控制战争物资。最后，我们对叙利亚和黎巴嫩军队的整编工作已经开始了，今后还要积极进行。

利特尔顿先生，你知道我本人和我的追随者对我们的同盟事业做了一些什么。因此你就可以估量出，如果我们不得不看到这个同盟被破坏，那是多么令人感到遗憾！但是，我们本身以及我们国内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的人，都不能承认这一同盟将用来危害法国。如果不幸出现了这种情况，我宁愿断绝我们和英国的关系。诚然，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将尽可能跟共同敌人作战。我打算在三天内到贝鲁特去，在这三天之中，我随时准备进行你们认为有必要的谈判。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危机中，戴高乐将军自始至终寸步不让，拒绝妥协，傲然无视自己地位的软弱，这使他在伦敦的代表们十分担心，他们在 7 月 25 日发给戴高乐将军的电报中抱怨说，他以法兰西帝国防务委员会的名义决策，却不与委员会的委员们充分磋商。他们恳请戴高乐不要真的和英国人闹翻了，那样会带来不可估量的危险。8 月 10 日，他们又发了一份电报，明确表示对达尔朗愿意在北非和达喀尔给德国人提供基地一事可能引起的后果颇为担忧。他们认为，这将给自由法国造成新的困难。一旦和英国关系破裂，他们担心自由法国就将“面临末日”，拯救法国的最后一线希望也就破灭了。

然而，戴高乐却毫不为之所动。他坚信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目前的危机有利于和英国建立公平合理的关系，丘吉尔本人也会懂得这一点，戴高乐对于维希政府在非洲进一步向德国投降一事所产生的后果，也和他的代表们看法不同。他认为，其后果只会提高自由法国在国内和国际，特别是在美国人眼里的地位。他对部下说：“我们的伟大和力量，就在于在法国的权利问题上寸步不让。直到我们到了莱茵河国境，我们都需要这种不妥协精神。”结果戴高乐在中东问题上胜利了，英国作了让步。自由法国进入了叙利亚和黎巴嫩，使几千名维希官兵倒向自由法国，从而使戴高乐再建两个旅和一支装甲部队。

中东问题刚刚平息之后，戴高乐又在其内部问题上遇到了棘手的米塞利埃事件。这位海军中将在法军中的级别比戴高乐将军要高，但到伦敦后却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成了戴高乐的下属，他对这一点一直心怀不满。而在戴高乐看来，米塞利埃只不过是到伦敦加入他的阵营的许多法国人中的一个，不比别人重要，却比别人讨厌。作为一名海军将领，米塞利埃已经证明他十分能干，自由法国那支小小的海军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已成了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当戴高乐提议成立的全国委员会进行分工时，让他掌管海军部无疑是最合适的了。但海军中将却另有打算。戴高乐认为此人的致命弱点在于他热中于搞阴谋诡计，而且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一些政治小团体的工具。这些小团体流亡国外后，继续搞旧政体的那套相互攻讦、相互利用的把戏。戴高乐认为，正是这种政体应对法国的溃败负主要责任。

在米塞利埃同伙中，还有一位是安德烈·拉巴尔特，此人能言善辩，利欲熏心。戴高乐提议让他担任新闻委员。由于他是《自由法国》的主编，这种安排似乎也合情合理。但拉巴尔特与米塞利埃沆瀣一气，他们一起去见戴高乐，告诉将军他们拒绝他的建议。9月18日，海军中将给戴高乐写了一封信，建议设立一个“执行委员会”，由他自己——米塞利埃担任主席并兼管国防、商船和军备，而由拉巴尔特主管在法国本土及法兰西帝国开展的政治行动并兼管宣传，至于戴高乐将军，只是担任自由法国运动的名誉主席。米塞利埃料到将会发生冲突，除在委员会内部进行阴谋活动外，还向英国人求援。他说，英国政府既然当初对发起自由法国运动承担了义务，现在就不能对运动内部如此重大的发展不闻不问。9月20日，米塞利埃自以为有英国人的支持，就向戴高乐摊牌了，戴高乐对此阴谋活动，怒火中烧，毫不妥协。9月23日，他给这位法军中将写了一封信，指责他“令人不能容忍地滥用了职权”，并限令他在24小时之内回到轨道上来，否则，他将采取措施，使米塞利埃“无法起坏作用”，并把他搞臭。

当天晚些时候，戴高乐将军向报界宣布全国委员会已经组成，名单将于第二天公布。晚上11时，丘吉尔、艾登与海军大臣亚历山大等，讨论了自由法国最近发生的这场风波。他们一致认为海军中将应以书面形式向戴高乐申述自己的情况，而且要写得使将军指责他有个人野心的说法站不住脚。在英国人的调停下，米塞利埃认了错，戴高乐也作了让步，当即任命米塞利埃为海军和商船委员，拉巴尔特什么也没有捞到。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戴高乐刚处理完米塞利埃的问题，又遇到了奥迪事件。这位法国空军将军，起初投靠戴高乐，后来又变了卦，1941年，54岁的奥迪在北非任职，他与维希当局越来越合不来。于是他前往华盛顿，在那里发表声明谴责维希政府，并宣布他愿力戴高乐将军效劳。在华盛顿的戴高乐宣传机构把他的声明大大宣传了一番。戴高乐亲自致电表示感谢。奥迪于1941年12月12日到达英国，立即被接到卡尔顿花园。自由法国的领袖在那里迎候他，可是，戴高乐将军的第一句话就使他大吃一惊，随之而来的是“幻灭”。戴高乐说：“我派你到布拉柴维尔去当我的非洲陆海空三军总司令。”奥迪不想在虚构的战场上当光杆司令。他发现自由法国这个组织浅陋、造作，充满了娱乐性行业和广告行业的味道，因此对它“十分厌恶”，但他努力克制自己，在那里呆了大约四个月时间，他第二次见到戴高乐时，曾为魏刚辩护。戴高乐冷冰冰地表示反对，说：“贝当元帅是卖国贼，我要枪毙他。魏刚将军是卖国贼，我要枪毙他。凡是叛徒都要枪毙！”

1942年2月3日，两人大吵大闹了一番，最后决裂了。奥迪说：“我简直不能相信，竟然有人想在法国人之间制造仇恨，罪犯为数并不多，我要求惩罚他们。”他请求与在北非的法国人建立联系。戴高乐以无可挽回的口气冷冷地回答说：“如果你是那样想的。你就回北非去吧，我将向你宣战。”奥迪满腔怒火，告诉英国政府，他的自尊心过去不容许他与维希共事，现在也同样不容许他与自由法国组织发生关系。

这些难以驾驭的追随者们，虽然暂时分散了戴高乐的精力，但最使他伤脑筋的是和美国人的关系。罗斯福总统对戴高乐本人和他的自由法国，抱有一种本能的反感，罗斯福认为，戴高乐将军是一个暴发户，将来可能成为独裁者。直到珍珠港事件以前，实际上包括在那以后一段时间，罗斯福的对法政策是与维希政府保持亲善关系，希望以此抵制德国的影响。戴高乐派认为，这等于姑息养奸，自寻失败，尽管美国富裕强大，但毕竟离得太远，鞭长莫及，不能与占领法国的纳粹抗衡，这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清楚了。不幸的是，罗斯福派驻维希的大使李海海军上将，与贝当元帅打交道时缺乏洞察力，贝当说戴高乐是法国的叛徒，李海从未对此提出过疑问，罗斯福驻北非的代表罗伯特·墨菲的汇报使罗斯福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看法。罗斯福对维希的政策和对戴高乐的态度都得到他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的全力支持。赫尔认为：“戴高乐将军是个法西斯分子，是美国的敌人。”

为了打开美国的大门，1941年5月19日，戴高乐从布拉柴维尔致电勒内·普利文，指示他由伦敦去华盛顿，在美国需要呆多久就呆多久，执行六项任务：与国务院建立经常性联系；建立自由法国所属非洲和大洋洲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和财政联系；购买作战物资；组织或改组那里的自由法国委员会；建立一个新闻宣传机构并与可能乐于帮助自由法国的有影响的美国非官方人士建立联系，此时，自由法国运动事实上控制着太平洋和非洲的一些法国属地。为了引起美国的重视，戴高乐指示普利文，主动提出在喀麦隆、乍得、刚果以及在太平洋的一些岛屿上为美国建立空军基地提供方便。这对美国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因为北非在维希的控制之下，美国人将来有可能需要在非洲建立这样的基地，以便在欧洲采取战争行动。

尽管戴高乐很想得到美国实际上而不是形式上的支持和承认，但他并不准备在由他代表整个法国这一点上作出任何让步。当普利文告诉戴高乐，美国国务院邀请他“以专家的身份而不是以代表身份”参加会谈时，戴高乐叫他坚持原则。在8月9日一封电报中，重申了他不可动摇的立场：“一般说来，你很清楚，我们所要求的是美国提供作战物资，而不是什么救济品。我知道，国务院目前准备提供医疗用品，而不愿提供武器。如果他们不提供武器，我们就拒绝接受医疗用品。遵循老一套方针行事的幻想在华盛顿显然还很流行。他们偏袒维希，也就是说，偏袒一手培植了维希的希特勒。你是代表法国的，我不同意你仅仅以专家身份参加美、英、法三方会议。要出席，就得同其他与会者享有同等权利，否则就干脆不出席。”

自由法国虽然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作出了些主动姿态，但与美国的关系并没有取得显著的进展，到了1941年底，反而因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事件，双方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了。这两个小岛从16世纪起就一直属于法国，那里的居民大多属于布列塔尼和诺曼底血统。维希派高级专员罗贝尔海军上将牢牢地控制着他们。设在岛上的电台是维希派进行亲德宣传的工具。只要这些岛屿仍在维希派手中，就有可能被德国人用作潜艇基地来威胁盟国

在大西洋上的运输船队。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认为解放这些岛屿是明智的，但这一计划却遭到了美国人的干扰。愤怒之下，戴高乐命令米塞利埃海军中将一举解放了这两个岛屿。在随后举行的公民投票中，大多数人支持自由法国。年轻人立即报名参加自由法国的军队，年岁较大的则着手组织地方自卫队。戴高乐任命他的特使萨瓦里接替维希派的高级专员担任当地的行政长官。

这件事严重刺激了美国人。国务卿赫尔深感自己受到了“侮辱”，他吁请加拿大政府公布它打算提出的恢复这两个岛屿原来状态的办法。这场轩然大波闹了三个星期，当时，丘吉尔正在魁北克与罗斯福会谈，戴高乐致电丘吉尔，提醒他美国国务院的态度已在法国公众舆论中造成了极坏的印象。丘吉尔为戴高乐进行辩护，但科德尔·赫尔不顾英国人的斡旋，依然固执己见。1月14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美国的压力下拜访了戴高乐，试图劝说戴高乐同意让这些岛屿实现中立，脱离自由法国全国委员会而独立，并接受盟国的共同控制，不出所料，戴高乐一口回绝了。

艾登威胁说，美国显然打算派遣一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去圣皮埃尔岛，他问戴高乐那时会出现什么情况。戴高乐极其幽默地答道，“盟国的军舰将在法国的领海之外停下来，美国海军上将将与米塞利埃共进午餐，米塞利埃一定会非常高兴。”

“如果巡洋舰开进法国领海呢？”艾登问。

“我们的人将会按照惯例要求它停止前进。”

“如果巡洋舰还往前开呢？”

“那就大不应该了吧，”戴高乐说，“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我们的人就得开火了！”

到了1942年1月底，在丘吉尔的斡旋下，美国人总算比较体面地决定接受自由法国占领这两个岛屿的既成事实。但是负责执行占领岛屿的米塞利埃在外界的挑动下，又掀起了一场反戴高乐的活动。3月3日，他在全国委员会一次会议上大发一通牢骚，声明他要辞职，要向戴高乐将军递上辞呈。戴高乐立即任命当时正在“凯旋号”上的海军上将奥布瓦诺接替米塞利埃担任全国委员会海军委员和自由法国海军总司令，同时委派奥托利接替莫雷担任海军总司令的参谋长。此外，戴高乐还判处米塞利埃海军中将和莫雷海军上校30天软禁，并根据1941年1月15日的司法协定要求英国人执行这一判决，因为软禁将在英国领土上执行。事后，米塞利埃拒绝担任海军总监的任命，并通知戴高乐，他与自由法国一刀两断。后来，米塞利埃和拉巴尔特一起到北非投靠了吉罗将军。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大举入侵苏联，为戴高乐发展对外关系带来了新的转机。6月23日，当他在大马士革听到这一消息时，他就暂时收起了反苏反共的念头，向他驻伦敦的代表团发了一份电报。

“我们目前不想说苏维埃政权的种种恶行，甚至罪行，我们应当像丘吉尔那样声明：我们毫不隐讳地站在俄国人一边，他们正在与德国人作战。……蹂躏法国，占领巴黎、兰斯、波尔多和斯特拉斯堡的不是俄国人。……俄国人正在消灭和将要消灭的德国飞机、坦克和士兵，就再也不可能用来阻止我们解放法国了。”

戴高乐发出这封电报之后，紧接着又派卡森和德让前往苏联驻美国使馆会晤伊凡·麦斯基大使，向他保证自由法国一定支持苏联，并要求与莫斯科

建立军事关系。9月26日，苏联政府正式声明：承认戴高乐将军为整个自由法国的领袖，并愿意同法兰西帝国防务委员会建立关系。此外，莫斯科愿意在反对希特勒德国及其同伙的共同斗争中帮助自由法国。至于法国，苏联政府强调了它坚定不移的立场，保证在战胜共同敌人之后，充分而完整地恢复法国的独立和伟大，不久，苏联政府正式任命鲍戈莫洛夫大使为与自由法国全国委员会打交道的代表，这样一来大大提高了戴高乐在盟国中的地位，对他克服米塞利埃海军中将的公开反叛，以及与英国、美国关系中的危机，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正是：无畏无惧渡险滩，大胆勇为方英雄！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五章 血与火的考验

战斗长河血泪多，事业艰难无尽说；
英雄立下移山志，紧擂战鼓斩妖魔。

经过两年多血与火的考验，战斗的法国在戴高乐的领导下，不仅建立了一支精悍的海陆空武装部队，而且对外关系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1941年9月24日，戴高乐发布命令，成立法兰西民族委员会，代行政府职能。

这个委员会包括：普利文，负责财政、经济和殖民地；卡山，负责司法和教育；德让，负责外交；勒让蒂约姆，负责作战部；瓦兰，负责空军；刚从法国来的迪特尔姆，负责在法国本土的行动、劳工和情报，卡特鲁与达让吕也成为这个委员会的不管部委员。开始，戴高乐曾想吸收某些在美国的法国著名人士参加这个委员会，以扩大这个委员会在海外的影响。为此，他曾请求流亡海外的原法国军政官员马利丹与阿莱西·莱吉尔等人给予协助，但都被他们婉言谢绝了。

这个民族委员会成立之后就不时地遭到维希政权和德意法西斯的恶意攻击。它有时被说成是一堆贪婪的政客，有时被说成是一群法西斯冒险家，有时又被说成是“一群乌合之众的共产党狂人”。但是，所有这些诽谤，都被戴高乐他们奋不顾身的反法西斯战斗精神和他们为了民族的解放所经受的血与火的考验而不攻自破了。人民清楚地看到，当国家和民族处于危亡的时机，是戴高乐将军发出了战斗的号召，举起了抗战的大旗；是戴高乐他们为了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解放，在和法西斯匪徒们浴血奋战。同时，人们也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正是由于维希政府的投降政策，才使150万法国战俘在法西斯的铁蹄下经受着各种各样的苦难；正是由于贝当等人的不抵抗政策，才使德国人并吞了阿尔萨斯、洛林及法国北部地区的广大领土；正是由于赖代尔等人的卖国求荣的政策，才使希特勒匪徒得以在法国横征暴敛，使法国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正是由于维希头目奉行投降卖国哲学，才使德国法西斯驱使愈来愈多的法国人为他们服苦役。特别当人们看到希特勒的飞机在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着陆，日本侵占了河内和印度支那的时候，看到维希军队残酷镇压抗战人民的时候，维希头目所说的“为了保卫法兰西帝国不借与任何人作战”的说法就不能欺骗任何人了。

至于维希政府想用来掩饰投降的所谓“民族革命”，给人们的印象是一堆无用的改良措施，有些措施虽然可能暂时缓和一些矛盾，但因为人们在人们心目中它们是和灾祸、奴役分不开的，因之也就失去作用而毫无成效了。相信的人，受骗的人，也就越来越少了，贝当元帅自己也承认他的苦恼。

1941年8月，他在广播中说。“我感到吹起了一阵歪风。人们感到心神不安，疑虑占据了他们的心灵。政府的成信成了问题。命令不能贯彻。一种真正的焦虑冲击着法国人民。”次年6月，在他要求停战的二周年那天，他在广播中说：“我不否认，我的呼吁所得到的反应微小得可怜。”

在戴高乐的召唤和抗战组织的影响下，法国本土上的地下抵抗运动，也在秘密地发展起来。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以不同的方式参加抗战运动。有的在积极编写、印刷和散发传单；有的在秘密监视敌人，为抗战组织提供情报；有的在冒着性命的危险，掩护或护送地下工作人员；有的在运输及分散空投或偷运过来的军用物资；有的在袭拢敌人，或破坏敌人要害部门的通

讯联系。

1941年9月发生了一系列枪杀德国官兵的事件。第一批被杀的有：一个刚从地下车站上来的法西斯军官，南特城卫戍司令，驻防波尔多的一个德国军官和巴黎塞宾莱大街上的两名德国兵。其他地区的暗杀也跟着开始了，为了报复，法西斯强盗枪毙了几百名人质，将好几百爱国者关进监狱，随后又把他们送在德国服苦役。敌人还以极重的罚金和劳役来惩罚有德国人遭到暗杀的城镇居民。当戴高乐听到这些冒着巨大危险单独抗敌的法国本土人民的战绩的时候，他的心情是骄傲而又沉重的。他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应当注意保存力量，尽量避免得不偿失的牺牲，以备将来有效地配合全国的大反攻或大起义。为此，他在1941年10月23日发表广播讲话说：“德国人被法国人杀掉是完全自然和完全正确的。如果德国人不愿死在我们手里，他们就应该呆在自己的家里……既然他们没有能够征服全世界，他们每一个就一定不是俘虏就是死尸，但是，斗争必须讲究策略。目前我命令沦陷区的人们，不要公开地杀害德国人。唯一的理由就是：敌人现在可以大批屠杀我们目前被解除武装的战士，作为报复。另一方面，只要一到我们能够进攻的时候，我就会发出你们期待已久的命令。”

戴高乐一方面要限制得不偿失的牺牲，同时也必须利用这种由德国人的镇压而激起的法国人民的愤怒情绪，以鼓起民族的斗志。

10月25日，德国法西斯匪徒在南特和波尔多各杀害50名人质的第二天，戴高乐在广播中说：“敌人以为枪毙我爱国志士便可以吓倒法国。我们将让他们知道，法国是吓不倒的。我现在吁请全法国的男子和妇女，在10月31日星期五这天，从4时到4时5分，在他们当时所站立的地方停止一切活动，静默五分钟。这是一个巨大的警告，同时也是法国精诚团结的证明。”那一天的前一日晚间，戴高乐又重申了这一号召。事实证明，在许多地区，特别是在工厂里，这次示威是非常动人的。这一行动表明，战斗的法兰西人民是听从召唤的，是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的。

在戴高乐的号召下，在法国大陆，各种各样的战斗组织相继出现。在所谓自由地区，有弗莱乃上尉领导的“战斗队”，艾曼纽耳·达斯迪埃·德拉维热里领导的“解放队”，让一皮尔·勒维主持的“义勇军”，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号召以不同的方式同敌人展开斗争，在沦陷区，爱国者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敌人严密的监视。任何嫌疑犯都被关进监狱，然后押出国境。因此他们在这地区的活动是极为分散的，行动是秘密的。像杜尼上校创立的“军政组织”，黎包含领导的“自由人”，莱贡特一布纳组织的“抵抗者”，加瓦那建立的“自由北方”以及在艾诺、在法兰德斯和矿区由乌克指挥的“北之音”，都表示要为祖国的解放、民族的复兴而奉献力量。

这些组织政治观点不同，他们的共同愿望是反对法西斯。他们之间存在的派系之争，实际上是同法国被占领的状况分不开的。起初，抗战运动是由一些爱国人士以小组的形式组成的。不久，这种小组大量出现，但是很分散，为了避开盖世大保以及与之配合的纳粹机构和维希的保安警察的监视，他们往往互无联系，甚至在同一小组同一地段活动的人也互不了解。到1943年，抗战运动发展很快，但还谈不上是一个群众运动，特别是起初，当这些秘密小组纷纷出现时，名目繁杂。后来，许多小组消失了，或同其他小组合并了。其中最重要的组织是“解放”、“战斗”、“狙击兵”和“民族阵线”。

“战斗”是由两个组织在1941年底或1942年初合并后组成的。一个是由亨利·弗雷内领导的。另一个是由乔治·皮杜尔（后来成为外交部长）等基督教民主党人领导。“狙击兵”同“战斗”一样。成立于里昂，这个城市实际上成了法国南部抗战运动的首都。它的最初领袖是莱维和克洛迪斯—珀蒂。“解放”则是由仪表非凡、喜欢冒险的人物艾曼纽耳·达斯迪埃·德拉维热里创建的。他是一个新闻记者，也当过海军军官。重要的“民族阵线”是由共产党发起的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按行业建立了若干互有联系的“民族阵线”。有律师民族阵线，店吏民族阵线，农民民族阵线，妇女民族阵线等。每个阵线都有自己的报纸。它的成员的政治色彩多种多样，有路易·马兰的右翼共和联盟，有社会党人，有激进党人，还有基督教民主党人。“民族阵线”是在法国南北两个地区都能以一个团结一致的整体进行活动的唯一组织。“民族阵线”曾得到过不问政治的吉罗将军的支持。他向科西嘉的“民族阵线”组织提供了武器，结果使他们把这个岛屿从德国人手中解放了出来。

“面对着法国本土抗战组织的纷纷出现，戴高乐极力想把这些组织统一起来，纳入他的“自由法国”的统一领导之下。

1941年他听说让·穆兰从法国到了里斯本，正准备到伦敦来。戴高乐了解了穆兰的为人，当德国人进入沙特尔城时，穆兰正在埃尔—罗伯尔任省长，他表现了“卓绝的坚定和高贵品质”。法西斯侮辱了他，把他殴伤，并将他关进监狱，可是最后还是将他释放，并向他道歉和表示敬意。让·穆兰一直住在法国的未被占领区，他在那里同抗战运动取得联系。

1941年9月9日，他偷越国境线，取道西班牙准备前往英国。在里斯本的英国当局立刻看中了他的才干，花了六个星期的时间，试图争取他回法国为英国服务。但他决心已定：他要到伦敦，为戴高乐效劳。戴高乐获悉此事，并在意识到他的潜在重要性后，为他的受阻大发雷霆，接着他写信催促艾登大臣，这才使穆兰能在11月底从里斯本来到伦敦。

戴高乐将军于1941年12月同穆兰进行了几次长时间的谈话。他对此人天生的辩才和决断能力印象极深，正如他在与类似人物接触时常得到的感受一样。他决定派穆兰回法国去，在法国未被占领区的抗战运动内作为他一切政治和军事行动的唯一代表。经过短期突击跳伞训练，穆兰于1942年1月1日被空投到法国。他的密码代号先是“雷克斯”，后是“马克斯”，他的使命是组织秘密军事小组，设立空投武器接收站，分发经费，用无线电同伦敦保持联系。抗战运动组织很需要经费，而他手中就掌握着经费，就等于他握有一张王牌。他在随后几个月的耐心的组织工作中，以及在同那些不如他那样相信戴高乐是唯一可能的领袖的人们进行谈判时，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穆兰的推动以及基层人员的支援之下，南方地区抵抗运动组织的领导人很快就组成了一个委员会，由民族委员会的代表担任主席。3月间，他们发表了以戴高乐为抗战领袖的共同宣言。但是，正当他发挥更大作用时，穆兰却被敌人逮捕而英勇牺牲了。他的死对戴高乐的抗战事业是一巨大损失。对于穆兰的死，戴高乐是非常痛心的。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个人虽然还很年轻，可是已经具有力责任磨练出来的丰富经验，他和我的最能干的伙伴们是属于一种类型的。他的心里洋溢着热爱祖国的感情，并且相信‘戴高乐派’，不仅仅是一个对敌斗争的手段，同时也是革新法国的动力。他深深认为‘自由法国’便是法国的具体表现。他希望担负重大的任务。可是他也是一个洞明世事和阅历很深的人，当走在一条布满了敌人的陷阱和朋友的阻碍的

道路上的时候，他是步步小心谨慎的。穆兰忠实，可是机警；不好怀疑，但也不轻信；他是门徒，同时也是大师。在 18 个月中他要完成一件重大的工作。他要使还仅仅具有象征性统一的轮廓的法国本上抵抗运动变为实质的统一运动。后来他给人出卖了，遭到逮捕。丧失人性的敌人对他施加可怕的酷刑，但他坚贞不屈，最后为法国英勇地牺牲了。他像无数勇敢的士兵一样——他们风吹日晒，度过漫长、空虚的夜晚，准备‘他们明晨的战斗’。”

的确，让·穆兰之死所造成的政治后果，对戴高乐来说，是最令人难以忍受的。穆兰是他的人，而且是自愿投奔他的。他于 1943 年 2 月到伦敦和戴高乐会面，并听取了戴高乐的指示。他的信心给戴高乐将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戴高乐在他的汉普斯特德官邸举行的一次仪式上，给这位抗战运动的领导人颁发了“解放十字勋章”。他觉得这次仪式比其他任何同类仪式都更加动人。后来他曾派遣穆兰带着他的明确指示回到法国去。指示要求建立抗战运动各组织。各政党和工会组织联合起来的全国抗战运动委员会，由穆兰任主席。指示还明确规定了这个新的组织与全国委员会的关系。

经过穆兰和他的支持者的努力，最后征得大部分抵抗组织的同意，认为以它们的名义来宣布它们要达到的目标的时候到了。这个目标就是解放人民，解放法兰西。在征得国内抵抗组织同意后，戴高乐以民族委员会通过的一篇宣言的形式宣布了这个目的。在宣言中，戴高乐宣布：我们决定在打败敌人以后，使法国在世界拥有自由、尊严和安全，在推翻腐败的政权——它曾剥夺了许多人的这种权力——以后，国内每一个男子和妇女在他们的生活中都应得到自由、尊严和安全。宣言同时谴责了那个“在战败中消失的道德、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政权”和那个“从投机卖国的罪行中产生的政权”。宣言断言：“法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抗战胜利，同时他们也是团结起来进行革命。”1942 年 6 月 23 日，法国沦陷区和非沦陷区所有的地下报纸都登载了这一宣言，布拉柴维尔、贝鲁特和伦敦的电台也广播了这个宣言。

在伦敦，戴高乐还经常受到“大下列颠法兰西人协会”的帮助。特别是它组织了好几次有军民踊跃参加的集会。在会上，戴高乐和这些法国人见了面。他们表达了自己的爱国热情，并坚定了对争取胜利的信心。国内人民也听到了反法西斯战士们的声音——电台向他们转播了与会群众的发言和大会盛况。1941 年 11 月 15 日，在挤满了艾伯特大厅的人群中，戴高乐郑重宣告：“战斗法国的任务就是解放祖国，复兴法兰西。我们说‘光荣与祖国’，意思是祖国只能由胜利而得到新生，而只有通过对它自己的伟大崇拜才可以继续生存。我们说‘自由、平等、博爱’，因为我们决心忠于民主原则。我们说‘解放’，因为在打败敌人之前，我们的努力不能停止，它必须给每个法国人带来在光荣和安全中生活和工作的条件。”这时艾伯特大厅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示威，以特殊的方式表示了对这位抗战领袖的忠诚和敬意。

大下列颠岛不仅是戴高乐和本土及海外抗战组织联系的纽带，而且是自由法国反法西斯战士的训练中心。大批抗战骨干在这里接受训练，并由这里出发分赴前线。由雷纳上校指挥的轻骑兵，炮兵团、装甲队、工兵支队和信号组，每六个月负责培养一批士官和专家。由伯台上校领导的炮兵辎重处，除负责组织军人生产外，还负责分发由美国依“租借法案”所供应的军事物资，用以装备新成立的部队。由特里小组领导的“法国义勇军校”，继马祖夫人之后，训练了大批能干的年轻姑娘们成为驾驶员、护士和后勤服务人员，

由鲍端司令领导的法国学生队，培养了数以千计的班排连军官，有 521 人后来在作战中光荣牺牲。戴高乐说：“没有再比和这些年轻人会面能给自由法国领袖以更多安慰的了。他们是镶嵌在法国晦暗了的光荣之上的光芒四射的希望之宝石。”

在英国这块基地上，还培训了数以千计的海军人员。他们大部分从英国港口出发，参加在大西洋、英吉利海峡、北海和极地一带进行的海上战斗。到 1942 年 6 月，已有 700 名自由法国的海军将士英勇献身。当时海军感到最困难的是军官的补充问题，紧张的战争环境不允许他们按部就班地遵循专业化的原则进行训练，只能边战斗，边学习，从战争实践中总结提高。由海军中校威泽尔和加拉尔领导的“学校舰队”，积极地在“戴奥多尔·迪西埃总统号”、“行星号”和“美丽的火鸡号”舰上进行训练。在这里共毕业了四批学员，从这座实战学校培养出来的学员，都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在对敌作战中英勇顽强，成了自由法国海军的中坚力量。

在盟国阵营服务的一支法国商船队，在航运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战争开始时法国所有的 270 万吨——或 660 艘客船和货船——船位中，有 70 万吨或 170 艘客船，在维希政府投降后仍然继续为抗战服务。在人力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戴高乐的海军部，还补充配置了 67 艘商船的人力。总计有 580 名军官和 4300 名海员继续为战争坚持航运。到 1942 年春，已有 1/4 的海员在海上牺牲。

自由法国的空军，从无到有，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

1941 年，戴高乐首先在英国成立了“法兰西之岛”空军战斗队，司令员为西威杜。当他的飞机在法兰西上空被击落后，便由杜贝叶继任。在叙利亚战斗的第二天，在埃及成立了“阿尔萨斯”战斗队。它最初在布里格指挥下在利比亚进行战斗，以后调到大下利比亚，由摩绍特担任指挥官。就在保卫伦敦的空战中摩绍特光荣牺牲了。洛林轰炸队是在东地中海地区成立的，由毕若担任指挥。他在敌人后方执行轰炸任务时牺牲了。盖尼良·摩里尼接替了他的职务。“布列塔尼”混合队在乍得成立，由圣贝鲁领导，支援盟军在撒哈拉作战。这些年轻的飞行员，英勇奋战，前赴后继，不怕流血牺牲，正如戴高乐在回忆录中所写的：“在空战中，光荣的代价是很高的啊！自由法国的空军在战争中损失的总数比它所保持的空军实力多一倍。”

在北非战场上，戴高乐的第一轻装师在和隆美尔交战中创造了光辉的战绩。这支部队在 1942 年 6 月初在比耳哈亥依木地区被敌人重重包围后，接着又遭到德军重炮和飞机的轮番轰炸。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军的军人储备日益减少，食物缺乏，水源几乎断绝。在炽热的阳光下，在风沙中，法军一直奋勇拼杀。6 月 3 日，隆美尔写信要求法军投降，以免痛遭歼灭。6 月 5 日，德国军官又重申其最后通牒。对于敌人的投降要求，法军都以炮火作了回答。到了 6 月 8 日和 9 日，德军又连续向法军发起了猛烈攻击，企图把这支部队消灭在沙漠里。法军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他们不仅子弹快打光了，而对他们威胁最大的是水源完全断绝了。他们每人每天只得到 2 公升水，在这样炎热的天气中显然是不够的。戴高乐将军在遥远的伦敦，在密切地注视着战局的发展。他发给前方的电报说：“盖尼将军，希望你知悉，并转告你的军队，全法国注视着你们，你们是它的骄傲！”

在戴高乐将军的号召和鼓舞下，这支部队终于在 6 月 11 日奇迹般的突破重围。全军 5500 人，经过 11 天的拼杀，死伤 1109 人，但德军却遭受了三倍

于法军的损失。这时，许多国家的公众舆论对此开始注意起来，比耳哈亥依木的法军越来越成为大家议论和报纸新闻的中心。在法军胜利突围后的第二天，所有在伦敦、纽约、蒙特利尔、开罗、里约热内卢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新闻号角，都震天动地地响起来：“法军的英勇防御！”“辉煌的战绩！”“在比耳哈亥依木德国人被打败了！”戴高乐对此次战役总结说：“我们已经接近一直所向往的目的，那就是为我们的自由法国军队——虽然他们在数量上力量有限——取得一个伟大时期的伟大任务。比耳哈亥依木的炮火向全世界宣布了法国复兴的开端。”

6天以后，一万余法国军民在伦敦举行集会，庆祝6月18日发出号召两周周年。这天，艾伯特大厅的四层看台都挤满了人。一个有洛林十字旗的三色帷幕悬挂在演说台后面，引起了全场的注目。厅内响起了马赛曲和洛林进行曲，大家的心在沸腾，在共鸣。在会上，戴高乐将军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说，他的讲话不断赢得听众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香弗曾说过：‘理智的人忍耐，热情的人生活！’法国在彼尔多投降和被出卖已有两年，可是法国的反法西斯战士仍以顽强的精神继续作战。”戴高乐说，“在这两年间，我们过着伟大的生活，因为我们是热情的人。可是我们也忍耐了，因为我们是理智的人，”

“我说我们是热情的人，可是我们只有一种热情，那就是对我们的伟大祖国——法国！”戴高乐说，“在所谓停战以后，在成千上万的人，在非洲和东方的战场上，在广阔无边的海洋上，在英国、厄里特里亚和利比亚的天空上，在圣纳扎尔的夜战或是早晨的刑场上丧命，在最后一口气里也要念着法国的名字，千百万立场坚定的法国人，不论是在本国准备复仇，在战争中打击敌人，还是在海外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维护着祖国的尊严和影响，他们都只有一个愿望，就是为法国服务；只有一个思想，就是对法国效忠。因为没有热情就不能成就任何大事。”

“我说我们是理智的人。的确，我们选择了最困难、最光荣的战斗的道路。为了祖国的解放，我们不惜牺牲一切。”戴高乐说，“我们从来不承认法国曾退出战争。在我们看来，1940年的战败，所谓停战，所谓我们部队和领土的中立，只是那蛮横窃夺政权的人，为破坏法兰西共和国制度、法律和自由，为侵略者的利益而破坏我们的联盟，所施加的种种阴谋活动而已。”

“说真的，两年前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当我们大胆地挺身担负起捍卫国家使命的时候，我们就坚信我们的抗战事业一定胜利，法西斯的侵略，必遭到可耻的失败！”戴高乐说，今天世界的战局正像我们早先预料的那样顺利发展。当今，在丘吉尔所领导的英国，在敌机猛烈的轰炸下，像盘石一样坚定，他们在非洲，在海洋连续取得胜利。我们看到斯大林所领导的俄国人民及其军队，一年来，在1200英里长的战线上粉碎了德国及其所谓盟国的疯狂进攻，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们也同时看到罗斯福所领导的美国，正在把他们的巨大资源变为战争武器，他们正在慷慨地援助反法西斯的国家和人民。我们也看到法国人民群众在抵抗中那样团结，他们在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帮助自己的部队。我们公开地向这些忠诚的爱国公民致敬！”

“是的，一个伟大的国家，它为了自己和别国必须继续保持伟大，但是，如果它的儿女都舍弃了它，它怎样继续保持伟大呢？如果它的战士不是它的荣誉象征，勇敢的泉源，希望的中心，它将怎样再建立它的统一、恢复它的伟大光彩呢？”戴高乐指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是一个战争的

时代，我们要超脱自私和偏见，我们要和一切反法西斯的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一股伟大的浪潮正涌向国际理想的高峰。

戴高乐最后说：“我们知道血和火的考验还没有过去。我们了解敌人还有多大的力量和狡猾伎俩……我们必须团结战斗，忠诚地履行对法国的义务，不到全国解放决不罢休。那时我们工作完成了，我们的作用尽到了，我们将追随那些从它的历史开始以来为它服务的人，以及在它永久的未来中为它服务的先驱者，用庇古的话简单地对法国说：母亲，看看您的那些战斗得那样艰苦的儿子们！”

戴高乐的演说，像一声春雷，唤醒了仍在沉睡的人们；戴高乐的演说，像一把高高的火炬，照亮了战士们继续前进的道路。他们知道在斗争的道路上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在和盟国的关系中还有许多矛盾需要解决。但是，他们战斗的决心不变，他们将继续勇往直前，正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欲知法美关系后事如何发展，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六章 法美关系

大国角逐不易说，美国对法难捉摸；
藕断丝连与维希，“策略灵活”称楷模。

1942年冬季快要到来的时候，自由法国在世界各国的心目中不再是最初人们用讥讽、怜悯和眼泪接待的那个使人“惊奇的逃亡者”了。现在可以从各方面看到它的现实性——政治的、军事的、领土的。自由法国今后所需要的是在外交上打开一条出路，在盟国中取得它应有的位置，以一个交战国和主权国的姿态出现。

戴高乐在和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的交往中，感到最难打开局面的是和美国的的关系，当戴高乐的事业在美国舆论界获得广泛热烈的反应时，美国官方却“坚持以一种冷淡和漠不关心的态度来对待它”。罗斯福政府一直和维希保持着关系，理由是这样可以使它脱离德国的影响，免得把海军舰队移交给德国，并且和魏刚、诺盖和布伊松保持接触，因为罗斯福总统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力他打开非洲的大门。但是，美国外交政策本身就有极大的矛盾。他们一方面和贝当保持着外交关系，一方面却说，他们远远避开自由法国是因为不能预先断定法国解放后将有一个什么样的政府。戴高乐认为，“真正的原因是美国决策者认为法国将要灭亡，所以他们才跟维希打交道。”

为了取得美国的援助，戴高乐曾多次采取主动。1941年5月，他又派他的得力干将普利文前往美国，临行前戴高乐给他规定了这样一个使命：“解决同美国国务院建立永久、直接的关系，自由法属非洲和大洋洲同美国的经济关系，以及我们直接购买战争所需的物资问题；在美国建立我们的情报和宣传机构；在美国成立我们的委员会，把同情我们的美国人给我们的帮助组织起来。”普利文虽广泛进行活动，但并未取得明显的成果。

戴高乐坚信：他不仅代表法兰西，而且他就是法兰西。多年以前，他在《剑刃》一书中就提及并颂扬了凯撒和拿破仑的表演才能。他自己扮演的角色是法兰西本身，这是历史使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扮演的一个伟大角色。尚未亲自领教过戴高乐的罗斯福，从来不相信也不承认戴高乐的这种自诩。丘吉尔却从同这位将军的交往中深深领教了这一点，但他并未完全信服。这位首相在一次盛怒中吼道：“你说你是法兰西？你并不是法兰西！法兰西！她在哪里？当然，我承认戴高乐将军和他的追随者是法兰西民族的一个重要而又值得尊重的部分。但是，除他们以外，我们无疑可以找到另外的权威，它也有它的价值。”戴高乐打断了他的话：“如果在你看来我不代表法兰西，你为什么，又有什么权利来同我商讨法国的世界利益呢？”丘吉尔不吭声了。

至于罗斯福，他对这位倔强的法国将军也有他自己的看法。如何对待自由法国？在当时孤立主义狂潮的影响下，罗斯福对这一问题，的确是反复考虑过的。谁都知道，法国的崩溃在英国引起很大冲击，深深震动了罗斯福总统。事实上，在法国即将溃败之前，保罗·雷诺总理曾向罗斯福发出个人呼吁，要求美国派军队和运送物资给以支持。翌日，罗斯福答复说：“美国人赞赏法国对德国侵略进行英勇抵抗……”他将尽力“加速运送武器和弹药”。但又说：“我认为您应当理解我的声明不包含承担任何军事义务”，“唯有国会能够承担这种义务”。在收到这份电报后，6月17日法国政府投降。

在六个星期内，一支被认为是欧洲最好的军队投降了，一支完整无损尚未参战的现代化的海军宣布“中立”了，法国可耻地接受了希特勒的停战条

件，这使罗斯福认为，多年来政府连续更迭的法国已经完全分崩离析。一段时间，罗斯福曾希望法国海军和法兰西帝国继续同英国人并肩作战，但这也使他失望了。法兰西已不复存在，目前的法国是纳粹帝国的一个附庸国，由一位身边全是叛徒的老元帅统治着。这就是罗斯福总统当时的思想状况。

据戴高乐派往美国的首任代表拉乌尔·阿格隆回忆，1941年1月2日，他持一份英国通行证从中东抵达纽约。总爱吹毛求疵的美国移民局的一位检查官，翻来覆去地查看了他的这份不同寻常的旅行证件，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然后问道：既然是法国人，为什么要在英国的外交保护下旅行？于是，阿格隆向他出示了由卡特鲁将军签署的公函和一封英国驻开罗大使馆的证明信。“这么说，你是同戴高乐将军一起战斗的自由法国人的一员了。如果我是法国人，也会这样做的，请过去吧，先生。”

阿格隆走出海关，买了最近几期的《纽约日报》和《先驱论坛报》，使他大吃一惊的是，美国绝大多数人并不愿卷入到这场横扫欧洲的大战中去，鼓吹孤立主义的两位美国参议员塔夫脱和博拉强调说，同英国一起参战将冒很大风险。而当时英国一直是孤军奋战。只有极少数美国人对希特勒一旦取得最后胜利就将出现一个被奴役的欧洲感到忧虑不安。

全美国在奉行孤立主义，不愿卷入欧洲冲突。大西洋的英雄查尔斯·林德伯格不停进行所谓“和平主义”，实际上是“失败主义”的宣传：“这场战争输定了。即使我们投入全部的财力和物力，也不能帮助英国打赢。”他又说：“只有英国人、犹太人和罗斯福政府才愿意打仗。”

从纽约看来，危险在于罗斯福这位“民主政体的伟大捍卫者”是否能克服孤立主义。对国内那种消极的、和平主义的公众舆论，他似乎随波逐流。这种舆论认为，美国无须参战便能战胜轴心国。罗斯福不是向美国的母亲们下了保证吗？他说：“你们的儿子决不会在任何外国战争中作战，不论战争是在哪里打。”

阿格隆来到纽约不久，见到了罗斯福夫人，她激动地向阿格隆谈起法兰西和受苦受难的法国人民。她深表同情，表示愿尽力帮助。但是，从她的讲话里，总感到有怜悯的味道，这对于一个自由法国人来说，听起来很不是滋味，阿格隆在美期间，作为总统的罗斯福一直拒绝接见。好像戴高乐在伦敦的出现，没有给罗斯福留下什么印象。他认为，少数无名之辈所追随的这位性情古怪的准将只有象征性的价值，他确实是光荣的，但丝毫不代表实实在在的力量，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和副国务卿韦尔斯，根本不注意自由法国运动，他们关心的是避免发生最坏的事情，即维希与轴心国更“全面的合作”。

当时，人们不好拿罗斯福对法国的态度与丘吉尔的态度相比较。对丘吉尔来说，法国是一个具体的现实，以前或是同它一起或是为了反对它而进行过多次战争。法国在现代欧洲的建设中与英国共同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同英国一样，在世界上创建了帝国。丘吉尔了解历史，敏锐地意识到应当奉行一种欧洲的均势政策。他接近法国人，真正体会到他们的悲剧。他理解法国是战争更是和平的必不可少的因素。所以，尽管他与戴高乐也不时发生冲突，但最后总是支持戴高乐，他坚决主张重新装备法国军队，使它参加战斗，恢复它的大国地位。而罗斯福却不是这样想的。

这位美国总统，毫不理解第三共和的悲剧和困境。法国失败后，他对法国采取了一种恩赐态度：“在这悲观的时刻，我最终相信了法国最坏的情况……”他写道，他认为法兰西永远不会再成为第一流国家，因而，没有必

要投入军事力量和在外交上给予支持，以使它恢复旧观。贝当接受投降，将国家置于附庸国地位，贝当代表着这个古老的、有着光荣历史，但不能适应新世界节奏的国家，这一切与丘吉尔的愿望相差甚远。出于关心和同情，丘吉尔需要在大陆上有一个强大的法国作为伙伴，并且把戴高乐看作“命运的主宰”。

戴高乐与罗斯福的关系一直不好。

1940年，戴高乐将军曾经考虑过，为了平衡英国的政策，他需要美国的友谊。罗斯福下认识戴高乐，后来又听说没有一位法国知名人士随戴高乐去伦敦，维希驻华盛顿大使馆，从一开始就加紧进行反对这位所谓“叛乱将军”的有效宣传。罗斯福的私人朋友、美国驻维希大使李海海军上将，也对戴高乐存有偏见。在他的报告中指出：“法国大多数人追随贝当，反对戴高乐。”为了争取法国不要完全投在法西斯的怀抱，罗斯福一再鼓励贝当元帅顶住德国压力，1942年12月，他得到法国舰队保持中立和于把殖民地交给德国人的保证，他对此表示满意，罗斯福如何看待戴高乐呢？他认为戴高乐的代表性远不如贝当，贝当身边派驻有教廷大使、苏联、美国、加拿大、比利时、葡萄牙、瑞典、巴西，瑞士大使……贝当统治着半个法国。他无可争辩地统帅着一支军队，特别是一支完整无损的海军，并且控制着大片海外领地和头等重要的战略要地。

戴高乐与罗斯福在出身、性格和经历上迥然不同，富兰克林·罗斯福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家庭。他在格罗通中学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学习，他很早就接受了“自由民主”思想。他所接触的作家、思想家和理论家都具有“新的民众思想”，他成为“新政”的总统，震撼了美国，并在经济和社交方面进行了改革。他是一位资产阶级杰出的政治家，精明强干，身残志坚；又是一位出色的谈判能手，善于施展他的魅力。战争使美国在军事和经济活动中占据了优势，使罗斯福总统成为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物。

戴高乐将军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他出身于一个严厉的、爱国的、信奉天主教的知识分子家庭。青年时代，他已经懂得了责任感和为祖国献身的精神。直到战争爆发前，他一直从事军事艺术和作战行动的研究。他的著作，表明他对快速攻击型的现代战争有着独到的见解。很久之后，他才同政界接触。战争开始后，他被任命为副国务秘书和国防部副部长。这并不是因为他对社会的看法，而是因为他的勇敢、朝气蓬勃的军人气质。1940年贝当政府投降后，6月18日，他在伦敦向军人和民众发出呼吁，要求他们与他并肩战斗。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他致力于这一事业，没有从事政治活动。随着法兰西帝国的众多领地宣布归顺自由法国，他“身不由己地卷进了政治舞台”，他把军人采取攻势和切断敌人退路的品质带到他的政治活动中，他与盟友的关系不是处于谈判的地位，而是挑战和对抗。此外，他像罗斯福一样，对过去受到的侮辱一直耿耿于怀。

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米尔顿·维奥斯特在他的《敌对的同盟国》一书中分析了罗斯福和戴高乐这两位活动家的性格，认为他们当中只要有一个人不十分以我为中心，彼此就可能达成谅解。“二人中的强者罗斯福即使对戴高乐表现出一定的关心和亲切相待，也毫无损失。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把戴高乐看成一个利己主义者、心胸狭窄的人和沙文主义分子。认为戴高乐的唯一愿望是夺取并保持绝对权力。罗斯福不愿把为了保卫国家主权和尊严而准备冒任何危险的戴高乐视为捍卫法兰西荣誉的勇士。在戴高乐的眼中，罗斯

福则是一个倨傲的人，有着大国优越感，希望由他扮演上帝角色，主宰法国命运。戴高乐同样也看不到罗斯福身上的军人和理想主义者的气质。二人谁也不能正确看待对方，这就进一步加剧了由于政治分歧而造成的困难。”

他们周围的人也没有起到和解作用。可以说，戴高乐在美国的死对头都是接近或者能够影响罗斯福总统的人。贝当派驻华盛顿大使馆的领导人为前凡尔赛市长。此人在美国有不少朋友，很受美国前驻巴黎大使威廉姆·布利特的推崇，在政界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生活在美国的法国知名人士和移民在造成戴高乐与罗斯福的不和上，确实起了作用。他们中间确有一些移民由于不了解情况，感情用事，心怀不满，或有个人野心，而损害自己国家的利益。

罗斯福从这些人身上获得的情报中得出结论，戴高乐只被国外流亡的极少数法国人承认，在伦敦指挥着一支很小的部队，武器、经费全靠英国。此外，罗斯福认为戴高乐性情高傲；难以相处，不断挑起纠纷，妨碍了他对维希的立场，更糟糕的是，在意识形态的冲突中，美国新闻界大多支持戴高乐，反对自己的总统，罗斯福对此也很恼火！

为了消除外界的误会，1942年4月1日，戴高乐发表了一篇演说，全面阐述了他的对外政策，同时对罗斯福的“不公正”态度，也旁敲侧击地进行了批评，他说：“不要认为战斗法国这个奇迹，只要一经形成就不要管它了……整个问题的基础是，只有在盟国愿意和战斗法国站在一起的条件下，战斗法国才愿意和盟国站在一起。”在直接谈到美国政府仍然和维希发生关系并和维希的代理领事进行秘密交易的时候，戴高乐严正指出：“对于民主国家来说，依靠那些破坏法国自由和想按照法西斯主义的模型或脸谱来改造法国的人，就是在政治上引用了为了怕雨淋而投入大海的可怜的傻子原则。”戴高乐进一步强调说：“当前整个法国问题是一个革命问题，不承认这一点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是被它的统治阶级和特权阶级出卖了的法国，开始要完成的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革命。如果自封的现实主义，在一次又一次的慕尼黑会议中，已经把自由引向深渊的边缘，而现在又继续压制热情，不肯改弦更张，那将是不能容忍的！”戴高乐最后说：“地位已经确定了。自由法国无论在公众的感情上或在法律的认可上，都成功地被认为不仅是法国的武装保卫者，而且是它的利益的监护人，这个结果是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得到的，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经过近两年的“曲折”的了解和“严肃的对话”之后，戴高乐与华盛顿的关系有了迅速的改善，1942年5月21日，美国新任驻伦敦大使约翰·怀南特在伦敦同戴高乐会晤，恭听他对开辟第二战场的见解。接着在6月1日又举行了一次会谈，艾登也参加了。戴高乐打电报给他的驻华盛顿代表阿德里安·蒂克西埃说，现在看来美国国务院的科德尔·赫尔和萨姆纳·韦尔斯已开始意识到他们对自由法国的态度是不现实的了。6月29日，英国外交大臣告诉戴高等将军，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改变它对法兰西全国委员会的政策。次日，怀南特与戴高乐共进晚餐，他表达了对将军的同情，并答应在美国尽力宣传将军的人格。

这时，丘吉尔正在华盛顿，他正竭力劝说罗斯福总统缓和他对这位自由法国领袖的态度。结果华盛顿于7月9日发表了一个公报，给戴高乐运动以某种承认，公报的全文曾于事前送交戴高乐，征求他的同意，斯塔克海军上将和博尔特将军被指派为美国政府的代表，与在伦敦的法兰西全国委员会协

商有关指挥战争的一切问题，美国方面承认戴高乐将军的贡献和全国委员会为维持法国的传统精神和制度所作出的努力。全国委员会“作为法国抗击轴心国的法国各种抗战力量的象征”，将得到一切可能的援助。公报同时载明，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一致认为——“它确信法兰西全国委员会也会认为——法国的政治前途只能在自由和没有强迫的条件下决定”。

戴高乐对这份公报表示满意，但是，他很快发现它的实际价值很有限，公报宣称，美国愿意同自由法国官员在他们各自管辖的领地上打交道，只要他们在那里行使着有效的职权，但它却只字未提非常重要的其他领地，特别是仍在维希控制下的法属北非。7月23日，戴高乐会见了美国陆海军将领总参谋长马歇尔上将、海军总司令金海军上将、美国驻欧陆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中将，告诉他们盟国在法国领地上登陆时自由法国能够作出的贡献。戴高乐发现他们沉默不语，而且已被“美国心目中的一个新的、称之为世界大战的庞然大物弄得不知所措”。

事实上，英国和美国都还没有为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作好思想上或军事上的准备，更不用说进军法国了。他们的注意力正转向法属北非，并且对戴高乐将军缺乏信赖之意，国务卿赫尔对自由法国“解放”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的事一直耿耿于怀，忿忿不已。当美国在太平洋的司令官帕奇将军到达新喀里多尼亚时，又出现了新的事件。当地的政客们乘美国人在场的机会企图争夺权利，戴高乐的行政长官达尔让利厄海军上将一度被迫到丛林中忍辱避难。1942年2月28日，美国发表声明承认太平洋诸岛上的领地“是在设立于伦敦的法兰西全国委员会的有效控制之下”，整个事件才令人满意地结束了。但是，美国人只有在他们别无他法时才与自由法国打交道。

1942年夏天过去了，戴高乐将军越发注意中东和北非的局势。卡特鲁向他电告，法英两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不断发生争端。戴高乐决定亲自去看看，他亲临前线也许能给他的战斗部队带来些安慰。7月中旬，他把“自由法国”改名为“战斗法国”，从此标志他现在不仅得到了海外的，而且也得到了国内的抵抗者的忠诚。7月底，戴高乐果然把三大抗战组织的领导人召集到了伦敦。27日，他改组了全国委员会。已经到达英国的法国“社会主义领导人”安得烈·菲利普受命负责内政；成功地出使过墨西哥和一些操西班牙语的美洲国家的雅克·苏斯戴尔被任命为情报委员。全国委员会的事务现在已是井井有条，戴高乐的影响比过去更大了。戴高乐认为他可以离开伦敦了。

临行前，戴高乐拜访了英国首相，双方就英美盟军使用马达加斯加岛的问题进行了一场不愉快的谈话。戴高乐要他注意英美对法兰西帝国——也许在最近的将来——和法国本土上的某种做法所引起的对于“我们联盟的危险”。首相认为，双方争论的实质在于，自由法国关心的主要是维护法国对那些领地的统治权，而英国关心的“主要是在于进行战争”。然而戴高乐并不这样看问题。对他来说，真正的问题是他怀疑英美对法国托管下的领土有所图谋。

丘吉尔对戴高乐的质问十分恼火。他暴躁他说，“你不是我唯一的盟友！”接着又嚷道：“我是法国的朋友！我过去一直希望，现在也希望，伟大的法国有一个伟大的军队。这对于和平、秩序和欧洲的安全都是必要的。我从来也没有任何其他政策！”

“你说得很对！”戴高乐说，“在维希的停战协定之后，你的长处是一直掌握看法国这张牌。这张牌的名字叫戴高乐。现在不要失掉它！如果失掉就大可笑了！因为现在你的政策正日渐成功，而自由法国已经成为法国抗战

的灵魂和支柱。”

他们也谈到了罗斯福和丘吉尔对戴高乐的态度。丘吉尔说：“不要急躁！看看我是怎样能屈能伸，转来转去的。”

“你能那样做，我是办不到的！”戴高乐说，“因为你是在一个巩固的国家基础之上，有团结起来的民族，统一的帝国，庞大的军队。但是我！我的资源在哪里？可是我，你知道，我是对法国的利益和命运负责的，这个负担太重了。我没有条件低头。环境也不允许我低头！”

谈话结束时，丘吉尔对戴高乐的态度表示理解。他说：“我们前边还需要克服的障碍。但是，有一天我们将去法国，也许就在明年。无论如何，我们一定回到法国去！”丘吉尔伴送戴高乐一直走到大街上，并一再重复：“我一定不会离开你，你相信我好了。而且我也尽力说服罗斯福改变对你的看法。”

珍珠港事件后，在日本进攻的压力下，美国同自由法国的军事合作，也较前加强。法国在太平洋上的领地——新喀里多尼亚群岛、马贵斯群岛、吐摩图群岛。社会群岛……都变成了盟国的战略据点，戴高乐决定，在军事上先满足美英的要求，唯一的条件是对方必须尊重法国的主权和在当地的权力。1月15日，美国国务院给自由法国在华盛顿的代表团一份备忘录，明确了美国准备承担的义务，内容是关于“尊重大太平洋上所有法国岛屿的主权；美国在各岛上建立的基地和设备将留下来作为法国的财产；如果战后美国基地仍旧保持，则法国有与美国共管的权力”。1月23日，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打电报给戴高乐说：“美国和英国的参谋长，鉴于新喀里多尼亚的重要性，想依照1月15日备忘录中规定的条件，采取加强防御的步骤。”赫尔谦和地表示：“希望法国高级专员过去所给予的友好的协助和合作，在将来仍继续下去。”

随着这些动议之后，双方进一步采取了具体的措施。2月25日，戴高乐通知达尔让利厄将军：“太平洋美国陆战队司令帕奇将军已奉命到努美亚，应和他以最友好的精神直接协商统一指挥问题。”3月6日，法兰西民族委员会被邀请派代表出席在伦敦设立的“太平洋战争委员会”，同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以及美国的代表一起交换情报和讨论作战问题。3月7日，美国政府请求在吐摩图群岛和社会群岛建立基地，戴高乐答应了。这样，战争迫使美国 and 自由法国的关系的日趋接近，双方在太平洋战区的合作也日益加强。

但是，美国和英国在北非谋划的“火炬”战役却对戴高乐“保密”。尽管如此，某种军事行动正在计划中的迹象已越来越明显了，丘吉尔在开罗时，已任命亚历山大将军担任总司令，不久，蒙哥马利将军接任第八集团军司令。坦克和飞机的集结从未中断。8月27日，戴高乐致电他在伦敦的委员会，宣布了他的结论：美军已决定在法属北非登陆，以配合英军从埃及发动的攻势。欲知“火炬”战役的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七章 “火炬”前后

火炬战役多计谋，英美重用老吉罗；

五星上将无济事，达尔朗君遭枪祸。

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三年头的春天，大局已定。交战双方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苏联战场开始反攻，全世界瞩目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正在取得胜利。德国已成为强晋之末，意大利已经一蹶不振，太平洋方面，日本的侵略已被阻遏，而中国的抗战力量正在大大加强，在北非，战局也开始好转，盟国已经不再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而正酝酿着一次大规模的攻势。

综观世界战局，全球性的反攻形势即将成熟。但在此时此刻，戴高乐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受人拥护的伙伴中我是相当孤立的，在富翁当中我是个穷鬼。在这种情况下，我满怀希望，但也万分忧虑，因为在未来的战斗中，无论如何总应该有法国。法国当前的中心问题，不仅是能不能把敌人赶出国土的问题，而且是决定民族与国家的前途问题。假使法国一直衰败下去，本身的威信将丧失殆尽，官的独立自主也就不存在了。它将从平静的海面不停地沉沦下去，从受敌人的奴役变成盟国的附庸。相反地，如果它能在恢复统一的基础上东山再起，那就什么也不会损失。只要战争期间法国是个交战国，而又团结在一个政权的周围，它的前途就有保障。”

然而，团结在什么样的政权周围呢？在戴高乐看来，当然不是维希政权。在法国和全世界人民面前，它是一个投降政府。在法国的灾难中，群众再也不相信那不久前由于失败而垮台的政治体系。最有代表性的人在这点上比任何人都坚定，有些人还持保留态度，也有一些人对维希那只破船还抱有希望。

就在戴高乐考虑法国前途的时候，在苏联红军咄咄逼人的攻势下，罗斯福和丘吉尔也在着手考虑他们的作战计划。对美英来说，在欧洲登陆的“霸王”计划，与在北非登陆的“火炬”计划，两者相较，无疑后者对他们好处更多一些，如果美英于1942年在西欧登陆作战，那就要同法西斯军队作殊死的斗争，势必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和牺牲，这是英美所不取的。而北非和西非是法国维希政府的殖民地，这时维希政府同美国有外交关系，在那里登陆风险要小得多。

从殖民利益考虑，英美也各有打算。对英国来说，一旦占领北非，盟军可以威胁隆美尔的后方，解除埃及之围；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军队赶出北非，可以确保直布罗陀的安全，恢复地中海航道，维护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进而掠夺这些殖民地，特别是中东的石油。英国工业巨头对此十分感兴趣。对美国来说，罗斯福最怕德国占领西非、北非，然后东进与从苏联高加索南下的德军会师，进而在印度同日本军队携手；西边从达喀尔通过大西洋中部最短的航道进逼巴西，威胁美国的安全。所以美国急于消除这个威胁。另一方面，美国也想控制西非、北非和地中海，窥伺中东。1942年7月15日，即霍普金斯等赴伦敦前夕，罗斯福对这位心腹交底说，如果进攻西欧的计划不能实现，那么可考虑的是北非和中东。丘吉尔提出的“火炬”有很大的优点，“它将使我们获得西非，并为最后控制地中海奠定基础”。在这里，美国的目的，就是趁法兰西帝国之危来扩大美国的影响。因此，这一计划对戴高乐实行“高度保密”。

按着1942年7月份美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开始在伦敦拟制的“火炬”作

战方案，经过反复磋商，9月20日经罗斯福和丘吉尔最后批准，“火炬”方案确定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和阿尔及利亚的奥兰、阿尔及尔三处同时登陆。参加“火炬”作战的美英远征军共有13个师，650艘军舰和运输船。首批登陆的部队为7个师，共约11万人。此外还有几个主降营将参加这次行动，其任务是占领敌防御纵深内的机场和要地。这次登陆的空中保障，将使用1700架飞机，其绝大部分都驻守在直布罗陀要塞。双方并确定，由美国艾森豪威尔将军担任这一战役的总指挥，英国亚历山大将军担任副总指挥。

即将开展的“火炬”战役，将戴高乐卷入到一个异常错综复杂的政治漩涡中去。尽管起初各方面的情况都于他不利，特别是罗斯福玩弄只顾政治成功而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式”的把戏，但戴高乐终于取得了他政治生涯中最惊险的一次胜利，在这场政治搏斗中，法国方西主要出场的人物有吉罗将军、达尔朗海军上将和戴高乐本人，经过一番较量，戴高乐击败了地方上所有的反对势力，排除了美国特使罗伯特·墨菲的外交干涉和各种计谋，作为法国无可非议的代表出现在舞台上。

战役开始之前，也就是1942年这年秋天，戴高乐虽然猜测到盟国的军事意图，然而对于盟国的计划和密谋却一无所知。他觉察到，打破他孤立状态的关键在于罗斯福。他已派他的特使达斯蒂埃到过华盛顿，但成效甚微。现在他决定派第二个特使——已在伦敦参加他的阵线的社会党的抗战运动领导人安德烈·菲利普，让他带去一封给美国总统的私人信件。这封信开门见山，谈到一些根本问题。他说，法国承受了1914—1918年战争的主要负担，虽然它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是却已元气大伤，疲惫不堪了。法国在战略上和策略上的错误，以及缺少盟国的支持，导致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使法国重新投入战争确有必要。他本人毅然承担起这个责任。

戴高乐在信中说，他不是一个政客，当然不赞成他和他的追随者介入政治，如果这意味着参加党派之争、但如果这意味着捍卫法国的利益，为了法兰西而同敌人作战，那么他确实已参与了政治。他驳斥了认为他对战后法国个人野心的种种流言蜚语。有人认为他想成为独裁者，或认为法国人民竟会容忍独裁，这些想法都是无稽之谈。美国总统在法国享有无与伦比的崇高威望。但是美国总统应该与哪一个法国打交道呢？昨天的法国？维希的法国？还是明天的法国，人们尚未看到其形状的法国？不，他申辩道：战争期间算得上法国的唯有现在的战斗的法国。戴高乐要求罗斯福“为了我们共同战斗的神圣事业的利益，全面地直接地审查美国和战斗法国之间的关系”。这封10月26日签署的信虽然及时交到了，但罗斯福总统并没有给予答复，原因是，此间他已经物色了一个名叫亨利·吉罗的法国人作为他执行北非政策的工具。

亨利·吉罗是五星上将，军阶高于戴高乐。他的军人生涯非同凡响，并且由于众所周知的“无政治野心”而为美国人所赏识。他挺拔魁梧，戴高乐在梅斯时是他的部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被德国人俘虏过，但成功地逃跑了。而今他又故技重施。尽管已63岁，他还是用绳索逾墙逃出了柯尼斯坦因监狱的城堡，并于1942年的4月到了瑞士。冒着纳粹用十万马克的悬赏要他首级的危险，他到了法国的未被占领区，受到了贝当元帅的召见，并同他进行了“诚挚的谈话”。后来维希政府的总理赖伐尔试图说服他向德国人自首，被吉罗予以拒绝。最后他得知，如果希望德国人给他自由，他必须签署一项效忠于贝当元帅的声明。美国人决定和他打交道的时候，并不了解这

一点，然而维希选择了适当的时机广播了吉罗给贝当的信。信的全文如下。

为了消除你对我的态度的种种疑虑，继我们上次谈话之后，我想表达我对你的耿耿忠心。承蒙你偕同政府首脑向我阐明了你们所奉行的对德政策。我完全赞同你。我以军官的名誉向你保证：决不做任何可能妨碍你们和德国政府之间关系的事情，也决不妨碍达尔朗海军上将和皮埃尔·赖伐尔总理在你的最高领导之下去执行由你授予他们的任务，我的过去就是以保证我对你的忠诚，我请求你，元帅先生，接受我忠贞不二的保证。

且说戴高乐，在得知吉罗将军逃出柯尼斯但因德国监狱并于 1942 年 4 月来到瑞士之后，不失时机地公开赞扬了这位将军，并派密使向他提出了为了法兰西的利益而合作的建议，此举使戴高乐赢得了声望。事实上，他给吉罗指出的前景是在未来解放法国的战斗中，统率一支统一的法国军队。然而，吉罗对戴高乐这个提议却不予理睬。他认为，凭着他的资望和上将的军阶，只要在北非一露面，所有的人就会向他靠拢，向他靠拢的人无疑也包括戴高乐，何等狂妄啊！

当时“火炬”正在暗中等划，为了使这一战役顺利进行，美英两国除在军事上作好充分准备外，还积极开展政治攻势，争取维希法军归顺，企图“兵不血刃”地占领“法属北非。因此，物色一位有“威望”的法国人显然是很必要的。而在美国人和英国人的心目中，再也没有谁比吉罗将军更合适的了，这位“斗志坚强”的高级将领，在德国惊险而大胆的越狱奇迹已经传为美谈。丘吉尔在 1937 年参观马奇诺防线时曾在梅斯见过吉罗一面，当时他负责指挥马奇诺防线的主要部分，吉罗曾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越狱后在德军后方的惊险事迹告诉过丘吉尔。丘吉尔也越过狱，他们两人有共同的经历。如今，在他当上了集团军司令官以后，他又重演他青年时代的英勇事迹，这事迹甚至更为轰动。奇怪的是，早在 4 月间，当罗斯福的“秘密的战争婴儿”——“火炬”作战计划尚未诞生时，丘吉尔就给总统发去下列电报：“我对古罗将军越狱到达维希一事极感兴趣。此人在实现你所寄予厚望的事情上可能起决定性的作用。请将你所知道的情况见告。”

如今，在 6 个月之后，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极为重要了。美国人已和吉罗将军举行了秘密会谈，并拟定了计划，在决定性时刻把他从里维埃拉送到宣布罗陀。他们对“要人”寄予很大的希望，“要人”是吉罗的代号。丘吉尔在 11 月 3 日致电罗斯福说：“‘要人’来电说，他已决定立即前来，并要求派一架飞机将他送往直布罗陀。为安全计，艾森豪威尔已复电劝他乘坐一艘在美国舰长指挥下的英国潜艇，该艇正在海岸附近等待。”在海上饱尝虚惊后，吉罗和他的两个儿子被安全地送到直布罗陀盟军司令部。

在此期间，英美的庞大舰队已驶近目的地。在北非登陆是西方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一次大规模的进攻性的战役。盟国最初计划于 1942 年 10 月在北非登陆，由于艾森豪威尔坚持要作好准备工作而推迟了一个月。“火炬”行动不只是对英美军事政治同盟效率的第一次考验，对艾森豪威尔来说也是严峻的考验。

10 月底，差不多拥有 900 艘舰艇的巨大舰队驶离英国海岸。这支舰队要航行 1900 海里，10 万名士兵走上了新的战斗航程，10 月 5 日，载着艾森豪威尔的“飞行堡垒”终于把他送到了直布罗陀。盟军指挥部设在这里，丘吉尔打电报给他说：“直布罗陀的岩壁掌握在你手里，是不会发生危急的。”不日，他们就要向“法属北非”发动进攻了。

“法属北非”，包括法属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法国投降后，维希政府在“法属北非”约有20万军队，500架飞机。在法国土伦和法属北非各港口，尚有4艘战列舰、12艘巡洋舰、40艘驱逐舰、20余艘潜艇和其他船只。维希政府及其法属北非的军政首脑，与美国国务卿赫尔有联系。他们中有些人不愿站在德国一边打仗。魏刚、吉罗、朱安等法军将领，与美国驻阿尔及尔的总领事墨菲关系也很密切。魏刚曾向墨菲表示：“假如你仅仅带一个师来，我将向你开枪；假如你带20个师来，我就要拥抱你了！”

11月7日，艾森豪威尔将军根据罗斯福总统的指示，把在法军中“享有盛誉”的吉罗将军接到直布罗陀，想利用他的影响使北非的维希法国倒向盟国。正在这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维希政府外交部长兼法军副统帅达尔朗海军上将巡视北非回国后，他的儿子突然得了小儿麻痹症，在阿尔及尔住了医院。由于病情危急，促使这位海军统帅于11月5日飞回北非。因此，正当英国即将大举进攻之际，他恰巧在阿尔及尔。这是一个奇怪而麻烦的巧合。罗伯特·墨菲希望他能在盟军登陆前离开。可是达尔朗由于关怀他儿子的病，在阿尔及尔多逗留了一天，住在一位法国官员费纳尔海军上将的别墅里。

近几个星期以来，盟军在阿尔及尔的主要希望寄托在法国军事长官朱安将军身上。他与墨菲的关系一向很密切，但是墨菲并没有告诉他具体的登陆日期。

11月7日午夜稍过，墨菲访问了朱安，告诉他登陆的时刻已经来临了。一支强大的英美联军，在占绝对优势的海空军的支持下，即将开到北非，几小时之内即可登陆。朱安将军闻讯不禁大吃一惊。他原以为他可以控制阿尔及尔的全局。但是，他知道，由于达尔朗在此，他的职权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他手下只有几百名热情奔放的青年。他知道得很清楚，军政府的一切领导大权都已转移到这位身为维希政府副元首的海军上将手中。只要达尔朗在此，一切手握实权的效忠于维希的法国人，决不会再听从他的命令。

经过商议，墨菲与朱安决定打电话给达尔朗，请他马上到他们这里来。在凌晨还不到两点钟的时候，朱安将军打电话唤醒了达尔朗，声称有要事需要面商，当达尔朗听到了英美联军即将登陆的消息后，他暴跳如雷，气得满脸胀红。他说：“我早就知道英国人是愚蠢的，但是我一直认为美国人要比英国人聪明一点。现在我开始认为美国人所犯的错误之多也不下于英国人。”达尔朗对英国人的反感是人所皆知的。长期以来，他一直投靠轴心国。

1941年5月，他不但同意把达喀尔供德国人使用，而且同意德国人假道突尼斯向隆美尔的军队运送给养。魏刚将军当时制止了这一叛逆行为，因为魏刚将军当时是北非负责人，他说服贝当拒绝了德方的要求。同年11月，德国人认为魏刚不可靠而将他免职。现在事过境迁，苏联红军节节胜利，其他反法西斯战场也有新的起色，希特勒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达尔朗的态度虽稍有改变，但他依然是彻头彻尾地效忠于卖国投敌的贝当元帅的。因此，尽管墨菲和朱安百般劝说，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他也只是答应发电报请求贝当允许他自由行事。一连串无情的事件，使他陷于极端困难的处境。

在战役开始之前，为了争取维希政府和法属非洲各国领导人对“火炬”行动的支持或守中立，罗斯福总统曾分别给维希首脑贝当、西班牙头目佛朗哥、葡萄牙总统卡蒙纳将军、阿尔及利亚总督夏泰尔以及摩洛哥和突尼斯的统治者发出了字斟句酌的电文，要求他们为盟军提供合作。最有意思的是，

在草拟致贝当的信时，丘吉尔曾提醒罗斯福，贝当“利用自己的名望给我们的事业所带来的损害，是任何地位稍次的人物都做不到的，对他不能太仁慈了”。但是，罗斯福还是以反法西斯大局为重，给他写了一封热情的规劝的信，信中仍称他为“法兰西共和国元首”。希望贝当和盟军合作，解放北非，清算德意法西斯的罪行。“我现在正把一切情况向北非的当局详加说明，呼吁他们为抵御轴心的威胁而同我们进行合作。我的明确目的是支持并援助法国当局和他们的政府机构。这就是这些美国军队眼下要达到的目的。”罗斯福在信中进一步指出：“我无需告诉你，最终的和更大的目的就是将从轴心的枷锁下把法兰西和法兰西帝国解放出来。这样做，我们也就自然地保证了南北美洲的安全。我也无需一再向你宣称，美利坚合众国不想占领别人的领土，而且永远记住我们之间的历史性友谊和彼此之间多方的援助。”

出乎意料的是，罗斯福这封10月15日的电报发出后，竟受到贝当这个不识时务的无耻之徒的敌视。他马上回复说：“我今天晚上接到你的军队侵略北非的消息时，感到不知所措，甚为悲哀。”

……法兰西和它的‘光荣’存亡攸关。我们受到袭击。我们的天职是保卫自己。这就是我所下的命令。”这样，贝当为了所谓维希政府的“光荣”，就与盟军展开了一场不自量力的搏斗。

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戴高乐在密切注视着盟军在北非的行动。自1942年11月7日黎明，他就约略知道北非登陆已经开始。因为英美电台叫嚷：“罗伯特来了！”“罗伯特来了！”罗伯特是墨菲的教名，所以他毫不怀疑这是远征军的代号。中午时分，戴高乐被英首相召见，来到唐宁街十号。丘吉尔和艾登友好地迎接了他，但显得有些尴尬。丘吉尔立即解释说，在海上和空中，英国人占较大的比重，但在地面上，美军人数超过英军。事实上这是美国人的一场表演，指挥官是艾森豪威尔。遗憾的是，美国人坚持要把自由法国排斥在外。“我们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丘吉尔说，“不过你可以放心，我们决不抛弃与你签订的协议。自1940年6月以来，我们就一直答应支持你。”这位首相还情绪激动地补充说，“在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你曾和我们站在一起；既然现在前景越来越光明了，我们决不会抛弃你！”

丘吉尔告诉戴高乐，美英商议由吉罗将军指挥北非的法国军队。戴高乐听了表示赞扬和良好的祝愿。但在军事方面，他认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必定要使用突尼斯的巨大海军基地宾泽特，而盟国却没有打算在那儿登陆，对此他表示惊讶。再说他本来是可以派柯尼希师在那儿登陆的。丘吉尔和艾登对他表示赞同，但是提醒他那是美国人的责任。

“美国人现在在非洲登陆，这件事本身是令人满意的。”戴高乐说，“你们英国和我们自由法国在非洲共同作战已经有两年了。对法国说来，我看非洲可以重建一支陆军，或者重建一支海军为解放法国而战。吉罗将军是个伟大的军人。我祝愿他的尝试成功。遗憾的是盟国怂恿他与我不和，否则我不仅预祝他成功，还能给他帮助。迟早我们会相互谅解的，盟国的干涉越少，我们的合作就会越好。至于说现在所进行的战斗十分激烈，我丝毫不感到奇怪。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有许多去年在叙利亚同我们扛过仗的军人，是你们不顾我们的警告把他们放走的。另外，美国人在北非要玩弄利用维希反对戴高乐的把戏。我一直这样想，到时候他们必然要还这笔帐。事实上他们正在付这笔代价，当然我们法国人也应该付出代价。但是，在我们军人的灵魂深处有正义观念，我相信这场战斗不会打很久。然而，不管时间多么短，

德国人是要来的。”

然后，丘吉尔问戴高乐对战斗法国和北非政权之间的关系有什么打算，还问他是否知道达尔朗也在阿尔及尔？对此，戴高乐回答说：“在我看来，只有统一起来。这就是说有些关系应当尽早建立。在阿尔及尔的维希政权及其代表人物必须下台，因为整个抵抗运动不允许他们存在下去。如果达尔朗要在北非为王，那就没有取得协议的可能。”

1942年11月8日晚上，戴高乐向法兰西全体军民，向法属北非的侨民和军政人员发表了广播演说。他说：

法兰西的盟国，已开始把法属北非投入解放战斗里来了。他们正在那儿让大批军队登陆。这样，就使我们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成了解放法国的前进基地。……

战斗法国已经使法兰西帝国的一部分重新参加了神圣的战争，它一直希望，一直想使其他的一切地方都这样做。其他的一切地方！特别是指法属北非来说的，我们从前在那里曾经获得那么多光荣，现在那里又有着大批的部队。

法兰西的将领、士兵、海军、空军、公务人员们、北非的法国侨胞们，起来吧！帮助我们的祖国！毫无保留地与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的法兰西特别命令你们，不要考虑什么名义和形式，只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拯救祖国！所有战斗法国的成员，赞扬、欢迎和欢呼一切不怕敌人和卖国贼、敢于重新站立起来的人。不要听信奸细的谣言，说什么我们的盟友，将要夺取我们的法兰西帝国。

前进吧！这是伟大的时刻。正是施展聪明和勇敢的时候。敌人到处都在动摇和屈服。北非的法国人，我们希望通过你们，把我们从地中海这边逆到对岸，重新回到战斗的行列中去，这就是说要依靠法国人取得胜利了！

北非战斗中、法、英、美伤亡惨重的消息使戴高乐闷闷不乐。11月9日午后，他在伦敦召见了美国代表斯塔克海军上将。战斗中的情况使海军上将感到痛心，他不相信竟会发生这样的战斗。他说：“艾森豪威尔也感到吃惊和不安。”可是戴高乐还是想采取行动。“我要派一个使团到阿尔及尔去。”他说，“我要求美国政府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使团到达目的地。”斯塔克答应作必要的安排。次日，戴高乐写信给丘吉尔，请求他从中斡旋，以寻求罗斯福的支持，并命令普利文、比约特、达斯蒂埃和弗雷内准备起程。

11月11日，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日那天晚上，成千上万的“在大不列颠的法兰西人”，聚集在阿伯特大厦倾听戴高乐将军为法兰西全国人民的团结而发出的慷慨而激昂的呼吁。

这时，一种奇妙而糟糕的局面在阿尔及尔发展着。在盟军占领了阿尔及尔之后，吉罗将军来到这里，发表了一篇广播演说，号召北非法军停止抵抗，但毫无作用。在北非的维希法国一部分上层人士中，特别是军政首脑们，仍然把贝当视为偶像，而达尔朗又被视为贝当的直接代表，北非的军官都是按他的指示办事。据艾森豪威尔将军回忆：“克拉克将军拍回电报说，没有达尔朗参加，就不可能达成和解，而他的这种观点也得到当时在阿尔及尔的吉罗将军的支持。”同时，在艾森豪威尔离开英国之前，丘吉尔曾对他说：“如果我能见到达尔朗的话，尽管我极恨他，但我如能匍匐在地上，爬行一英里而使他把舰队带到盟军这边来，那我也欣然照办。”此外，从军事方面讲，盟军也力求避免“耗费大量鲜血，造成无数痛苦”。因此便同达尔朗达成停

战协定。

11月10日，达尔朗发出停火命令。12日，阿尔及尔以西的战斗全部停止了。

11月中旬，盟军又继续东进，占领了突尼斯境内的一些地方。

德国人截获了达尔朗给贝当宣布停火的报告。在德国人的压力下，贝当立即宣布不承认达尔朗有此权力，并解除他的职务。这个不识时务的法国元帅，还宣布与美国断绝外交关系，抵抗英美入侵，与德国进行全面合作。因此，当达尔朗在11月11日下午下令土伦舰队一旦有被德国人俘获的危险就立即出港时，法国地中海舰队司令德拉博德海军上将，根本不予理睬。

11月27日，德国人开始了夺取这支舰队的行动，德拉博德立即下令将73艘舰只沉没在港底，其中包括一艘战列舰，两艘战列巡洋舰，7艘巡洋舰，29艘驱逐舰和鱼雷快艇以及16艘潜艇。戴高乐在伦敦听到这个消息时颓丧悲愤已极，就是这个德拉博德，听到盟国登陆的消息时，居然想出动他的舰队去攻击盟国的海上护航运输船队。

为了进一步发挥达尔朗的所谓“作用”，经罗斯福授意，11月13日，盟军同达尔朗达成了最后协议，即“北非的法国军政官员与和平居民同盟军合作，盟军承认达尔朗管理法属北非的行政事务，吉罗将军指挥北非的所有法国军队”。当达尔朗协定的实情公诸于世后，在英国国内，在自由法国内部，引起了普遍的不满。丘吉尔也感到他周围的舆论日益激昂。许多人认为，这是一桩卑鄙龌龊的勾当，而其对象“乃是一位与我们不共戴天之仇敌”，因此在他们心目中，在北非登陆的胜利，还有阿拉曼战役的胜利，已因此黯然失色。

11月16日，戴高乐拜会了丘吉尔和艾登，告诉他们，与达尔朗作交易的决定并不像他们所辩解的那样，在战略上是站不住脚的。丘吉尔忙解释说，“英国只是因为这是权宜之计才同意的。”

“我了解英国的立场，”戴高乐说，“但我的看法是不同的。你们援引了一些战略上的理由，但这正是战略上的错误，正是与这次战争的道义性质相矛盾的。我们不是处在腓特烈向维也纳朝廷行贿夺取西里西亚的18世纪，也不是利用米兰的警官或佛罗伦萨的刺客的意大利复兴时期。况且，后来人们也没有选他们出来充当解放了的人民的领袖。今天，我们是以人们的生命、鲜血和痛苦进行战争的。”说到这里，戴高乐把法国来的电报拿给丘吉尔和艾登看，他说：“这些电报反映出来的舆论令人震惊。你们要想一想这种冒险所带来的后果。如果由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缘故，法国一旦看到它的解放就是达尔朗，那未从军事观点来看，你们可能打胜仗，但在道义方面你们是要吃败仗的。”

与此同时，戴高乐命令法兰西全国委员会发表了一项公报，声明与盟国在阿尔及尔的安排断绝关系。戴高乐在会见丘吉尔和艾登之后，留下来和他们共进午餐。谈话的气氛是紧张的，虽然英国首相竭力安慰这位倔强的将军说：“事态很可能朝着对你有利的方向转化，吉罗在政治上已经完蛋了，达尔朗迟早也会有同样的下场，你就是荣誉，只有你一个人能站得住。”丘吉尔劝戴高乐忍耐一点，“美国人到时候会来找你的，因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余地”。

在这次会见后的第二天，11月17日，丘吉尔致电罗斯福说：

“我应该让你知道，与达尔朗所签的协定引起了强烈的愤怒。我越考虑

这个问题，就越相信它只能是一种仅仅由于战事急迫而不得已才采取的权宜之计。人们会以为我们愿意和当地的吉斯林之流妥协，这种看法不仅在全法国而且会在全欧洲给我们的共同事业带来不良的政治影响，我们对此决不能忽视。达尔朗声名狼藉。正是他，提拔他的下属来指挥法国海军，从而使法国的海军对我们怀有恶意。正是他，派法国海军到卡萨布兰卡附近的海面与你的舰队作战，才使一些美国海员送了命。此事恍如昨日，如今为了权位，达尔朗又倒向我们这边了。和达尔朗签订一个永久性的协定，或在法属北非成立一个达尔朗政府，这是无法为千百万普通百姓所理解的，而他们的一片至诚之心就是我们的力量。”

根据丘吉尔电报中反映的情况，罗斯福于11月18日，也就是在收到英国首相电报后的第二天，发表了一项公开声明。罗斯福代表盟国强调指出：“未来的法国政府决不能由法国本土或海外的任何个人来成立，它只能在法国人民被同盟国的胜利所解放后，由法国人民自己来成立。目前在北非和西非所作的安排，仅是由于战事紧迫而不得已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罗斯福的声明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人民的忧虑，同时也使丘吉尔感到宽慰。

11月20日，总统还写信告诉首相说：“昨天我私下对报界讲了一个流传在巴尔干的古老的希腊教会的格言，因为它似乎适用于我们目前的达尔朗—戴高乐问题，这句格言是：“我的孩子们，在大难临头之际，你们可与魔鬼同行，直到你们下桥为止。”

罗斯福所提到的“权宜之计”和“与魔鬼同行”，使达尔朗忐忑不安，他开始感到自己已处于日益孤立的境地。他在给克拉克将军的信中写道：“由各处获得的消息，都证实了这样一种看法，即我仅是一个被美国人挤干后将要扔掉的柠檬。”他还表白说，他并不计较个人地位，也并非出于骄傲、野心或有什么打算，而是因为他在他的国家秉居要职而有责任这样做。

达尔朗虽然口口声声忠于他的祖国，要真诚地与盟国合作，但他却继续为非作歹，不听忠告。达尔朗继续任用维希官员，甚至包括那些同纳粹密切合作而声名狼藉的人。另一方面他把阿尔及尔的戴高乐分子关入狱中，封闭了他们的《战斗报》，这就更加激起法国人民对他的仇恨。自由法国、地下抵抗运动以及英美报刊群起而攻之。达尔朗短命的统治即将猝然告终。圣诞节前一天，他在走上通向他的办公室的台阶时，被一个叫博尼埃·德拉夏佩尔的青年开枪击倒，不到一小时这位海军上将就死了。刺客认为，为法国人民铲除一个声名狼藉的领导人是他的责任。但根据吉罗的命令，他立即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并于12月26日被枪决。这位英勇的青年，当时年仅20岁。

达尔朗之死除掉了戴高乐将军道路上一个主要障碍。但其直接后果是使一个业已混乱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化了。

12月27日，戴高乐已经收拾好行装，准备应邀去华盛顿访问。在去机场的途中，突然接到通知：由于暗杀达尔朗所产生的后果，罗斯福和丘吉尔已决定取消他的访问。戴高乐从机场回来，立即电告吉罗将军：“达尔朗被刺是一个警告，现在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政权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了。”他建议尽快在法国领地阿尔及尔或乍得与吉罗会晤。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八章 会见吉罗将军

美国总统伤脑筋，偏听偏信害死人；
强迫吉罗作新郎，新娘反对难成婚。

且说达尔朗被刺身亡后，在美英支持下，吉罗将军作为达尔朗的继承人，担任法属北非高级专员和总司令。

12月27日，丘吉尔提醒戴高乐，即使华盛顿把整个法属非洲都交给吉罗，也不要做任何反对美国政策的事情。

12月28日，戴高乐向吉罗致意，并再次呼吁战斗的法国人团结一致，第二天，12月29日，吉罗被迫作出了这样的答复：“鉴于达尔朗被刺所引起的情绪，我认为当前时机不利于我们之间举行会谈。”

戴高乐决心利用达尔朗之死所造成的有利形势，大力宣传战斗法国的政策，并扩大其影响。1月2日，他发表广播讲话，呼吁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建立临时中央政府。他说：“法属北非和西非内部的混乱局势日趋严重。这是由于法国政权在这里的基础并不巩固，在维希政权垮台后，就出现了一阵混乱。战斗法国组织起来的富有热情和久经考验的强大民族力量，虽然使法兰西帝国大部分领地投入战斗，重新回到共和国的怀抱，但这个力量在法国这块属地上还没有真正体现出来。”戴高乐在叙述了国内外当前形势后，进一步阐述了他呼吁建立中央临时政权的必要。他说：“12月25日，我得到民族委员会和帝国防务委员会的同意，向吉罗将军建议从速在法国领土上会晤，共商大计，以争取实现这个目标。”

同时指出，这个中央政权必须“以全国统一为基础，以战斗精神和解放精神为鼓舞力量，以共和国的法律为依据”。他认为，法兰西的形势以及战争的总形势，都不容许我们再有任何迟延了。

戴高乐的声明以及这个声明在国内外产生的广泛影响及群众的强烈支持，都击中了华盛顿政府的痛处，使罗斯福和他所支持的吉罗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在各方面的压力下，1月6日，吉罗又向戴高乐发出第二封信，原则上表示同意和戴高乐在阿尔及尔举行会谈。这次没有再提达尔朗之死所造成的不利气氛，但又借口“早有约会”，说在1月底前不可能确定谈判的具体日期。为此，戴高乐非常生气，他说：“早在1942年12月25日我就建议与你举行会谈，使我遗憾的是，你由于早有约会而延至今年1月底举行。我要坦白地告诉你，关于实现法兰西帝国的统一以及把它的力量和全国抵抗运动的力量结合在一起的迫切性，民族委员会和我个人跟你的见解不同。”

当时国际形势发展很快，从1942年11月以来，盟军连续取得重大胜利。蒙哥马利的部队在阿拉曼突破了隆美尔的防线。这就打开了通往的黎波里的道路。一个月以后，德军第六集团军被围困在斯大林格勒。纳粹在东线总崩溃的迹象已开始出现。面对着苏联红军节节胜利，全面反攻的情况，英美十分焦急。下一步是向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还是经由西西里岛和撒丁岛登陆，进攻欧洲的“软下腹”？英美仍在举棋不定。在此情况下，在最高一级进行磋商看来是必要的。可是由于苏德战场上正进行殊死战斗，斯大林脱不了身。然而，英美首脑却没有理由不会晤。为了协调下一步的军事行动，罗斯福和丘吉尔决定把会谈地点设在摩洛哥濒临大西洋的城市卡萨布兰卡，在安法郊区作了舒适的布置。

1943年1月12日，丘吉尔到达那里。两天后，罗斯福也到了。列席这

次会议的还有罗伯特·墨菲和英国新任负责中东事务的国务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

法国问题对美英来说仍是一个伤脑筋的问题。罗斯福对戴高乐不感兴趣，对这位将军怀有很深的偏见，而他所扶植的吉罗又缺乏“政治头脑”，对吉罗的表现又不尽满意。特别是阿尔及尔的混乱日趋严重，迫使美英不得不采取行动。罗斯福建议，吉罗和戴高乐在美英两巨头的仁慈监督下进行一次会谈。对于这两个对立的法国领袖，罗斯福抱着一种取笑的实际上近乎戏弄的傲慢态度。“我们把吉罗叫做新郎，”他对丘吉尔说，“我把他从阿尔及尔弄来，你把新娘戴高乐从伦敦接来，我们来强迫他们举行婚礼。”

在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导演下，这场“结婚的闹剧”就这样开始了。1月17日，吉罗带着他的一小批随员先到了。在他到达之前，罗斯福已从墨菲和艾森豪威尔那里得知，吉罗的表现使对其寄予希望的美国人很失望。吉罗任性而傲慢，一心想担任盟军总司令，对于行政管理一窍不通，也没有政治抱负。而戴高乐却恰恰与此相反。罗斯福对他的儿子说，他确信戴高乐企图在法国建立个人统治，并问道：“在戴高乐派组织中充满了暗探和告密者的情况下，人们怎能相信戴派呢？”

然而，他们要把戴高乐弄到卡萨布兰卡来，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1月17日文登大臣把英国首相从摩洛哥拍来的一份电报交给戴高乐。电报中说：“我可以在这里给你和吉罗在完全秘密的情况下安排一次具有良好远景的会谈。”但戴高乐得知美国总统也在摩洛哥时，对英国首相的电报十分反感。使他生气的是：如果罗斯福在那儿，为什么丘吉尔避而不提呢？为什么只用首相一个人的名义邀请他呢？他不愿意在一出有失身份的喜剧中充当丘吉尔的斗士，去与受罗斯福庇护的吉罗较量。戴高乐没有征询全国委员会的意见，就马上回电予以拒绝，并提醒丘吉尔，他曾一直找机会与吉罗会晤，但都没有成功。他坚持说，最好在法国人之间举行会谈，他不喜欢“盟国高级法庭”的气氛，而盟国却正是建议用这样的“法庭”来代替最好由法国人自己安排的会议。同时他又打电报给吉罗，他在电报中十分不客气他说：“请你记住，我仍旧随时准备与你会谈，但必须在法国领土上，在法国人当中进行，地点和时间，完全由你选择。”

戴高乐的拒绝使丘吉尔感到难堪，他极力在美国人面前掩饰，并敦促这位倔强的法国抵抗领袖重新考虑前来卡萨布兰卡的问题。商天后，艾登又把丘吉尔的一封电报转送戴高乐。电报说：“我受他人的委托告诉你，那份关于参加会议的邀请是美国总统和我本人共同向你发出的。在这次会议上，首先要讨论北非问题，如果你参加这个问题的讨论，那么美国总统以及英国首相将感到荣幸。”艾登并向他说：“如果再下去，恐怕舆论会对你不利，而且丘吉尔在使美国人帮助战斗法国问题上再做任何努力。”

但是，戴高乐下愿在这样的恫吓面前屈服，于是他决定把这件事提交他的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经过故意长时间的辩论，决定即使仅仅为了与罗斯福的会晤，戴高乐也应该走一趟。于是他满有情绪地给丘吉尔回电说：“大战的形势和法国目前的处境，不容许我拒绝跟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和英王陛下的首相举行会谈。”同时强调指出：会议上要讨论的问题是“战斗法国未曾参加讨论的事情的继续，而这件事已引起一种对于盟国似乎是不大令人满意的形势，而对法国则在任何情况下也绝不能令人满意的形势”。

在离开伦敦前，戴高乐同美国海军上将斯塔克进行了长时间谈话，后者

非常认真地听了这次谈话。戴高乐向他讲述了法国历史及其悲剧。总是在最黑暗的时刻，法兰西依靠某位在以前不被人知的领袖死而复生。圣女贞德、波拿巴、克雷蒙梭以及其他就是例子。圣女贞德是位农民，一个没有文化的平民女儿，但她却拯救了王国。戴高乐将军的这番话深深打动了海军上将。斯塔克认为，仅仅透过溃败、停战和与敌合作来看法国的罗斯福，将会发现一个永恒的法兰西像凤凰一伴在烈火中新生。斯塔克建议戴高乐在卡萨布兰卡与罗斯福会晤时，把这些话再说一遍给罗斯福总统听。

1943年1月22日，戴高乐一行抵达卡萨布兰卡机场，受到美国将军韦尔伯等人的欢迎。上车前，韦尔伯用一块破布蘸了些污泥涂在汽车的玻璃窗上。这种谨慎的做法，无非是要把戴高乐将军及其同伴抵达摩洛哥的消息封锁起来，不让别人知道。

在安法，盟国征用了许多别墅，这些别墅的住户都迁到别处去了。此外，又把四周都弄空了。铁丝网围绕着会议处所。里里外外都是美国岗哨，不许任何人自由出入。每个人的生活事务都由美国士兵料理。戴高乐对此十分反感。他和吉罗将军见面头几句话就很不客气。他说：“喂！怎么回事！我四次向你建议会谈，而你为什么要我在这铁丝网里，在外国人中间来跟你会谈呢？你从国家观念上说，不感到有些难为情吗？”吉罗显得很窘，他忙向戴高乐解释说，他也是不得不这样做。进餐时，戴高乐渐渐心平气和下来，以致要求吉罗讲述他轰动一时的脱险经历。但是，当话题转到时事时，这位五星上将才告诉对方说，他丝毫不反对维希政府，他所要做的事就是打德国人。听到这番话，戴高乐的随员们，全靠他们的领袖所表现出的冷静的克制才按捺下来。

为了摸清美英的意图，戴高乐来到卡萨布兰卡后，曾和丘吉尔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他一进门就先发制人。他大声对英国首相说，如果他早知道在法国的土地上会被美国人的刺刀团团围住，他决不会到这里来。接着丘吉尔向戴高乐说明总统与他苦心孤诣制定的“解决方案”：戴高乐和吉罗将共同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他们的权力是平等的，但是吉罗还将兼任最高军事长官，因为负责装备已经统一起来的法国军队的美国人坚持这一点。也许，“我的朋友乔治将军”将成为委员会的第三个主席。这个委员会还将包括现任法属北非高级官员的诺盖、佩卢东、布瓦松和贝尔热雷。

“这个解决办法，在美军上士看来也许是合适的，但是我认为英国首相本人也不会把它看作严肃的事情。至于我，我应当重视法国固有的主权。”戴高乐对此严肃地评论道：“盟国撇开我，并且违反我的意图在阿尔及尔建立了行使职权的行政系统。显然，因为他们在这方面不能得到任何满足，所以现在又图谋把战斗法国溺死。但战斗法国不允许这样做。如果战斗法国必然灭亡的话，它也愿意光荣地灭亡。”

丘吉尔似乎不理解这个问题的精神实质，他对戴高乐说：“你看我的政府怎样？你知道我是长期为反对慕尼黑精神而战，但我组织政府时，却让那些具有慕尼黑精神的头面人物进入政府。结果他们干得很起劲。好！以致在今天，人们已经辨认不出他们跟别人有什么不同了。”戴高乐回答说：“这样讲，你一定是没有看见法国的遭遇，至于我，可不是一个想组织内阁并在议会得到多数票而左右逢源的政客。”丘吉尔还是要戴高乐认真考虑这一方案，并告诉他：“今晚你要和美国总统会谈，而且你将知道，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总统和我是有连带关系的。”

会晤之前，罗斯福总统派罗伯特·墨菲去见戴高乐。他们交谈了近一个小时。墨菲建议将军会见总统时，不要提条件。“吉罗感兴趣的只是军事指挥权。”墨菲说，“只要你沉住气，过不了三个月，控制形势的是你，因为吉罗无政治野心。”戴高乐绷着脸回答说：“政治野心会随着一个人地位的变化而迅速膨胀的！”

1943年1月22日晚上，在安法一座为罗斯福准备的漂亮的别墅里，举行了这次会晤。罗斯福亲切地接待了戴高乐。他带着通常那种迷人的风度，用法语向戴高乐问候，他的法语讲得不好，但愿意用这种语言交谈。然而，他们的谈话不得被翻译打断，这更增加了混乱，罗斯福的基本观点是，他不能承认戴高乐的组织，因为戴高乐“不是选举产生的”。戴高乐回答说，圣女贞德拯救了法兰西；她也不是选出来的。历史上其他例子，戴高乐也讲了许多，但罗斯福只记住了圣女贞德的名字，后来他一再加以嘲讽。他用各种方式反复说的那些他认为是诙谐的挖苦话传遍了华盛顿，甚至外国的首都。据说罗斯福对戴高乐说：“那天，你告诉我，你是圣女贞德，现在你却说你是在克雷蒙梭。你到底是谁？”戴高乐回答说：“我两者都是。”于是罗斯福又对戴高乐说：“你应当做出选择，因为你不可能两者都是！”总统身边的人也围着罗斯福绘声绘色编造笑话：说戴高乐接连宣称他是圣女贞德，是波拿巴，当然还是路易十四！

这些挖苦话也传到了戴高乐的耳朵里，但他从未进行反驳，这或许刺伤了他的自尊心。对这次和罗斯福的首次会见，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会谈虽然客客气气，但十分勉强。“这天晚上，我们随心所欲地展开角逐，但是当谈到法国事务时，我们都保持着某种程度的暧昧。罗斯福转弯抹角地把丘吉尔已直言不讳地告诉给我的那套既定计划暗示于我，并且使我慢慢地理解他要强制我接受这个计划，因为他自己早已决定好了。而我呢？只是很审慎地告诉他说，法兰西的民族意志已经有了自己的选择，并且迟早要先在法兰西帝国内，然后在法兰西本上建立起法国人所渴望的政权。但是，我们都竭力小心，避免引起正面冲突，因为我们都感觉到，冲突没有什么局处，并且我们也知道，此后我们俩都需要彼此尊重对方的利益。”

第二天，戴高乐单独会见了吉罗将军。吉罗又向他兜售了罗斯福和丘吉尔所推行的计划。将来的法国执政委员会会有三位主席，吉罗本人是第一位首脑，戴高乐居第二位，英国人打算从法国调来的乔治将军居第三。为了保持三首脑在军阶上的平衡，准备把戴高乐提升为陆军上将。但吉罗却要把军事方面的指挥权独揽下来。吉罗将是法国军队的总司令。包括自由法国和抵抗运动的一切武装力量，根据这个理由，他只隶属于文森豪威尔。维希的总督们仍然保留他们原来的位置。另外，组织一个“法兰西帝国议会”，这个议会要管理法兰西帝国的行政事务，但绝不能从事任何政治活动。

戴高乐听完了这个“一厢情愿”的计划后，十分反感他说：“你所想象的是，在罗斯福的庇护下由你掌握实权。总之，这是任凭外国摆布的执政官。但是，第一执政官拿破仑是在战争和独立中得到人民的一致称赞的。你要举行一个什么样的公民投票呢？如果举行一次公民投票的话，准能对你有利吗？况且，拿破仑是以一个为法国赢得多次伟大胜利以及占领了广大领土的将领姿态出现的。我也全心全意地希望你能做到跟他一样。但是，照目前的情况来说，你的胜利在哪儿呢？”

戴高乐咄咄逼人，对这位败下阵来的理屈辞穷的将军紧追不放，接着他

又质问道：“第一执政官在立法方面和行政方面都有过人之处。你的才能是这样的吗？再说，你不是不知道，在法国，公众舆论都攻击维希。然而，你的职务先是从达尔朗那里取得的，以后是从诺斯等人的手中取得的。所以你是以贝当元帅的名义取得你的那些职务的。人人都知道你给贝当元帅的信，你在信中告诉他说，你决不作任何事情来反对他的政策，在这些情况下，你相信你能取得大部分法国人民的拥护吗？没有人民的拥护，一个政府即使不成为叛乱的靶子，也只是个徒有虚名的政府。最后，对于盎格鲁撒克逊人来说，你的权力是人为的，是处在从属地位的。试问你，在这种情势下，怎能靠你保全法国的主权呢？”

面对戴高乐的质问，吉罗穷于应付，只好再次声明，这是属于政治问题的事，他不愿卷入政治漩涡；对于他来说，只知道重建法国军队，他完全信赖美国盟友。他说：“我刚刚跟罗斯福总统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我能组织多少师，美国就负责装备多少个师。我考虑，准备在半年内建立12个师。至于你，能在同样的时间内组织起一半吗？谁来供应你武器呢？”

戴高乐反驳说：“我们现在谈的不是你我在军队名额上的竞赛。现在，北非的军队是属于法国的。这些军队不是你的产业。这一点，如果我们不能达成协议，你很快就可以看到的。问题是法兰西帝国以及法国本土内的统一，这就要求建立一个适应这种形势的中央政权。做到了这一点，所有各种军队就会毫无问题地统一起来，而且能统一使用。世界局势要求战斗法国是抗击敌人、维护共和国以及复兴民族的标志。当维希这个幽灵破灭的时候，全法国的共同情感自然而然地会转向战斗法国。我们所要求建立的中央权力机构，一开始就谴责维希，并且声明停战条约根本无效，是非法的；这个中央权力机关和法兰西共和国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对于全世界来说，要成为法国独立的化身。”但是，吉罗拒绝让步。戴高乐发现他“不但没有被说服，反而更加顽固了”。戴高乐希望他回心转意。这两个人至少总算同意在北非建立一个联络组，以便进一步加强联系。

就在戴高乐与吉罗会谈的那天下午，罗伯特·墨菲又来向这位倔强的将军施加压力。告诉他英美同吉罗已作出一些新的安排。墨菲说，今后武器和粮食都将提供给吉罗当局，因为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都正式承认他“掌管法国的军事。经济和财政权益，而这些权益现在和将来都与现已在法属北非和西非站稳了脚跟的民族解放运动有关”。戴高乐以怀疑的态度和不愉快的心情听着墨菲的讲述，他对供应方面的安排不加可否，但有一点刺痛了他，就是美国 and 英国自命为法国权利的裁判官，竟要与吉罗单方面打交道，而吉罗则在所谓不染指政治的借口下，居然承认他们的权威。这样看来，法国的权益不会受到尊重。

第二天清早，麦克米伦和墨菲给了戴高乐一份这两位外交官力他和吉罗草拟的协定文本。这个文件责成这两位将军去贯彻的仅仅是这样一个意图，即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以便在战争期间管理法兰西帝国。戴高乐认为这个文件最低有三点不能接受。第一，它是盟国提出的；第二，它将使戴高乐不得不放弃他现有的政权；第三，它将给人们造成达成了协议的印象，而实际上却没有任何协议。戴高乐征求了他的随员们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任何影响法国权力的协定，决不能是外国干预的结果，不管这种干预是多么友好或者多么高尚。但是，他准备在结束这次会谈之前，再分别向丘吉尔和罗斯福重申一下自己的立场。

根据戴高乐的回忆，那天下午他同英国首相的会谈是一次“最激烈的交锋”。丘吉尔声色俱厉地威胁说，他一回到伦敦就公开谴责戴高乐阻挠协议的达成，就要发动公众舆论反对他。戴高乐却反过来指责丘吉尔支持了一个法国不能接受的、使欧洲不安宁的、使英国感到遗憾的事业；丘吉尔的这种做法，只是为了使美国人满意，而不考虑其代价如何。接着戴高乐又会见了罗斯福，这位美国总统显得比英国首相“理智”。他对不能说服戴高乐接受公报的内容感到遗憾。他说，公众需要的是戏剧性的事件。如果吉罗和戴高乐在有总统本人和丘吉尔首相参加的会议期间举行会谈，发表某种共同声明，即使达成协议仅仅是“理论性”的，这样的消息也会产生预期的效果。戴高乐回答说：“这事我可以办到，会有一个公报的，尽管它不可能是你所需要的。”

会谈即将结束时，丘吉尔、吉罗和他们各自的随员也进来了，此外还有许多盟国的将军和官员。丘吉尔利用这次会晤的机会向戴高乐发起了一次新的进攻。他大声吼道：“我的将军，请不要妨碍战争！”可是罗斯福装作没有注意到丘吉尔在大发雷霆，他笑容可掬地询问戴高乐是否愿意与他、丘吉尔和吉罗将军合影留念？戴高乐“彬彬有礼”地表示同意。然后，罗斯福又惊喜地问道：“再请你当着我们的面，在照像机前和吉罗将军握握手，行吗？”戴高乐用英语回答：“I Shall do that for you。”（为了你，我将这样做）总统对此非常高兴。有了这张照片，他可以向美国新闻界表明他的政策是多么成功！

离开安法之前，戴高乐草拟了一个简短的公告。这个公告他给吉罗看过。当然没有让罗斯福和丘吉尔知道内容，最后的定稿是这样的：“我们会见了。我们会谈了。我们注意到了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这个目标就是彻底打败敌人，从而赢得法国的解放和人类自由的胜利。与所有盟国并肩作战的全体法国人在战争中团结一致，将会达到这个目标。”

戴高乐在卡萨布兰卡坚持了自己的立场，他不得不为此在盟国所设置的种种障碍和困难方面付出代价。不仅美英政府首脑对他不满，而且在伦敦和华盛顿的法国记者和电台评论员也都津津乐道地在他的“可悲的傲劲”和“野心未能实现”方面大做文章。

当停泊在纽约港的法国军舰和商船上的海员纷纷弃船而去，要求在戴高乐的旗帜下服役时，美国当局便逮捕了一些人，并以戴高乐征召志愿军破坏战事为理由，用最强烈的词句向在华盛顿和伦敦的自由法国机构提出抗议。

然而，戴高乐密切注意的是政治战略。阿尔及尔是权力和活动中心。双方都在这里加紧施加影响。照戴高乐派看来，关键的一点是对吉罗施加压力，使他割断与维希政府的联系。戴高乐的代表卡特鲁将军明确表示，如果要取得谅解，必须清除维希分子。1943年2月23日，他起草了一份“致军政长官”（吉罗）的备忘录，呼吁他宣布1940年的停战无效，撤销维希分子的高级行政职务，恢复“共和法”，也就是废除维希法律。权力竞争到了这一阶段，一个不露声色而又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微妙人物让·莫内出场了。这位对历史有影响的法国人，最初曾拒绝参加戴高乐的抵抗运动，后来他到了美国。作为一个银行家和工业家，莫内堪称典型的专家治国论者。然而，多方面的才智使他对政局的复杂性有充分的了解。根据哈里·霍普金斯的建议，在卡萨布兰卡会议期间，罗斯福决定派莫内去阿尔及尔担任吉罗的半官方的政治顾问，实际上是教吉罗如何玩弄政治，尽快把戴高乐派统一起来。

在莫内的帮助和规劝下，不久，吉罗的办公室便制定出大量的“共和国”的措施，发出了许多文件。3月4日，颁布了关于战士勋章的新条例；3月5日，吉罗宣布法国没有种族歧视；3月8日，禁止发行载有贝当最新训令的一期《北非公报》。吉罗又于3月14日作了一个由莫内起草的精彩演说。在演说中，他不仅赞扬了自己的部队，也赞扬了戴高乐的部队，并呼吁共和国内团结一致。四天以后，维希政府的许多法令被正式废除了。接着，莫内又说服撤掉了一批维希派顾问，在填补这些新的空缺的人中，有宣布效忠于戴高乐的德姆维尔。在后来的年代里，他曾先后担任戴高乐的外交部长和总理。

在此情况下戴高乐派的力量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他的计划并未完全如愿。英美“竭尽全力”挫败和限制戴高乐遥控的夺权尝试。

1943年4月6日，从华盛顿回来的艾登和怀南特分别警告戴高乐说，如果他接受吉罗的领导，许多好事将会降临于战斗法国。戴高乐回答说：“如果吉罗1940年6月18日就在北非负起责任，拒绝贝当和魏刚的命令而把战争打下去的话，我本来是可以全心全意接受他的领导的。但是如今是事情已经过去。”4月10日，吉罗建议成立“海外领地委员会”。他和戴高乐将是其成员，但并无政治权力。吉罗本人不会使他的军事指挥权隶属于这个机构，他准备使它隶属于盟军最高统帅部。吉罗的新建议使法兰西全国委员会大为震惊。在4月15日的会议上，委员会一致支持戴高乐，要求组成一个拥有实权的执行委员会，撤换通敌的维希人员，并要求使法军总司令（即吉罗）置于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同时，现在存在的全国委员会主席戴高乐应有权在不附带任何条件的情况下去阿尔及尔。

吉罗的新建议，弄巧成拙，它挫伤了法国人的民族情绪，从此戴高乐的威信进一步提高，吉罗的抵抗已开始崩溃。抗战运动的洛林十字旗已在阿尔及尔出现，不少人公开致电支持戴高乐。4月14日，当自由法国和英国的军队开进突尼斯的斯法克斯时，迎接他们的是一片“戴高乐万岁”的欢呼声。这时，戴高乐的力量已有了决定性的增长。他派往国内的抗战运动的代表让·穆在5月15日电告，全国抗战运动委员会业已组成，从而联合了各种不同的政治信念的组织，一致向戴高乐将军和民族委员会表示，保证完全服膺他们所确定的原则，并贯彻到底。而且还要求在阿尔及尔迅速成立“以戴高乐为主席的中央临时政府，并任命吉罗将军为军事首脑”。

在此情况下，吉罗4月27日被迫写信给戴高乐，说他放弃占优势的政治地位，并邀请戴高乐立即前往阿尔及尔，以便商谈组建法国中央权力机构的问题。至此，戴高乐确实赢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正是：

有勇无谋是吉罗，首次较量走下坡；抗战领袖得群众，计谋运筹着数多。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九章 确立领袖地位

吉罗将军败下风，抗战领袖受人拥；
阿尔及尔决胜负，洛林旗帜插满城。

1943年5月30日中午，一架法国战斗机把戴高乐送到阿尔及尔的布法里克机场。随行的是他提名参加拟议中的法兰西联合委员会的勒内·马西格里、安德烈·菲利普、帕莱夫斯基和比约特等人。吉罗将军亲自到机场欢迎，卡特鲁将军和美国、英国使团的代表也来了。国民志愿军的仪仗队向法国抗战领袖致敬，乐队奏起“马赛曲”。连汽车都是法国制造的。这番情景和安法相比，戴高乐感到十分欣慰。这说明战斗法国已经在北非取得了胜利。

公众不知道戴高乐来到这里。因为阿尔及尔、伦敦和纽约的新闻检查机关不许发布这个消息。因此，在车队穿过的地区，一般都没有任何表示。只有那些时刻保持警惕的“戴高乐派”不顾一切地向他欢呼。在阿尔及尔郊区，突然被惊动了的人群跑来高呼“戴高乐万岁！”但地方当局以“安全”为由，不让群众接近车队。飞机是有意不在白宫机场降落，特在偏远的布法里克降落，因此戴高乐一行没有进城就直奔“避暑大厦”。

当天中午，吉罗将军为戴高乐举行盛大宴会。参加的有乔治将军、卡特鲁将军和法国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共40多人。这些形形色色而又相仿的法国人曾被事变的浪潮卷到不同的海滩上，现在又聚集到一起，仍然和战败前那样朝气蓬勃和充满信心！

戴高乐在《回忆录》中写道：“在今天的宴会上有两种人。在这两种人中，力量的鲜明对比是一望而知的。一方是无所不有，另一方是一无所无。这里的军队、警察、行政、财政、报纸、电台和广播，都由‘军政长官部，吉罗将军直接管辖。由于盟国当局，才安排成这个样子，而盟国当局只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工作的。至于我——戴高乐，在这里没有军队、宪兵，没有银行存款，也没有能使人们听到我的声音的工具。但是，两个钟头之后，我所看到的人们的态度、听到的议论以及人们所表现的神情，都向我表明优势是在哪一方面，每个人内心里都知道争论应如何结束。”

5月30日下午4点钟，当戴高乐到邮政广场洛林死难者纪念碑前献十字架时，成千上万的支持者神秘地出现，向他欢呼。将军极为欣慰，唱起了《马赛曲》，大家也满怀激情地跟着唱起来。等戴高乐回到格里森别墅，各方的信件送到这里来了。他收到的第一封信是前空军总参谋长维勒曼将军寄来的。他从1940年惨败以后，就满怀悲痛和希望隐居家园。这位将军以最高尚的词句，要求戴高乐在战斗法国的空军里给他相应的军级，派他担任指挥一个中队的职务。从群众的欢呼声中，维勒曼将军的这一行动，更使他看清了事情的实质。在这儿，跟别处一样，民族感情作了抉择。因此，他对即将面临的和吉罗的摊牌更充满了信心。

可悲的勾心斗角，第二天早晨就开始了。5月31日，对立两派的内圈人物在国立弗罗芒坦中学举行了一次争吵激烈的会议，其特点是，戴高乐谴责了当地的维希分子——阿尔及利亚总督佩卢东、摩洛哥总督诺盖将军和法属西非总督布瓦松将军。会议在戴高乐砰地一声把门关上骤然离去后结束了。那天下午，在与吉罗单独会谈时，戴高乐重申了他的最后通牒，必须将这三个人解职，否则他不能与委员会一起工作。6月1日，戴高乐出于他在选择时机和自我宣传方面惯有的敏感，在格里森别墅召见了法国和盟国的记者，提

供了几条他们所渴望的重要新闻。戴高乐说，他到北非来，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有效的法国权力机构，以领导民族力量进行作战，这个机构的建立是为了维护法国的主权，但要将某些代表维希方面的人士排除在外。直到这时，当地还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论调，于是这些话立刻到处传开了。

阿尔及利亚总督佩卢东，听到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忧心忡忡。他一度是维希政府的一个部长，后来支持吉罗将军。现在，戴高乐坚持要把他和其他维希政府高级官员一同解职，使他心慌意乱。为了争取主动，就在当天晚上他给委员会两主席各写了一封信。他给戴高乐的信说，他愿意放弃他总督的职位，以促成为取得胜利和恢复法国的伟大所必需的全体法国的联合。他仅提出一个要求：戴高乐应当支持他即将向军事当局提出的申请，即以预备军官的名单上一名殖民军步兵上尉的身份服役。一位朋友急忙把这封信送到了格里森别墅。然后，佩卢东草拟了一封给吉罗的信，大意相同，但措词略有出入。佩卢东决定第二天早晨再把这封信送到夏宫。但这很快就证明是一个错误。

戴高乐收到这封信后，不出所料，立即接受了佩卢东的辞呈复信说：

你 6 月 1 日的来信收到，信中提到你要辞去现任阿尔及利亚总督的职务，并要求在军队中服务。

在祖国正经受危险考验的时候，我相信法国人一定都和我一样，重视你这种大公无私的行为的价值。

请你特职务移交给阿尔及利亚总督府秘书长，并请承认你已经被动员入伍，以殖民地步兵上尉的资格听候地中海东岸国家总司令的调遣。

随后，戴高乐把佩卢东总督的来信和他的回信的副本送交给吉罗将军，同时也把这一切情况告诉新闻记者。第二天，这一消息就在世界各地的报纸上刊登出来。佩卢东在这种情况下辞职，立刻产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影响。事后，人们虽然传说他同样也给吉罗写了一封信，但是没有发生任何影响。这个曾经在维希政府担任过部长和出任过驻巴西大使的佩卢东，只是由于吉罗的支持和罗斯福的催促，才从巴西到阿尔及利亚来担任总督的职务。他公开引咎辞职，表示了对戴高乐的顺从，从而否定了吉罗的阿尔及尔体系，使这个体系的人员及其盟国顾问内部的混乱，达到了极点。这一行动大大鼓舞了当地群众抗战的情绪。

吉罗获悉戴高乐的行动后，立即在凌晨 3 时左右写了两封信：一封是怒气冲冲的正式信件，对戴高乐处理佩卢东辞呈的做法表示惊讶；一封是毫不客气的非正式信件，指责戴高乐有纳粹倾向。这时，种种谣言开始流传。一场“军事暴动”即将发生。吉罗派米塞利埃海军上将去“维持阿尔及尔城内外秩序”，派遣坦克守卫通向这座城市和夏宫的各条道路，并调进增援的殖民军。面对这种剑拔弩张的形势，戴高乐十分气愤。当天深夜，他派人告诉吉罗将军说：“这种在外国人面前制造暴乱的气氛，以我看来，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我们或者决裂，或者达成协议，明天必须采取新的步骤。”

虽然吉罗将军刚刚在盛怒之下谴责了戴高乐企图在法国建立纳粹统治，并玩弄刀枪，施加恫吓，但现在他已在主要问题上，也就是在戴高乐要求撤换首要的维希分子的问题上让步了。6 月 3 日上午 10 时，七人委员会开会审理了佩卢东的辞呈，一致同意卡特鲁将军取代他的总督职位。至于其他人，诺盖将军将被解除在摩洛哥的职务；布瓦松一埃找到别人继任他的工作，就从达喀尔撤回；贝尔热雷将军将退休。障碍一经扫除，建立法兰西民族解放

委员会的协议便迅速达成了。戴高乐和吉罗共同担任主席。委员中戴高乐方面有卡特鲁、马西格利和菲利普；吉罗方面有乔治和莫内。委员会宣布它为法国的中央政权，负责领导法国的抗战和其他一切事宜。

6月3日，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正式宣告它的诞生，对外发表宣言和法令。宣言说：

委员会将以种种不同的形式，在各个地区，领导法国的力量进行作战，在一切未被敌人占领的土地上行使法国的主权，保证管理并维护法国在世界上的一切权益。对截至目前为止，无论是属于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或属于军政长官部的一切法国领土和陆海空军都拥有最高权威。委员会从即日起开始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实现有关两个机关的行政合并事宜。

依照吉罗将军和戴高乐将军互相交换的信件，委员会在全部国土解放之后，根据共和国的法律，将职权移交那时已组成的临时政府。

民族委员会继续与各盟国密切合作，继续为解放法国的全部领土和盟国的领土而共同奋斗，直到彻底战胜一切敌人为止。

委员会庄严地承担恢复法国的一切自由共和国的法律和共和国的政体，彻底粉碎今天强加于国家的个人权力和专制。民族委员会是为法国人民服务的，无论目前的作战力量、抵抗运动和必须经受的一切考验，以及今后的必要改革，都要求整个民族力量团结一致。

委员会号召全体法国人来同它一起，通过战争和胜利，使法国重新恢复自由、伟大和在强大盟国中的传统地位。

戴高乐基本上如愿以偿，他热情地拥抱了吉罗，用的是法国式的拥抱。尽管戴高乐认为委员会的双重领导（两个主席）是荒谬的，但他有信心可以使委员会从属他的意志。眼前一个不可忽视的好处是，迄今为止，不在他控制下的为数众多的军队和官员，现在至少有部分人要对他负责了。

正如戴高乐所预料的，他的主要困难必然来自盟国方面。解放委员会撤换了维希分子，掌握了主权，从而嘲弄了罗斯福明确表示过的愿望。英美首脑，特别是罗斯福、对出现这种局面是不高兴的，因此，戴高乐在发现委员会的第一篇宣言被军事检查机关扣住不发时，并不感到奇怪。但是，他却设法通过广播讲话公布了这条消息，因为广播设施已在很大程度上为组织得很好的戴派所控制。与此同时，英国人还把运送由戴高乐提名的、将从伦敦前来参加委员会的人的飞机启程时间推迟了10天，以表示对他的专横的不满。

事实上英美一直在密切注视着法国政局发生的变化。就在5月30日戴高乐乘坐的飞机在阿尔及尔军用机场着陆的时候，丘吉尔也秘密地来到这里，随后文登大臣也赶来了。他们住在遥远的别墅里，乔治将军等人暗中向他们汇报解放委员会所讨论的情况。

6月6日，也就是在法国解放委员会成立的第三天，丘吉尔邀请戴高乐、吉罗和其他几个委员去参加所谓“乡村”宴会。对此，戴高乐指出：“近几天首相在这样的环境下出现，可能是专为我们来的。”丘吉尔连忙否认说，他丝毫不打算干涉法国的事情。可是，他又补充道：“在军事控恫的情况下，英王陛下政府应该了解北非这个主要交通要冲内部所发生的事情。如果在这儿突然发生了一种非常震动的事件，比方说，你把吉罗一下子吞并了，我们也好采取一些措施。”

戴高乐在他的回忆录中否认有任何这样的意图：“我希望促使吉罗将军自觉地站到公众利益方面来。”在戴高乐眼里，吉罗即使作为一个军人也有

他的局限性，但可以欢迎他担任在目前情况下所能提供给一名法国军人的最高职务。然而，决不能让吉罗保留他的主席和国家文件签署人之一的职位所给予他的对政治决定的否决权。戴高乐知道，他的对手的孤立和撤职仅仅是个时间问题。

6月5日，解放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主要是研究确定各位委员的分工问题。卡鲁特继续保留原职，乔治被任命为国务委员，马西格利和菲利普分别担任外交委员和内务委员。德姆维尔主管财政，普利文负责殖民事务，莫内负责军备和供应给养等。至于新的殖民地总督人选，两星期内来自喀麦隆的比埃尔·库尔纳里将取代维希分子布瓦松，得到戴高乐赞同的马斯特将军被确定为突尼斯总督。关于棘手的军队统帅问题，双方发生了分歧，多数委员否决了乔治将军关于给予吉罗充分军权的建议。根据这项建议，吉罗仍将是主席之一，但在军事问题上不受委员会的约束。戴高乐建议，在当前军事任务十分繁忙的情况下，总司令应被派去担任与盟军司令们联络的任务。吉罗应尽快亲临前线指挥，因此应解除他的政府职务。同时，军事事务应由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处理，吉罗和戴高乐应在其中任职，但该委员会最终应对政府负责。但是，吉罗和他的朋友乔治都断然拒绝考虑。会议陷入僵局。6月10日，戴高乐声明，既然委员会连显然该作出的决议都无法作出。他不能再与委员会发生联系了。他在格里森别墅闭门不出，并向外界透露，他打算去布拉柴维尔。

经过6天的混乱，始终没有取得进展。吉罗发现，在戴高乐缺席的情况下，他无法利用委员会。罗斯福对此十分焦急。6月16日，他致电艾森豪威尔，指示他要阻止戴高乐“亲自或通过其党羽”控制法国军队，至于丘吉尔，则借助于《圣经》，要麦克米伦去查看马大福音第七章第16节：“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段隐晦的引语可以解释为什么丘吉尔在那个阶段无意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麦克米伦和他的班子连忙辛苦地在圣书里寻找答案，终于在启示录第二章2—4节找到了，其最后一句是：“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这个回答，以其含蓄的责备，反映出了麦克米伦对戴高乐不断增长的钦佩。

这时，艾森豪威尔在罗斯福的压力下决定采取行动。他邀请吉罗和戴高乐在6月19日同他一起商谈“有关法国武装力量的指挥和组织问题”。这次会谈只有三个发言人。墨菲和麦克米伦以及许多英美的军政官员都处于旁观和议论的地位。

戴高乐从来就是一个不会错过机会登台表演的人，他故意姗姗来迟，并立即在其他将军们还未来得及集中思想之前便开始发言。他对艾森豪威尔说：“我是以法国政府主席的资格来这里开会的。因为在作战中，按惯例国家元首或政府主席应该亲自到他们授予指挥权的总司令部去。如果在有关你的职权范围内的事情上向我有所要求，请放心，我一定使你满意，可是我们先说明，这必须与我所负责的国家利益一致。”

戴高乐的坚强性格，使艾森豪威尔得到了深刻印象，并在内心深处对这位法国抗战领袖产生了敬仰之情。但他仍秉承罗斯福的指示，对戴高乐说：“你们知道，我准备不久就向意大利进行一次重要的战役，它直接关系到欧洲和法国的解放。为了进行这场战斗，我需要你给我保证后方的安全。法国在北非现有的军事统帅和组织必须不作任何变更。特别是吉罗将军，必须保

持现有的权力和职位，并仍有他保留军队、交通、港口和飞机场的全权。应该由他一个人来同我商讨北非的一切军事问题。虽然我不管你们内部的组织问题，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对于我们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以美英两国政府的名义向你声明，如果我刚才所指出的条件未经履行，美英方面将停止对法国军队供应军力。”

面对如此威胁，戴高乐毫不示弱地说：“我知道你的措施。你向我要求的保证，我无权给你。因为，法国统帅组织，是法国政府权限以内的事情，决不属于你们！但是，我听了你的发言，我想向你提几个问题。”

“一切作战的国家，”戴高乐说，“比如美国，都是把作战部队的指挥权交给将军，而有关建军事项则由部长负责。难道你硬要法国不这样做么？”艾森豪威尔只是重复说，他的请求是指维持吉罗的整个权力而言。

“你刚才提到，你对美英政府承担着自己的义务。”戴高乐又说，“难道你不知道我对法国也负有自己的责任吗？因此，我不能允许任何外国来干涉法国执行自己的权力。”艾森豪威尔默不作声了。

“你是个军人，”戴高乐说，“只靠外国的信任，一位统帅的威权能够存在吗？”

又一阵沉默以后，这位美国总司令才说：“我的将军，我十分理解，你对祖国命运深切关怀，考虑得很远，请你了解，我现在在军事方面有燃眉之急。”

“我也有，”戴高乐说，“因为我的政府应该迅速地把法国的军事力量联合起来：包括战斗法国的兵力、北非的兵力和现在法国本土所组成的兵力，而现在的制度却使它们分散。政府还必须用你们供给的武器来装备这些分散的军队，你们的供给是为了我们同盟的利益，也是为了取得我的政府给予你的各种合作。”

“在这一点上，我也有个问题要问你。”戴高乐对艾森豪威尔说，“你还记得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供给许多国家武器方面，法国也起着像今天美国这样的作用。我们法国人，当时完全装备了比利时和塞尔维亚，供应俄国和罗马尼亚许多军火，最后，我们又以大量物资供应了你们的军队。是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你们美国人放的大炮是我们的大炮，坐的战车是我们的战车，乘的飞机是我们的飞机。反过来，我们对比利时、塞尔维亚，俄国和罗马尼亚，甚至对美国，难道也曾要求任命某某统帅和建立一定的政治制度吗？”说完，又是鸦雀无声。

一直没有开口的吉罗将军，这时也发言了：“我也有我的责任，特别是对于军队。这支军队的力量很小。它只能在盟国范围内维持下去。关于它的统帅和组织，正像它参加战役一样，完全应包括在盟国的范围内。”

说到这儿，戴高乐站起来，离开了会场，回到自己的住处。第二天他要求盟军总部，将它的各项要求写成书面文件，正式提交法国解放委员会。这个书面文件总的说来就是坚持由吉罗担任法军总司令，而不应受“压倒一切的政治控制”。末尾，对法国的主权再次作出保证，然而，戴高乐并不为此所动，因为这些保证与上述的实际要求相矛盾。戴高乐所以要盟国提出书面要求，正是为了让委员会便于否决他们。在6月21日的一次委员会上，果然委员们要求吉罗决定要么承认法国政府的权威，要么离开政府，不担任总司令职务。

当吉罗反对与一个14人的解放委员会讨论秘密军事问题时，戴高乐乘机

力促建立一个以他自己为主席的军事委员会。这个军事委员会在戴高乐的领导下，包括总司令，参谋长和政府的代表，以便对法兰西的军队组织、招募和联合，以及把他们调配到各个战场和地区的问题作出决定。在执行问题上，分设两个最高军事司令部：吉罗仍负责北非司令部，戴高乐负责法兰西帝国其余地区和法国抗战运动。令人吃惊的是，吉罗竟然接受了这一建议。

从此，戴高乐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法国领袖和最高军事统帅。7月2日，吉罗去美国商谈军备供应问题。这样一来，没有双头制的干扰，戴高乐的各项工得以顺利进行。从而，抗战运动蓬勃发展，在配合盟军登陆意大利和解放科西嘉岛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章 配合盟军反攻

向意进军顽敌惊，配合盟军大反攻；
摧枯拉朽扫敌阵，联合破敌显威风。

戴高乐对吉罗的胜利为他今后在法国本土上的斗争铺平了道路。这位自由法国领袖已经除掉了一个竞争者，此人的确不是他的对手，要不是美国人在英国人的支持下把他扶上台，他根本不可能成为戴高乐的竞争者，也不可能台上维持八周之久。但是，真正的斗争，最后的斗争，只能待到解放的时候在法国进行。届时，鹿死谁手还要拭目以待。

当时法国的反法西斯斗争，主要由两种力量构成。一种是国外的抗战运动，一种是国内的抗战运动。前者主要是戴高乐派，后者是那些在敌人占压倒优势、处境极端险恶的情况下，团结起来向纳粹作斗争的男男女女，到1942年11月，国内的抗战运动业已承认戴高乐为其领袖和在反对压迫者的斗争中的民族意志的象征。但是，对他抱有这样看法的人也不一定接受他对未来法国前途的观点。许多人担心戴高乐将努力建立独裁统治，而且普遍有这样的情绪：他在解放法国的任务完成后，最好应该引退，那样他就可以达到他斗争生活的自然而光荣的顶峰。

在这一期间，法国本土上的抗战运动，对自己的组织也进行了一些改组。全国抗战运动委员会新选出乔治·皮杜尔担任主席，他不是戴高乐任命的，但比较合戴高乐的意。他不像穆兰那样兼有全国抗战运动委员会总代表和主席的双重职务。这时戴高乐担心的还不是皮杜尔任主席的问题，他所忧虑的是，全国抗战运动委员会常设办事处的五个成员中，有三个是共产党人，而且新的军事行动委员会又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戴高乐由于内心深处对共产党怀有偏见，因此他总是千方百计地减少和限制共产党的影响。

戴高乐虽然和国内各派的抗战力量还有矛盾，和英美的关系也使他伤脑筋，但聊以自慰的是他与亲人团聚了。他的妻子带着有病的女儿安妮来到阿尔及尔，随后二女儿伊丽莎白又从牛津来到这里，在处理外国报刊办公室工作。他的儿子菲利普仍在海军中服务，战斗在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上。全家在奥利维埃过着简朴的生活。

后来戴高乐又得到他的兄弟姐妹们的消息。他的哥哥格扎维埃隐藏在里昂，经常把一些有用的情报传送到阿尔及尔。格扎维埃的女儿热纳维埃被德国人逮捕，长子正在意大利同敌人作战。夏尔·戴高乐的妹妹阿尔弗雷德·卡约夫人被盖世太保逮捕，最初关押在弗雷纳，后来被关在德国，她的67岁的丈夫被送到布痕瓦尔德。他们的一个儿子在法兰西战役中牺牲了，其他的三个儿子参加了自由法国的军队。戴高乐瘫痪的弟弟雅克的三个儿子也参加了自由法国军队，雅克本人则在瑞士避难。另一个弟弟皮埃尔于1943年被德国人逮捕，后来被押到艾森贝格集中营。皮埃尔的妻子和五个孩子步行越过比利牛斯山到了摩洛哥。

现在，戴高乐在北非的地位已经比较巩固了，而且在“火炬”战役后，戴高乐领导的武装力量有了新的发展，戴高乐本人的威信也较前大大提高了。

1943年春夏之交，法国抗战部队参加了盟军发起的规模巨大的突尼斯战役。经过18天的战斗，于5月7日分别攻占了突尼斯城和比塞大港。

25万德意军队由于没有运输船只可供撤退，便于5月13日宣告投降。

至此，盟军在北非已全部肃清德意军队，墨索里尼所要建立的“非洲大帝国”的梦想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了。

由于意大利在北非和地中海地区接二连三的惨败的打击及腐化无羁的荒淫生活，墨索里尼的身体垮了。他身边的一个心腹曾如此描述了“领袖”当时的情景：“灰白色的面孔，消瘦的双颊，无穷的忧愁，疲惫不堪的眼睛，给人以无限苦恼、屈辱和悲哀感的嘴角……他已不可能和即将来临的岁月斗争了。所有这些，对于那些不管他的成败而仍旧爱戴他的人们来说，是足以使他们惊愕不止的。大家都轻轻地握着他的手，想与他寒暄、慰藉他一番，但他已不是昔日的统帅了。他早已失去了海阔天空地谈论的兴致了。”据墨索里尼的侍卫长透露，自从“领袖”视察利比亚回来之后，体重减少了19公斤。据他分析，这多半是由于战局不利，忧伤过度及他的情妇贝塔西的纠缠所致。虽然墨索里尼时常与贝塔西吵架，偶尔也非难她，甚至拳打脚踢，但他却不能没有她。为了讨好这个风骚的女人，墨索里尼倾其全力保护贝塔西贪得无厌的家族，把一个不足取的青年任命为法西斯党的书记。还发生了贝塔西的哥哥马切洛与内政部相勾结偷运黄金的丑闻，这位法西斯头子已众叛亲离，成为孤家寡人了。

却说盟军在突尼斯取得全歼轴心国25万大军的胜利后，即准备挥师北上，横渡地中海，向意大利本土进军了，正是这种恶梦，曾经在1939年9月使墨索里尼坐卧不安，也曾经使他迟迟不敢让意大利参战，直到法兰西被希特勒征服，英国远征军又被赶到海峡对岸，他才与德国携手。现在这个恶梦又来了，但是这一次它要变为现实了。大难即将临头，对墨索里尼来说，这完全是咎由自取。如今，墨索里尼大势已去，心力交瘁，整天被这种恶梦吓得胆战心惊。在意大利人民和军队中间，普遍存在着失败主义情绪。工业城市米兰和都灵发生了大规模罢工，饥饿的工人为了“面包、和平、自由”而举行示威。威信扫地的、腐败的法西斯政权正在迅速瓦解中。

面对着意大利法西斯政权摇摇欲坠的形势，戴高乐将军十分高兴。他决心率领法国战斗部队参加盟军所发起的意大利之战，并为进一步解放自己的祖国——法兰西积蓄力量，做出重要的贡献。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盟军进攻欧洲的时候，法兰西之剑是多么的短啊！在这样严重的关头，我们国家的武装力量还从来没有相对地减少到如此地步。为我们祖国的解放事业而斗争的人们，回忆起我国旧日的力量，不免忧心忡忡。但是，我国军队的素质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优良。我们越是从苦难的深渊中复兴起来，我们的事业就越光辉灿烂。”

“自14世纪以来，军事力量就是法国的第二生命。”戴高乐在《回忆录》中写道，“尽管我国曾多次忽略国防，轻视军队，打过很多败仗，但无论什么时候，它一直能出色地以做出丰功伟绩的国家出现。这个规律并没有因时代的变迁而减弱。尽管在拿破仑的伟大业绩以后我们的国力大衰，尽管1870年的普法战争的失败非常惨重，在这以后，尽管我们有许多弱点，但是，我们仍然保持着一个勇敢民族的精神和力量。我们是1918年的胜利的主要创造者，我们领导了其他国家走向这个胜利。如果说我们的陆军是世界陆军之冠，我们的海军是世界优良海军之一，我们的空军是世界第一流空军，我们的将军都精明强干，那么，这对我们来说乃是很自然的事情。”

戴高乐写道：“1940年的失败以及伴随而来的沦丧，使许多人大为震惊，甚至认为法国无可救药了。长期来法国人民对自己的估价以及全世界对法国

人深表尊重的历史舆论，忽然间烟消云散了。如果法国不建立自己的军队，那么将永远无法在自己和别人面前恢复它的尊严。但是，能够帮助法国重新恢复统一和再取得它的旧日威望的，莫过于这样一件惊人的事实了”。这就是在刚刚团结起来的法兰西海外领地内，在受着压迫的法国本土内，找到充分的信赖和战斗的勇气，再锻炼一支我认为作战能力很高的军队。在色当和敦刻尔克以后，接着贡比涅和都灵的投降，然后是维希接受丧权辱国的条件。现在，当敌人占领我们全国，200万法国人沦为俘虏而‘合法’政府坚持惩罚抗战的法国人的时候，要我们的军队取得重要而光辉的胜利，这应该是一个翻天覆地的转变。”

经过四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法国的抗战武装力量由小到大，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到1943年底，他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23万人的野战军，拥有15万士兵的殖民地军，拥有5万名海员和32万吨位的舰队，120万吨位的货船和商船，其中有2/3是由法国海员武装起来的。此外，还有一支拥有500架作战飞机，3万名服务人员的空军。大部分物资是盟国根据“租借法案”供给的，有一部分是从敌人手中夺取的。为了掌握现代化的武器，战士们在勤学苦练，决心为欧洲大陆的解放做出自己的贡献。意大利战役开始前，戴高乐曾视察了每一个团队，每一只军舰和每一个空军小队。戴高乐说：“我从每个人的眼睛里看出了我们的武装力量的骄傲。法兰西军队的根苗具有多么不可摧毁的力量呀！”

随着苏联红军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不断取得伟大胜利和盟军在北非的登陆成功，墨索里尼不断向希特勒呼吁，要求他同斯大林议和，以便把德国军队调到西方，和意大利军队一起，共同抵御在地中海上的英美军队日益增长的威胁，并共同防御正在英国集结、准备横渡海峡的盟国军队对西欧大陆的进攻。希特勒认识到，此刻又是需要同墨索里尼举行会谈的时候了，应当给这个意志消沉的伙伴打打气，使他挺起腰杆来。这次会谈于1943年4月7日在萨尔斯堡举行。虽然意大利领袖到会时下定决心要实现自己的主张，或者至少要谈出自己的主张，但是最后他却又一次屈服于希特勒的滔滔不绝的辞令。

其实，在盟国方面，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酝酿已久。早在1943年1月，正当美英联军在北非登陆成功的时候，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举行了会谈，商讨北非胜利后的作战方针。并初步商定：一旦突尼斯的军事行动结束，下一步的进攻目标应是意大利的西西里岛。但是，两国的三军参谋长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却发生了严重分歧。美国的参谋人员希望“把地中海的这一插曲赶紧结束”，以便腾出手来一举打过英吉利海峡，开辟第二战场。英国人则认为，横渡海峡是一场无谓的冒险，可能会遭致灾祸，不如从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开刀，刺向敌人的“软腹部”。

为了统一作战方针，1943年5月11日，当北非战役快要结束时，丘吉尔为了与美国领导人协调尔后的军事行动，第三次访问了华盛顿。他一再敦促罗斯福说服他的三军参谋长们“正确地认识进攻意大利问题的重要意义”，美国军方在总统的干预下，勉强同意进攻西西里岛。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应丘吉尔的邀请，随同英国首相乘专机飞往阿尔及尔，与北非战区总司令商讨有关进攻西西里岛以及尔后的作战方针。从5月29日开始，丘吉尔、马歇尔、艾森豪威尔、亚历山大等，在艾森豪威尔的别墅召开了军事会议。几经

磋商，双方最后决定：进攻西西里岛，如果进展顺利，还应攻入意大利本土。他们的理由是，一旦意大利退出战争，德国必然要抽出大量兵力来代替巴尔干的 26 个意大利师。德军的兵力越分散，对 1944 年横渡英吉利海峡，开辟第二战场就更为有利。

西西里岛是地中海中最大的岛屿，面积 25000 多平方公里，人口 400 万。该岛位于亚平宁半岛与北非之间，隔墨西拿海峡与意大利本土相望，最窄处仅 3219 米，是意大利南部的重要屏障。这个以“哈斯基”为密码代号的作战计划，涉及由亚历山大将军指挥的第十五集团军和巴顿指挥的美军第七集团军，共有 13 个师又 3 个独立旅，总兵力达 47 万多人。此外，还有作战飞机 4000 余架，各种战斗舰艇和辅助船只 3200 艘。根据亚历山大的计划，首先是空军猛烈轰炸，重创敌人的海空力量，然后英军第八集团军在法国抗战部队的配合下，在西西里岛东南部锡拉库扎到帕基诺的地段登陆，空降兵则应越过滩头堡着陆，夺取要地，支援登陆部队。主力上岸后应向北进攻，分两部围歼德意守军，力争尽快占领全岛。

虽然墨索里尼的武装力量在北非遭到惨败，受到严重打击，但是他们防御本土的力量还是不容忽视的。当时意大利的总兵力为 82 个师又 8 个旅，825 架可供作战用的飞机，还有 263 艘舰艇。在亚平宁半岛、科西嘉岛、撒丁岛和西西里岛担任防御的有 44 个师又 6 个旅，600 架飞机和 183 艘舰艇。其余的兵力在苏德战场作战，以及在巴尔干半岛、法国南部执行占领任务。希特勒派往意大利的兵力为 7 个师、1 个旅、500 架飞机和 60 艘舰艇。

在战役开始之前，西西里岛上驻有墨索里尼的第六集团军，下辖 9 个意大利师和两个德国师，共 255000 人，可以及时得到 500 架飞机的支援。守岛意军大部分为当地人，恐战、厌战情绪严重，并认为战役愈激烈，家乡的破坏也就愈严重，因而不想进行认真的抵抗。德军在该岛的坦克和运输工具不足，战斗力不强。岛上的抗登陆防御能力比较薄弱，意军第六集团军在南岸 200 公里的正面阵地上，只配置两个意大利师，大部分兵力驻守在岛屿的西北部，企图在美英军队登陆时实施反突击，歼灭登陆部队于滩头。不然，再转入纵深进行决战。

按照盟军司令部制定的计划，7 月 10 日是进攻的日子。7 月 9 日早晨，从东方和西方驶来的舰队集合在马耳他岛的南面，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就设在这里。为了从海上掩护登陆，美英海军在墨西拿海峡以南展开了 4 艘战列舰、2 艘航空母舰、4 艘巡洋舰和 18 艘驱逐舰；在突尼斯海峡展开了 2 艘战列舰、2 艘巡洋舰和 6 艘驱逐舰。盟军登陆部队分别在北非和地中海东岸的港口上船，美军第七集团军和戴高乐的部分部队在奥兰、阿尔及尔、比塞大起航；蒙哥马利的第八集团军则从的黎波里、亚历山大、塞得港、海法和贝鲁特起航。载有登陆部队的舰船，伪装成护航运输队，紧沿北非海岸航行，并于 7 月 9 日凌晨到达马耳他岛以南海域，然后转向西西里岛。

在盟军强大的战斗机掩护下，美军第七集团军的部队，在利卡塔、杰拉、斯科格里蒂登陆，第二天上午遇到德军的反击。驻守在卡尔塔吉罗内地区的德军“戈林师”，对美军第一步兵师发起了猛烈的反冲击。次日，德军第十五装甲师一部从岛屿的西部赶来增援。但由于英军已逼近西西里岛东岸中部的卡塔尼亚城，“戈林师”又被调往该地作战，美军才算顶住了对方的反击，并将三个滩头阵地联成一片，英法联军在锡拉库扎登陆后，进展较顺利，在最初的三天内，便占领了岛屿的东南部分，并于 7 月 16 日向卡塔尼亚和杰尔

比尼的飞机场挺进。

面对盟军的凌厉攻势和意大利军的节节败北，希特勒暴跳如雷，他狂吠道：“必须在意大利成立军事法庭来清除不良分子！”局势严重，他再次把墨索里尼找来讨论这一问题。这次会议于7月19日在意大利北部的菲尔特雷举行。这是两个独裁者的第十三次会谈，会谈的情况同不久以前举行的几次一样。饭前三小时，饭后两小时，都是希特勒一个人在说话，墨索里尼在一旁恭听。这个狂热的纳粹党领袖竭力想使那位有病的朋友和同盟者的颓丧情绪重新振作起来，但是并未收到什么效果。他说，他们必须在各个战场上继续作战，他们的任务不能留给“下一代”。“历史的声音”还在呼唤着他们。如果意大利人打下去，西西里和意大利本土是能够守住的。更多的德国军队会来增援他们。不久便有一种新式的潜水艇参加作战，他要给英国人来个“斯大林格勒”。据施密特战后回忆，尽管希特勒许了诺言，夸了海口，当时的气氛还是十分低沉。墨索里尼实在劳累过度，对他的朋友的长篇大论无法听进去，最后要求施密特把记录给他看。

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之所以一举成功，除了意大利军队的士气低落和战斗力急剧下降外，还有个重要原因是，希特勒在判断盟军登陆地点时犯了严重错误。德国在西班牙的情报人员曾告诉他，1943年4月30日，在西班牙南部海滩上发现过一具英军尸体，身上还有两封信：一封是蒙巴顿写给地中海舰队总司令、海军元帅安德鲁·卡宁汉的信，信中谈到英美两国联合作战的问题；另一封是英国陆军副参谋长阿契巴尔德·奈将军写给亚历山大的信，信中透露盟军将进攻撒丁岛和希腊。希特勒对此信以为真，并下令将西西里岛上的兵力调往撒丁岛和希腊，在岛上仅留下了两个德国师，这为盟军登陆提供了有利条件。其实这是英国人的调虎离山计，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设下的一个圈套，果然这两个法西斯头子上钩了，最后经过38天的紧张战斗，盟军共歼德意军队167000人，其中德军37000人，缴获敌机1000多架，取得了意大利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大胜利。

关于盟军下一步的战略行动仍然悬而未决。是应当渡过墨西拿海峡攻取意大利的趾形地带，还是占领位于度形地带的塔兰托；是沿意大利西海岸而上，在萨勒诺湾登陆并攻夺那不勒斯，还是仅限于占领撒丁岛？英美意见不尽统一。丘吉尔极力主张乘胜前进，攻占罗马，在意大利尽可能向北挺进，并进而向巴尔干进军；而美方则认为应及早横渡英吉利海峡，开辟第二战场，正当这一问题讨论得十分激烈的时候，墨索里尼于7月25日垮台了。这样一来，局面完全改观，进攻意大利的观点，似乎占了压倒优势。

在意大利战役期间，盟国只要求法国军队参战，而不参加计划的制定和重大问题的讨论。戴高乐对此非常愤慨。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尽管盟国费尽心机不让我们参与它们的决策，但是，现在我们的武装力量已经足够使人相信：不经我们同意就不能通过任何与我们有关的决议。可是，尽管我不蔑视丘吉尔见解的迷人之处，但我也并不表示赞成。从军事观点来看，从地中海向中欧进军，我认为这大冒险了。即使能够很快地粉碎意大利敌人的兵力，以后也要越过阿尔卑斯山的天险，如果人们能够设想在达尔马提亚登陆，那么又怎能越过南斯拉夫的山区呢？毫无疑问，希腊是可以接近的，但是再稍稍往北，巴尔干的崇山峻岭又会有多大的困难啊！何况，英美军所受的训练主要是依靠大量机械的支援在平原作战，而且必须保持充分的军需供应，生活条件不能太苦。英美军即使穿过巴尔干半岛的崎岖地带，再向前挺进困

难就多了，因为没有适当的港口可以作为他们的基地。至于交通，只有下大的公路，而且为数也不多，铁路运输又少又慢；而他们面对的德军，却是善于利用自然电光形堑壕技术的能手。不！必须从法国领土上来考虑；在法国，换句话说，在有利于速战的土地上，既接近海空军基地，又有抵抗运动在敌后活动，给予盟军以有力的帮助。”

“在我们这方面，我认为应当根据法国本身的利益来排除英国人的计划。”戴高乐继续指出，“难道当侵略者正在奴役法国的时候，可以听任西方把我们的士兵派到其他遥远的地方去吗？难道可以允许我们国家最后解放和间接地解放，而不是自己的军队与盟军并肩作战，首先踏上自己国土争取胜利吗？难道可以让自己的唯一军队打到布拉格去，而巴黎、里昂、斯特拉斯堡还要长时期沦陷在敌人手里吗？如果疏忽了这点，不让我们在海外经过训练的军队在本土作战和取得胜利，那么，不是使我们在历尽动乱之后坐失加强法兰西联邦的联系的机会吗？最后，在我们国内，德国人撤退和维希垮台以后，接着一定要出现混乱的局面。在这种混乱中，如果我们的军队还在奥地利或在匈牙利，不能与国内武装力量结合起来，试问将要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政权呢？对于英国和美国来说，上述战略的抉择，虽牵涉到它们自己的不同政策，但是这对法国来说，却是把法兰西的整个命运作了赌注。”戴高乐曾多次建议早日开辟第二战场，在诺曼底登陆，尽快解放法国，并向希特勒的大本营进军，但是丘吉尔总是置若罔闻，并强调客观原因，一拖再拖，而不付诸实行。

尽管戴高乐对盟军作战计划意见很多但仍派出了3个远征师、12万人参加了意大利战役。这支军队英勇顽强，攻无不克，在解放罗马的战斗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当盟军克拉克将军的装甲部队在平原受阻时，法国远征军第二师在陶蒂将军指挥下，越过海拔2400公尺的高山，冒着大雨冲入敌后，向敌人发起猛攻。5月20日，法军占领了30多公里的纵深地带。在他们的正前方攻下德军第一道防线，楔入第二道防线，俘虏了1200人，这一切都是在极端险峻的地带进行的。1944年6月4日，戴高乐的先头部队进入罗马。6月5日，美、英、法三国军队进抵意大利的首都。戴高乐在获悉这一捷报后，立即向全军指战员致电祝贺。电报说：“在罗马大捷中，法军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应当如此！你们做得好！芮因将军啊！你和你所率领的军队完全没有辜负祖国的期待！”

1944年6月18日，法国抗战部队继解放科西嘉岛之后，又光复厄尔巴岛，共俘敌2300人，缴获各种炮60门，以及其他许多物资。厄尔巴岛的解放，对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南大西洋，法国海军在“铁砧”登陆待命期间，对于盟军的活动给予了有效的支持。他们积极打击敌人，支援盟军作战。1944年3月1日，在波拉海面，法国巡洋舰击沉了敌舰5艘，其中有一艘鱼雷艇。3月19日，法国轻型巡洋舰在莫莱里海面击沉敌舰5艘，6月，在亚德里亚海，法国轻型巡洋舰又击沉敌人其他舰只4艘。在同一时期内，在英吉利和诺曼底的广大海域内，或向意大利、科西嘉岛。北非航行的所有盟国辎重舰队，都有法国舰只护送。

如果说，掌握了制海权才能进攻大陆，那么这次是由于制海权与制空权结合起来了。无论在制海权和制主权方面，戴高乐统率的抗战部队均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从1943年至1944年6月，有17个法国空军大队在意大利

作战，7个空军大队支援法国战役，其中2个大队参加破坏德国工业的远程轰炸。2个大队驱逐舰光荣地参加了苏联胜利进军的决战。在北非海岸，许多飞行大队协助掩护地上基地和海上运输队。法国空军对支援盟军作战，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法国的战斗形成一个整体。战争的神速发展，不仅加重了国外正规军的任务，而且使国内的内地军也迅速壮大起来了。为了迎接全国的解放，为了配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游击队到处打击敌人，破坏敌人的仓库和军事设施，他们由小到大，作战能力不断提高，有的可以整连、整营地歼灭敌人，从乡村到城市，从山地到平原，到处燃起了复仇的烈火。欲知内地军的发展和诺曼底登陆的详细情况，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一章 诺曼底登陆前夕

反攻号角震天响，跨海登陆各战忙；
法国儿女齐奋进，高举战旗迎解放。

全世界瞩目的欧洲第二战场就要开辟了，欧洲的决战时刻到了，在盟军诺曼底登陆前夕，1944年6月4日，戴高乐应丘吉尔的邀请，乘英国首相的私人飞机离开阿尔及尔，来到了伦敦。

在这之前，戴高乐一直为两件事情所恼怒。一件事情是，英国政府限制戴高乐用密码和法国驻伦敦的办事机构联系；再一件事情是，一位名叫达福的英国人，控告戴高乐犯有刑事罪，戴高乐和英国人之间没完没了的纠纷由于这一案件达到了高潮，而且自此之后始终酝酿着新的事端。

据戴高乐的传记作者说，达福是英国情报机关的间谍，曾试图打入法国在伦敦的情报部门。由于冒名顶替，戴高乐在英国的指挥官对他进行了军法审判，并将他关押在伦敦郊外坎伯利的法军拘留营。然而，达福逃出了拘留营，并向英国法庭控告戴高乐和其他法国领导人，说他在坎伯利遭到了虐待。英国政府“无权撤销”这一起诉，并扬言除非原告本人撤诉，法院一经备案，必须开庭审判。如果戴高乐回到英国，很可能被捕，甚至在被宣判有罪之后，不得不去坐班房。

戴高乐闻此，十分愤慨。他通知英国外交部，说这是一桩“寡廉鲜耻”的事件。此事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后，戴高乐在1944年3月再次得知，英国法庭准备开庭审理这一案件。戴高乐以攻为守，也提出了一项控告。

1943年初，一位名叫斯蒂芬·梅尼埃的自由法国人从阿克拉回到英国。梅尼埃受雇于戴高乐主义者，在阿克拉莫国广播公司发射台负责向法国本土广播。因为他是外国人，因而受到英国安全部门的拘留和盘问。拘留期间，梅尼埃突然死去。戴高乐宣布，梅尼埃的儿子准备向法国领土上所有的英国秘密情报局官员，向丘吉尔和整个英国政府起诉。英国人能抓戴高乐，法国人也能逮捕丘吉尔。

当时军情火急，整个西方世界即将投入历史上最为冒险的规模巨大的军事行动。为了和缓同法国解放委员会的关系，丘吉尔政府决定付给达福1000英镑，作为他撤回起诉的代价，并邀请戴高乐前来伦敦商谈军务大事。

对此，戴高乐在《回忆录》中写道：“危机已经达到顶点。另一方面，现在已逼近登陆的期限，盟国再也不可能用拖延的办法来解决问题。5月23日，英国政府驻阿尔及尔代表达夫·库柏恳切地要求我接见他，这是毫不奇怪的，从理论上讲，自从我们不能与伦敦传递密码电报以后，我就很遗憾地拒绝接见英国大使。这次，我给他敞开了大门，因为他声明有了‘一个新的动向’。他对我说，英国政府请我到伦敦去，好在那里解决承认法国的的问题，并解决将在法国登陆的盟军同法国行政机构合作的问题。但是大使又向我声明，英国政府希望登陆的时候我在英国。”

“我很感激这种关注。”戴高乐继续写道，“事实上，当盟军发动登陆战时，我确实很愿意在出发基地，我想从那里到法国解放了的第一个地区去，所以我愿意接受到伦敦去的邀请。但是，关于在那里签订一项带有政治意义的协定，我完全采取保留态度。大使同意我重复说明的：我们对承认不感兴趣。同时，我还告诉他，解放委员会不管盟国有任何意见，我们都断然要用共和国政府的名义。关于我们与盟军司令部合作的条件，很早以前我们就在

一个备忘录中讲得很清楚，但是盟国对这份备忘录迟迟没有答复。现在英国政府可能准备在这个备忘录上签字。但是美国政府并不是这样，那么，法英之间决定采取措施，而没有罗斯福的同意就不能付诸实施，这又有什么用处呢？因此，我们准备着参与三国共同商议，而不是由两国来讨论合作的实际条件。最后，我告诉达夫·库柏大使，只要我得到保证与我的政府用密码通电报，我才到伦敦去。”

关于英美限制法国使用密码一事，戴高乐怒火中烧。他说：“4月21日，盟国通知我们，今后不再转发我们和我们驻伦敦的外交和军事代表之间的密码电报。盟国当局对我们解释说，这是因为必须保守准备登陆的秘密。英美单方面对法国所采取的这种谨慎态度，我们认为是一种粗暴的行为，因为法国的武装部队正同它们一起在反攻战役中占重要的地位，同时战场是在法国的领土上开辟的。因此，解放委员会决定在盟国硬要干预我们下达命令和传达报告期间，停止自己的大使维埃诺和军方代表盖尼同他们解决任何事务。”

1944年5月26日，法国解放委员会通过了戴高乐对英国大使提出的主张。它声明戴高乐去伦敦是参加发动反攻战役并在适当时间内去慰问战地的法国民众，而决不是为了协商什么事情。后来委员会通过一项法令，规定了“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名称。第二天，戴高乐又接见了达夫·库柏大使，并向他重申了上次的立场。关于密码电报，英方同意使用，并为此向戴高乐作出了“书面保证”。

6月4日，戴高乐一行抵达伦敦。当时丘吉尔为了等待登陆的时刻住在朴茨茅斯附近的火车上。两位领导人就在车厢里举行了会谈。丘吉尔首先对戴高乐的到达表示热烈欢迎。在首相身旁还有其他大臣和将军们。史未资元帅也在那里，他对戴高乐的来访表现得相当尴尬。因为几个月以前，他曾在一个团体中说：法国已经不是一个强国，它应该与英帝国并在一起，同时盎格鲁萨克逊的报纸也曾经进行大肆宣传。

午餐后，丘吉尔首先向戴高乐介绍了关于即将从英国海岸出发所展开的规模巨大的战斗，他满意地指出最初阶段主要由英国的力量来承担这个任务。他说：“特别是皇家海军在运输和护航方面将起主要作用。”戴高乐对英国的成就表示敬佩。他儿“英国勇敢地经受了无数的危难，从而挽救了整个欧洲。今天它应当成为反攻大陆的基地，在那里集结无比强大的兵力，这就是英国的勇敢政策的鲜明证据。”丘吉尔从打败仗那天起，就把这个政策看作是自己的化身。虽然将来的事情还要使法国经受许多艰难困苦，但无论如何，法国对于它能与盟国共同解放欧洲这一点仍然感到骄傲。

在这个历史时刻，在这儿的法国人和英国人中间，弥漫着一种互相尊重的气氛。接着大家就谈起双边和多边的关系。丘吉尔对戴高乐说：“我们研究一下在法国的合作问题，随后你就到美国去，让罗斯福总统决定这些问题。他可能会接受它，那时我们就可以把它付诸实行。无论如何，你要去跟他会谈。这样他才会软化，并在某种形式下承认你的政府。”

“为什么你硬要我到罗斯福眼前去作法国政权的继承人？”戴高乐不满意他说，“法国已有政府。在这一方面我没有任何必须向美国和英国请求的事情。在这里，最重要的是盟国把法国行政机构和盟军司令部的相互关系建立起来。我们早在九个月前就提出这个问题来了。因为明天陆军就要登陆，我知道你们急于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自己也准备好了。但是，为了解决这

个问题，美国的代表在哪里呢？而且你也非常清楚，没有他，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将得不出任何结论。另外，我知道，华盛顿和伦敦政府不与我们协商，就有了它们自己的解决办法。举例来说，我刚才得到消息，听说准备登陆的部队和工作人员都带有所谓法国货币，但这些货币都是外国制造的。共和国政府完全不承认，而这种货币在盟军司令的命令下将在法国领土上强制流通。我就等待明天艾森豪威尔将军按照美国总统和你同意的指示，来宣布法国应受他的管辖，你要我们在这种基础上怎么举行谈判呢？！”

“你怎么能叫我们英国人采取与美国不同的政策呢？”丘吉尔大声说，“我们要解放欧洲，这是因为美国人同我们一道来做这项工作。因为，你要知道！当我们在欧洲和海洋之间进行选择时，我们总是挑选海洋。当我在罗斯福和戴高乐中间选择时，我总是选择罗斯福。”

丘吉尔对戴高乐讲完这番话后，外交大臣艾登摇了摇头，似乎他不相信这件事。劳工大臣贝文走过来，为了让别人都能听到，大声对戴高乐说：“首相对你说，无论如何他是赞成美国总统的。”

你要知道，那是他个人的看法，绝不是以英国内阁的名义来说的。”

在这以后，丘吉尔同戴高乐一起到附近的艾森豪威尔总部去了。总司令在密林深处、墙壁上尽挂着地图的小屋中，对这两位领导人十分详尽地介绍了登陆计划和准备情况。船只随时可以出港，飞机待命起飞。几天来，军队都已上了船。8个师团和渡海、登陆的许多机械设备，都已经全面地准备妥当。由海军、空军和伞兵部队进行保护的工作也丝毫没有忽略，戴高乐听完了介绍，认为在这极端危险和复杂的巨大战役中，盎格鲁萨克逊人为了建立自己的“计划”所施展的才能，真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总司令还必须确定日期和时间。在这一点上，艾森豪威尔流露出踌躇不安的样子。的确，一切都盘算好了，登陆要在6月3日到7日之间进行。这时期一过，海潮与月亮的条件就要把登陆战役几乎推迟一个月，恰好正是天气恶劣的时候。在大海的风浪中，使用平底船、登陆艇、浮桥对航行和靠岸都是没有把握的。但最迟明天必须发布进攻或延迟的命令。

“您的意见怎么样？”艾森豪威尔向戴高乐问道。

“我只向您说一句，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决不推迟。”戴高乐说，“我认为天气的危险并不比推迟几个星期的危险更大，一再推迟就会涣散军心，也有泄露军事机密的危险。”

当戴高乐准备告辞时，艾森豪威尔显然有些侷促，他递给戴高乐一份打字文件。他说：“这就是我准备向西欧人民发表的声明，特别是对法兰西人民。”戴高乐浏览了一下，对声明表示不满意。总司令向他保证说：“这只是一个草稿，我准备按您的意见修改。”双方约定，明天具体商谈修改意见。之后，戴高乐和丘吉尔一同回到列车中。这时戴高乐又毫不隐讳地谈出了自己内心的忧虑。“因为在十分鲜明的战斗前景上，又一次出现了人为的政治阴影。”

的确，华盛顿为艾森豪威尔所撰写的声明，法国人是不能接受的。按照这个声明的原文，总司令首先要以负责军事任务的统帅身份向挪威、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人民发表声明，这与他们的政治前途毫无关系。但是，声明接着用另一种语气向法兰西人民讲话。他要求法国执行他的命令。“如果没有相反的指示，在行政机关中，人人应继续执行自己的任务。”等法国国土解放后，由“法国人自己来选举他们的代表和政府”。戴高乐对这一声明甚

为反感。他说：艾森豪威尔“在表面上自命为担负我们的责任，其实他只不过是一个有权指挥军队的盟国将军，他没有任何资格来干涉我们的内政，何况他也是无法进行干涉的。在这个问题上，它对法国的政权只字未提，这个政权几年来是鼓舞和领导我国人民作战的力量，这个政权也引以为荣地把大部分法国军队委托给艾森豪威尔指挥。无论如何，我在6月5日上午交给盟军总部一份关于我们能够承认的声明文件。正如我所估计的那样，他们答复我说，这个声明文件来得太晚了，因为声明文件都已经印制妥当，随时准备要投掷到法国的本土上。”

戴高乐回到伦敦之后，受到英国安全部门小心而又严密的监视，以免他泄露登陆日的秘密。艾森豪威尔的心理战主任麦克卢尔、政治战执行处主任洛克哈特，以及丘吉尔和艾登都再次劝说戴高乐去宣读已准备好的讲稿，戴高乐执意不肯。最后他向法国作了广播讲话，但是是用他自己的话讲的，他说：“亲爱的同胞们！最后的战斗开始了……当然是法国的战争，也只是法国的战争……凡是法兰西的儿子，不论他们在哪里，也不论他们是谁，他们唯一而神圣的义务是尽一切力量打击敌人……法国政府及其所任命的首长的命令，必须确实遵守……在我们的鲜血和眼泪所凝成的浓雾后面，将重新出现我们伟大的太阳！”

登陆日开始之前的数小时内，戴高乐在一件棘手和“一触即发”的问题上默认了盟军作出的决定，这就是为了支持“霸王”战役，法国抵抗运动将受命采取行动。5月30日，盟军最高司令部指示，让他们开动机器，广播“霸王”行动进攻阶段有关的全部325条“私人信件”。6月1日和6月2日两天晚上，警戒暗号全部播出。从“超级机密”得到的情报看，大量播出的暗号并没有像人们担心的那样，使德军警惕到进攻迫在眉睫。到了登陆日的前夕，盟军司令部又通知他们广播所有行动暗号。通过广播达到这样的目的：第一，尽量迷惑敌人，使他们无法得知登陆的确切地点；第二，最大限度地争取在一击之下挫败敌军，使他们不能迅速集结；第三，瓦解敌军，使他们在法兰西的土地上不得安宁。

命令下达一个多小时后，就听到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个播音员，正在以一种奇怪，神秘，几乎是凶兆毕露的声调，在缓慢重复地朗读行动口号，重读着每一个音节：“蜈蚣是哺乳动物！……鳄鱼口渴了！……医生埋葬所有的病人！……弗洛拉长着一个红脖子！……亲爱的，我希望在阿维尼翁见你两次……雅克需要梅尔波内！……你现在可以摇树捡梨了！……佩皮尼昂的西红柿已经成熟，可以摘了！法国南的夹竹桃鲜艳夺目！”这一单调的广播持续了一个小时。

显然，德军对警戒暗号未作任何反应，因为播送这类信号已经成为家常便饭。德军对行动暗号，尤其是对韦莱纳信号的发出，会有什么反应呢？会使部队进入戒备状态吗？是否会命令飞机起飞？是否会在此时出动集结在法国和挪威港口的鱼雷快艇、潜艇和驱逐舰？是否会增加重点要塞的兵员配备？后备装甲部队是否开始向沿海移动？德军仍然有时间为这场大战作准备，盟军对“超级机密”情报的关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急切和仔细。

登陆之前的最后的几个小时是最难熬的，艾森豪威尔的总部在焦急之余总算收到了一条极有意义的“超级机密”情报。它是一项“超级机密”气象情报，是破译的一项德国空军每天夜间的天气报告。这是一条六位数字的长密码，在利用“图林”机破译时颇费了一番周折。德国空军预报说，在月相

和潮水变化之前，英吉利海峡的气候将始终是动荡多变的，德国人并没有发现斯泰尔气象辛迪加测到的一段短暂好转时间，因此有理由认为，他们相信当天晚上的气候条件排除了盟军发起进攻的可能性，如果说“超级机密”的天气情报使盟军最高司令部增强了信心的话，福尔德的作战情报中心的另一项报告却带来了一场虚惊。监视奥尔良附近利尔装甲师所属坦克营的英国秘密情报人员报告说，他们看到德军在铁路上有频繁的活动，很可能要出动。在夏托登，一列重型坦克列车正在装运；有人在奥尔良铁路车场内看到许多平台式车皮，“上面满载作战部队，说明部队即将出动或正在出动”，福尔德草草地向索思威克公寓的“头人”写道：“情况表明，利尔装甲师正在移动……行动地点尚不清楚。”

德军的活动说明了什么？难道敌军司令伦斯德和隆美尔对进攻有所风闻？利尔装甲师是否准备开往诺曼底？谁也无法回答这些问题。“超级机密”此时也无声无息。对索思威克公寓的最高司令部来说，对当夜大部分时间守在百老汇英国情报局信号接受中心的孟席斯来说，“超级机密”的沉默既鼓舞人心又令人不安。参与制定“霸王”作战计划的布鲁克将军，那天晚上在日记中写道。“我感到非常的不安……对所有不了解作战难度的大部分人民来说，这次战斗打得再好，他们也会大夫所望的；打不好，将会变成整个战争中最令人胆战心惊的一场大灾难。上帝保佑这场战斗能平安地过去。”

那天晚上，罗斯福呆在白宫，而且终于能够告诉他夫人，登陆日将于第二天拂晓开始。由此看出保密措施是很严格的，为了避免向报界或电台透露消息，13500万人口的美国，充其量只有十人了解“霸王”作战行动。居于伦敦的丘吉尔，当天晚上呆在斯托利门的房间内，和他的秘书乔柯·科维尔喝着白兰地。所有见到他的人都记得，那天晚上他郁郁沉思，寡言少语。

在法国，人们感到度过了历史上最热的一次降灵节。塞纳河流域法兰西岛上的乡村田野，几乎被烈日烤干了，夜晚也是又闷又热。6月4日清晨天气突变，狂风吹撼着拉罗什盖杨城堡的山墙。隆美尔黎明起身时，残枝落叶已经铺满庭院。他一边梳洗，一边注意到窗外的阵阵急雨。据德国空军气象专家瓦尔特·施特贝预报，近日内气候将多变；尽管月相和潮汐可能有助于登陆行动，但德国海军已经指出，坏天气将使盟军在两周之内不可能联合发起主攻，风暴席卷着城堡，证实了施特贝的预报。隆美尔因此决定，他将按原定计划于第二天返回德国，和元首讨论装甲部队的部署问题，并庆祝他夫人的生日。

不过，英国方面也确实有一些令这位德军司令不安的迹象，比如无线电信号销声匿迹了。隆美尔根据在北非沙漠中的经验知道，这常常预兆着战斗即将来临。但自3月份以来，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多次，不是用作训练，就是为了让德国武装部队疲于奔命，不得安宁，使他们无暇加强“大西洋墙”。由于缺乏有利的天气条件，无线电信号的沉寂又被当作骗局，未予理睬。德军西线最高统帅部上上下下都有一种预感，认为不久将发生某种大事变，但又都认为尚无燃眉之急。

6月4日，隆美尔在作完每周一次的情报分析之后，敦促立即开始对英国南部和西南部港口进行空中侦察；但是由于海峡天气恶化，而且会持续数日，因此暂时无法作侦察飞行。海峡浪高五至八英尺，德国人认为，在这样的风浪中，盟军根本无法渡海进攻。加来海峡预计有六级大风，瑟堡海面将有七级大风，云层距地面只有900至1800英尺。在这种情况下，也无法从空

中发起进攻或空投伞兵部队。隆美尔于是在 1944 年 6 月 5 日早晨 6 点钟告假离开了作战部队。当他驱车向他在赫林根的家急速驶去的时候，他的司令部向在伯希特斯加登的希特勒报告说，由于气候恶劣，部队在长期警戒之后，准备在这段时间休整一下。希特勒同时从其他渠道接到报告说，盟军的空中行动依然在继续指向“预计中的主要登陆地点”——加来半岛。

显然，德国最高统帅部没有人感到进攻即将来临，希特勒更是深信盟军此时不可能行动。据纳粹元首的日记记载，6 月 5 日，他出席了一次会议，讨论从葡萄牙进口钨的问题；最高统帅部中午的会议几乎完全用来研究如何把意大利前线的第十军安全地撤回。稍后，希特勒同帝国部长斯佩尔详细研究了伪装莱茵河桥梁的问题；出席了另一个讨论制造柴油卡车的会议；让医生做了便检——他仍然感到肚胀。

登陆日前夕，整个德军最高统帅部作出的一致判断是：不管盟军意图如何，由于天气大差，6 月头一周是不可能进攻的。无论是希特勒、伦斯德、隆美尔，还是任何其他人都丝毫没有想到，由 6000 艘舰船组成的进攻舰队已经出海。西线德军总司令伦斯德无法知道，狂风暴雨之中将有一段平静时间，恰恰足以使盟军渡过海峡，完成登陆。尽管这段平静时间的气候比德国人预计进行大规模水陆两栖战斗所需要的气候还要差，盟军在气象方面有计划地使德军无法预报出如此微小的气象变化。气象战的全部努力，就是为了赢得这一短暂的时间。正如德军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副局长瓦尔利蒙将军所说的：“1944 年 6 月 5 日，万万没有想到，我们正面临着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性时刻。”

正是由于气候的原因，德军取消了空中和海上的行动，否则完全能够发现盟军开来的大型舰队：正是由于对气象判断的错误，到了关键时刻，这支被称为“上帝铁锤”的德国军队，却没有人去使用。在圣洛，八十四军的军官们正为他们的指挥官埃里希·马尔克斯将军庆贺生日。在勒芒，第七军的官兵们，在参谋长马克斯·贝姆塞尔将军的指示下，取消了预定在当夜举行的警戒演习，正让士兵们恢复疲劳睡大觉。在赫林根，德军诺曼底防区的总指挥隆美尔元帅，在家中同夫人和儿子曼弗雷德一起吃完饭后，到书房花了一个小时给希特勒写有关装甲兵部署的备忘录。在巴黎，德军西线总司令伦斯德元帅，在接到“气候恶劣，敌军不可能入侵”的报告后，就上床睡觉了。在伯希特斯加登，夜晚星光灿烂，天气平静，希特勒陪着他的情妇爱娃·布劳恩听了一阵良漫歌曲之后，服了一剂安眠药很快就入睡了。就是在德军统帅、将军们思想上完全解除戒备之时，盟军第一批空运部队便开始在诺曼底着陆，担任首攻任务的海运部队开始进入塞纳湾。“伞兵空中列车”和轰炸机，反潜艇战斗机和夜战战斗机在隆隆声中向法国海岸飞去，一次空前的登陆战役开始了。正是：

六月太阳似火烧，
盟军心潮逐浪高；
百万雄师欲出动，
且看顽敌哪里逃！

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二章 “霸王”行动

诺曼底区炮声隆，诈骗计谋获成功；
各路大军奋勇战，全球展开大反攻。

在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两栖作战经过长期的准备和谋划终于在 1944 年 6 月 6 日开始了。诺曼底登陆并不是以洪水般的狂轰滥炸，也不是以大批部队从空中和海上登陆开始的，按照秘密计划，盟军的第一步行动是偷袭，同时配合以诈骗和牵制行动来迷惑敌人。

午夜过后 11 分，“泰但”行动的第一组人员在瑟堡半岛 3000 英尺上空从一架“斯特灵”轰炸机上跳了下来。头一名跳伞者是特种空军部队的诺埃尔·普尔中尉，另外三名伞兵跟着他跳了下去。普尔碰了一下机尾，便坠入云雾之中。降落伞自动打了开来，普尔昏沉沉地降落在圣洛正西五英里、去库汤斯路旁的一片草滩上。醒来之后，他发现备用品中的鸽子笼，便给伦敦写了一封信，简要地报告了着陆地点的情况，然后装入鸽子脚上的小筒内，便把鸽子放了。普尔中尉是登陆日那天盟军空投到法国的第一位前哨兵，也是第一个从法国把情报送回英国的人。

普尔小组离机数分钟后，“泰但”行动第二组四名伞兵在哈里“雏鸡”·福尔斯的带领下，在同一地区降落。为了使这八名伞兵看上去像是一支空降部队的先导，随后又派了数架“斯特灵”飞机，空投了 200 个只有真人一半大小的假伞兵。德国人后来把这些假伞兵称作“洋娃娃”，“洋娃娃”伞兵离机开伞之后，针尾弹开始落地爆炸，并按照罗马烟火筒的放法，使炸弹向空中喷射出伞状和维利式信号弹形状的火焰。飞机空投下的数千支伪造的步枪和机枪开始爆炸。同时，普尔和福尔斯带着伞兵们装起了扩音箱，开始播放事先录制好的枪炮、迫击炮，士兵的咒骂、指挥官的命令等混杂声音。30 分钟之后，草滩上一切又沉寂下来，普尔和福尔斯带着小组的人员偷偷地溜进果园，隐蔽起来。

在勒阿弗尔附近的伊夫托和哈尔弗勒尔，从利西那到埃夫勒的沿途地带，在埃库夫森林一带和圣伊莱尔杜哈库四周地带，盟军都采取了类似的行动。在每一块驻有德军机动部队的地区，似乎突然都出现了盟军伞兵部队，小至一个连，大至一个旅。这些行动旨在制造混乱，让德军及伞兵部队陷入对诺曼底村野的搜寻之中，而真正的盟军空降部队则在横跨奥恩运河的蒙特布尔和卡朗丹之间完成了着陆，建起了空降场。几小时之内，那些“洋娃娃”和噪音发生器将会把巴黎的德军高级指挥部搞得晕头转向。“泰但”行动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参加，使用的飞机和技术装备也屈指可数，但却为登陆行动起到了巨大的配合作用。

在戴高乐广播讲话之后，午夜之前，法国各地抵抗运动的成员们就已经聚集起来，准备执行进行游击破坏活动的使命。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盼望已久的时刻，在戴高乐的召唤下，他们从秘密接头地点走了出来，分组悄悄地开始执行各自的任務，登陆日的头几分钟，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执行英国特种行动局的“紫色”计划，即破坏敌人的通讯联络。他们切断了敌人的电缆，毁掉敌人的电话线，使法国各地，尤其是勒阿弗尔和阿弗朗什之间的线路突然中断。接线员无法操作，电源线路被烧毁。午夜之后，巴黎、勒芒、奥尔良、里尔、图尔、里昂、波尔多、圣洛、阿弗朗什、亚眠等所有关键的德军驻地，都遇到了严重的通讯障碍，有时联络甚至完全中断，盟军

的无线电和雷达干扰行动密切配合着“紫色”计划，加重了德军指挥系统的混乱。

午夜过后，6月6日凌晨开始，盟军2395架运输机和847架滑翔机，从英国20个机场起飞，载着3个伞兵师向南疾飞，到法国诺曼底海岸后边的重要地区空降伞兵。黎明时分，英国皇家空军的1163架飞机，对勒阿弗尔和瑟堡之间事先选定的敌军海岸的十个堡垒，投弹5853吨，天亮以后，美国第八航空队的轰炸机开始出击，1083架飞机在部队登陆前半小时，对德军海岸防御工事投弹1763吨。然后盟军各类飞机同时出击，轰炸海岸目标和内陆的炮兵阵地。太阳升起之后，盟军海军战舰开始猛轰沿海敌军阵地。霎时间，炮火连天，山摇地动。

进攻部队由运输舰送到离岸11英里和7英里的海面，然后改乘大型登陆艇和小型攻击艇，每个小艇运载30人。小艇并排前进，按时抵达攻击滩头。跟在它们后面的是运载大炮、坦克和工程设备的大型登陆艇，最后是登陆船，直接开到岸边，卸下人员、装备和供应品。登陆艇上还分别安装着大炮、迫击炮和火箭炮，靠岸时就直接向敌人的海岸防御工事进行轰击，此外，还有两栖坦克，它们一开上海岸就能直接投入战斗。

大约早晨6时30分，美军开始在奥马哈和犹他滩头登陆。在这之后，英国和加拿大军队也陆续在事先选定的海滩登陆。在这次战役中，盟军共准备了各类飞机13000多架，战舰、运输舰和各种类型的登陆艇共达6000多艘。参加战役的军队共287万多人。

清晨传来的消息说明，进攻舰队几乎在未遭敌军阻击的情况下渡过了英吉利海峡；全部海空运输部队已经登陆，正在巩固阵地。空军对德军装甲师集结地的侦察表明，登陆日前夕，利尔装甲师正在用火车装运坦克，但尚无其他的行动迹象。艾森豪威尔曾经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已经实现了：“霸王”行动偷袭成功。无疑，这一行动的计谋和对进攻的严格保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归根结蒂，使德军放松警惕的主要原因是天气。据气象专家斯泰戈记载，气候使艾森豪威尔“有机会在欧洲大陆获得一个立足点”。艾森豪威尔后来给斯泰戈写信说，“我要感谢战神，我们在该出发的时候出发了。”

英国人对渡海进攻所冒的风险始终比较担心。但奇怪的是，那天清晨，斯托利门的英国最高统帅部却洋溢着一种乐观情绪。将近10点30分，布鲁克和英军参谋长们来到地图室，听取联合情报委员会在登陆日当天的首次汇报和分析。孟席斯已向委员会主席维克多·卡文迪什一本廷克提交了“超级机密”夜间获取的情报以及其他情报。卡文迪什一本廷克在汇报中宣布，德军在进攻面前“毫无准备，措手不及”，他认为“在加来半岛和瑟堡之间，盟军仍将完成几起登陆行动”。

按照盟军最高司令官的指示，上午9点17分公布了进攻的消息。英军的一等兵玛丽·帕里将纸带放入电传发报机，伦敦各家世界通讯社便收到了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第一号公报。公报极其简单：“在强大空军的配合下，盟军海运部队于今晨在法国北部沿海登陆。”艾森豪威尔同时下令开始执行“托弗莱特”行动。两分钟之后，英国广播公司广播了有关登陆的消息。9点48分再次播送了欧洲流亡领袖们播过多次的讲话，这些广播讲话专门用来迷惑德军，让他们无法了解盟军在西北欧的真实意图，并使抵抗运动成员更加了解这次行动的重要性。“霸王”作战部队已经到达彼岸，但盟军滩头堡是否安全巩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坚韧”行动能否继续获得成功。

到了6月6日夜晚，将近十个师的部队连同坦克、大炮和其他重武器已经上岸了，后续部队源源而来，不断扩大盟军对德国守军的优势。希特勒大肆吹嘘的“大西洋墙”已被突破，从而为摧毁西线德军奠定了基础。

由于6月5日狂风大作，英吉利海峡恶浪翻腾，西线德军大部分将领认为盟军不会在这时进攻。6月4日，驻巴黎的空军气象站认为，由于气候恶劣，至少在半个月内盟军不会采取行动。当时，由于能见度很低，德国空军已不能对英国南部海岸港口进行空中侦察，而文森豪威尔的军队就是在这时刻在这里登船出发的。德国的海军也因为海浪太大，撤回了在海峡中的巡逻舰艇。因此，诺曼底驻军司令隆美尔只能根据他所得到的很少情报和气象站的意见，在6月5日早晨起草了一个给西线德军总司令伦斯德的形势报告，说敌军进犯不会立刻发生，接着就乘汽车回到赫林根同家人一起团聚去了。更有甚者，6月6日，驻防诺曼底的第七军团司令弗雷德里希·杜尔曼将军，竟下令暂时解除经常戒备状态，召集高级将领在离盟军即将登陆的这些海滩南边约125英里的勒恩，进行“图上作业”。

德国人对盟军进攻的日期既心中无数，对登陆的地点也完全蒙在鼓里，伦斯德和隆美尔都肯定地认为，进攻的地点将在海峡最狭处的加来地区。他们在这里集中了最强的部队第十五军团，它的实力在春天已由原来的10个步兵师增加到15个步兵师。在四五月间，盟军最高统帅部还大用疑兵之计，它集结了一支假舰队，发出大量电讯，造成假象，仿佛盟军总司令部设在肖特，并让以勇猛著称的美国将领乔治·巴顿漫步肯特街头，而德国情报人员正断定他是盟军总司令，在进攻前夕，英国飞机又撒下大量的锡箔片，使德军从海岸雷达上看来，好像一支舰队正从第厄普向东驶去，开往加来。这些虚张声势的行动，使德军更加相信他们的估计是正确的。

6月5日这一大，英美的猛烈空袭，继续破坏着德国的军需库、雷达站、V—1飞弹发射场和交通运输线，但这样的空袭多少星期以来一直在日夜不停地进行。在这一天看来，也不比以往更加猛烈。5日夜晚，第十五军团截获英国广播公司发给法国抵抗运动的一份密码电报，第十五军团相信内容是告诉他们进攻即将开始。该军团遂进入戒备状态。但伦斯德却认为不必对第七军团发出警报。这时已到午夜时分，此刻盟军正向这个军团防守的西端海岸，千船齐发，蜂拥而来。

直到6月6日凌晨1时11分，第七军团才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当时该军团司令在勒恩参加“图上作业”还没有回来。两个美国空运师和一个英国空运师已开始在他的防地着陆。虽然1时30分发出了全面警报，但由于德军统帅部情况不明，决心不大，因此被称为“猛虎”的德第二十一装甲师，在盟军空运部队发起进攻12个小时之后，才投入战斗。

2点29分，美国“湾地”号进攻运输舰，载着海军少将多恩·R·穆恩和犹他海滩指挥官劳顿·柯林斯将军到达了犹他海滩。抛锚后，驾驶台得到报告说，“锚深31米”，领航员宣布“湾地”号离岸11.5英里。运输舰、坦克和步兵登陆舰、指挥舰、弹药舰等纷纷前来报到。在离岸这样近的距离内，德军雷达、海军和空军都没有发现这支舰队。2点51分，美军两栖登陆指挥舰“安肯”号，在奥马哈海岸外11英里处抛锚，也未被德军的早期警报系统发觉。

横渡英吉利海峡花费了很长的时间，有些船只在海上整整航行了两天，但整个舰队编队完好，6100艘舰船中只有一艘由于敌军的行动而受损。开路

舰队成功地找到了浮标信号，顺利地通过了布雷区。每艘进攻运输舰到达指定锚地抛锚之后，便解缆将进攻用的小船放入海内。从3点15分开始，这些小船在碰撞声中颠簸地装运着军队向登陆地点开去。此时德军仍毫无动静。经常出没于海峡的德军快艇、潜艇和扫雷艇到哪里去了？曾几何时，这些舰艇使英国“猛虎”型巡洋舰陷入灾难之中。德国空军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听不见德国海军的炮声？是“霸王”行动已经偷袭成功，还是又一次萨莱诺事件？在萨莱诺事件中，德军一直等到登陆艇向岸边放下登陆板之后才开火。敌军的沉默使盟军感到吉凶未卜。德军是否在保存全部实力和武器，在盟军不堪一击的时刻，即盟军士兵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扛着武器和弹药，湿漉漉地离开登陆艇，蹚水向岸上走去的时候，一击而致盟军于死地呢？

英加军队即将登陆的三处海滩——“哥尔德”、“朱诺”和“索德”的外面，停泊着装载英国和加拿大三个师兵力的舰船，即将攻打1066年征服者威廉一世攻打英国时扬帆出发的地方。对英加军队来说，情况也差不多。由于德军毫无动静，他们不仅感到困惑不解，而且有一种可怕的预感。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德军武装部队对分散在60英里海面上的59只护卫舰会一无所知。成千上万名伞兵正在法国着陆，1000多架轰炸机正在横扫德军要塞和塞纳湾周围的炮兵群。除了德国空军的一些无线电截获讯号外，“超级机密”并未披露多少其他的无线电通讯活动，实际上，德军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无线电活动。盟军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种想法：德军是否有一张从未露过的王牌？总攻时刻到来之前，盟军有一种可怕的如堕烟海之感，在看到已弗勒的巨大灯塔之后，更加心神不定，德军那天晚上让世界最高、最明亮的灯塔亮着，直到清晨。其目的是否是使塞纳湾看起来一切如常？

6月里的英吉利海峡，大雾弥漫。尽管正值满月，当天夜里却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偶尔云散，露出一丝月光，可以照见一艘艘军舰的轮廓。舰上的水兵头戴钢盔，身着防水服，犹如中世纪的长矛兵，水兵们把这次进攻和1415年攻打塞纳湾的大战役作了比较，那年8月20日，亨利五世率领12000名官兵，横跨英吉利海峡，在哈尔弗勒尔登陆，并在阿冉库尔和法王查尔斯六世交战。但这里即将发生的战斗将比军事史上任何一次战斗更加惊心动魄。正如莎士比亚在《亨利五世》中所写的：“凡是度过了今天这一天，能安然无恙回到家的人，每当提起这一天，就会肃然起立！”

清晨两点左右，德国海军上将克朗克在波尔多接到诺曼底海军部队总司令的电话，后者报告说，盟军伞兵已经在马尔库夫海军重炮群附近着陆。克朗克立即打电话通知了巴黎总部，同时从总部得知，勒阿弗尔和瑟堡之间的雷达系统几乎同时出了故障。克朗克急忙穿起衣服，穿过漆黑的庭院，向指挥波尔多的海军上将住处走去。克朗克此时无法平静，因为他知道第十五军团自午夜以来已进入战备状态，而且已经从伦斯德那里听说，伦敦敌台已向法国抵抗运动广播了行动的暗号。

45分钟之后，德第七军团参谋长马克斯·贝姆赛尔少将，用电话向隆美尔总部的参谋长斯派达尔将军报告：这一次看来像是“大规模行动”，斯派达尔不相信，但把情况转报给伦斯德，后者也同样对盟军的“大规模登陆”表示怀疑。这两个将军认为，空降兵只不过是盟军的一种声东击西的手法，它的主要登陆地点仍是在加来附近，当6月6日拂晓后不久，盟军大规模登陆的消息传到之后，这位德军西线总司令仍然认为，这不是盟军的一次主要攻击。斯派达尔后来说，直到6月6日下午，情况才算判明，到了这时，美

军已经在两处海滩、英军在一处海滩取得了立足点，并且向纵深推进了二至六英里。

在这段时间里，斯派达尔、伦斯德和他的参谋长勃鲁门特里特，都在用电话与当时在伯希特斯加登的最高统帅部联系。由于希特勒发布过一个愚蠢的命令，即使是西线的总司令，非经“元首”特许不能调用装甲师。这三个将军在6日清晨要求批准急调两个坦克师到诺曼底去，约德尔答复说，希特勒先要看一看形势的发展。然后希特勒就上床休息了，尽管西线将领的告急电铃响个不停，但没人敢去打扰纳粹元首。当下午3时希特勒醒来时，已经传到的坏消息使他立刻行动起来，他批准派两个装甲师到诺曼底去，并要求在当天晚上肃清盟军滩头阵地，但这个命令已为时太晚了。此时，希特勒所大肆宣传的“大西洋壁垒”已经被突破了。一度吹嘘得不可一世的德国空军已经完全从天空中被赶走了，德国海军从海洋上被赶走了，德国陆军也冷不防受到袭击。战事虽远没有结束，但它的结局已经不再有什么疑问了。斯派达尔后来说，“从6月6日以后，主动权就落在盟军手中了。”

然而，在奥马哈的登陆战是进行得相当激烈和残酷的。总攻时刻到来时，由于天气恶劣和情报不准确，曾使奥马哈的登陆部队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登陆部队离开运输舰向岸边开去的时候，由于距离太远，32辆两栖坦克下沉了27辆，火炮全部损失，海空轰炸配合得也不得力，轰炸机驾驶员担心误伤登陆艇，结果1285吨炸弹很少命中目标。登陆部队在到达岸边之前，德军始终按兵不动；一旦开始上岸，德军各种火炮便一齐开火。海军的炮火使岸边烟雾弥漫。登陆部队因为分不清陆地的标记，许多人落入齐脖深的水中，带着沉重的装备在水中挣扎，冒着阵阵密集的炮火向岸边冲去。许多人被海水卷走，还有许多人死于德军的炮火中。

登陆在继续。被击中的舰船吐出浓黑的油烟，笼罩着整个海滩，到处燃烧的火舌使雾气变成了深红色；海浪卷着腥红的泡沫，冲刷着数百具尸体，伤兵们仍然在海水中挣扎；沙滩上到处是弹药箱、枪支、吉普车、坦克和推土机。面对着这番景象，布莱德雷将军曾考虑是否将后续部队调往犹他或者索德海滩，从奥马哈撤离他的美国登陆部队。但此时云消雾散，登陆部队已经逼近守卫在海岬中的德军两个团，使其受到炮火的惩罚，盟军的轰炸机中队全力压住了德军的炮火。约在9点钟，第一批美军终于冲开一条血路，向海岬低处德军火力的死角靠拢。许多人倒下了，但也有一些人冲了过去，给仍然在满潮标桩和侮草中萎缩不前的士兵树立了榜样。经过一场激烈的拼杀，终于使奥马哈登陆获得了成功。

6月6日上午10点钟，隆美尔的参谋长斯派达尔才决定向住在赫林根家中的陆军元帅打电话，第一次全面扼要地介绍了形势。隆美尔听了之后，“为之愕然，震惊不已”。有人后来写道，隆美尔耐心地听完了斯派达尔的报告，然后喃喃自语，毫无表情他说道：“我太愚蠢了，我太愚蠢了！”用早餐的时候，隆美尔夫人发觉，斯派达尔的“电话使他成了另一个人，气氛紧张极了”。隆美尔匆匆用完早餐，立即打电话将副官朗格上尉找来。他们二人原定在当天去伯希特斯加登，设法说服希特勒授予隆美尔更大的指挥权，以便调动西线的装甲师，但现在不能去了。隆美尔说，他要在一点钟返回拉罗什盖扬城堡前线指挥所。

且说希特勒醒来之后，虽然发出数道命令，但对盟军登陆的严重性仍然估计不足。西线情报分析科科长罗恩纳，在研究了军事地图和各方情况报告

后，恰好中了盟军“坚韧”行动的圈套，他在为“元首”午间会议准备的报告中写道：“盎格鲁撒克逊敌军在诺曼底海岸的登陆，很像是一次大规模的战役，但投入的兵力只占（盟军现有兵力）很小的一部分，英国南部共有60个师一级的部队，到目前为止，算上空降部队，只有10至12个师投入了战斗。”罗恩纳还指出：“美国第一集团军在泰晤士河南北驻有25个师的兵力，该集团军在战斗中尚未投入一兵一卒，驻扎在英格兰中部和苏格兰的10到12个战斗师也尚未派出部队参战。”罗恩纳最后在报告中写道：“这说明敌军正计划在英吉利海峡发起一场更大规模的行动，攻击目标可能在加来半岛沿海一带，”

由于这种分析符合“元首”的观点，也就成为德军行动的依据。已经接近中午时分，清晨的阴霾本来可以掩护德军装甲部队开往法国沿岸，免遭盟军的空袭，但此时云雾已经消散，天空中到处是盟军的轰炸机和战斗机，轰炸和扫射着地面上所有的移动目标，德军要想在当天发起有效的反攻，为时已经太晚。

纳粹最高统帅部当天的午间会议挪到了克莱思海姆城堡举行。克莱思海姆城堡是坐落在霍恩萨尔兹堡山脚下的一座巴洛克式官邸，专门用来接待来访的外国达官显贵，但距离整个武装部队的指挥系统很远。希特勒当时正接待匈牙利新任总理德迈·斯托姚伊将军，他看起来“兴致勃勃”。下属们一入座，他就说道：“我们开始吧！”

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出席会议的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长官瓦尔特·瓦利蒙将军写道：“……我们站在地图和图表前，急切地等待着希特勒的到来和他的决定。任何奢望都注定要落空。像经常发生的那样，希特勒又开始装腔作势，故弄玄虚，他一边朝地图走去，一边无忧无虑似地轻声笑着，似乎长时间以来，他好不容易才找到和敌人算帐的机会，”

但是，希特勒仍然没有决定将战略后备力量调往诺曼底，他说他将在午饭时间予以考虑。然后他便离开会议室到接待室向斯托姚伊将军介绍战况，希特勒夸大了德军在西线的力量，吹嘘说他将对英国使用威力强大的秘密武器，声称对取得最终胜利有着绝对的把握。会见完毕，希特勒便带着随从人员和匈牙利来宾共进午餐，此时他依然兴致勃勃；对只能备素餐招待客人表示歉意。他还自我解嘲说，“大象是强大的动物，可它是不能吃肉的！”

登陆日的第二天，6月7日拂晓，蒙哥马利向在诺曼底作战的盟军部队发去了“万能的上帝在战斗”的行动命令之后，来到法国海岸并在科勒那堡的庭园里建起了他的指挥部。蒙哥马利把卡昂看作是通向巴黎的大门。由于敌人开始反击，给后勤供应带来了不少困难，另外还有天气，丘吉尔曾经说过，天气的因素“就像一只高空盘旋的兀鹫，使意志最坚强的人为之心惊胆战”；在海军给滩头堡运来补充给养之前，气候会进一步恶化。值得庆幸的是，登陆的英加部队已达83115人，美军已达72000人。他们已经在海滩立足，并建立了较巩固的滩头阵地，现在正进一步扩大战果。

面对着盟军咄咄逼人的进攻，伦斯德和隆美尔十分焦急，他们认为，现在是当面把真相告诉希特勒并且要他承担一切后果的时候了。他们要求“元首”在6月17日到苏瓦松北面的马吉瓦尔同他们开会，讨论形势，开会的地点是在一所建筑坚固的地下避弹室里，这座避弹室原来是准备在1940年夏天进攻英国时作为“元首”的大本营的，但一直没有使用。现在过了四个夏天，这个纳粹统帅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

希特勒当时脸色苍白，神经质地抚弄着他的眼镜和夹在手指里的红蓝铅笔。他弯着腰坐在一只凳子上，陆军元帅们站着，他原来那种使人跟着走的魔力似乎消失了。他简单地、冷冰冰地同大家打了个招呼，然后愤愤他说，他对盟军登陆成功十分气恼，想让战地指挥官们对这件事情负责。他命令将士必须坚持抵抗，收复失地，对任何撤退的建议都听不进去。他竟对将军们保证，新的V—1武器已在前一天第一次向伦敦发射，它“对大不列颠将起决定作用，会迫使英国人议和”。当这两个元帅要希特勒注意德国空军在西线的惨败时，“元首”反驳说，“成群的喷气式战斗机”很快就会把英美飞行员赶出天空。他说，那时英国就要垮台，谈到这里，盟军飞机来了，他们只好暂时停止会议，躲到“元首”的防空洞里。

进了钢筋水泥的地下室之后，隆美尔坚持要谈一谈政治问题。他说，德军在诺曼底的防线将要崩溃，盟军突入德境是难以阻止的。他指出德国在政治上完全孤立，竭力主张结束这场战争，在隆美尔说话的时候，希特勒打断了他好几次，最后索性不让他说下去：“你不用为战争的未来发展操心，还是为你自己受到进攻的防线操操心吧。”

饶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两位陆军元帅从马吉瓦尔走后不久，6月17日下午，一个向伦敦发射的V—1飞弹，因机件失灵，转过头来，掉在“元首”地下避弹所上面。这一来可把希特勒吓坏了，他立刻动身向比较安全的地方转移，马不停蹄地一直奔向伯希特斯加登。

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以来，势不可挡，德军节节败北。曾几何时，强大的德国武装部队，曾经创造出有名的闪电战，耀武扬威地征服了整个欧洲大陆，如今却像一匹受伤的老马苟延残喘了。正是：末日已到，在劫难逃。欲知战情如何发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三章 乘胜前进

百万雄师跨大海，全球欢呼齐称快；
东西两线相鼓舞，霸王战役放光彩。

胜利的喜讯到处传扬。就在诺曼底登陆的当天，6月6日中午，丘吉尔对英国下院宣布：“在昨晚和今天大清早的时候，我们已在欧洲大陆开始了一系列大规模登陆行动中的第一个行动。这次解放性的进攻是以法国海岸为目标。一支拥有4000艘以上船舰，连同几千艘较小的船只的庞大的舰队，渡过了海峡。密集的空降着陆行动已经在敌人战线的后面成功地实现了！”丘吉尔的话音刚落，会场上就掀起了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掌声。

“一次真正的战术突袭，已完全胜利在望。”丘吉尔接着说，“我们还希望在战斗进程中，继续给敌人以接二连三的出其不意的袭击，现在已经开始的这个战役在今后好几个星期内，其规模和激烈的程度都会不断地与日俱增，”“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中，好一个伟大的计划啊！”

作为亲临前线的统帅和东道主，同一天，丘吉尔又将“霸王”战役情况向斯大林作了通报。他在电报中写道：“一切开始进行得很顺利。水雷、障碍物和地面的炮台大都被克服。空降很成功，而且规模很大。步兵登陆进展迅速，许多坦克和自动推进火炮已运上岸。天气预报常转佳。”

斯大林收到电报后，当即回电：“接奉来电，得悉‘霸王’作战行动业已开始，并获成功。我们同感欢欣，并祝获得很大成就。按照德黑兰会议协议所组织的苏军夏季攻势，将于6月中旬以前，在前线某一重要地段开始。苏军的总攻将随着部队之陆续转入进攻而逐步展开。从6月底到7月间，各项进攻行动将汇成苏军的总攻势。攻势行动的进展情况，当随时奉告。”

6月7日，丘吉尔又将战役的发展情况，向斯大林作了进一步的通报：

“截至今天（7日）中午为止，我对于局势是很满意的。只有一处美军登陆的海滩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但现在已克服了。两万人的空降部队已在敌人战线的两翼后方安全着陆。并已分别同美英两国的海上登陆部队取得了联络。我方横渡时仅遭轻微损失。我们原来估计要损失约一万人。到今晚，我方25万人部队中的绝大部分，包括相当数量的装甲部队（坦克）在内，可望一并登陆，或由特种舰艇运送或自行泅渡上岸。自行泅渡上岸的坦克部队损失很大，特别是在美军战线方面，因海浪掀翻了好些两栖坦克。现在我们必须估计到会有强大的反攻，但是我们期望在装甲部队力量方面能较敌人为强。只要云雾一消散，我们当然可望在空中占压倒的优势。……”

“绝密，我们正计划在塞纳河口宽广多沙的海湾沙滩上，很快地建造两个大型人造港。像这样的海港以前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大型远洋轮船能在这种港口利用许多码头卸货，来为战斗部队输送给养。这决不是敌人所能预料到的，并且可使盟军的集结照常进行。而不受天气变化的影响，我们希望在本次军事行动中能及早拿下瑟堡。”

“另一方面，敌人将迅速集结重兵，战斗将要继续进行，而且规模也将日益扩大。尽管如此，我们希望到了进攻发起日后的第三十天，将有约25个师连同其军直属部队能摆开阵势，使第二战线的两翼都靠海，并至少有三个良港——瑟堡和两个人造港。这条战线将不断得到补充和扩展，我们希望以后把布雷斯特半岛也包括进去。但是，这一切都得视战争的风险有多大而定，关于这一点，斯大林元帅，你是熟知的。”

“我们希望这次登陆行动成功以及在罗马取得的胜利——这些胜利的果实还有待于从已被截断去路的德寇手中摘取下来——将会给你们那些曾经不得不承担敌军全部压力的英勇战士们以鼓舞。对于这种重担，在贵国以外，谁也没有比我知道得更清楚的了”

6月9日，斯大林复电丘吉尔：“接奉6月7日来电，承告以‘霸王’作战行动顺利展开的情形。我们大家向你和英勇的英美军队致敬，并且热烈预祝你们取得进一步的成就。苏联军队夏季攻势的准备即将结束。明天，6月10日，我们的夏季攻势中的第一阶段即将在列宁格勒战线展开。”

斯大林又在6月11日致电丘吉尔说：“显然，原定计划中的这次规模庞大的登陆行动，已经全部成功了。我的同事们和我不能不承认：就其规模，就其宏大的布局，以及杰出地执行计划情况来讲，战争史上从来也没有过足以和它类比的事业。众所周知，拿破仑当年打算强渡海峡遭到可耻的失败。歇斯底里的希特勒吹了两年牛皮，说要强渡海峡，但是就连作一个企图进行威胁的暗示，也下不了决心。只有我们的盟军才光荣地胜利实现了强渡海峡的庞大计划，历史将把这一业绩当作一项最高的成就而记载下来。”

对当时德军的态势和部署，丘吉尔作了如下的评述：盟军登陆前，伦斯德元帅正以60个师的兵力经营着整个“大西洋壁垒”的海防，从低地国家直到比斯开湾，以及从马赛起的法国南部的海岸。在他的手下，隆美尔扼守着从荷兰到卢瓦尔河一线的海岸。他的第十五集团军所属的19个师扼守加来和布洛涅周围一段地带。第七集团军有9个步兵师和一个装甲师驻在诺曼底。在整个西线，共有10个装甲师像老鹰展翅似的散布在比利时到波尔多之间。德国人当时采取守势，竟然重蹈了法国人在1940年的覆辙，把他们反攻的最有力的武器分散开来。真是怪事！

当隆美尔在一月下旬接掌诺曼底海岸指挥权时，他对于他所见到的防御部署颇为不满；经过他的努力，情况大有改进。沿着海岸建有一条混凝土工事构成的环形防御线，布有许多水雷和各式各样难以克服的障碍物——特别具在深水水位标以下的，固定的大炮对准了海面，野战炮兵控制着海滩，他们虽然没有一条完整的第二道防线，但是后方村落都设置了坚固的防御工事。隆美尔对于所取得的这样的进展并不满意，倘若他能有更多的时间，对盟军登陆将会造成更多的困难。

德国的警报系统，在盟军飞机的轰炸和法国游击队的破坏下，基本上全部瘫痪了。从加来到格恩济岛，德方原有用以侦察盟军护航队并指挥沿岸炮台的炮火的主要雷达设备，不下120套之多。这些雷达设备编成47个站。它们全部被盟军发现了；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随即发射火箭进行了成功的袭击，以致到了进攻发起日的前夕，能发挥作用的雷达站还不到总数的1/6。那些还能用的，却被盟军散发锡箔条以假乱真地骗过，它使敌人误认为是一支驶往费康以东的护航队，因而敌人未能侦察出真正的登陆行动。这对保证“霸王”战役之成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6月10日，蒙哥马利将军向丘吉尔报告称：他在对岸已经完全站稳脚跟，可以接待访问了。于是丘吉尔首相在史末资，布鲁克、马歇尔等将军的陪同下，乘一艘驱逐舰前去视察，当他们在登陆艇上纷纷攀缘而出时，蒙哥马利满怀信心地带着一脸笑容在海滩上迎接。他的军队已深入内陆七八英里，而他的司令部就设在内陆约五英里处的一座别墅内，周围有草坪和湖水环绕着。在他们共进午餐时，首相和将军进行了一场简短的有趣的对话：

丘吉尔：真正的火线距离我们有多远？

蒙哥马利：大约有三英里。

丘吉尔：那末，有什么办法来阻止德国装甲兵突然闯进来，把我们的午餐打散呢？

蒙哥马利：他们下会来。昨天晚上他们还在这里进行狂轰滥炸，如果他老是这样做，那未免冒险太大，我们会好好收拾他们的。

午餐后，丘吉尔一行对人造港和海军陆战队进行慰问，并乘舰对海岸进行巡视。当他们驶到距离敌人只有七八千米处时，丘吉尔对舰长说：“我们既已如此之近，为什么下在回家之前，我们自己也来对着敌人开上几炮？”舰长随即回答说：“对！向敌人开炮！”顷刻之间，舰上所有的大炮就朝着沉寂的海岸开火了。当然，他们已经驶入敌方大炮射程以内，所以当它们开火之后，舰长就立刻把驱逐舰掉过头去，以最快的速度驶离了。在返回朴次茅斯的四小时航程中，丘吉尔甜蜜地睡了一觉。他说：“那是我最有趣味和愉快的一天，也是我一生中置身于‘炮人怒吼’唯一的一次。”

盟军登陆后，第一个要求就是巩固各滩头阵地附近的防御工事，并扩展这些防御工事。到6月11日，盟军已在内陆结成一条连绵不断的战线，并在滩头阵地上建立了六个小型机场。下一个任务是要为这一具有决定性的突破找一个面积足以容纳充足的队伍的驻留地点。美军穿过瑟堡半岛，向西朝着位于西海岸的巴思维尔挺进，6月17日到达该地，并一举攻下瑟堡。在头六天中，经过奋力拼搏，登陆的盟军计有326000人，54000部车辆和104000吨军用物资。到了6月19日，两个“桑葚”港工程也取得良好的进展。海底输油管（代号叫“冥王星”）稍晚一些时候，就要开始使用了。

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苏联红军就以优势兵力向德军反击，从1944年6月10日开始的苏军夏季攻势，节节胜利，到8月中旬，红军打到了东普鲁士边境，在波罗的海地区包围了德国50个师，深入到芬兰的维堡，消灭了中央集团军，而且在六个星期内，在这条战线上推进了4000英里，到达维斯杜拉河与华沙隔河相望。同时，在南线从8月20日开始发动新攻势，月底就占领了罗马尼亚和普洛耶什特油田。8月26日，保加利亚正式退出战争，德军开始从那里仓皇撤退。9月间，芬兰也退出战争，并向拒绝撤离其领土的德军开火。

斯大林在指挥红军反攻的同时，还密切地注视着“霸王”战役的发展，盟军攻下瑟堡后，斯大林马上向丘吉尔致电祝贺：“盟军已经解放了瑟堡，这是他们在诺曼底取得的又一次伟大的胜利。对在法国北部和意大利展开军事行动的英勇的英美军队所取得的节节胜利，我谨致以祝贺，如果说法国北部的军事行动的规模使希特勒感到越来越厉害和危险，那么，盟军在意大利攻势的顺利进展，也是值得重视和赞扬的。我们祝你们取得新的成就。关于我方的攻势，可以说我们是下会给德国人以喘息机会的，我们将增强猛攻德军的力量，借以不断扩展我方进攻的战线。谅你必会同意，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这是非做不可的。”

7月1日，丘吉尔致电斯大林，一面祝贺苏联红军夏季攻势的伟大胜利，同时又向他通报了诺曼底战场的情况。电报说：

“我们应当及时奉告：俄国军队的辉煌进展，给了我们多么深刻的印象；随着挺进气势日益增强，看来要把处在苏军同华沙以及尔后同柏林之间的德军全部粉碎了。此间以殷切关注的心情，注视着你们所获得的每一个胜利。

我清楚地知道，这一切都是自从德黑兰会议以来，你们所从事的第二轮战役。在第一轮战役中，你们收复了塞瓦斯托波尔、敖德萨和克里米亚，从而你们的先头部队就得以推进到了喀尔巴阡山、塞勒特河和普鲁特河一带。

“诺曼底的战斗正在激烈进行。6月的天气很讨厌，我们不仅在海滩遇见了多年来夏季从未有过的暴风，而且还遇上天空老是乌云密布，这就使我们无法充分利用我们的空中压倒优势，却有助于飞弹的飞入伦敦。不过，我希望7月份的天气会变得好些。同时，在剧烈的战斗中我们继续占上风，尽管八个德国装甲师在英军战区之内进行对抗，可是我们的坦克仍占很大的优势，我方现已有75万人以上的部队登陆，英美军各占一半。敌人在每条战线上都被打得焦头烂额、血肉横飞。我同意你说的，这场战争必须进行到底。”

面对着盟军咄咄逼人的进攻，看来在西线保卫“第三帝国”的使命落到隆美尔肩上了。这位元帅的指挥系统在土崩瓦解：盟军进攻区第八十四军军长马尔克斯将军在公路上被轰炸机炸死；第七军军长多尔曼也在圣洛的互助银行死去——传言是自杀，在盟军进攻的头几个阶段里，隆美尔的6名师级指挥官和20名其他高级军官，不是被击毙，就是身负重伤，损失这样惨重，希特勒又拒绝派兵增援，隆美尔陷入极为困难的境地。

德军西线总司令伦斯德元帅由于“辜负元首的重托”而被免职了。7月2日，希特勒的人事副官鲍格曼上校来到伦斯德指挥部，交给这位陆军元帅一封“元首”的来信。信中说考虑到元帅健康欠佳，决定免除他的指挥职务，同时授予他一枚橡树叶饰片，加在他的铁十字勋章之上。军团司令盖尔·冯·施韦彭堡，由于持有“失败主义观点”也被解职。隆美尔听说伦斯德遭到罢免的消息之后，对斯派达尔说：“下一个该轮到我了。”

7月3日，冯·克鲁格陆军元帅前来接替伦斯德。他和隆美尔在拉罗什盖扬城堡首次会见。几周以来，克鲁格始终未离开“元首”，再一次确信希特勒是一位伟人，因而接任了西线总司令的职务，他坚信自己有能力将盟军“入侵”部队驱逐出去，丝毫也不会同情隆美尔关于“单独结束西线战争”的设想，更不会去和隆美尔商谈这件事，克鲁格由斯派达尔带进隆美尔的书房时，手持元帅节杖，胸前挂满了绶带和勋章，和隆美尔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话不投机半句多。克鲁格对诺曼底的战局有着根本不同的认识，他严厉地批评了隆美尔。他指出，解除伦斯德的职务，只不过是希特勒对西线最高统帅部不满的一个征兆而已。据斯派达尔说，克鲁格宣布，“隆美尔自己也没有得到元首的绝对信任”；克鲁格还说，隆美尔“什有全心全意地执行元首的命令”，而且威胁道：“隆美尔元帅，从现在起，你要无条件地服从命令。这是我对你的忠告。”

听到这话，隆美尔气得满脸通红，两人的谈话也越来越激烈。隆美尔不得不命令当时在场的斯派达尔和作战指挥官坦贝尔霍夫离开。这两个人离开时，听到隆美尔要求克鲁格“看看整个形势，再作出自己的结论”，并希望他“立即撤回对他的不实之词”。同时，隆美尔还建议克鲁格，“在会见所有的指挥官之前，在视察部队和前线之前，不要匆忙作出结论”。

7月15日，隆美尔又给“元首”写了一份报告，报告像是最后通牒。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希特勒的政策已经失败，“诺曼底前线形势一天不如一天，已经到了某种危机关头”。他说敌军集中了大批的火炮和坦克，而他自己却面临着巨大的兵员和物质损失。隆美尔部队的伤亡人数达97000人，其中军

官有 2360 人；补给前线的兵员才 6000 人，另外虽然还答应给 4000 人，却并没有到达前线。隆美尔写道，面对敌人如此强大的实力，“即便最勇敢的部队也会被一口一口地吃掉”，隆美尔还提请“元首”注意，加来半岛战线的几个师正在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他警告说：“在这种情况下，敌军在不久的将来便会突破我们这条单薄的防线……向法国内地纵深推进。”他在报告的最后写道：“各处的部队都在奋勇作战，但由于力量悬殊，寡不敌众，这场战斗行将结束，作为集团军的总司令，我认为有义务直率地阐明这一点。”

这个报告发出两天后，7 月 17 日，隆美尔身受重伤。他所乘的汽车被盟军低飞的战斗机击中。据认为在他生命垂危的情况下，他被送入医院。他神奇地恢复了健康，可是，后来希特勒一道命令，到时候还是难免一死。

就在隆美尔身负重伤的第二天，7 月 18 日，蒙哥马利向敌人发动了总攻势，总攻前，丘吉尔致电说：“愿上帝保佑你。”蒙哥马利复电道：“感谢你的来电。明日将进行的大规模攻击，总的情况都很有利，因为敌军主力正按照我们的打算，已经移到奥恩河之西，去抵抗我在厄夫雷谢地区的攻击，而这些攻击从今天到今晚一直要继续下去。”这次蒙哥马利用了三个军的兵力发动进攻，目标在于扩大他们的各个桥头堡，并使队伍越过奥恩河。在作战行动开始之前，先由空军作了一番大规模的轰炸。这次攻势完全按预定计划胜利完成。

攻势过后两天，丘吉尔又到前方进行视察。这次他的飞机直接在瑟堡半岛着陆。他视察了“桑葚”人造港和陆战队的前沿阵地，晚上他在一艘军舰上参加了官兵们举行的歌咏晚会。他在热烈的掌声中，向官兵们背诵了汤姆森壮丽的诗篇：

许多国家不如你幸福富强，
他们仍在暴君专制下遭殃；
你以伟大和自由而繁荣昌盛，
他们却只有恐惧与羡慕。
缪斯诸神与自由同在。
将常常降临你们幸福的海疆：
幸运之岛啊，明媚无双，
英雄的心在守卫着这美丽之乡。

就在这时，德军撤销了原来把第十五集团军留驻在塞纳河后面的命令，同时派遣了几师生力军，去增援处于困境的第七集团军，他们利用铁路、公路、或用摆渡代替被毁桥梁而渡过塞纳河的转移行动，因受到盟军空袭而耽搁了。部队受到重创。这支受阻时间较长的援军，开到战场为时太晚，以致无法挽回局势。

7 月 20 日，正当盟军发动更强大的攻势时，又发生了一次谋杀希特勒未遂事件。施道芬堡上校在一次参谋会上，把一个藏有一枚定时炸弹的皮包放在希特勒的桌子下面。由于桌面很厚，桌下又有横档，炸弹的威力被减弱了，希特勒侥幸保住了性命。在场的有几个军官被炸身亡。当时这位“元首”虽然受到极大的震惊并受了伤，却站了起来，叫嚷说：“谁说我没有上帝格外的保佑！”这一密谋事件激发了他整个穷凶极恶的本性，他对与该案有关的 1000 个嫌疑犯所施的报复，就是一桩令人毛骨悚然的暴行。

随着时间的推移，盟军的进攻愈来愈猛。在新成立的美国第三军团，美国人找到了一位坦克将军，这就是司令巴顿将军。他与非洲的隆美尔一样骁

勇善战，7月30日他攻克了阿夫朗舍之后，即开始向在诺曼底一线的德军实行大包抄，向东南推进到卢瓦尔河畔的奥尔良，然后转师向东推进到巴黎南面的塞纳河。8月23日，盟军抵达巴黎东南方和西北方的塞纳河。两天以后，雅克·勒克莱尔将军所统率的法国第二装甲师就直逼巴黎大门。法国首都的解放指日可待了。

在诺曼底战役中，德军遭受了一场沉重的打击。损失兵员近50万人，其中25万人被俘。面对着这场惨败，希特勒恼羞成怒。在8月的一次会议上，他咆哮道：“我们在必要时将在莱茵河上作战，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战斗下去，正如啡特烈大王所说，要一直打到那些该死的敌人精疲力竭不能再战为止。我们要作战到底，一直打到赢得在今后50年到100年内能够保障德国民族生命安全的和平局面为止。这个和平局面，首先不能像1918年那样再一次地玷污我们的荣誉……我活着就是为了领导这一战斗，因为我知道，如果在这一战斗的背后没有铁的意志，这场战斗是不能胜利的。”然而，希特勒所叫嚷的“铁的意志”在德军中愈来愈少见了。德国法西斯“四面楚歌”，面临绝境，他们的末日就要到了。

且说戴高乐将军，他自从由阿尔及尔来到伦敦之后，就和盟国领导人会商，并积极筹划和指挥法国内地军和正规军协同盟军作战，当得知战斗法国的舰队、机群、伞兵、突击队、向导和盟军一同胜利地抵达彼岸时，他十分激动，这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一天啊！6月14日，戴高乐将军就乘“战斗”号驱逐舰重新踏上祖国的故土。他一靠岸就受到法国人民和武装人员的热烈欢迎。当戴高乐进入贝叶城时，他从这条街步行到另一条街。居民们看到戴高乐将军，开始都很惊讶，随后是热烈欢呼，或泪流如注，他们走出家门，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跟着他走。孩子们把他包围起来，妇女和老人向他诉说四年来的痛苦生活和法西斯匪帮在这里犯下的暴行。当地县长对群众说，“荣誉和祖国！我们的戴高乐将军回来了！”在热烈的掌声中，戴高乐对他的人民说，“敌人毕竟是敌人，我们的任务就是击败他们。法国一定会胜利的。说老实话，这不就是民族革命吗？”

戴高乐号召人民积极支援盟军作战，积极支援法国内地军和正规军作战，狠狠打击敌人，为解放自己的祖国作出贡献，戴高乐说，“我们法国人要永远记住6月6日这一天，这是伟大解放战争的第一天。从这一天起，我们在法国本土上开始了反攻；从这一天起，我们要获得胜利，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从法西斯的铁蹄下。要获得解放！”戴高乐为了让人民牢记“6月6日”这个神圣的日子，最后背诵了著名诗人拜伦的《唐璜》中的诗句：

那是夏季的一天——六月六日：
我对于日期喜欢说得确切，
不仅哪一代哪一年，也要说明哪一月；
它们像是一种驿站，命运女神
在那里调换马匹，使历史改变调子，
然后越过帝国和国家疾驰而去，
留下的除了编年史外没有别的，
要末还有死后才能进去的天堂。
日子是六月六日，时间大约
六点半——或许更近七点……

欲知法国内地军的战斗情况，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四章 复仇之火

法国军民动刀枪，武装起义遍城乡；
复仇之火熊熊燃，支前打仗人人忙。

1944年6月6日午后6时，戴高乐将军在英国广播公司对法国人民发表讲话，这时他已经与盟国进行了两无激烈而困难的谈判，诺曼底登陆就在当天晚上开始，直接参加这一行动的法国野战军很少，他提出了一个十分鼓舞人心又表明未来大纲的口号：“这是解放法国的战役，也是法国自己解政自己的战役。”

在戴高乐的号召下，法国抵抗运动领导下的各种爱国力量紧急动员起来了。当复仇的烈火从一个省烧向另一个省的时候，盟军最高司令部密切地注意着布列塔尼的形势。此处的游击队负有一项不仅对“霸王”战役而且对“坚韧”行动意义十分重大的使命。为了配合诺曼底登陆，游击队的任务是切断布列塔尼同法国其他地区的联系，尤其要设法阻挠驻守该半岛的145000德军向诺曼底增援。同时，为了配合“坚韧”行动，游击队还加强了活动，给德军造成一种错觉，认为布列塔尼地区也可能出现大规模登陆作战。盟军有几项作战计划的登陆地点都选在布列塔尼地区，蒙哥马利也曾考虑使用这些登陆地点来粉碎隆美尔对诺曼底的压力，但盟军并未准备从海上进攻布列塔尼半岛。布列塔尼人的任务是配合巴顿第三军团，发起一场大规模攻势，造成夺取半岛及其重要港口的假象，因此，布列塔尼游击队的秘密活动，比起法国任何其他地区，都更加广泛和频繁。

自从登陆日以来，盟军向布列塔尼半岛空投了大批特种作战小分队，负责武装、训练和领导该地区的游击队。英国特种空军第四团，号称“天兵”，空降后在敌人后方设立了两个火力极强的武装据点。第一批“天兵”在布列塔尼沼泽和灌木地带降落时，适值云消雾散，皓月当空，朱尔斯·德香中尉从“哈利法克斯”号飞机上跳下的时刻是登陆日凌晨零点45分；跟在他后面跳伞的是一名无线电报务员、七名特种空军人员和弗雷德里克领导的混合小组。他们的任务是，在大批德军伞兵部队集结区之内，在离古堡城市甘冈不远的地方建立“西萨姆”基地。

空降非常顺利，而且数小时之内基地就在杜沃特森林建立起来，特种作战部队和当地游击队便开始出击骚扰德军。他们听到电台广播的行动指示——“拿破仑的旗子难道总是在佩罗斯—基勒克的上空飘扬吗？”——之后，便发起全面出击，和盟军大部队开入半岛的时间基本吻合。据弗雷德里克报告，法国游击队对德军怀有深仇大恨，他说：“在我们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几名年轻的爱国者用头天晚上空投给特种部队的武器武装起来，当天晚上在离基地200码远的一个农庄会台，他们谁也没有受过军事训练，连如何使用半自动步枪都不知道，说来也巧，两名德国军官开着汽车来到村庄，打听去卡雷的路。一名军官走进房间时，这些年轻人正在吃晚饭；于是他彬彬有礼地询问去卡雷怎么走，但回答他的却是射向腹部的五发子弹。他捂着流出的肠子挣扎着回到汽车上，二人在开车逃跑前向爱国者们扔了一颗手榴弹。”后来敌人进行报复，在双方交火中又击毙十名德国官兵。

6月18日拂晓，德军以一个旅的兵力向游击队据点发起了进攻。敌人用曳光弹引着了干柴，点起了森林大火，300多名游击队员不是英勇战死就是失踪了，据说德军捉到了35名俘虏，让一名德国牧师给他们集体做了忏悔后

全部枪杀了，数十座农庄被烧毁。但是德军的暴行并没有吓倒法国爱国者，他们提出：“血债必须用血偿还！”在这次惨案之后，布列塔尼半岛很快又组织起 8000 名武装的和 22000 名没有武装的“马基”游击队。

游击队尽管出兵不利，损失惨重，但却相当成功地延迟了布列塔尼地区的德军部队向诺曼底的增援，隆美尔的战略是用步兵包围盟军的桥头堡，同时重新调配装甲部队，以期进行强大的反攻。可惜的是，隆美尔没有足够的步兵来完成对盟军的包围。由于游击队的活动和盟军的轰炸，驻守布列塔尼的第七十七步兵师，用了 13 天的时间才走完两天的路程。第一百六十五步兵师在登陆日当天就从洛里昂出发了，但直到 6 月 16 日全师也未能到达前线。第二百七十五步兵师，6 月 7 日和 8 日就离开了瓦恩地区，到 6 月 14 日部队仍然还在路上；有一个营用八天的时间才走完了一天的路程。德军的伞兵部队也遭到了同样的阻击，大大延误了战机。号称“帝国”的第二党卫军的装甲师，是世界上最精良、战斗力最强的战斗部队，但它在从佩里高到诺曼底的路上，同样遭到了游击队传奇般的骚扰和袭击。

登陆日那天，驻守在法国本土的党卫装甲师一共有四个，“帝国”装甲师是其中之一，登陆日后的第三天，敌人急忙将这支精锐部队派往诺曼底，而迅速到达滩头堡的办法一是靠铁路运输，一是使用途经布里夫、利摩日、普瓦蒂埃、图尔、勒芒到卡昂的公路。在这种情况下，延迟“帝国”装甲师的行动成为盟军所有部队，尤其是法国部队和皇家空军的共同目标，盟军首先出动了空、军部队，轰炸并摧毁了大西洋沿岸到奥尔良之间卢瓦尔河的桥梁和附近的公路，目的在于阻止法国南部的德军装甲师渡河北上。接着游击队又受命摧毁了索米尔——帕特内铁路通过卢瓦尔河的隧道，挫败了一场现代的“飓风战”。

大规模进攻日开始后，法国抵抗组织的“修车工”游击队开始出击，尽管其成员来自各地，信仰各不相同，有些人还长期坐过牢，但它仍不失为法国游击队中最有战斗力的一支抵抗力量。“修车工”组织的领导人是乔治·斯塔尔，法国人叫他“希莱尔”。

他于 1942 年 11 月乘小船潜入布列塔尼地区。他的公开身份是采矿工程师，为了掩饰他那南腔北调的法文以及无职业却很有钱的事实，他自称曾在刚果发了一笔财，他为人谦恭大方，秉性无忧无虑，热情泼辣，讨人喜欢。加斯科涅人历来对外来人就没什么好感，但斯塔尔却设法控制了整个斯科涅地区，在当地人民群众中建立了自己的威信。

“修车工”游击队的专长是切断敌人的通讯联络，1943 年斯塔尔和他的部下多次破坏敌人的电话线和发电站，使法国南方的德军陷入极大的混乱，常常很长一段时间无法联络。“修车工”组织的基地设在佩里高公路交叉处的阿让镇，斯塔尔他们既可以监视“帝国”装甲师，又可以注意驻扎在波尔多附近的第十一装甲师的行动。“帝国”装甲师师长拉麦丁刚刚接到伦斯德的命令，准备开赴诺曼底时，“修车工”便将“帝国”装甲师储存的大部分汽油作上了天。

“帝国”装甲师由于缺乏燃料，拉麦丁不得不改用铁路运输，但又遇到了“辣椒”的破坏，“辣椒”是安东尼·布鲁克斯的代号。是长期潜伏在这个地区的一名年轻的抵抗运动组织者。布鲁克斯从小在瑞士的法语区长大的，他最初的秘密生活是协助比利牛斯山脉一条逃亡线路的工作，后来跑到伦敦，自愿为法国抗战运动工作。1941 年 7 月 1 日夜晩，刚满 20 岁的布鲁克

斯跳伞到了利穆赞，和一小批经验丰富的铁路工人协同工作，破坏法国南部的铁路运输。为配合登陆日，他的任务是切断法国南方通往法国其他地区和意大利的铁路运输。总攻时刻开始时，“辣椒”采取了行动，中断了从图卢兹到蒙托邦的所有运行车辆，有效地阻止了“帝国”装甲师的军需、弹药和舟桥设备（横渡卢瓦尔必须架设舟桥）的运输工作。同时，在地下属人员的破坏下，从马赛开往里昂的每一列火车都至少发生过一次出轨事故。这样做的目的，是阻止“帝国”装甲师先向东、再向西北开往诺曼底。

铁路中断了。“帝国”装甲师只有靠自身的力量向诺曼底进军，但进军只是在弄到足够的汽油之后才开始的。该师行进线路要途经“修车工”组织在贝日拉克和佩里格之间的一个活动区域。法国游击队在该地区的多尔多涅、韦塞尔、奥韦塞尔、德罗纳岛等美丽的峡谷中，设下了天罗地网。褐石红瓦的村落里，路旁的花岗岩丛中，古老的桥旁，更加古老的高卢和罗马遗址以及地穴和山洞中，到处都埋伏着菲利普的游击队，相传英王理查一世当年就是在法国这一地区受致命伤的。游击队员们布置了一些大胆的埋伏和圈套，埋设了牛粪状的地雷，专门用冷枪射击站在坦克炮塔上的德军指挥官，而且将汤盘扣过来摆在路面上（从坦克潜望镜看上去很像地雷的凸出部分），以此来干扰装甲师的行进速度。

“帝国”装甲师好不容易摆脱了“修车工”组织的袭扰，又碰到“奎宁”混合小组带来的麻烦。这支 27 人的游击小队，首先炸掉了公路上的一座桥梁，然后埋伏下来，等待“帝国”装甲师的到来。他们获悉，拉麦丁为了避开游击队，下令让重型坦克部队不走去诺曼底的大道。他们在敌人必经的一个桥头堡埋伏下来，同该师的一个坦克连激战了 6 个小时，结果这个 27 人的游击小队，有 20 个人光荣战死。“帝国”装甲师随后又遭到代号“矿工”的抵抗组织的袭击。“矿工”是活动在科雷兹的一支抵抗力量，其领导人是阿利·佩吕维。他刚被德军俘虏时，在牢房内曾用一只小勺挖取大腿上的子弹。“矿工”组织成员冒着枪林弹雨和敌人周旋，损失极其惨重。他们在曲折回山的山路上一次又一次地向德军发起冲锋，击毙了许多德军冲锋队员，炸毁了一辆又一辆的德军坦克。

登陆日已经过去七天，“帝国”装甲师不仅尚未到达卢瓦尔河，而且还要准备应付一系列抵抗组织和特遣小分队的骚扰和狙击。这些组织和小分队的代号为：“消防队员”，“修船工”、“搏斗者”、“口技演员”、“布尔巴斯开特”等等。“布尔巴斯开特”小分队，共 50 名游击队员，他们获悉西线德军统帅部已经派出油罐火车，向“帝国”装甲师运送汽油。当这批汽油完好无损地贮藏在普瓦蒂埃尔和图尔之间夏特罗的地窖内之后，游击队便向盟军发报，报告了目标的详细方位。盟军随后派出飞机炸毁了这座储油地窖，从而延缓了敌军的行动。

在游击队的频繁打击下，德军已成了惊弓之鸟，坐卧不安。游击队千方百计，以各种形式袭扰敌人。“哈密士”混合小组劫持了一卡车黄油；在苏亚克镇郊外的狭窄公路上，28 名游击队员将“帝国”装甲师的先头部队，“元首”装甲营整整牵制了 40 个小时，致使该师大部分官兵聚集在附近的公路上，不断遭到盟军的空袭。科雷兹位于利摩日和克莱蒙费朗之间的米埃瓦什高原下。该市附近的公路交叉点蒂尔镇，是“帝国”装甲师的必经之路。这里曾发生过一起大的爆炸事件。蒂尔镇附近的游击队，听说南边的游击队已和“帝国”装甲师的主力部队交火，便起而消灭了兵工厂、师范学校和特莫

里埃饭店的德国驻军。后来蒂尔镇遭到敌人的报复，党卫军装甲掷弹兵抓到了500名男人和一些妇女，党卫军突击队长瓦尔特从中选出了99名男人、妇女和孩子，沿着公路把他们活活地吊死了，奥拉多尔絮格兰村也遭到德军的大屠杀，全村652人，除了10名逃脱外，全被德军枪杀了。成为德军对法国人民犯下的最严重的罪行之一。

布列塔尼半岛的法国游击队，他们积极响应戴高乐的战斗号召，为了自己祖国的解放，不惜付出重大牺牲，他们以自己的英勇斗争大大推迟了“帝国”装甲师到达前线的时间。该师在登陆日之后第十七天才到达诺曼底。特种行动局认为：“本来是三天的路程，我们设法让德军多走了两周，这对巩固诺曼底的桥头堡，可以说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盟军桥头堡的情况，在头几天内极其不妙，德军如再增派一个装备完善的第一流装甲师，就能很容易把盟军前线中的一些单薄部队赶回海滩，甚至挫败整个‘霸王’行动。”

据法国官方公布的战报，“帝国”装甲师从佩里高到诺曼底途中，共死伤4000人。此外，几十辆克虏伯工厂的骄傲——行动缓慢的“风暴”式坦克和宽履带坦克被击毁、烧掉，充分证实了诗人拜伦说过的，那些“衣不遮体的爱国者们”发动游击战争的威力为了能够很好地把法国海内外的爱国力量组织起来，1943年11月，戴高乐在阿尔及尔成立了“法兰西行动委员会”。这表现了戴高乐将军及其政府对“战斗的法国人”的战略作用是十分重视的，委员会由戴高乐将军任主席，它使内地委员和国防委员得以定期会面。在被占领下的法国，1944年初，经过同样耐心的努力，地下抵抗运动的一切武装和非武装的军事组织，都统一在“法国内地军”之中，至少在原则上是如此。内地军没有一个全国总参谋部，只有一个地区的司令部，有省一级的司令部。内地军是由志愿人员组成的。由于地下活动形成的习惯和自然而然的保密观念，他们往往只承认自己原来所属的运动。因此，1944年2月，法国成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即“科马克”），在地下军事部队和1943年春成立的政治协调组织“法国抵抗运动委员会”之间起联络作用。在“行动委员会”中除了戴高乐的“秘密军队”的代表外，还有共产党和吉罗将军抵抗组织的代表。为了加强对这支军队的统一指挥和领导，1944年4月，柯尼希将军被任命为总司令，管辖驻在英国的全部法军（勒克莱尔将军的装甲师及情报和行动总局特种部队），以及能够配合盟军登陆部队作战的法国内地军。

虽说内地军斗争热情很高，但他们非常缺乏武器。据调查，在奥恩，即在紧接登陆地区的地方，在1800名参加法国内地军的兵员中，只有600人有武器，其中每4个游击队员才有一挺轻机枪和150匣子弹，每30人才有一挺重机枪和200匣子弹。在厄尔，除了200名“苏尔古”游击队以外，5000名法国内地军都没有武器。根据这一情况，法国内地军情部和行动总局认为，“抵抗运动宜于执行破坏，突然袭击和暗中骚扰敌人的活动，而不宜于从事大规模武装行动”。因而它确定，在盟军登陆之前，抵抗运动主要活动是提供情报，执行特定的破坏任务；在登陆之后，则是“在敌后活动”，“瘫痪敌人的运输，破坏敌人的战争经济”。此外，抵抗运动还要保证不使敌人破坏港口、隧道和桥梁，以备登陆部队使用。

行动总局的计划定得相当周密、完备。按照“绿色计划”，在据认为建立一个桥头堡所必需的10至15天期间，破坏活动将不断进行，以瘫痪敌人的铁路运输。按照“蓝色计划”，地上的电力网应加以切断。按照“紫色计划”，远离邮电中心的地下电缆应加以切断。最后，按照“拜本达姆计划”，

要建立大量的障碍物，破坏桥梁，袭击运输车辆，以阻延敌人通过公路开往前线。行动总局认为，虽然“地下力量的行动必须从外部由一个非常集中的司令部来指挥”；但是，另一方面，“游击队由于本身的性质，活动却应当是分散的”。因此，他们打算使抵抗运动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时间展开活动，以便机动灵活地配合盟军和法国主力部队的军事行动。

戴高乐“解放法国”的号召发出后，内地军很快行动起来，数以千计的没有武器的人，也戴上抵抗运动的臂章，但他们一遇上占领军部队就被镇压了。敌人的暴行更加激起了人民的反抗。他们丢弃一切成见，团结一致地进行战斗。地下抵抗运动几天就用完了所储备的很有限的一点装备和弹药。因此，柯尼希将军于6月10日打电报给军事代表，要他们“尽可能节制游击活动，因为没有办法给他们运送补给品。必须竭尽一切办法立即中止接触”。总之，盟军被这支地下力量的锐气所震惊，他们像受到地下军打击的德军一样，原先对他们的估计也过低了。

由于地下游击战的特点，很难估计游击队在这样大规模作战中所取得的成绩。他们没有占领大片的地区，没有抓到大批的俘虏，没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他们的活动分散成许多局部的小战斗。因此，要估计抵抗运动在法国战役中起了多大的作用，最好还是听听他们的敌人和盟友是怎样说的。

德国占领兵团情报机关的报告中有这样一些话：

6月7日在奥里亚克：“形势危机，我军不断遭到袭击。”

6月9日在上比利牛斯：“我方部队不断受到袭击。这些匪帮使我军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6月10日在多尔多涅：“第十一装甲师每天都不得不与散布在多尔多涅各地的恐怖分子互相扭打。部队进展甚慢，有时一天只能前进几公里。克莱蒙—费朗—利摩日地区完全落入恐怖分子手中。全区铁路交通完全停顿，部队移动十分困难。”

盟军指挥部6月底宣布，战果超出他们期望之外。艾森豪威尔将军认为，法国内地军的贡献等于15个正规师。他们实际上等于是一支在关键时刻到来时已经着陆的伞兵。

内地军的战斗事迹在全国各地引起巨大的反响，有力地鼓舞了法国人民的斗争。到7月中旬，全国40个省全都起义。中央高地、利莫森省、阿尔卑斯省以及上加隆省、多尔顿省、德伦省、汝拉省等，正如布列塔尼各地一样，完全控制在游击队的手里。维希官员纷纷投降或自首，新的解放政权出现了，人们的胸前、墙上、公共纪念物的旗帜上都悬挂着洛林十字。

到1944年7月20日，在卢瓦尔河，塞纳河和巴黎—奥尔良铁路之间，没有一座桥梁是完好的。敌人的车队在白天一移动，马上就被发现，并且受到轰炸。至7月末，法国内地军单独牵制住敌人八个正规师，使它们不能增援前线。

早在8月2日，美军四个装甲师开进了阿弗朗什峡口，再分成两路，一路朝布列斯特进发，另一部指向南特，争夺圣马洛的战斗从9日打到14日。75000名德军曾企图穿过居民起义的布列塔尼半岛向东逃窜，后来又掉转头来在某些港口藏身。巴顿所部不屑去抓俘虏，而是转过身来朝大西洋向塞纳河猛扑。虽然解放布列塔尼的战斗还在继续，但是从战略上说，布列塔尼之战已成过去。这项任务完全交给了法国内地军。他们解放城乡，看守俘虏，维持秩序，并保护东进美军的右翼。但是，布列斯特、洛里昂、圣纳泽尔和

拉罗歇尔这些被包围的城市设防坚固，抵抗运动难以攻克。由于他们既无空军，又无炮兵，只能加以围困。布列斯特打了一个月才被攻克。这一战役的结果，敌军死了几千人，被俘5万人，4个师完全被歼灭。

巴顿知道他的后方是保险的，因此以闪电般的速度向前推进。3天前进了75英里，加拿大军在绿色信号弹和探照灯的指引下，从北向法勒兹方向进攻。在南面，巴顿所部转而向北进攻。8月12日，勒克莱尔将军的法军第二装甲师攻克阿朗松。这时形成钳形的两路军队相隔约18公里。至8月19日，网口终于收拢了，俘敌5万人。但是敌人的坦克逃跑了，这时加拿大第一集团军奉令沿海岸向法国北部进发，英国第二集团军向利西约和鲁昂以南地区推进，美国第一集团军向塞纳河下游，第三集团军向塞纳河上游前进，巴黎的两端各有一个集团军，而勒克莱尔将军的法国第二装甲师已逼近巴黎的大门。看来，法兰西首都的解放指日可待了。

1944年8月20日，戴高乐对参加解放巴黎战斗的官兵们说：“我们攀登的苦难的山峰是我们历史中最大的考验。但是，我们知道自己是从什么样的深渊里挣扎出来的，也知道我们要走上什么样的高峰。”正是：越过险峰坦途展，胜利在望喜心间。

欲知巴黎情况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五章 巴黎的解放

千年古城重放光，天翻地覆慨而慷；
巴黎人民庆解放，人间正道是沧桑。

大军直逼法国首都，巴黎就要解放了。四年多来，巴黎一直是人们所厌恶的纳粹占领军的统治中心，现在它又突然成了吸引人心的磁铁，当这个被囚禁被麻醉的巨人似乎酣睡的时候，人们也随着它的消沉而沉默。可是德国人的防线刚在诺曼底被突破，法国的首都就马上又成为战略中心和政治中心了，军事将领的计划，政府的规划，群众的心情，以及野心家的阴谋，都立刻转向巴黎，巴黎将以新的姿态出现。

“如果让巴黎自由抉择的话，它首先必须解决政权问题。谁也不怀疑，戴高乐回到首都时，不会遭到人民的反对，而会受到人民的欢迎。”但是，戴高乐指出：“那些国内外无论站在哪一立场都想阻碍这种情况出现或至少使它不那么美满的人们，都千方百计地想利用解放的最后时机，来制造一个使我感到困难的局面。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把我搞垮。但是，民族已经有所选择，群众的觉悟将粉碎这些阴谋。”

其中进行这项阴谋活动最积极的就是臭名昭著的皮埃尔·赖伐尔。1940年他投降了希特勒，曾先后任维希伪政府的外交部长和总理，甘心事敌，干尽了坏事。他在德国人暗中支持下，妄图在巴黎召集1940年的“国民议会”，并建立一个所谓“联合”政府，然后把它当成合法的政府，来欢迎盟国和戴高乐进入首都。这样就可以抢先代替戴高乐将军组织政府，在精神上剥夺了戴高乐的荣誉，使他失去民众的支持，说他只有空头衔，闹党派纠纷，最后必定在既没有能力管理国家又要实行独裁的双重罪名下遭到人们普遍反对。

赖伐尔是一个诡计多端的野心家。为了使这个计划具有复兴共和国的外貌，首先要有这样一个杰出的人物参加政权：在国会里有代表性，在反对贝当的政策方面很著名，同时在国外又有相当声望。曾任政府总理和国民议会议长的著名政治家赫里欧先生似乎是他寻找的理想人物。只要把他抬出来事情就好办了。同时还要考虑，在盟军进入巴黎时，这个新政权能否得到盟国的承认。另外还要经德国人同意。因为这时仍然是他们的军队占据着首都。最后还要贝当元帅同意，否则德国占领者拒绝批准，盟国拒绝承认，议员们拒绝开会，而在任何情况下，抵抗运动方面的愤然拒绝也是必然的。

8月初，赖伐尔也许认为他可能得到他所期望的必要帮助。他通过美国派来和下院议长联系的昂菲埃尔证实了华盛顿方面有排斥戴高乐的计划。赖伐尔，这位维希投降政府的领导人转向德国人那里，德国人对他的计划也很赞成，并暗中予以支持。实际上，希特勒的外交部长和谋士里宾特洛甫，阿伯兹和其他人，都认为法国一旦解放，最好在巴黎出现一个包括维希分子的政府。赖伐尔取得德国占领者的同意后，就到囚禁赫里欧的马尔维尔劝说赫里欧，同他一起到巴黎来召集1940年的国民议会。至于贝当本人，出于减轻自己罪责的考虑，也对此表示愿予积极支持。

这一阴谋，遭到了以戴高乐为首的抗战运动人士的坚决反对，并对其阴谋予以揭露。他们声明，1940年的国民议会没有资格代表法国说话。此时抗战运动所组织的斗争正在各地风起云涌，巴黎眼看就要解放了。7月14日，在巴黎市郊人们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人们到处插上了三色国旗，高唱《马赛曲》，不断高呼“戴高乐万岁！”这一天被囚禁在桑德监狱的政治犯，在

监房互通声气，冒着被严厉惩罚的危险在所有的窗户上挂起国旗，高呼“打倒法西斯！”“打倒维希卖国政府！”“打倒赖伐尔！”他们的口号声、爱国歌声响彻全区，8月10日铁路工人举行罢工，15日警察罢工，18日邮政电讯人员罢工，巴黎沸腾了，人心向着戴高乐，人们盼望解放。

实际上，从6月6日到巴黎解放，法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霸王”战役开始前，英美两国国家首脑的政治—战略会议，没有邀请戴高乐将军参加，盟国联合参谋总部在运筹决策的过程中，也没有征求法国统帅部的意见，盟国如此无视法国的地位，是这应临时政府领袖——戴高乐将军所不能接受的。他认为，“非经法国政府下令，不得将法军投入任何作战地区”。由于法国没有参加盟国的讨论，他认为法国有理由自由行动，“只要法国本身的利益有此必要，而不问其他国家的意见如何”。

1946年6月底，戴高乐将军通知他的盟国说：“从7月25日以后，法军既不能再留在意大利作战，也不能远离法国本土。”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专家亨利·米歇尔说，正是通过这样的方法。法国才第一次对盟国战略的确定作出贡献。从这以后，盟国就经常把作战计划通知戴高乐将军，而他也对这些计划表示支持。

法国第一集团军有26万人，包括7个师，其中两个是装甲师。这是一支完全摩托化的部队。德拉特尔一就职，就把自己看作是法军的最高司令，不隶属于盟军统帅部。为此曾经举行过谈判，但没有结果。

1944年4月18日，临时政府单方面地确认了德拉特尔的这种态度。最后，盟国之间达成了协议，在登陆之后由法军总部负责第一集团军的战术指挥。这个参加了登陆行动的集团军成了一支独立的法国军队，直接对以戴高乐为首的法国临时政府负责。与此同时，临时政府为“法国内地军”的起义也作了充分准备。在阿尔及尔，科歇将军被任命为“法国内地军”南部作战地区的指挥。在法国第一集团军中设立了一个同他们联系的联络处。

法国临时政府国防部也设立了一个法国内地军局，专门负责这一支军队的调遣和指挥。戴高乐将军再三强调，“法国的首都必须由法国自己的军队来解放！”

当时在巴黎，由冯·肖尔蒂茨将军统率着一支人数不多的德国守军，他们的任务是奉命炸毁桥梁，阻延盟军的推进，而且有些桥梁已经埋上了炸药。但是，冯·肖尔蒂茨将军非常不安，如果他把巴黎破坏了一部分，他就要在全世界舆论面前承担罪责。他不认为自己有足够强大的兵力来打一场胜利的阻击战。虽然他的兵力能够把力量薄弱的起义镇压下去，但是他没有这样坚强的决心，他知道没有指望得到援军，因而愿意接受任何“体面的解决”。

8月19日，瑞典领事诺尔德林出面试谈，达成了停火，但只持续了48小时，因为行动委员会决定，抵抗运动不应遵守这种停火。从8月22日起，一家解放报纸开始出版。抵抗运动占领了广播电台和政府各部，每一个市区都有一个秘书长接管政权。几乎到处都筑起了街垒。德军的优势使法国内地军有被击溃之虞。盟军司令部在接见了巴黎派来的使者之后，终于同意了戴高乐将军的要求，命令勒克莱尔将军率领法国第二装甲师火速向巴黎进军。

勒克莱尔将军率领的第二装甲师隶属于巴顿麾下，于8月1日在诺曼底登陆，并在进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戴高乐于同日抵达，盟军最高统帅部向他作了保证，说只要时候到了——就像早已协商同意的那样——勒克莱尔的部队是会首先开进巴黎的。8月22日傍晚，首都发生巷战的消息，促使艾

森豪威尔决定行动。8月23日艾森豪威尔向勒克莱尔发出的进军命令，开门见山地写道：“任务攻占巴黎！”

勒克莱尔致电戴高乐称，“我得到了这样的印象，即1940年的局面正在倒过来重演着——敌方情况十分混乱，各部队无不惊慌失措。”这位将军决定大胆行动，与其征服德军的集中力量，毋宁避开它。第一批几个分遣队于8月24日从朗布依埃出发，向巴黎推进，这批队伍是前几天从诺曼底开到朗布依埃的。由比约特上校领导的主攻队从奥尔良出发。当晚9时22分，一支坦克先头部队开进市政府前面的广场。这一师的主力队伍准备好在次日开进首都。第二天一早，比约特率领的几个装甲纵队，占领了巴黎城对面的塞纳河两岸。到了下午，德军司令官肖尔蒂茨将军设在默里斯大厦的总部就被包围了，肖尔蒂茨向一位法国中尉投降后，被解交比约特。正在此时，勒克莱尔也赶到了，并在蒙特巴那斯车站建立指挥部，当日下午又移至警察总局的所在地。4时左右肖尔蒂茨被押解到他的面前。这就是从敦刻尔克到乍得湖又回到了老家所走的一条道路的尽头！勒克莱尔以低沉的语调说出了他的思想：“这一天终于盼到了。”之后，他用德语向这个手下败将说明了自己的身分。经过一段简短、不客气的谈话之后，就签订了德国守军投降书。接着，抵抗运动所属部队和正规部队逐一占领了敌方其余一些支撑点。

8月24日，戴高乐将军来到塞纳省省长的办公室。他在那里受到了抗战官员们的热烈欢迎。他一进入大厅，乔治·皮杜尔就喊着说：“我的将军！你瞧，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和巴黎解放委员会都团结在你的周围。我们请您在这里聚集的民众面前庄严宣告共和国的成立。”戴高乐回答说：“共和国一直存在着。自由法国、战斗法国、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都与它形成一体。维希政权过去和现在都是无效的和非法的。我本人就是共和国政府的主席。为什么我还要宣布共和国成立呢？”将军走到窗前，向挤满广场的群众挥手致敬，向他们欢呼：“法兰西共和国万岁！”

晚上，勒克莱尔向戴高乐汇报了巴黎市区的战斗总结。德军所有据点的受降已经完毕。卢森堡宫、矿业学院、孟戴尼中学的所谓“卢森堡”驻军，在欧根尼亲王营房和在阿尔什维大街电讯总局的共和国广场驻军，是最后停火的。法国部队这一天共俘获德军14800人，德军死伤4200多人。法军第二装甲师的损失是28名军官，600名士兵。关于内地军，据负责卫生医务的巴斯德·瓦来利·拉道教授估计，死伤2500人。这是对六天来的战斗的估计数字。此外还死亡了1000多市民。

巴黎解放的喜讯，迅速传遍法兰西、传遍全世界。巴黎城沉浸在狂欢中。人们向德国法西斯强盗阵唾沫，把通敌的奸细拖着游街，而解放队伍则备受欢迎。戴高乐将军就在这这时出现在这一个推延已久的胜利场面上。他于下午5时抵达圣多米尼克道，并在陆军部地址设立了总部。两小时之后，他在抵抗运动的一些主要人物及勒克莱尔将军和朱安将军的陪同下，以自由法国领导人的身分，在市政府首次出现于兴高采烈的群众面前。到处充满着自发的狂欢的热情。

1944年8月25日，戴高乐将军在巴黎市政府大厦，向抵抗运动的军政官员和各界发表了讲话。他说：

你们为什么要我们在自己家里，在起来解放并且亲手解放了自己巴黎的时候，把激动着我们每个男女公民的激情掩藏起来呢？决不，我们不能把这种深刻而神圣的激情掩藏起来。这是在我们不幸的一生从未有过的时刻。

巴黎！被敌人蹂躏过的巴黎！横遭破坏的巴黎！受尽千辛万苦的巴黎！巴黎，到底是解放了！巴黎是自己解放了自己，巴黎是它自己的人民在法兰西军队的协助下，在全法国、战斗的法国、唯一的法国、真正的法国、永久的法国的援助和支持下解放的。

当然，盘据巴黎的敌人在我们手下投降了，法兰西又回到巴黎来了，它又回到自己的家里来了。法兰西虽然遍体鳞伤地回到巴黎，但它却是十分果断坚决的。法兰西回到巴黎，无数的教训使它清醒过来，它对自己的义务和权利，比任何时候都要看得更明确。

我首先谈一下它的义务，目前，我们把所有的义务总括为战争的义务。敌人虽然动摇了，但它并没有被降伏。它还留在我们的土地上。我们不能满足于借助我们敬爱和令人钦佩的盟军就能把敌人赶出去，我们不能满足于过去。我们必须以战胜者的姿态直捣他们的国境。所以，法兰西先头部队是以炮击进入巴黎。所以，在意大利的法国大军在南方登陆后，即迅速向罗尼会流域挺进。所以，我们那些英勇可爱的内地军要装备起新式武器来。这是为了雪耻，为了报仇，为了正义。我们必须继续战斗，一直战斗到全面而彻底的胜利为止。在场的同胞们，还有法兰西听从我们的人都要知道，这个战争的义务要求全国统一。

在目前的情况下，国家不容许破坏它的统一。国家很知道，为了胜利，为了复兴，为了使它壮大强盛，必须有它的全国儿女跟它站在一起，国家知道它的儿子，它所有的儿女（几个可恶的投敌的卖国贼除外，他们知道或将会知道国家法律的尊严）。不错，法兰西的所有儿女，应当像兄弟般共同携手，走向法兰西的目标。法兰西万岁！

翌日下午，8月26日，戴高乐举行了正式的入城式。沿途到处是欢迎的人群，房屋上下不知有多少飘扬的旗帜！从隆瑞莫起，欢迎的群众越来越多。在布尔拉来纳附近，人群更是拥挤。在奥尔良门前，人山人海，简直是一片欢腾的海洋。下午3时，戴高乐来到凯旋门，临时政府的官员和将军们，以及内地军的许多军官和战士都站在英雄纪念碑前。戴高乐向乍得团致敬。他们在凯旋门前排成战斗队形，当这位抗战领袖在广场上从官兵们面前经过的时候，他们都站在车上向领袖行注目礼。戴高乐重新点起碑前的灯火。自1940年6月14日侵略军占领这里以后，谁也没有这样做过。随后，他离开了凯旋门和平台，渐渐远离了参加大会的人们，徒步向香榭丽舍大街走去。

“啊！简直是人的海洋！人山人海，到处都是欢呼的人群。总有200万人。屋顶上黑鸦鸦的一片人。”戴高乐在回忆录中写道：“窗口里密密拥挤着人，人群中间则夹杂着许多旗帜。梯子和柱子上边甚至也爬满了人。凡是能看到的，都是阳光灿烂、国旗飘扬下的人群的巨浪。”

这不是一个武器闪烁，军乐响亮的阅兵节日，今天是一个曾经沦为亡国奴、受尽压迫和摧残的民族，在欢欣鼓舞的景象和自由的气氛中重见天日。人们选择了戴高乐作为自己灾难中的救星和希望的象征。人们没有忘记，在法兰西民族处于最黑暗的年代，在贝当元帅拱手向纳粹元首投降的时候，是戴高乐向海内外发出了庄严的抗战号召，是戴高乐领导法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如今抗战就要胜利了，人民怎能不拥戴他呢？人民怎能不感谢他呢？人民怎能不向他欢呼致敬呢？

戴高乐在群众暴风雨般高呼他的名字的时候，激动而又镇静地走着，尽力使他的视线看到这个欢腾浪潮中的每一个浪头，看到人海中每一个人的眼

睛，他的双臂时起时落，答谢群众的欢呼。他先后在凯旋门广场，在园点广场，在协和广场，在市府大厦前，在圣母院大教堂的门前，走到无数的法国人中间，面黄饥瘦的儿童们手舞足蹈向他大声欢呼！经受了无数苦难的妇女们笑逐颜开，向他高呼万岁！老年人流着眼泪向他致敬！“啊！你们，都是患难与共的人们！”戴高乐心想，“至于我，在这种激动欢腾之中，深深感到应该完成一个远远超过自己能力的任务——担当国家命运的舵手……我应当总结一下已经完成的事业，筹划一下我的将来。今天统一大业成功了。这个统一奠基于布拉柴维尔，成长于阿尔及尔，而完成于巴黎，这个曾经饱受灾难、悲痛和分裂的法兰西，现在又能勇敢地到目前的这出戏唱到底，胜利地收复全国的领土，恢复它的地位和尊严。”

1944年8月29日，戴高乐在巴黎广播电台向全国人民发表了讲话。他说：“巴黎的德寇在法国人民面前投降已经四天了。巴黎解放已经四天了，一种无比的喜悦和骄傲使全国沸腾起来。甚至全世界的人们，当听到巴黎从苦难深渊中摆脱出来而又将重放光芒的时候，也都为之欢欣鼓舞。”

“法兰西向一切使巴黎走向胜利的人们表示感激。”戴高乐说：

“首先，我们应感谢巴黎人民，他们在内心深处从来没有、绝对也没有承认失败和屈服；感谢那些致力于击退敌人而在这里长期积极进行抵抗侵略者的男女英雄们；感谢那些就地作战打击敌人并使敌人投降的法国军人；感谢那些身经百战、来自非洲或临时在内地军领导下组织起来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英勇战士；感谢那些在战场上或绞刑架上牺牲的男女同胞们。同样，法兰西也感谢那些优秀的盟军和盟军将领，他们英勇胜利的反攻解放了巴黎，同时也决定了我们全国的解放，并与我们共同粉碎德军。”

“可怕的狂潮已经退去了，全国人民兴高采烈地呼吸着胜利和自由的空气。在各个角落里呈现出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我们的国家感到今后不仅有希望，而且完全有把握成为一个战胜国。我们的远景像美丽的春天一样，我们可以重新出现在世界的行列中，也就是像它过去那样，站在最大强国的行列里。”戴高乐进一步指出：“不过，我们国家也知道它距自己要达到和所能达到的终点还有多大的距离，它必须注意到如何彻底使它毫无保留地打垮敌人，并使法国在最后胜利中具有最大的功绩。它注意到自己领土上和它的人民遭受灾难的程度。它也考虑到现在的极端困难的粮食供应。运输、武器装备和它目前阻碍战斗力以及解放地区生产力的装备。”

戴高乐最后强调说，“我们的事业也就是人类的事业，它必然会取得胜利，使我们有理由欢欣鼓舞和骄傲，但这决不等于一切都已安排就绪，恰恰相反，我们知道，在我们与目标之间，还有许多艰苦的工作和一段非常困难的路程。这种工作，法兰西人民决心要完成它。这些困难，他们愿意忍受。因为这是在经历无数考验之后，为了获得自己的幸福、自由和伟大所应付出的代价。”

巴黎解放之后，法国南部地区也陆续获得解放，到1944年11月，只剩下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一部分地区尚待光复。当然，战争还没有过去，100多万战俘还在德国，他们境况悲惨，危在旦夕。重建的任务甚为艰巨。但是，除了一小撮追随德军的通敌分子以外，举国上下空前团结，群众热情高涨，向往新的生活。

戴高乐将军改组了阿尔及尔政府，吸收了法国抵抗运动委员会的成员，同时取消了抵抗运动建立的一些临时机构，恢复了传统的国家机构。他的权

威为全国各地所承认。他所到之处，人们都把他作为领袖欢呼。但是，这个国家在精神上和物质上仍然是一片混乱。抵抗运动在各级都安插了他们所中意的人，而这些人并不都适合于承担他们所面临的任務。人们的狂怒表现为抢劫和残暴行为，通敌的妇女被剃光了头，男的遭到毒打和游街示众，许多人被关起来和被当场处决。解放委员会已经掌管了绝大部分省的权力，他们正着手制订法律，征用物资，并着手解决解放后所出现的各种问题。

有些地区的形势仍然动荡、紧张，特别是在盟军活动范围以外的西南部，那里的新政权还没有建立。但是，这种动荡局面没有持续很久。由于执行了在地下制订好的一些措施，一切又逐渐开始恢复正常。人们的自发镇压行动受到了引导和限制，设立了特别法庭——军事法庭，但主要是民事法庭和法院负责对敌特的审判。

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从基督教抵抗运动中产生出来的第三大党“人民共和运动”都参加了政府，这个事实表现了“举国上下的团结一致”。政府中也包括了传统的右翼势力代表，不过只限于某些知名人士。至于维希政权本身，它的一切都完蛋了。它的法律被全部废除，头目们进了监狱。德国人不顾贝当和皮埃尔·赖伐尔的意愿，把他们迁到了西格马林根。他们罪行昭然若揭，遭到了法兰西人民的咒诅和痛骂。

对赖伐尔这位政治播客，戴高乐在回忆录中评述道，“赖伐尔进行了一场赌博，他输了。他有勇气承认自己应对一切后果负责。他为了支撑那岌岌可危的局面，在当政期间无疑使用了一切诡诈手段，力图以此为他的傀儡政权效劳。但愿人们会承认这一点，在那灾难深重的岁月中，有少数甘愿在耻辱的泥坑中爬行的法国人。

并没有完全自绝于祖国，这是事实。”

就在这个时候，戴高乐又收到了贝当的一封信，严格他讲，这封信是维希政权前任部长奥方海军上将托朱安将军转给戴高乐的。贝当在被德国人拘禁起来以前，给这位海军上将下达了一个1944年8月11日签署的秘密文件，授权他代表贝当本人去同戴高乐取得联系，以便使“所有善良的法国人”重归于好。但他又加了一个附言；“只要我所体现的法统得到了维护。”贝当和戴高乐两人所扮演的角色完全调了个个！一度是戴高乐上司的法国元帅，现却希望与他曾批准判处死刑的人取得谅解，戴高乐又一次面临着在个人感情和国家利益之间作出抉择的问题。这一次他也没有犹豫。他决定不予答复。他觉得，有资格自称正统的，决不是这个曾经在希特勒面前屈辱投降的老头子。只有一个人体现了法统：这个人拒不承认失败，并引导整个民族恢复了尊严。这个人就是戴高乐将军。

坚持抗战、全民起义使法国得以再度跻身于盟国之林。盟国终于承认了共和国的临时政府。戴高乐将军所说的“通过斗争赢得独立，重新恢复法国的荣誉”已成为现实。既然共和国政府得到了盟国的承认，群众的拥戴，又有了机构和军队，因而它也就在联盟中有了更大的发言权。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六章 华盛顿之行

法美关系要改善，将军赴美搞谈判；
披荆斩棘开新路，不卑不亢受称赞。

巴黎虽然解放了，但是美英政府至今还没有正式承认戴高乐政权，因此在外交上还面临着一些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戴高乐清楚，在对外关系中，美国是所有链条中最重要的一环，这个环节打开了，其他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因此，他决定再次到美国访问。

罗斯福对法国的态度已经讲过多次了，他将不会直接或间接支持任何总统候选人、任何政党，但法国解放后，谁来执政呢？关于这一点，罗斯福确实认为，只有摆脱了奴役的法国人民能够选择适合于他们的政府形式，并由他们自己选举国家领导人。罗斯福希望这场斗争“是民主国家的一场斗争”。它不应该以建立波拿巴或佛朗哥式的军事政权而结束；他希望由幸存的法国文官和议员们组成未来的政府。因此，总统向军事领导人下达了最严厉的指示，例如要马歇尔、艾森豪威尔、史密斯将军避免表示支持戴高乐，对沦陷的或自由的法国所奉行的政策，是只同“地方当局”打交道。

从罗斯福与艾森豪威尔的一次通信中可以看出他这种立场。1944年5月，艾森豪威尔向马歇尔参谋长寄去一份绝密报告，请他转交总统，作为对罗斯福来电的答复。报告写道：“请总统放心，在同法兰西委员会的谈判中，我只涉及军事问题和与军事方面有关的民政管理问题，我理解你焦虑的心情，我将不会作出任何可能被看作是影响未来法国政府性质的事情。但是，根据特工人员和逃跑的战俘向我提供的情报，我想告诉你，目前在法国只有两大集团：维希‘帮’集团和对戴高乐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另一个集团……只要我们解放一些地区，我们就可能发现人们普遍要求加入戴高乐集团……我向你介绍了也许在法国会出现的情况，当然，我不会向法兰西委员会的成员们阐述这些看法。”

罗斯福一接到报告，就大发雷霆，通过马歇尔将军对艾森豪威尔作了答复。从1944年6月2日的措辞强烈的秘密备忘录可以看出罗斯福的心情：马歇尔将军，当你到达那里时，告诉艾森豪威尔将军，我读了他寄给我们的报告，但我仍然认为他没有理解我的思想。虽然，他相信新闻界编造的我反对戴高乐、仇视戴高乐的愚蠢谎言。当然，这一切毫无意义。我随时准备看到戴高乐成为总统、皇帝、国王或随便什么人，只要这是法国人民自由作出的决定。……但是，我不同意法国只有两大集团的说法。”罗斯福总统再次表示了不支持任何候选人的愿望，并期待法国人民作出选择。

军人们，如艾森豪威尔和美军谍报机关已经意识到随着法国领土的解放，戴高乐将军的巨大声望和承认戴高乐为其领袖的抵抗团体对戴高乐有效的和勇敢的支持。但是，罗斯福的敌视和不信任态度，在诺曼底登陆时明显地表现出来。战役的一切，都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准备着，好像戴高乐和法国临时政府不存在似的。总统认为军事指挥权应授予艾森豪威尔，因为他是盟军总司令，他享有极高的威望，能就地保留维希的官员，如有必要，还可以用经过特殊训练的美国军官来管理地方事务。

因此，双方的冲突、矛盾加剧了，戴高乐原同意6月6日至8日对华盛顿的访问，也推迟了。6月10日，戴高乐向报界发表谈话，谴责盟军在解放了的法国领土上实行军管，印制并在法国境内发行毫无价值的“货币”。对

戴高乐在法国享有声望早有了解的艾森豪威尔将军，派其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前往伦敦，以设法要求罗斯福总统在华盛顿接见戴高乐，并一劳永逸地处理已变得棘手的局面，幸好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也在伦敦，他了解戴高乐与罗斯福的冲突，很支持艾森豪威尔的要求。与此同时，费纳尔海军上将，于第二天从华盛顿到达伦敦，带来了罗斯福总统的信件，就与戴高乐的会晤，提出了几个可供选择的时间。

戴高乐不卑不亢，坚持独立外交。他不愿看到安法情况重演。当时罗斯福根本听不进他的意见。6月8日至20日间，比利时、卢森堡、南斯拉夫、挪威、波兰和捷克的流亡政府均承认了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这对戴高乐还不够，他宣称将代表法国进行访问。

1944年6月14日，戴高乐在法国北部进行视察，所受到群众热烈欢迎的场面，美国报刊都作了充分报道，并要求美国政府迅速改变对戴高乐的态度。在这之后，戴高乐又以国家元首的身分访问了意大利和梵蒂冈。所有这些都有效地提高了他的地位，使他后来不是以乞求者，而是以一个盟国代表的身分与罗斯福进行对话。

6月11日，戴高乐在致战斗法国驻美代表普利文和马西格利的信中说：“罗斯福总统本人向公众介绍我访问华盛顿计划所采取的那种极不确切和带倾向性的方式，以及让美国报刊就此发表的评论表现了同样的、应当称之为霸权主义的思想。这是恩赐予我的访问，他想让人们相信是我自己要求的。似乎我戴高乐必须经美国总统审查资格才能得到他颁发的管理法国的证书。”

在这场涉及到法国前途和与美国关系的会晤前夕，两位政治家都没有平息怒火。为了强调不举行任何谈判和充分显示戴高乐是罗斯福的唯一客人，任何部长都不陪同将军前往。6月24日，戴高乐将军在致驻华盛顿代表的电报中明确地表示了他的立场：“我既不需要什么，也不打算特别要求什么，尤其是关于让美国正式承认临时政府的问题，我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因此，我不准备提出这一问题。”

1944年7月6日，戴高乐抵达华盛顿。他被当作一位高级军事领导人，在机场受到鸣礼炮17响的欢迎，没有给予国家元首鸣礼炮21响的礼遇。在欢迎的人群中，有法国人、美国人和新闻界人士，以及美国著名将领马歇尔、阿诺德·金海军上将等。但是，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等高级政界人士没有到机场欢迎。

从戴高乐抵达华盛顿起，罗斯福便通过欢迎的陈容向将军表明，尽管是正式邀请，但美国对他的立场没有改变。戴高乐立刻被送至白宫，在那儿受到罗斯福总统的接见，在场的还有赫尔国务卿、前驻维希大使李海海军上将以及美国其他高级官员和代表。罗斯福再次用法语欢迎他的客人：“我见到你是多么高兴啊！”7月7日，罗斯福在白宫设午宴款待将军，并发表了动听的讲话：“我认为，法国有些东西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存在，这就是不仅对我们，而且对全世界都珍贵的文明精神……岁月流逝，我们已看到法兰西的黎明来到了，我们已看到这一文明将获得全部解放，不仅是过去的文明，而且比战争以前更吸引人。更伟大的文明都将获得全部解放。”

罗斯福在向法国致意后，又特别亲切地对将军说：“一年以前，也就是去年的一月，我第一次会见了戴高乐将军。我非常高兴我们今天又有第二次会晤，我希望还有第三次，乃至更多次的会晤……在法国人和美国人之间，

或戴高乐将军和我本人之间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一切都会得到很好的解决。毫无例外，戴高乐将军和我本人，今天早上曾谈到涉及全世界的许多事务，我们对世界前途的看法完全一致，并且同意解除德国武装，使其近五年发生的事情在今后 50 年内不再重演。”

戴高乐在美访问期间，曾和罗斯福举行了两次单独会谈。他们谈论了法美关系和未来世界的组织问题，罗斯福的“雄心壮志”给戴高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戴高乐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我们的会谈中，他根本不提棘手的事情，而只让我理解到他自己想从胜利中达到什么样的政治目的。在我看来，他的胃口是不小的，它使欧洲和法国感到不安。按照总统的看法，美国的孤立主义是过去的一个最大的错误。但是，罗斯福从一个极端跑到了另一个极端，他打算通过国际法来建立一个常设的干涉机构。在他的思想中，他要建立美国、苏联、中国、英国四大国的领导权来解决全世界的问题。”

“我静心倾听罗斯福给我叙述他的计划。”戴高乐说，“好像这是符合人道的，他用理想掩盖其强权意志。而且总统决不是光谈原则的教授，也不是根据情感和利益来谈事情的政治家，他轻描淡写地把事情一笔带过，以致很难公开反驳这位艺术家和幻术家。但是我回答他说，照我的看法，他的计划冒着把西方国家置于绝境的危险。如果把西欧看成是次要的，岂不是要削弱他自己所从事的文明事业吗？”

“西欧是应该复兴的，”戴高乐对罗斯福说，“如果它复兴起来，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宁愿以它为榜样。如果它削弱下去，蛮横的暴力就要席卷一切。虽然西欧存在着一些分歧，但是西方国家还是一个重要因素。任何东西代替不了古老民族的价值、能力和光辉。的确，首先是法国，它是欧洲的大国。只有法兰西，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是你们的盟友。我知道你们准备从物质上帮助它，这对它是十分宝贵的。但是在政治上也应该使它恢复自己的实力和信心，因此，必须使它能起作用。如果有关世界最重要的决定不让法国参加，如果法国丧失了它在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地，一句话，如果战争的最后决定给它造成一种战败者的心理，那它怎么能起作用呢？”

“罗斯福的伟大在于他的看法同我很相近。”戴高乐说，“况且，他对法国至少也抱着他过去所具有的那种真实的感情，但是，正是由于这种感情，所以由于我们昨天的惨败而内心里感到失望和生气。同时，看到法国的惨败在许多法国人的心中没有引起多大反应，特别是他自己接触过的人当中更是如此，这就使他非常痛心。他全盘托出，对我吐露了内心的感慨。关于前途问题，他肯定我们的制度会重新恢复起来，他向我描绘了战前他看到我们的政治无能时那种难言之痛。他对我说：‘我这个美国总统，甚至有时还想起法国政府的短命总理的名字，在这儿，现在你看到我国热烈地欢迎了你。但演完这幕悲剧后，不知道你是否还是政府的领袖？’”

“使罗斯福回忆美国的孤立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法国惨败中叫我们多么失望并不困难，但毫无用处。”戴高乐说，“另外，指出他对戴高乐将军和战斗法国的态度，除了使大部分上层人物抱着观望的态度以外，将怎样使法兰西民族重新陷入他所不欢迎的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也同样是没有什么用处的。美国总统的见解终于使我相信，在国际事务中，理论和感情同强权的现实比较起来是不重要的；最主要的是人们所掌握的和坚持的事实；法国要恢复自己的地位，只有靠自己。我把这件事向他说明了，他笑了起来，最后说：‘我们应该努力去做；但是，的确，为法国服务，谁

也不能代替法国人民，’ ”

罗斯福与戴高乐的几次谈话共用了两天半的时间，但在国务院和总统私人秘书的记录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只是戴高乐的《回忆录》描述了当时谈话的情景，二人情绪激动，却是友好的。不管怎么说，当时罗斯福正处在权力的顶峰，美国作为世界最强国，在军事、工业和财政方面控制着它的盟国。罗斯福对世界未来有着全球性的看法，只想着向对方阐述这种观点。而戴高乐所考虑的仅是满目疮痍的法国的问题。法兰西在罗斯福所描绘的奇妙的巨幅画面中，只占无足轻重的地位。在分歧的问题上，二人总是各讲各的，谁也不愿听取对方的意见。

会晤之后，罗斯福于7月11日在白宫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表明总统仍旧坚持原来的立场：“在法国人民选出它的政府之前”，他同意法兰西民族委员会作为“事实上的民政当局”。罗斯福在回答问题时明确指出，“戴高乐的委员会不被看作是法国的临时政府”，艾森豪威尔将军可以自由地同法国其他行政当局进行谈判，由他选择或任命能够维持治安的地方行政当局。

这次会谈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成果，双方共同的感受是彼此极不信任，而且对以往发生的冲突均记忆犹新。但在分手前，罗斯福总统把他亲笔题词的照片送给戴高乐。上面写着：“赠予我的朋友戴高乐将军。”

戴高乐没有在美国逗留过长的时间，因为离美国大选只有几个月了，他不愿引起自战争开始以来就不赞成美国对法政策的新闻界对国务院和罗斯福的敌视。但是，在短短的访问结束时，戴高乐在驻华盛顿大使馆举行记者招待会，吸引了大批法国记者和美国记者。戴高乐在会上谈笑风生，平静地用法文谈着法国的解放、某些重大问题以及法美友谊。当他进入会场时，人们起立向他欢呼；在记者招待会上，记者们不断地向他鼓掌。美国新闻界大多数一直支持他的行动，要求罗斯福总统承认戴高乐领导的政府。

记者招待会一开始，戴高乐先用英语说道：“早上好，女士们，先生们。”接着用法语宣读他事先准备好的稿子，戴高乐谈了他这次访美的目的是与罗斯福总统讨论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他说：“我将带着在美国首都逗留期间留下的美好印象离开这里。我这次有机会同许多内阁成员……国务卿、议员、将军们会晤。我认为，我们达到了罗斯福总统和我本人力此行确定的目标：原则上，我们就这场战争中和战争结束后美国和法国共同关心的问题客观、坦率地交换了意见，还议论了将来建立世界组织的问题。我们应当迫使德国和日本完全投降，然后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国与国的团结不再是一句空话。”

“罗斯福总统同我谈了这一切事情，还谈到战争期间和战后美国的对外援助。”戴高乐说，“罗斯福先生高瞻远瞩，理解问题，他的理想主义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而我则尽力向他说明了法国在逐渐摆脱暂时的灾难以后，首先和盟军按照自己的地位共同参加作战，一步步走出它暂时的苦难。它打算先与盟国一起参战，进而分享世界和平生活。”

在场的记者们惊奇地发现他们面前的是一位和蔼可亲、高尚和持重的人。在记者的报道中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他不高做……”，“毫无骄傲的痕迹……”，“他不卑不亢”，“黑黑的眼睛，平静的声音”，“不像漫画上画的那个样子”，“没有长鼻子”，“忧郁的面孔反映了法兰西的痛苦”，“一张自负的脸，但充满人情味”……

最后，戴高乐巧妙地回答了一些记者提出的一些不适宜的或荒唐可笑的

问题。

问：你同美国就已经解放的领土上实施民政管理达成协议了吗？

答：这个问题未列入事先预定的日程，但我希望它所创造的气氛能够在在这方面取得积极的成果。

问：你是否把临时首都设在雷恩？

答：法国的首都在巴黎。

问：目前你相信美国决不打算得到法国的领地吗？

答：我相信美国总统、美国政府和人民毫无这种想法。

问，你同罗斯福总统讨论过可能在法国举行一次公民投票以确定是否承认你的委员会为法国政府吗？

答：没有。这是法国的内政问题，只同法国人民有关。

问：你认为法兰西帝国会完整无缺的归于你们吗？

答：我深信法国将完整无缺地收复属于它的一切，但法国宪法和法兰西帝国在未来的世界中将不再是原来的样子。

问：战争之后，法国要求其他领土吗？

答：关于非洲和远东，法国不再有任何要求。但在欧洲则是另一问题。

问：有人说法国将不是从战争中涌现出来的四大强国之一。法国认为自己是一个大国吗？

答：空谈改变不了事实。很明显，如果不把法国摆在大国地位，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世界组织。

戴高乐在美国的访问，在公众舆论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著名评论家李普曼在6月28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文章说：“法国抵抗运动的事实已经过了检验和证明，这一运动完全是由戴高乐将军领导的。”又说：“在已经解放了的法国领土上，文官政府完全掌握在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代表手中，这一事实是任何人也否认不了的。今后英法美的关系应当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这是双方进行谈判时指导任何一方的根本原则，如果我们能有远见承认这项原则并明智地遵守它，那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也没有不可调和的争端。”

美国著名新闻界人士对罗斯福政府的对法政策提出批评和表示不满《纽约时报》评论员德鲁·米德尔顿7月29日撰文说：“对法国未来政府的态度使人感到惊奇。在这一地区的大多数法国人期待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力法国临时政府。他们听说在这个问题上存有争议非常吃惊。”

《纽约先驱论坛报》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哈罗德·卡伦德发表了一系列主张尽快承认戴高乐政府的文章。他权衡了英国和苏联关于提高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立场和软化美国保留态度的立场之后，得出结论：“英国政府事实上已经百分之百承认了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他指出：“没有正式承认法兰西解放委员会的原因是，美国政府拒绝与苏联和英国采取一致立场。罗斯福总统在对法政策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文章最后说：“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如果美国政府继续奉行目前对法国人的政策，必将使对美国所于蠢事具有惊人耐心和容忍的朋友们产生反感，它所引起的后果与美国所期望的目的正好相反。”

在卡伦德文章之后，著名评论家杰弗里·帕森也发表文章说：“国务院继续拖延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使美国盟友感到为难和恼火。英国和苏联政府已明确通知我们，它们希望考虑立即承认。”美国公众舆论普遍认为，

戴高乐将军的华盛顿之行，如果说没有改变罗斯福总统对他的看法的话，至少在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这一重大问题上引起了美国新闻界和公众舆论的关注。美国公众舆论随后掀起了一场支持戴高乐的运动，由于坚定不移，据理力争，白宫被迫再次做出让步。

1944年8月25日，戴高乐返回巴黎，受到隆重欢迎，证明了他一贯采取的立场是正确的，第二天，即8月26日，罗伯特·墨菲代表美国，哈罗德·麦克米伦代表英国，把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证书交给外交事务专员勒内·马西格利。美国的文本要比英国人的更有限制性：“美国政府赞成建立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我们希望委员会将按照所有成员集体负责的原则进行工作，以便继续积极进行战争。鉴于争取战争胜利，共同努力极为重要，与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关系仍应当继续服从盟国指挥部的军事需要。”美国人审慎地承认了有限主权，英国人承认的范围更宽一些。至于苏联人，他们无保留地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为法兰西共和国利益的代表。

罗斯福终于在事实面前低头了，1944年10月23日，他正式承认了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戴高乐想起以前所受的屈辱，得知这一消息时毫无热情。几天之后，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有人问他有何感想时，他回答说：“我可以告诉你，法国政府为别人愿意称呼官的名字而感到高兴。”对戴高乐说，这一承认不简单意味着只是接受这种法律状况，并把法国同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摆在符合礼宾的地位上，而是表明接纳法国为盟国作战委员会成员。“合法性不仅在于国内认为一个行政当局有权被承认，被服从；同时国外也承认它具有代表性，”

戴高乐以一个被承认的大国元首的身份向丘吉尔和艾登正式发出了邀请，11月10日，二人来到巴黎，戴高乐也向罗斯福总统和科德尔·赫尔国务卿发了邀请，但被他们婉拒，戴高乐从中看出，他与罗斯福的私人关系没有多大变化。罗斯福邀请了俄国、英国和中国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会上讨论了成立联合国的初步方案。法国没有被邀请。但罗斯福总统不愿激怒戴高乐，他在1945年1月6日的国情咨文中，赞扬法国人在1940年拒绝投降，进行抵抗。他承认法国有权解决德国问题。他打算让法国作为一个强国重返世界舞台，认为这样做可以取悦戴高乐。

虽然美国在承认法国临时政府问题上还有些扭扭捏捏，但戴高乐在争取外交承认上总算取得了重大突破。欲知巴黎解放后，这位法国抗战英雄，在内政、外交上采取如何措施，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七章 重建法兰西

战争结束忙重建，恢复创伤任务艰；
将军锐意搞改革，满目疮痍变新颜。

解放的步伐极其迅速。到 1944 年 9 月底，除阿尔萨斯及其前进阵地、阿尔卑斯各山口和大西洋沿岸的据点以外，法国领土上的敌人均已肃清。但是，潮水退下去以后，法国创伤的痕迹完全暴露出来了。

当时，戴高乐政府在治理这样一个刚爬出痛苦深渊的国家过程中，面临着许多难题。首先，为了正常行使中央政权，政府必须能够了解情况，下达各项命令并监督其执行。但是，在若干星期以内，首都和各省之间还不能有正常的联系。无数的电报和电话线路被切断了，无线电台被破坏了，在弹痕斑斑的飞机场上看不到法国的联络机。铁路几乎全部不能使用。全国 12000 台机车只剩下 2800 台，桥梁 3000 多座被炸毁，300 多万辆汽车只有 30 万辆能勉强使用。

需要做的事情很多，百业待兴，为了了解情况，戴高乐在几个星期内走遍了全国大部分地方，利用各种场合将近 1000 万法国人见了面。人们感到他和蔼可亲，关心群众疾苦，是当之无愧的领袖。

9 月 12 日，戴高乐在沙约宫召开了一次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全国抵抗委员会、各运动组织、市议会、国家团体负责人，巴黎大学以及经济界、工会、新闻界和律师公会的代表等，共计 8000 多人。戴高乐在会上扼要地阐述了自己的施政方针。在他追述了全国掀起的“欢乐、骄傲和希望的浪潮”后，便着重说明应当克服的困难和必须进行的努力。“不容许有任何贪图安逸、散漫松懈的情况存在！不容许有脱离政府、妄图干涉司法和行政的任何组织存在！”他说：“我们正处在一个十分艰苦的时期，解放决不容许我们有任何享受思想；相反，它意味着我们要继续过苦日子，并且要求我们进行艰苦的劳动，服从严格的组织和纪律。”

戴高乐接着宣布了临时中央政府所规定的目标，他说：“设法使法国工人的生活水平随着生产水平的上升而逐步提高；通过征用或保管的方式把某些公共服务机构和企业的活动直接交给国家管理；没收投敌分子所拥有的罪恶财产；在生产和运输还不能满足消费需要的时候，规定物价和监督交换。”

“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在国家还有许多困难的时候，要求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国家巨大资源的经营和管理要有利于全体国民；永远消灭投机赢利联盟，总之，要使法兰西的每个儿女都能安全而又有尊严地生活。劳动和教养子女。”戴高乐向参加抵抗运动的男女战士发出呼吁：“你们是佩带着洛林十字勋章的人，你们在争取法国的荣誉和自由的战斗中是全国的先驱，你们今后的任务是把全国人民引向富强和伟大的道路。这样，并且也只有这样，法国才能获得伟大的胜利。希望大家在重建法兰西的战斗中，勇立新功，为人民作出新的贡献！”

戴高乐认为，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而不是依靠企图在他与群众之间制造障碍的“社会名流”。但是，很多省份传来的消息都显示出普遍的混乱。四年来，人们的积怨大多了，郁结在心中的这种愤怒，在敌人及其走狗树倒猢猻散的时候，必然要爆发出来，有很多抵抗运动中的人要亲手肃好。游击队员们不通过法律手续就随意制裁曾经迫害过他们的人。在不少地方，公愤发展成为粗暴的反抗，这里面当然也有趁火打劫的

政治阴谋。总之，非法逮捕、任意罚款和对通敌分子不经审讯立即处死等情况，使由于普遍穷困而产生的混乱越来越严重了。

根据这种情况，戴高乐决定因势利导，在全国开展揭发、控诉维希政府和通敌人员的叛国罪行的活动。法国人民对维希头目赖伐尔和贝当之流怀有深仇大恨。从一开始，赖伐尔就是“忠诚合作”的鼓吹者，而贝当则希望在所谓“停战协定的保护下”保持中立和自治。赖伐尔曾设想英国不久也会像法国一样被打败。他看到的前景是整个欧洲都会变成在纳粹德国控制下的极权国家。在这样的欧洲，法国的唯一出路是与纳粹德国全面合作，甚至向它原来的盟国英国宣战。在他看来，不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法国的“波兰化”——消灭法兰西国家的一切痕迹，由纳粹地方长官直接统治。

在1940年下半年，赖伐尔第一次当政时期，这种推理如果还比较站得住脚的话，到1942年4月，他再次掌权时，事情已经清楚：他的英国会迅速战败的臆测并没有成为现实。但赖伐尔仍然非常自信。他认为，在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与德国人合作打败布尔什维克是可能的。他推测，德国将会打败东方的俄国，而在西方，他，赖伐尔将会成为德美之间谋求妥协性和平的中间人，那时英国已无力影响事件的进程了。

赖伐尔一上台就“助桀为虐”，帮助德国人干尽坏事。为了便于对法国占领区的掠夺，德国人在赖伐尔的支持下，发行了一种占领区马克作为法币，人为地规定一马克兑换20法郎。在占领的头三个月里，法国机床被运到德国的有500多台，85%的法国钢铁工业被置于纳粹控制之下，或干脆被德国人吞并了。据6月20日颁布的法令，法国被占领区一切原材料和产品的出口都被纳粹所控制。

贝当这位昏庸无能的老帅，当初，法国人民在失败的情况下曾寄希望于他，把他作为未来艰难岁月中能引导他们、保护他们免受德国人之害的父辈人物。但他的所作所为，却让人民大大失望了。他上台不久就宣布把坚持抗战的戴高乐缺席判处死刑，并颁布了许多限制抗战的反动措施。他选择了达尔朗海军上将作为他“没有政策的政策”的执行人。虽然他标榜既反德又反英，但到头来总是向纳粹让步。正是在他执政时，内政部长皮埃尔·皮舍在“法兰西退伍军人组织”中招募人员，组成一个某些方面与纳粹党卫军类似的“退伍军人团”，其誓词是：“我宣誓对民主、对戴高乐派的邪说，对犹太瘟疫进行斗争。”这个“退伍军人团”，效法纳粹，兜捕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不分男女老幼，统统塞进毫无卫生设备的列车里，运交德国人。

达尔朗维持了14个月，从1941年2月至1942年4月。德国人不断施加压力，赖伐尔也大肆鼓吹他自己的政策，终于赖伐尔作为维希政府的内阁总理再次登台。在1942年6月22日，德国人入侵俄国周年纪念这一天，赖伐尔表示，希望德国人战胜布尔什维克，并号召法国工人报名到德国做工，以使法国战俘得以遣返。后来，当报名者寥寥无几时，赖伐尔就强行规定，18岁到50岁的男性，21岁到35岁的单身妇女都在动员之列，致使35万名工人到德国去服苦役。后来得知，前去服苦役的人大部分死去了。赖伐尔和德国人狼狈为奸，实际上使法国“波兰化”了。

德国人的下一个要求是立即搜捕法国两个区域内的全部犹太人。赖伐尔又与德国人谈判，7月23日，双方达成协议：德国人只能从占领区运走外籍犹太人，自由区只向德国人移交外籍犹太人。此后的两个月中，维希当局把10410名犹太人送到纳粹集中营。

随着盟军在北非的登陆，法国舰队的舰船于1942年11月27日被凿沉，以及两个星期前德国武装部队对法国自由区的占领，维希政权堕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赖伐尔仍留任总理，贝当日益退居幕后，或者他的部长们已干脆不把他放在眼里了。

1943年1月14日，赖伐尔又把25万名工人强迫送到德国去劳动。至法国解放前夕，维希政府完全堕落成甘心事敌的卖国政府。

根据他们的罪行，法国临时政府——解放委员会决定对维希政权的主要人物进行审判或缺席审判。

1945年7月23日，贝当元帅被带到法庭。审判一开始，贝当就宣读了他的辩护声明，此后，他一直不回答任何问题。在听取了全部证词后，他只作了又一个更简短的声明。第三共和国的知名人士——或者说臭名昭著的头面人物——都出庭作了证，达拉第、雷诺和魏刚也在此列。不过，他们每个人主要关心的都是为自己在最近发生的那一系列悲惨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辩护，而不是去协助弄清楚贝当的所作所为。最轰动的是皮埃尔·赖伐尔的出庭作证。在这以前，一架德国飞机把他送到西班牙避难，但佛朗哥把他送回了德国，美国军队又把他转交给戴高乐政府。现在他本人也将面临审判。他驼着背，老态龙钟，和往常一样地衣冠不整，脸色与几乎全白了的头发相比，显得更黑了。但是，他依然能言善辩。他企图通过他的证词，使控告维希政权的人们体会到要在德国铁蹄下治理法国实际上是多么艰难。

8月15日，法庭宣判贝当有罪，并定为死刑。但建议从宽发落，后改判他无期徒刑。于是贝当先被飞机送到比利牛斯山中的波尔塔莱特堡，然后被送到大西洋岸边的那岛。在那里，他一直呆到1951年7月23日去世，时年95岁。

受审的高级官员名单上，下一个是约瑟夫·达尔南。他是维希政权走卒中名声最臭的人之一。他曾下令或批准对抗战运动的男女战士进行拷打和屠杀。对他的审判很简短，10月3日被判处死刑，并被立即处决了。

紧接着是对赖伐尔的审判。他的辩护律师想证明他是被引入歧途，犯了判断上的错误；但他藐视律师的劝告，决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全部责任。赖伐尔仍和往常一样，口才雄辩，有意激怒法官和陪审员，以致使他们上了圈套而破口大骂起来，于是他拒绝继续受审，但所有这一切并不能使赖伐尔免除死刑。1945年10月9日，死刑宣布了，当官员们来提赖伐尔时，他刚吞服了一小瓶藏在大衣里的氰化物。据估计，药瓶有裂缝，虽然不至于大得使药物漏出，但却混进了一些杂质，因而减轻了毒性。他立即被送到医院，毒药从其胃中抽出，他稍稍恢复后，即被带到刑场。临刑前他口里含着一支烟，喊着“法兰西万岁”。

虽然审判一直持续到1949年，并于1954年重新开庭审理那些原来缺席受审而后来回来自首的人，但赖伐尔的死结束了戴高乐对维希政权的清算。被审判的维希部长和官员共为108人。因谋杀或告密而害死抵抗运动战士的法好，有10824名未经正式审讯即被处死，其中有6675人是在解放前的游击战争中被处死的。此外，经法院和军事法庭正式审讯而处决的有779人。对维希政府和通敌首要分子的公审和判决，为被害群众申了冤，报了仇，从而有力地提高了戴高乐政府的威信。

世界各国都注视着解放了的法兰西。法国又宣布为主权国家，而且成为参战国之一了。她是以怎样的姿态重新出现？她要有什么地位呢？

戴高乐这位抗战领袖，既没有国王的委任，也没有议会的委托，更没有经过公民投票选举，他本人又没有任何政治组织，难道世界上性格最不稳定、最难约束的法国人民会长期追随他吗？在这疮痍满目的国土上，在贫困不堪的人民中间，在政治见解严重分歧的局面下，他是不是会遇到一些无法克服的困难呢？

大国在排斥它。不久前，戴高乐用一支精锐的部队占领了莱茵河和多瑙河，并俘虏德军 12 万多人。如今戴高乐所统率的部队已发展到四五十万人，飞机 1000 多架，又成了欧洲一支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战争一结束，美国就要回到它的西半球，英国将要回到它的岛上，只有法国仍然要在旧大陆上站立起来。

1944 年 11 月下旬，戴高乐应斯大林之邀，访问了苏联。他在莫斯科逗留了八天，经过多次谈判，签订了法苏互助同盟条约，有效期为 20 年。美国罗斯福总统虽然一直干涉法国事务，但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胜利结束的时候，1945 年 4 月 12 日，死神迫使他放下了这项“伟大的任务”，尽管法国饱受苦难和受人鄙视，但她的目的快要达到了。

但是，在所有难题中最使戴高乐头痛的是重振法国的经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国家遭受的创伤多么严重，战争和破坏使它所处的生活条件多么艰难，在从前建立起来的政体、等级、家庭和传统中所发生的混乱是多么严重，以致国家深深地陷入了普遍而漫长的危机。解放后的欢乐，只能暂时地使法国人看不到这些事实。现在，现实变得更加惨痛了，我，遥望将来，感到国家前途光芒万丈；可是环视周围，又看到国事如麻，千头万绪，大有麦克佩斯（莎士比亚的《麦克佩斯》剧中的主人公）站在女巫大镬前面的感触。”

最使戴高乐痛苦的是缺乏满足法国人民生活需要的东西。一个人的全部食品配给量，折合热量每天不过 1200 卡。由于没有羊毛和棉花，由于缺少皮革，很多人衣衫褴褛，穿着木板拖鞋。城市里没有一点燃料！因为煤矿生产的一点点煤炭，还要留给军队、铁路、发电站和医院使用，一点也不能提供给居民。当时国家经济是相当困难的，戴高乐哀叹道：“光明大道已经打开，但法兰西却成了一个破烂摊子！”

据统计，因为战争，法兰西的财富已经有 1/3 化为乌有。先后有 50 万座房屋完全被毁，有 150 万座房屋遭到严重破坏。铁路、桥梁也大部分遭破坏。有 100 万公顷土地已不能耕种，另有 1500 万公顷由于 5 年没有经心耕种已濒于荒芜。到处都缺乏种籽、肥料、农具，家畜减少了一半。总之，德国法西斯的占领，共使法兰西损失两万亿 1938 年的法郎，即等于解放后的 80 万亿法郎。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法国经济失掉了大部分生产资料，在财政方面国债如山，在预算方面必须长期地为重建而拨出巨款。法国就是这样一个疮痍满目而又潜伏着四分五裂危机的国家。

戴高乐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个民族的危机使我每天操劳不安。四面八方涌来的责难、意见、诉苦和批评，并没有使我担心。

我和每一个人一样，忍受着人民天天所忍受的困难，勉强维持着政府的工作，知道这些问题目前是不易解决的。尽管目前困难重重，但是必须建设未来。建设需要政策，并想尽力根据情况推行它。为了恢复生产和粉碎颠覆活动，必须进行社会改革。”

戴高乐主张主要动力资源由国家掌握起来，巨大工程实行国有化，国家

需要亲自领导银行，要成立法兰西航空公司。提高工人工资，努力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1945年要把各种社会保险制度完全恢复起来，并加以扩大。一切靠工资生活的人，都必须享受社会保险。

煤炭是动力工业的主要燃料，牵涉到国计民生，戴高乐政府首先将诺尔省和加来海峡省的煤田，随后是卢瓦尔省的煤田，都收归国有。国家接管了煤气和电力工业。国家石油研究机构开始勘探石油。还设立了一个原子能委员会负责开采法国地下丰富的铀矿。“重新装备和现代计划最高委员会”已经着手规模宏大的工作。在法兰西银行和各种信贷机构实行国有化以后，重新建设的资金也归政府掌管了。法兰西航空公司，这个国家管理的大航空公司，是由一些受资助的私营公司合并组成的。政府接管了据认为厂主曾与德国人有勾结的雷诺工厂，1945年8月，建立了全国行政学院，作为培训高级官员的中心。在对一些要害工业实行国有化的同时，政府还确保农民利益。在土地问题上，保证佃农不受驱逐，并且在土地出卖时，给予佃农以“第一拒绝权”。

制定这项社会政策的动机是复杂的。法国问题专家布赖恩·克罗泽说：“戴高乐为穷人谋福利并非装腔作势，也不是一种怀有政治意图的姿态。”在戴高乐看来，这些政策和改革都从属于复兴伟大法兰西的运动。在能源和信贷方面，实行国有化，是为了巩固国家，使之能够控制经济。减轻工人及其家庭的疾苦，保证农民的土地租佃权，是为了缓和他们的不满，使他们投身到重建家园的工作中来。若干年后，到60年代，戴高乐和他的部长们都赞成盛行一时的在企业中实行“劳资合作”的办法。但至少对戴高乐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的想法。在当年恢复经济时期，戴高乐就曾号召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他说：“工人的劳动与资本家的资本具有同样的权利，他们的报酬和股东的收入都一律依据经营的成果来决定——这就是我要实现的计划。”

戴高乐所推行的改革，虽然触犯了少数特权阶级的利益，但确实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因此有些党派虽然表面上也对他表示拥护，但暗中却加紧进行反对戴高乐的活动。戴高乐自己说，他每次出席会议，都受到隆重的礼遇。他如果发表演说，掌声会经久不息。但另一方面，他的计划却经常遭到抨击，尽管他本人免于非难，但他的部长们却不能幸免，国务部长朱尔·让纳内、财政部长弗朗索瓦·德芒东、情报部长皮埃尔·亨利·泰让、司法部长亨利·弗雷内，在咨询议会里都一一受到喧嚣激烈的攻击，甚至遭到谩骂。正如戴高乐所推测的，这种激昂情绪是议员们对他们成为纯粹的咨询角色所表示的不满。1945年3月19日，一个由各政治团体组成的代表团谒见戴高乐，要求今后作出的决定均不得违背咨询议会所陈述的观点。戴高乐以高傲神态回答说：“只有人民才拥有最高权力。在人民能够表达自己的意志之前，我有责任去领导他们。”

代表们声称，他们是代表抗战运动的，因此，在合法政权产生前，他们有资格表达人民的意志。戴高乐听后耐心他说：“你们受抗战运动各组织和党派的委托，当然有权发表你们的意见。正是这个缘故，我才设立了咨询议会并指定你们为它的成员。你们向政府提问题，政府向你们作解释，你们并向政府提出建议，你们是通过这些活动来参与政府工作的。但是，我不同意超过这个范围。另外，请你们考虑，法国抗战运动大于各团体，而法国又大于抗战运动。所以我是以整个法国的名义来履行我的使命的，而不是以一个派别的名义，不论这个派别多么重要。在下届大选之前，我要对国家的命运

负责，我也只对国家负责。”

1945年春，政府面临的最迫切任务之一，是制定国家预算。据认为，征税不可能多于1750亿法郎，而这个数目仅相当于军费开支一项，其他公共开支还需要2150亿法郎。在财政问题上，出现了两种各有其代表人物的、互相对立的理论。经济部长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提出的理论主张紧缩，而以财政部长勒内·普利文为代表的另一种理论却主张膨胀。通货膨胀是争论的中心问题。孟戴斯-弗朗斯要收回所有的钞票，换成票面价值仅合旧币1/4的新钞，其余3/4的价值仍归持票人所有，但由此增加的这部分除少量需用外，作为存款，予以冻结。这样就会急速地降低购买力，并打击黑市活动。与此同时，所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冻结在相当低的水平上，使比较穷苦的消费者能够维持生活。

财政部长普利文却对此提出异议。他认为当务之急是恢复生产，但苛刻的紧缩措施，取消一切刺激，就不可能恢复生产；人民对国家的信心和对货币的信任就会毁于一旦。复兴的途径在于刺激经济，在于实行膨胀政策。如果因此出现货币流通量太大，过多的货币可以用流动债券使其回笼。发行流动债券会鼓励储蓄，并使每个纳税人感到，他挣得的钱仍然分文不少。与此同时，必须没收黑市商人的诈骗的利润，但对合法企业则应予以保护。

经过权衡利弊，戴高乐认为普利文在平衡财政的做法上，要比孟戴斯-弗朗斯更胜一筹，因而接受了普利文的建议。不久，随着法国战俘从德国归来，普利文的才能和政府的决心受到了严峻的考验。为了解决250万战俘的吃、穿、安置问题，戴高乐授权普利文实行他的恢复（清理）计划。虽然这个计划远不及孟戴斯-弗朗斯所设想的措施那么伤筋动骨，但也够剧烈的了。自1945年6月4日至15日，这个行动全面展开了。所有钞票和短期债券都要交出，以一对一的兑换率换成新票。这样做有双重目的：完成对全国财富的全民清查工作，即彻底搞清土地、财产、公债券、股票和证券的情况；同时把非法财产冲刷出来。那些交出钱的人就得要纳税，而有些人可能由于害怕被控告而未交出的钱就会一文不值。这也适用于被德国人转移出去的法国货币。但对存款却不予冻结。两个月之内，流通的货币量就从5800亿法郎下降到4440亿法郎。对稳定经济、恢复发展生产起到有利的作用。

但是，随着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实施和发展，各个派别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日益尖锐起来。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八章 被迫辞职

党派林立矛盾多，社会改革起风波；
尔虞我诈比比是，愤懑辞职无奈何。

戴高乐哭笑不得地注意到：普利文平衡经济的计划在咨询议会遭到左、右翼的抨击，左翼指责它对投机商打击不力；右翼认为它妨碍了商业的活动。但最后还是以大多数赞成通过了这项计划。这是戴高乐政府在临时国会中最后一次获胜。

在国家困难时期，戴高乐在生活上总是严格要求自己。他拒绝迁入爱丽舍宫。出于同样理由，他也没有享用过在朗布依埃的总统别墅，却在布伦树林附近自费租赁了一所私人住宅。他和他的妻子、两个女儿住在那里。他的儿子不在家，到前线作战去了。晚上他们常常招待客人。客人走后，戴高乐便回到书房，全神贯注地批阅文件，起草讲稿，考虑、处理经济变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戴高乐在塞纳河左岸圣多明尼克路古老的布里安大厦办公。他在那里举行招待会，有时主持部长会议。在内阁会议上，戴高乐总是倾听每个人要讲的话。大多数情况下意见趋于一致。当意见出现分歧时，他就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他的看法也就成为内阁的意见。无论是在议会上、广播里，还是在公众集会和记者招待会上，戴高乐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这些演说成为他繁忙的政治家生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戴高乐很少受眼前气氛或情绪的驱使而作即席发言。他习惯于对自己的讲稿进行反复推敲，直至背下来，以便在讲演时给听众留下自然和流畅的印象。

随着 1945 年的逐渐消逝，戴高乐越来越深信恢复“多党制”对法国将是一场灾难。在那一年中，他审慎地考虑过无限期延长业经同意而由他建立起来的临时政府的做法，但最后还是打消了这个想法。戴高乐认为，他可以不放弃权力，但是他也知道，这样做必将引起骚乱，甚至可能发展为暴力行动。戴高乐之所以被人们拥护，不仅因为他的为人和他的贡献，而且因为他不断地向人们保证，他会尽快地让人民通过选举，自由地表达对于他的政绩的意见，因为戴高乐置身于一党一派的利益之上，并打算继续这样做，所以，他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小集团作为后盾。过去，抗战运动曾团结一致作他的后盾，但现在已分裂为追求各自特殊利益的派别了。军队是会支持他继续执政的，但其结果必然是军事独裁。而在目前，国家处于平时时期，没有外来威胁，戴高乐也无意仿效拿破仑，因此实行军事独裁是不适宜的。

戴高乐认为，在目前多党存在的情况下，唯一的出路是实行总统制，这就是领袖由人民直接选出，并凌驾于各党派之上，再由领袖选择一个不属于议会、因而不受派别制约的、为整个民族和社会服务的行政机构。戴高乐清楚，各党派将会为维护他们赖以生存的权力和政治目标而竭尽全力进行斗争。最后，只得由人民自己在全民表决中作出决定。如果人民赞成戴高乐的观点，各党派将只好勉为其难跟他共事。如果人民不同意，他就下台了事。

在德国投降以后，在人民欢庆胜利的短暂时间里，戴高乐曾自信能解决这个问题。

1945 年 5 月 15 日，他在咨询议会上的讲话博得全场一致的掌声；人们并当场唱起了雄壮的《马赛曲》。之后，当第三共和国的前领导人一个个从纳粹拘留下获释归来谒见戴高乐时，他们又向戴高乐保证对他忠诚、爱戴。

首先来访的是保罗·雷诺、爱德华·达拉第和阿尔贝·萨罗·莱昂·勃卢姆在获释时就公开声明：“由于有了戴高乐将军，法国已经复活了。我们有了一位戴高乐将军真是万幸。我从身陷囹圄之时起就希望我的党能够支持他。整个法国都信赖他。有了他，我们国内团结一致就有了唯一的保证。”爱德华·埃里奥被苏联红军解放出来以后，在莫斯科电台上广播说：“我确信，我国人民已经团结在夏尔·戴高乐的周围。我将毫无保留地听从他的指挥。”这些话尽管当时说得很诚恳，却并非必须付诸行动。

正如法国问题专家克罗泽所说的：当时每个人都需要戴高乐，但有一条，就是他不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在欧战胜利的日子里，在欢庆和团结的表面现象背后，政党领袖们实际上已醉心于市镇选举上。这次选举是解放以来的第一次。人们把它看作是将在秋季举行的大选的一次彩排。在4月29日和5月13日的两轮无记名投票中，抗战运动的候选人占了优势。这时对未来的宪法出现了两种意见：激进党和温和派主张干脆恢复1875年的宪法，即第三共和国宪法；而马克思主义者和左派则主张建立唯一的拥有最高权力的议会。双方的共同点是：由国会掌握所有权力，不管国会是由一院或两院来组成。

戴高乐也没有从被释放归来的第三共和国的政治家们那里得到任何支持。勃卢姆在狱中写文章赞成总统制。获释后，他很快就故态复萌，拒绝了戴高乐要他担任部长的建议。5月20日，也就是他回法国后不过第六天，他在演说中公开宣布：“谁也无权要求执政，但我们自己却有权不对任何人感恩戴德。”埃里奥更加令人失望。他被戴高乐派专机接回巴黎后，拒绝戴高乐要他担任的职务，他又梦寐以求地复兴他那奄奄一息的激进社会党，企图重新掌握全国政权。右翼政治家路易·马兰也是如此。这个洛林人在被驱逐出法国本土时，曾经毫无保留地支持过戴高乐，如今却和将军疏远了。他也不接受担任部长的提议，并且对限制议会权力的意见毫无兴趣。

戴高乐经过和让纳内长时间的商议后，拟订了一个选举和全民表决相结合的正式选举提案。用全民表决方式进行的选举定于1945年10月21日举行，7月9日的内阁会议也决定了省议会的选举将分别于9月23日和30日举行。7月21日，戴高乐在广播中阐明了他个人的观点，他号召人民不要恢复第三共和国，并限制立宪议会的权力和任期。戴高乐的意见遭到不少政党的反对。接着在7月27日和28日，在咨询议会展开了一场尖锐的舌战。戴高乐激动地为自己辩护，对几个议员骂他是波拿巴主义的指责进行反击。他指出，他非但不希望绞死共和国，恰恰相反，正是他把共和国从死亡中拯救了出来。他质问，这难道同拿破仑一世的雾月18日和拿破仑三世的12月2日有一丝一毫相似的地方吗？旧政体内部的一切勾心斗角和阴谋诡计必须停止。自1875年至1940年之间，法国更换过102届政府。同一时期，英国和美国则分别更换过20届和14届政府。

投票结果，96%的人不赞成恢复第三共和国，戴高乐似乎如愿以偿了，但周围的气氛已预示前景难操胜券。在拥有586名议员的议会里，共产党人占160个席位，社会党人和人民共和党人分别获得142和152个席位。激进党人则大为逊色，仅有29人被选为议员。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以302个席位占绝对多数。这在法国政治史上是第一次。建立一个人民阵线政府，看来是可能的，合乎逻辑的。但是戴高乐预料，共产党和社会党都想自己执政，而不会让他戴高乐继续担任总理。因此，戴高乐决定卸任，并向议会递交了自

己的辞职信。

制宪会议在 1945 年 11 月 6 日开会。会议由年龄最大的代表、激进党议员古多利主持。在会上，古多利发表了一篇演说，对夏尔·戴高乐表示敬意，可是对他的政策却大肆攻击。赞扬的话没有得到怎样热烈的反响，尖酸的批评却大受左派欢迎，而右派则未做任何表示。接着，这位年龄最大的代表宣读了戴高乐写给议会的信。戴高乐在信中声明，制宪议会一俟选出自己的常务机构，他的政府即行辞职。这封信并没有引起任何明显的反应。当时，戴高乐在半圆型会场的前排，感到 600 多名议员的沉重眼光都盯着他，觉得身上好像受到了普遍不满的重压。

议会推选菲利克斯·古盎为议长，接着选举政府的总理。戴高乐当然没有提自己要作候选人，也没有对他可能实行的纲领作任何说明。人们对他的看法可能同从前一样，也可能同从前不同。各个集团之间，整整进行了一个星期困难重重的谈判，在这期间，11 月 11 日，戴高乐在凯旋门广场主持了一次追悼会。从各个战场运来的 15 口棺材，排列在无名英雄纪念碑周围，好像这些烈士在前往瓦利良山安葬以前，要向无名英雄汇报自己的牺牲经过似的。戴高乐向前来参加追悼会的各方面的代表，作了感人肺腑的讲话。他说：

这些为反法西斯捐躯但同法兰西一起凯旋的人，在日日夜夜决定着我们的命运的战场上牺牲了的战士，经历了我们的一切痛苦和胜利的烈士，现在回来了！

他们代表着以同样谦恭的态度选择了同样的光荣的其他许多人，他们现在停在只有上帝才知道姓名、高举神圣的火炬、在 30 年战争的最初战斗中失利的民族的精华的周围，受到两千年来为保卫祖国的身心而献出生命的人们的英灵的保护。现在，他们聚集到这里来了！

但是，面对这些使我们流泪和自豪的死者，我们活着的法国儿女，应该接受他们刚刚留给我们的教训。

我们应该了解我们国家的安全很久以来就是没有保障的，因为在我国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曾不得不为那样多的危急付出重大的牺牲！我们应该认清，祖国的利益永远是至高无上的法律。在严酷的世界和艰难的时局给它所造成的形势下，一切（是，一切！）都应该服从效忠祖国的义务！

为了医治遍体鳞伤的法兰西，我们应该团结如手足。如手足！这就是说，不作无谓的争执，迈着同样的步伐，唱着同样的歌曲，在同一条道路上携手前进！

当这些烈士到安葬他们的高地去永远警卫首都以前在这里停下来是时候，当在我们旗帜下生活于我们领土的各个角落和海外各处的男女同胞们回忆我们的光荣和败绩的时候，我们要抬起头来，把重新团结起来的伟大人民的视线和胸襟面向未来。

法兰西万岁！

戴高乐的讲话像一把火，照亮了人们前进的道路。特别当他谈到“我们应该迈着同样的步伐，唱着同样的歌曲，在同一条道路上携手前进”时，广场上爆发了热烈的掌声，周围的人群又沸腾起来，情绪空前热烈。可是站在戴高乐跟前的政府官员的表情，却与往日大不相同。使他感到：自己确实应该辞职了。

但是两天以后，国民制宪议会一致同意推选戴高乐为法兰西共和国政府总理，并且宣布“夏尔·戴高乐确实有功干祖国”。尽管这个决定是经过八

天不愉快的会谈后作出来的，但是，可以表明，议会是有意识决定团结在他的周围，支持他的政策，丘吉尔似乎就是这样认为的。那一天他路过巴黎，戴高乐陪他共进午餐，饭后他知道戴高乐当选总理以后，给将军写了一封文雅的贺信，表示了这位英国首相的兴奋。丘吉尔想起自己最近用普鲁塔克的话给一本名著所作的题词：“对伟大的人物不敬，是强大的民族的特点。”他向戴高乐致意说：“普鲁塔克说谎了！”但是戴高乐知道，这次选举是对他以前的活动表示的敬意，而决不是对他的未来作出担保的诺言。

果然戴高乐这一想法，很快就被证实了。

11月15日，他着手组织政府，遇到了种种抵制。各党派都争着多要部长席位，经过多次协商，终于在11月21日达成了这样的协议：四个部长由共产党的代表担任，四个部长由社会党人担任，四个部长由人民共和党人担任，两个部长由民主社会抵抗联盟的代表担任，一个部长由激进社会党人担任，两个部长由无党派人士担任。此外，还有四个国务部长负责全面的工作，他们是社会党的奥里约，人民共和党的盖伊，温和派人士雅基诺和共产党的多列士。

1945年11月23日，戴高乐在国民制宪会议上讲了一次话，突出他说明了国家所处的严重情况，指出必须尽快采取措施，保证“行政机关有职、有权和稳定”，最后讲到法国人和他们的代表为重建法国而应当团结的责任。这一次，人民代表机关又一次一致批准了他的主张。在12月份，戴高乐又使政府通过了把法兰西银行和四个信贷企业收归国有并建立属于财政部的全国信贷委员会的法令，并使议会批准了这个法令。不久，又通过一项国有化的法令，其中规定了把电力和煤气的生产和分配交给国家管理的办法。在讨论这两项法令时，一切哗众取宠的修正意见都被否决了。此外，12月15日，戴高乐还满意地看到国立行政学院建立起来，这是一个使国家主要工作人员能够得到合理而统一的录用与培养的主要机关。但就在这座学院诞生的时候，公务人员的总罢工严重地威胁了政府的团结和戴高乐的个人威信。当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生活水平，确实由于通货膨胀而十分困难。他们薪金水平的提高，赶不上物价的上涨，但是，只有冒着预算和币制崩溃的危险，才能完全答应工会为他们提出的要求。若出现这种情况，对国家对民族是十分不利的，对当前的经济恢复工作会带来更大的困难。经过戴高乐耐心说服解释，和共产党出面工作，才使这场风波平息了。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46年度预算进入了讨论阶段。政府为了建立良好的秩序，要求在1月1日最后表决预算。但是，那一天，在讨论将要结束的时候，社会党突然要求把国防费减少20%。可是在这方面的费用，任何人都知道，在短期间内是不能减少这么多的。戴高乐认为，“这是选举前的蛊惑宣传和对我的敌视。”当天晚上，戴高乐深入地研究了一下各党派的态度和力量，觉得事情已经十分明显，各方面都在为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力量而玩弄着旧日的把戏，他再领导下去徒劳无益，甚至也不会有好结果。他感到，现在是应该处理他个人下野问题的时候了。

戴高乐在议会作了两次简短的发言，指出有些代表对他施加压力，为了某个党派的阴谋而轻率地要求削减国防费用，这是愚蠢的行为。他说：“我和你们之间的分歧，在于双方对于政府和政府与人民代表机关的关系的整个看法不一致。我们已经开始了共和国的复兴工作。我离开以后，你们将继续这样做。毫无疑问，这是我在这个会议室里最后一次讲话了。我必须开诚布

公地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在做这项工作时，不理解我们近 50 年的政治史，如果你们不考虑政府的权力、尊严和责任是绝对必要的，那么，我可以预言，你们这样下去，迟早会有一天要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痛感后悔莫及。”代表们心不在焉地听着。但表决时，几乎全体一致通过了预算方案。

现在，有待戴高乐决定的唯一问题，是选定辞职的确切日期。看来，他需要一段时间考虑一下。为此，他选择了地中海滨的昂提布。在那里住了一周，这是他七年多来度过的第一个假期。现在他明白了，他应该不声不响地离开，不攻击任何人，也不接受任何公职和私人职务。

他于 1946 年 1 月 14 日回来，用了一周的时间处理积压下来的政令和法令。同时，他将几个部长召集到办公室，告诉他们，他马上就要辞职了。1 月 19 日，他请各位部长第二天到圣多明克路来。除了奥里约和皮杜尔当时在伦敦、苏斯戴尔回加蓬去了以外，所有的部长都在 1 月 20 日（星期日）上午齐聚在“盔甲大厅”。他走进去，同大家握了手，没等大家坐下来，就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声明：

“排他性的党派制度又要卷土重来了。我是不赞成这个的。但是，除非用武力建立一个我所不能同意的、无疑也不会有好结果的独裁政治，我无法制止这种尝试。因此，我必须告退。今天，我就要向国民议会议长递交政府辞职书。我衷心感谢诸位所给予我的帮助，并请求你们在继任人到职之前，各守岗位，以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

部长们感到惊讶，但更多的是心情难受。他们默然不语。戴高乐走了。部长们在交谈着他们对戴高乐此举的看法。多列士说：“这样的辞职方式确实伟大！”莫克说：“这种辞职方式的确是严重的！但是，坏事可以变为好事。将军的成见已经压得国民制宪会议喘不过气来。现在，议会可以自由发表意见了。”普利文以痛苦而不安的语调说：“这就是你们各党派搞出来的结果！”他谴责了给政府制造障碍的各党派人士。盖伊和戴让说：“我们要继戴高乐担负起重大的责任，我们党要尽力做到胜任愉快。”多列士对此大声喊道：“算了吧！将军在的时候你们做不到，将来没有他，你们又怎么能做到呢？”

戴高乐在 1946 年 1 月 20 日致国民制宪议会议长的信中，避开了一切争论的问题。他的信全文如下：议长先生：

谨请您通知国民制宪议会：我辞去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的职务。

从我负责领导全国同胞争取解放、胜利和主权之日起，我一直认为一到全国性的议会机构组成、各政党能够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我的任务就应当结束。

我所以在 1945 年 11 月 13 日以后又接受委托领导政府，是为了满足国民制宪议会对我的一致召请，以及很好地完成一个必要的过渡。这个过渡今天已经完成了。

另一方面，艰苦的考验已经过去，法国已经不再处于令人忧虑的状态。当然还有不少痛苦折磨着法国人民，还有一些严重的问题有待解决。但是，法国人的生活本身基本上得到了保证，经济活动正在恢复，我们的领土已经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在印度支那又站立起来了，社会的安宁不受骚扰了，在国际上，虽然还存在着一些个人不安的事情，但是我们的独立已坚如磐石，我们控制了莱茵河，我们在国际组织中占有头等重要地位，今春还要在巴黎举行第一次和平会议。

当我辞职之际，谨表示我诚恳的愿望：祝我曾经有幸领导过的政府，在尚待完成的确保国家命运的任务中获得成功。

议长先生，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

戴高乐虽然“平静地辞职”了，但政客们仍忧心忡忡。奥里约匆忙地从伦敦赶回，他担心戴高乐会通过电台广播激起人民对各政党的愤慨。他在 1 月 20 日给戴高乐的信中说：“如果你有这个意图，这将会使国家分裂，使民主的敌人得利和称心。”其实奥里约无须担心，戴高乐不想在火上加油。他满足于沉默。因为他确信，法国人民迟早“将大声疾呼地要他回来”。欲知戴高乐辞职以后的情况，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九章 离职以后

元官一身洁自豪，著书立说乐陶陶；
政局不稳人民怨，稳坐鱼台静观潮。

戴高乐辞去政府领导职务后，住在远离巴黎的科龙贝的自己一座旧有的房舍里。这里地势很高，也很安静。戴高乐的每天大部分时间是在一个靠角的房间里度过的。在这里，眺望远方的落日的余辉，周围空旷，15公里以内没有任何建筑物。他的视线越过原野和树林，沿着一个缓长的斜坡一直望到奥布河谷，然后爬上河对面的山坡。他站在花园的高处，可以看到树林包围着的野地，它好像被海水拍击的地岬，晚上，可以静观夜幕覆盖的乡村，或仰望星空，回忆往事。

戴高乐带着妻子和患病的女儿安娜迁到这里，开始过着与世无争的幽静生活。在这偏僻的农村，戴高乐既检讨过去，又展望未来。他在静观法兰西大地所发生的一切变化。在议会里，“抢座位的迷人游戏”又时兴起来了。戴高乐曾经破坏了这个游戏，现在，政客们皆大欢喜，他们可以告诉人们第四共和国跟第三共和国是多么相似了。正如基督教民主人民共和党领袖乔治·皮杜尔所说的那样：“一个伟大的人不受欢迎，几个庸才倒很得意。”1946年1月24日，戴高乐辞职的第四天，几个所谓大党的代表便签订协议，定下了游戏规则，政客们许下诺言，今后不再热中于进行攻击性或侮辱性的争论了。他们保证“要在政府、议会、报刊和全国发扬忠诚团结的精神，来对待共同通过的决议”。可是日久天长，这些可钦可佩的意见越来越不受人重视了。

在国民议会里，社会党领袖费利克斯·古安是大家信得过的人物。他在550张选票中，以497票当选总理。三个议员凄惨地投了离任的戴高乐将军的票。然而使政客们感到吃惊的是，在1946年5月5日的全民表决中，法国选民以1050万票对950万票否决了宪法提案。直接提请国民公断而遭到否决，这在法国历史上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在这个关于赞成还是反对宪法的运动期间，陷于失意和怨恨之中的戴高乐没有公开发表言论，也未参加投票。

就在法国政权发生更替的时候，戴高乐一家一直在科龙贝村过着简朴的生活。他拒绝了只要他愿接受就可获得的荣誉。如今他唯一的收入是作为一个准将所得的养老金。

1946年4月，新任总理费利克斯·古安曾指示国防部长草拟一项法令，把戴高乐的军衔提到国家所能授予的最高一级。但是，要戴高乐接受一个次要人物的提拔是违反他的个性的，何况这种提拔既不合时宜，也不是因为他作战有功。因此当他得知政府首脑的意图时，他回信说：

“兹复来函……自从1940年6月18日我打破常规走上一条相当独特的道路以来，事态已以如此规模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人们很难对一个史无前例的地位作出合法的规定。况且，在5年7个月零3天的英勇斗争岁月中，显然没有人曾想到需要作出任何改变，今天想要采取一项行政措施加以解决，会令人感到奇怪，甚至可笑。正确的办法是维持现状。如有困难，到时候死神会来解决的。”

本着同样的精神，戴高乐把杜鲁门总统赠送给他的私人礼物——一架DC型飞机交给空军，并把他自己的一部美国大型轿车卖给了一个叫弗洛雷尔的艺术师。戴高乐的夫人伊冯娜·戴高乐学习驾驶汽车，并经考试及格，不久，

她便驾驶一辆普通的法国小轿车在村里或到临近的城镇购买食物。因为手头拮据，戴高乐家饮食常常比较简朴，酒要留着招待客人。对有些客人也不得以白水相待。

在戴高乐房舍周围，有三英亩园地是戴高乐寻求慰藉的地方。他在伊冯娜·戴高乐和一个园丁精心护理的花园里漫步，从不感到厌倦。花园中心的大花坛的花草种成洛林十字式样。戴高乐在这座 18 世纪的建筑物上增建了一个阁楼，在阁楼上可以眺望三面的景色。他在这里消磨了漫漫长日，校订了他早年的文学著作；若干年后，他也在这里写他的战争回忆录。戴高乐自称，他在小花园里徘徊过 15000 次！

上马恩省的冬天漫长，压在戴高乐心头的烦闷也变得难以忍受起来。他经常借景生情，抒发自己的心怀。戴高乐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冬天，它向我呻吟：‘你看我这荒凉严寒的样子，我所生所爱的植物、牲畜和飞鸟，有多少因为我不能哺育和温暖它们而死在我的怀里！难道说命运已经注定了吗？死亡永远得胜了吗？不是的！在我这无力的地面底下，已经在隐隐约约地积聚着一种力量。我虽然在黑暗里静眠不动，却已预感到光明和生命复始的美妙前景！’”5 月 5 日的全民对宪法提案的表决，为戴高乐打破沉默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借口。

1946 年 6 月 16 日。戴高乐经过深思熟虑，向不久前刚在投票表决中遭到失败的政府和宪法开了火。他在法国第一个获得解放的城市贝叶发表演说，当时人们正为他于诺曼底登陆纪念日时访问该城举行庆祝活动。这次贝叶讲话极为重要。尽管它没有产生直接效果，但它却精确地预示了 12 年以后颁布的第五共和国宪法。

戴高乐说：“在我们遭到破坏的光荣的诺曼底、贝叶及其郊区目睹了历史上的一个最伟大事件。我们确认，它们是这个事件的当之无愧的见证人。在这里，法国和盟国经过最初的失败以后四年，开始走上了最后胜利的第一步。在这里，那些从未屈服的人，那些从 1940 年 6 月 18 日以后团结了全国人的意志和重新组织了法国力量的人，从这个事件中证明了自己的努力是完全正确的。”

“同时，也是在这里，政府又在我们祖先的土地上出现了！”戴高乐说，“这个政府是合法的，因为它是以全民的利益和意志为基础的；当屈从政策使政府空有其名的时候，拥有实际主权的政府已转到战争、自由和胜利方面来；这个政府在贫困交加和阴谋交替中维护了它的权力、尊严和威信；这个政府防止了外国的干涉；这个政府能够在它的周围恢复全国统一和帝国统一，团结祖国和法兰西联邦的一切力量，与盟国一道取得了最后胜利，与世界其他国家平等相处，维持公共秩序，实行公正的裁判，开始国家的复兴工作。”

戴高乐分析了取得上述成就的原因。他说：“首先，从民族内部自发地涌现出一朵民族之花，他毫无党派和阶级的偏见，献身于为法国的解放、伟大和革新而进行的战斗。他有崇高的道义感，有一种牺牲和带头的觉悟，有冒险和敢于的热情，不怕骚乱、威胁和阴谋，对于自己在巨大的变乱中表现的力量和机智以及对于祖国的胜利和前途同样具有信心——这就是他的心理状态。他一无所有，必须不顾各种重大损失而带动整个帝国和整个法兰西。但是，他要是没有广大法国群众的支持，就会一事无成。……确实，政权只有符合国家的最高利益，并且以公民的信任为后盾，才能在实际和法律上

有效。政府如果建立在其他的基础上，就等于建筑在沙滩上面，一遇危机，就有坍塌的危险。”

戴高乐强调指出，“在不到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法国遇到了7次侵略，变过13次政体。”党派之争不适应我们面临的危险局势。由于政党制度的无能，民主一直在受到独裁的威胁。他问道，第一共和国、第二共和国和第三共和国是怎么垮台的？为什么垮台？意大利的民主制、魏玛共和国和西班牙共和国又是怎样让位于后来的独裁制度的？为什么？当然，独裁并不是答案。在民主制度失败而处于无政府状态之后，独裁制度给人一种有生气、有决心的印象。但实质上它是一种冒险。时间久了，独裁者就得在国内外从事一次比一次规模更大的冒险计划，直到最后在灾难及血泊中崩溃。

“只想到这种情景，就可以明白用新的民主制度来抵销我们的那种无穷的政治狂热影响是多么重要。而且，对我们说来这也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戴高乐说，“因为在当前的世界和时代，我们国家和法兰西联邦的地位、独立直到生存，都完全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当然，民主的实质就是表达各方面的意见，尽力通过选举按照选民的意愿确定国家的行动和立法方向。但是，一切原则和一切经验都要求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明确分立和彼此十分均衡，并建立一个处理偶然政治事件的全国决策机关，以便在发生混乱的时候保持政权稳定。”

戴高乐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政权建设的意见。他说，选举出来的议会当然有权通过法律和预算。但它考虑问题是有限的。因此必须有第二个议会。它是根据各种不同的原则选举出来的，它代表各地、各行各业和各个家庭的利益以及法国的海外领地。第二个议会应该有修正权，并与海外领地选出来的地方议会组成法兰西联邦大议会。戴高乐接着说，行政权显然不能由议会产生，否则，就会把政府降低到一个“代表团组成的大杂烩”。不错，临时政府曾经是这样，但这种作法之所以正确是因为处在非常时期和权力机构陷于真空状态。国家元首应超越于政党之上，应由一个不仅包括议会成员而且有更广泛人士组成的选举团选举产生。他应该是法兰西联邦的总统，又是共和国的总统，尤其重要的是，他必须有责任挑选总理和各部部长，并负责主持内阁会议，裁决争端以及把最难处理的问题提交法国选民。一旦国家处于危急关头，国家元首应该成为民族独立和履行法国所签条约的保证者。

戴高乐的贝叶讲话，对执政的人民共和党领袖乔治·皮杜尔产生了较大的震动。人民共和党在抗战运动中诞生，许多人认为它是戴高乐一手建立起来的。但在戴高乐执政期间，皮杜尔感到受压，戴高乐的下野使他如释重负。还有一层，人民共和党反对宪法，很快就得到政治上的利益。尽管皮杜尔那时已经掌权并享有公众的支持，但他充分意识到自己成功为时已晚，以及对将军完全置之不理的危险。显然他对将军仍有几分畏惧。但他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对贝叶演说没有作出恭顺的反应。过了几天，他派了两位同僚，到科龙贝去说明提出新宪法草案的理由。他们受到冷淡的接待。戴高乐说：“你们的宪法同5月5日的草案就像是一对双生姐妹。”

与此同时，愤怒的戴高乐分子到科龙贝去朝见戴高乐。他们无疑是在将军的赞同下，针对“背信弃义”的人民共和党发动一场猛烈的攻击。戴派左翼分子勒内·加比唐为了捍卫贝叶演说精神，建立了一个戴高乐主义联盟，联盟建立初期，出现过一股富于浪漫色彩的激流。特别是马尔罗，他的演说虽然闪闪烁烁，但很有鼓动力，它为这一股激流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在

演说时用了许多法国光荣历史上的引喻，听众对于这些犹如春风贯耳，弄不懂他究竟要说什么，但他的热情却很有感染力。戴高乐本人也经常不厌其烦地阐述问题，则完全与他的听众们的当前利益无关，或超出他们的理解范围之外。由于联盟组织松散，又缺乏明确的具体纲领，因此在人民群众中并没有产生特别重要的影响。

在这以后，戴高乐将军对自己发起的这个运动逐渐失去兴趣。联盟不但没有达到推翻第四共和国的这一主要目的，而且，在他看来，它在议会里的那一帮人经不起他最为鄙视的政治游戏的引诱，已腐化堕落下去了。

1952年3月，在苏斯戴尔组阁失败后不久，27名法兰西人民联盟的代表投票选举保守党的安托万·比内为内阁总理，跟这个制度妥协了。整个3月，戴高乐都呆在非洲，好像是为了表示自己对此件事情漠不关心。5月6日，即市选结果公布后的第三天，他回到巴黎，正式与联盟脱离关系。他宣布，联盟的代表从此可以各行其是，但不得借用运动的名义。然而，他并没有解散联盟，而只是号召盟员们在全国各地重新组织自己。他按照自己的个性从事，事先根本不考虑与联盟领导人商量，就发表了这项使他们的共同奋斗到此告终的声明。

戴高乐脱离联盟之后，他的大部分时间已经不是用在政治上，而是用在写作上。他已开始写战争回忆录了。就戴高乐而言，他那伟大的抱负，尽管受到挫折，他对历史的专注以及对文学的爱好都意味着这部回忆录不愧为一部“杰作”。因此，《战争回忆录》不仅是一部三卷的往事汇编，而且是戴高乐为自己树起的纪念碑。

戴高乐虽然早年写过几部作品，但如今他写起长篇巨著来仍很费力。他既不像丘吉尔那样口授，也不像专业作家们使用打字机。他拿自来水笔用黑墨水一笔一画地往下写。他独自在拉布瓦瑟里的阁楼里精心撰写。修改后，再由他的女儿伊丽莎白做打字工作，她能非常熟练地辨认她父亲那难以看懂的字迹。在写作之余，戴高乐如饥似渴地阅读。他读了许多政治、军事、历史书籍，也读了许多世界文学名著。

从开始写作战争回忆录时，戴高乐和他夫人伊冯娜就商定将回忆录得到的大部分版税，用作他们为残疾儿童所设置的慈善信托基金与其他选定的慈善事业的费用。这笔信托基金是以戴高乐那个智力发展不全的女儿的姓名安娜命名的，称为“安娜·戴高乐基金”。可是，两年后，安娜在她20岁生日前不久患肺炎死了。戴高乐在她的墓前落泪和默哀了一阵后，握着妻子的手说：“唉，现在她跟别人一样了。”

残疾儿童保育院的建立，几乎耗尽戴高乐夫妇所有的积蓄。1951年，“安娜基金”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之中。看来，戴高乐不得不将拉布瓦瑟里的宅邸抵押出去。可是这时他的朋友蓬皮杜已是罗特希尔特银行的总经理，他为戴高乐弄到了一笔贷款，帮助他摆脱了困境。

戴高乐的著作引起了法国出版界的重视。几家出版商都以出版戴高乐的回忆录为光荣。戴高乐选中了出版过福煦、霞飞、普安加雷、克莱蒙梭、劳合·乔治和丘吉尔著作的有名的普隆出版社。戴高乐切望分享这种声誉。

1953年秋，蓬皮杜代表戴高乐和出版商进行谈判。这时第一卷接近完稿。伊冯娜·戴高乐劝告丈夫趁他在世时出版全部著作，而不要像他最初所设想的那样，等他死后出书。第二年4月，与出版商达成协议，并签订了出版合同。为了保证书的质量，戴高乐和以往一样细心地亲自改正校样，并认

真考虑出版者所提出的、或者第一卷出版后读者所提出的供他注意的每一个事实性问题。1954年10月5日，出版社发行了第一卷《召唤》。第二卷《团结》于1956年5月29日出版。第三卷《拯救》到1959年9月25日才出版，这时戴高乐已经重新执政。《战争回忆录》立即成了畅销书。到1963年12月为止，不算外文版在内，每一卷都印行了插图书3万册。第一卷普通本印了228000册，平装本273000册；第二卷各印了225000册；第三卷分别印了186000册和225000册。回忆录的大量畅销使戴高乐获得了大笔版税，他不仅将这些钱慷慨地用在安娜基金委员会，而且用在法国红十字会和其他各种慈善事业以及科龙贝教堂、教区方面。

戴高乐尽管从写作中获得慰藉，但是退隐生活使他的忧郁之情有增无已。政府的历次危机都证实了他对这个制度的抨击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这个制度终于缓过气来，又不断地使他感到意外和失望。1956年6月30日，他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宣布今后他不再干预公众事务。到1957年底，夏尔·戴高乐事实上已成了一个被人忘却的人。人们把他作为一个传奇人物记在心里，除了极少数的人之外，再没有人认真地把他们看作可能拯救法国的人了。可是，这时离他轰动一时的重新执政只有几个月了。他上台时的形势也大致如他曾预见过的那样，只是命运注定要过12年时间才能实现他的期望。

到1957年为止的这五年，对戴高乐来说，是痛苦的而又无能为力的五年；对法国来说，是多事的并不光彩的五年；对世界来说，是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的五年。局势的发展，又把戴高乐推上政治舞台。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三十章 再度出山

政局不稳思良臣，人民怀念老将军；
殖民政策开新路，顺应潮流得人心。

自从 1954 年法国在奠边府战役遭到惨败后，接着又爆发了阿尔及利亚之战。这使法国统治集团忧心忡忡，戴派人物乘机活动，使其他各派接受了将军上台最符合他们利益的主张。至于戴高乐本人，他不久便将表明，他在野的 12 年并没有白白虚度。结束隐居生活再度出山的不仅仅是个又老了几岁的人，而是一个更为精明机智的政治家。

当时促使戴高乐重新上台的戴派领导人主要是米歇尔·德勃雷、雅克·苏斯戴尔和沙邦—戴尔马。参议员德勃雷与另外两人不同，他在戴高乐的临时政府里曾担任过共和国的委员。他从未向第四共和国让过步。他是犹太人的后裔，一个拥护宪法的著名律师。他在内阁历次危机中，都要求将军出来执政。在他写的《统治我们的王子王孙》的书中，对政客们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抨击。他又创办了一个人气十足的期刊《愤怒的来鸿》，其目的在于宣传只有戴高乐上台才能保住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后来，他的一片赤忱终于得到了报偿，在第五共和国里担任戴高乐的第一任总理。

苏斯戴尔与德勃雷不同，在第四共和国任职期间，他曾向旧体制做过妥协，尽管在最后阶段他在国民议会里为推翻政府出力最多，从而获得了新的名声。他是阿尔及利亚的总督。他虽然是法属阿尔及利亚的“热情保卫者”，但他的职责并不在于保护白人移民的特权，而在于寻求理想的“一体化”的解决办法，即各民族的完全平等，包括在法国议会中实行比例代表制。4 月 15 日，苏斯戴尔发表了措词严厉但又充满激情的演讲，导致了费利克斯·加亚尔政府的倒台，从而造成了第四共和国又一次的内阁危机。

沙邦—戴尔马是加亚尔政府的国防部长。他在阿尔及尔有一个亲信，名叫莱昂·德尔贝克，德尔贝克富于组织才能，他很快建立了一个情报网，并开展了为戴高乐重新上台作准备的宣传工作。不久，总司令萨朗将军就成为受其影响的人。从 1957 年 12 月到 1958 年 5 月，德尔贝克往返于巴黎与阿尔及尔之间达 27 次。他利用一次去巴黎的机会，拜访了戴高乐将军，并向他保证无论在阿尔及利亚还是在法国本土，无论在穆斯林、移民还是在军队中，公众普遍赞成将军再度出山。

法国的极右分子也在加紧活动，企图浑水摸鱼。他们虽然不如戴派人物那么有实力，但是他们已使巴黎的政客们精神惶恐不安、行动日益受阻。他们的领袖有两人：一个是曾经当过蒙面党、贝当派的 60 多岁的马丁博士；一个是年轻的罗贝尔·马泰尔，此人是阿尔及利亚米蒂贾地区的一个殖民者。还有两人是军官：一个是离职不久的前阿尔及利亚陆军司令谢里埃将军，一个是曾任印度支那空军司令、被誉为儒将的空军将领利奥尔—马克斯·夏森。不切实际而又爱搞阴谋的右翼团体，在维希分子暗中支持下，主张建立一个基督教和劳资协会主义的国家。在这些人看来，戴高乐重新上台将给法国带来灾难。他们一厢情愿地确信，戴高乐无论如何是不想出山的，即使别人要

奠边府战役，是越南在抗法战争中的一次重要战役。1953 年 11 月，法军以大量伞兵部队侵占越南战略要地奠边府，作为进犯解放区的据点。同年 12 月，越南军队发动攻势，解放了莱州并包围了奠边府。1954 年 3 月 13 日发起攻击。5 月 7 日解放奠边府，歼敌 16000 余人。

他干，他也不会干。他们认为用阴谋手段推翻第四共和国而达到自己的目的，是十拿九稳的事儿。谢里埃将军深信，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当上国家首脑。至于法国的军人集团，他们手中虽握有军权，但人心不齐，对政府处于既敌视又习惯于服从的矛盾之中。

在这种风云变幻、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戴高乐稳坐钓鱼台，不轻易表态。在1947年至1953年期间，他曾多次试图动摇第四共和国的基础，但都未能成功。他打算等着瞧，直到有朝一日人们把权力送到他手上来。如果事与愿违，那么他的历史悲观论将使他的失望情绪得到补偿，几个星期过去了，危机在进一步深化，但戴高乐仍然不出来讲话。这种情况本身就成为正在发展的危机的不祥之兆。一二年前的，大众包括政客们对于戴高乐不愿出头露面并不关切，现在他们渴望戴高乐出来说点什么：有的人希望听到他宣称自己并无政治要求，好把心放下来；另一些人则希望他宣布准备接管政权，从而给第四共和国致命一击。

戴高乐不公开表态，更给人们留下了“莫测高深”的印象。1958年3月，戴高乐怀着忧郁的心情对莫里斯·舒曼说：“我决不出来重新执政！决不出来！事情到此为止，”舒曼难过地把这番话转告给米歇尔·德勃雷。德勃雷很有把握地反驳他说：“要是戴高乐告诉你决不重新执政，那意思就是：他希望听你说出相反的话来。这就是他的想法！”

1958年4月15日，费利克斯·加亚尔政府倒台。戴高乐对当时的形势作了分析，他认为：科蒂总统不具备一个总统应有的权威，第四共和国实际上已经管不了事了。科蒂总统手下只剩下两名政客可以利用。一名是过去属于戴派的、议会协商老手勒内·普利文；一名是人民共和党的领导人、爱国人士、阿尔萨斯人皮埃尔·弗林姆兰，为了填补空缺，5月8日，科蒂指令普利文组阁，结果由于激进党人的反对而告失败。总统把最后指望系于弗林姆兰身上，为了礼节周到，他先召见了激进党三位领导人。之后，在爱丽舍宫华丽的办公室里，科蒂盯着弗林姆兰说：“你是我最后的一张牌。要是你也搞不成，那么唯一的出路是：请戴高乐出来。”

但是，为时已晚。皮埃尔·弗林姆兰深信他的地位具有合法性，而这种合法性的确是宪法承认的。5月13日选举结果，弗林姆兰以274票赞成、120票反对和137票弃权而当选总理。半个小时后，在阿尔及尔，马絮将军宣布成立公共安全委员会，由他担任主席。5月14日，在巴黎，右翼分子举行游行示威，他们来到爱丽舍宫广场，高呼“让马絮掌权”。同时，左翼分子聚集在共和国广场，高呼“绞死马絮”，局势进一步混乱。

就在这一天，戴高乐结束了每周一次的巴黎之行，回到了科龙贝，晚上，他直到深更半夜还在听广播和接电话，电话大都要他采取行动，或至少讲点什么。5月15日，戴高乐决定发表简短的声明，下午，300名新闻记者摩肩接踵，挤满了不够宽敞的戴派总部。下午5时，他们开始把消息迅速传播到全世界。戴高乐声明如下：

“国家的衰微不可避免地为已经联合起来的民族造成隔阂，为正在作战的部队造成不安，并已带来全国混乱。独立沦丧等等后果。

12年来，法国面临种种问题，非政党体制所能解决，国家一直处在这种灾难状态中。

“上一次，国家在危急存亡的关头曾赋我以重托，领导全国救亡图存的运动。今天，当国家再次面临考验时，它一定知道我已经做好了接管共和国

权力的准备。”

戴高乐的声明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政客们、将军们以及普通公民都已深信，戴高乐准备出山。除了政客们之外，几乎所有的人都希望采取相应的行动，搞掉第四共和国，这种愿望越来越迫切。为了便于各界了解他对时局的态度，戴高乐宣布5月19日下午举行记者招待会。有人说，这是一张王牌，因为它使危机自然而然地延长三天以上，看来政府未必能恢复它的威信，果真如此，戴高乐就可以把危机都归咎于当局软弱无能，甚至可以预言会出现更严重的混乱，也不用担心预言错了。这种僵持局面很可能继续下去，阿尔及尔的反叛力量将会进一步加强，而戴高乐则会被普遍地认为是唯一能主持大局，把法国救出内乱火坑的人。

5月19日，在记者招待会正式开始之前，旅馆门前被大约1200名新闻记者挤满了。大约30名摄影师和100名新闻图片记者用他们的闪光灯把将军和听众弄得眼花缭乱。在记者招待会上，戴高乐没有说冗长的开场白，他只是谦虚他说，他认为自己可能有用，因为政党制度已经失灵了，而他孑然一身，不属于任何派，但属于民众。接着，他回答了记者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有人问道：“你所说的共和国的权力是指什么？”

戴高乐模棱两可地答道：“这些权力只能是共和国授予的权力。”接着他追忆了他曾经如何拯救了共和国，并列举了他曾建议进行的种种改革。

一个记者问他，对于社会党领袖居伊·摩勒在议会提出的“组阁必须依宪法程序”有何看法？

戴高乐敏锐地感到他需要社会党的支持，于是他说：“我首先告诉你，我非常尊重居伊·摩勒。至于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我已回答是：如果戴高乐在非常时期被授予非常的权力，以执行一项非常任务，那么显然不能按照老一套规矩办事，那一套现在大家都受够了。”

有记者谈到许多人最关心的问题：“你有没有想到，就在你发出呼吁的时刻，阿尔及利亚的暴乱正面临失败？你一直在给煽动分子打气。你的记者招待会将会使他们增添力量。”

戴高乐故意含糊其词地答道：“责任问题可以到以后再追究。眼下有这么一个事实：对于被称为‘煽动分子’的一些领导人，政府当局并没有进行任何制裁，反而授予他们全权，而我，目前并不代表政府当局，你们有什么理由要我称他们为煽动分子呢？”

记者又问：“如果你重新上台的话，你是否会侵犯公众的自由？”

戴高乐反问道：“我做过这样的事吗？恰恰相反，当公众丧失自由时，是我使他们恢复了自由，我今年67岁了，到了这样年纪才开始独裁者的生涯，这话可信吗？”

记者招待会过后，接着又是一个令人紧张得喘不过气来的星期。谣言到处流传。部长们不敢住在家里，都跑到朋友家里去过夜。弗林姆兰的假日别墅已被塑料炸弹炸坏，他一连好几天都呆在办公室里，靠服用大量药片使自己不至于躺倒。戴高乐仍然在科龙贝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喜忧参半。他对合法性和正统观念的矛盾看法仍然妨碍他去掌权。政客们不甘心被人吓跑，他们仍然抓住权力不放。戴高乐决定迫使他们摊牌。

国内的动乱仍在发展。5月26日内政部已向内阁提出报告：“科西嘉岛的叛乱行动有可能于5月27日至28日的夜间在法国本土重演，首先在各省，

然后在巴黎会发生叛乱。”戴高乐得到了这个消息，决定采取他一生中最策略、也是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他于27日中午12时半发表声明。

我已于昨天开始采取必要的正常步骤，来建立一个能够确保国家统一和独立的共和政府。

我决定今后继续采取这种步骤，并相信国家将以它的平静和尊严来表示它希望这种步骤取得成功。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来自哪一方面危及公共秩序的行动，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即使我理解人们采取这种行动时的处境，我也不能表示赞同。

我希望驻在阿尔及利亚的陆海空三军做遵守纪律的模范，听从他们的司令官萨朗将军、奥布瓦诺海军上将和儒奥将军的指挥。我向这些领导人保证，我信任他们，并愿与他们取得联系。

弗林姆兰看到声明的全文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他还没有回过味时，他的政府已经垮台了。在科蒂总统的要求下，戴高乐于5月28日晚上在圣云街会见了国民议会主席安德烈·勒特罗克埃和共和国议会主席加斯东·莫内维尔。勒特罗克埃也是社会党领导人，他怀着强烈的敌意，坚决反对戴高乐当总统候选人，然而，莫内维尔支持戴高乐，并尽力向戴高乐说明他合法地重新上台的起码条件。6月1日，戴高乐按照莫内维尔的建议，向议会宣读了总统候选人的例行声明。他用简短的几句话描绘了国家的衰微和危机。他请求议会给予信任并批准他为修改宪法所提出的建议，这个修改将提交全民表决。他声称，一旦议会投了票，就将休会，一直到规定的下一次一般性会议为止。投票结果，329票赞成，224票反对，32票弃权。戴高乐取得了胜利。第二天，他又没费多少口舌就使议会投票通过了三项议案：重新授予政府在阿尔及利亚的特权；授予新政府6个月的特权，授予新政府修改宪法和对宪法进行全民表决的权力。

1958年6月，戴高乐再度执政，但是，人们对于他在这种情况下重新上台的合法性还存在着争论，因此，他的权力是不稳固的，在随后的三四年中，他的主要心思放在巩固他的权力上面，一是制服反对派，一是尽力解决第四共和国对付不了的、并最终导致它倒台的、可怕的殖民地问题。在殖民地问题中，最重要的是阿尔及利亚的问题。法国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在法国本土和北非、实际上也在全世界都激起了强烈的不满。

面对这些问题，戴高乐采取行动的依据就是新共和国的宪法了。戴高乐是一个性格坚强的人，有一套强硬的政策，所以他谋求一个强有力的根本大法。尽管宪法很重要，但是光靠它还不够。还要有斗争的毅力和智谋，在这方面戴高乐可比他的政敌胜过一筹。

戴高乐在重新执政的四年中，在德勃雷总理的协助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戴高乐的改革主要是围绕着四大问题进行的。这就是：组织、巩固和充实新宪法下的政治制度；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并圆满“完成非殖民化进程”；对外奉行维护民族尊严和独立的政策；在社会、行政机构和地方政府进行大规模的改革。这些活动全面充分地体现了戴高乐一贯的思想：加强总统的权威，甚至使其凌驾于法律之上；对党派、政客和他们的活动舞台——第四共和国不断作为敌人进行指责：越过中间机构，直接向至高无上的民众呼吁，借以实现自己的统治。

在第五共和国期间，阿尔及利亚战争延续的时间，比在上届政府期间还长。戴高乐力图循序渐进地引导法国民众舆论支持“自决权”，转而支持“阿

阿尔及利亚人的阿尔及利亚”，进而支持“阿尔及利亚共和国”，最后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与此同时，戴高乐通过三次连续的公民投票和与阿方时断时续的谈判，最后达成了停火和撤军协议。戴高乐在前进的道路上，经历了“一周街垒”事件中的“黑脚”们（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的暴动，以及“将军暴动”事件中造反军官的反抗和秘密军组织中亡命之徒的破坏。

戴高乐决心要使法国从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死胡同中脱出身来。他认为，这条死胡同妨碍了法国的经济和外交的恢复以及军事技术的现代化。他知道阻力是相当大的，无论在政界和军界都有强大的反对势力，他们顽固地坚持和维护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过早地暴露自己的最终意图可能会使他丧失不久前才取得的权力。因此，他决心把他的最终意图秘而不宣。

为了有助于解决殖民地问题，1958年9月4日，戴高乐在共和国广场的讲演中，抛出了宪法草案，并呼吁批准它。9月28日，全民表决日到了，结果新宪法在法国本土以80%、在海外属地以95%的多数票获得通过。接着议会又选举戴高乐为法国新总统。这是戴高乐自赢得公民投票以后，所取得的又一重大胜利。然而，阿尔及利亚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它随时都可能危及戴高乐精心制定的一切计划。他知道，除了采取渐进主义策略外，别无他法。

只有这样，才能拔掉这个定时炸弹的雷管。

戴高乐在1958年底和1959年初仍然希望通过调停和平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戴高乐的战略是朝着全体阿尔及利亚人自决的方向前进。1962年7月1日，通过全民投票，终于使阿尔及利亚获得了独立。戴高乐还亲自规定，每一个领地都可以自行决定，或是保持现状，作为部分自治的国家加入共同体，或是与法国合并。作为法国的一个海外省份，甚至完全退出法国共同体自行独立。作为先例，在1958年6月，戴高乐与摩洛哥和突尼斯签订了法国从这两个领地上撤军的协议。

戴高乐对待殖民地的政策，引起了国内军、政界殖民势力的强烈反对。在他们眼中，戴高乐是恶魔，是反基督的，是卖国贼。从1961年9月至1962年8月，曾发生了多起叛乱和谋杀戴高乐的事件。仅谋杀事件就发生了四起。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实际上阴谋者已动了手，但都失败了。第一次因为出了技术故障，最后一次是由于出现了奇迹，戴高乐才摆脱了厄运，另外两次在布置就绪前就败露了。第一次，阴谋者把装有90磅可塑性炸药的煤气桶及装有丁烷和一个储有汽油、肥皂片的罐头盒子埋在从巴黎通往科龙贝路旁的沙滩里。1961年9月8日晚上，当总统的汽车经过那里时，突然被一片火网包围了，但炸药没有爆炸。

1962年8月22日，在总统乘车前往库布莱镇军用机场的路上，一伙人从路旁的一辆黄色旅行汽车里向戴高乐的汽车开火。司机加速前进，但前行了100码，另一伙人从一条横街的一部蓝色汽车里向戴高乐的汽车开枪，总共射出了约150发子弹，其中14发击中了戴高乐那辆特制的、坚固的雪铁龙牌汽车。有一颗子弹击破了后窗，在离戴高乐头部几英寸的地方掠过。另外两颗击中了防弹车轮胎，但没有打穿。戴高乐在回忆录中写道：“但是，侥幸得令人难以置信，我们谁也没有中弹，那就让戴高乐继续走自己的道路，履行自己的职责吧！”

戴高乐重新当政时已67岁。他感到自己老了。他向他的私人医生利普什维兹博士吐露过他的心事：“我回来晚了十年，太迟了。”他还对普利文等

解放功勋团的伙伴们说：“我是1940年的人物。事实上我已老了20年，不能勇对命运的挑战了，”然而，西德总理阿登纳的访问，却使他恢复了信心。

1958年9月，他们两人第一次在科龙贝会面时，阿登纳指出，他比戴高乐大14岁，并告诉戴高乐，他认为，一个人可以跨越某一“年龄障碍”，就如飞行员能够突破声障一样。这位总理说，一旦跨越了这个障碍，就可以无定限地活下去。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戴高乐高兴地逢人便说：“我已经越过了年龄的障碍，可以无定限地活下去了。”

戴高乐不顾年迈和一直存在的阿尔及利亚的危机，不失时机地提出法国要分享世界领导权的要求。他的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打破美国在西方联盟中的霸权地位。这个目的构成了1958年9月17日他致艾森豪威尔总统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那份著名的、却是失败的备忘录的基础。他在备忘录中提议，在联盟中建立一个三大国理事会。这个备忘录表露了戴高乐的如意算盘：如果它被接纳的话，他就可以一举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遭到拒绝，他将不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合作。

在美国人看来，接受戴高乐将军的要求，就等于给予一个尚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以超级大国的地位。戴高乐非常明白这一点，因此他曾透露法国很愿意购买这类武器，但有一个条件，即这类武器一旦为法国所拥有，就必须置于法国的绝对控制之下。否则，不管得到得不到援助和指导，法国都有权依靠自己的努力成为核大国。

戴高乐已经十分明白，他的建议很难被接受，因此他认为，他可以在北大西洋公约的问题上自由行事了。戴高乐于1959年3月6日，决定迈出标志着法国不受北约限制、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行动的第一步。他宣布撤出受北约控制的法国地中海舰队。3月25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解释说，法国目前已经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约束下解脱出来，因为北约的约束使法国不可能保护它在中东、北非、黑非洲和红海等地的利益。

11个月后，法国成了核国家。1960年2月13日，法国第一个原子装置在雷冈沙漠中心地带试验成功，从而提高了法国的大国地位。

有人说，戴高乐反美、抗英，愿与俄国打交道的对外政策，可以追溯到他对雅尔塔会议的一肚子牢骚，以及他与罗斯福和丘吉尔交往中的积怨。戴高乐一生立志使法国重新具有伟大的形象。像有些伟大的人物一样，夏尔·戴高乐既是幻想家又是现实主义者，而这两者又在他身上斗争不已。早在1945年5月7日德国投降后，戴高乐就立下了这样的宏愿：

我认为，新的时代也许能允许我开始实行我为我的国家所制定的宏大计划。

我们要确保法国在西欧的安全，办法是防止一个新的德意志帝国对法国再度造成威胁，我们要与西方和东方取得合作，必要时将与这一方或那一方结成必要的联盟，而不接受对别国的任何形式的依赖。我们要防止仍在增长的，瓦解法兰西联邦的危险，使之逐步变为松散的联合。我们要从政治上、经济上以及战略上的观点出发，促使邻接莱茵河、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的国家组织起来。我们要使这个组织成为世界三大势力之一，一旦需要的话，就使其成为苏联和盎格鲁撒克逊这两个阵营之间的仲裁人。

为了探索成立一个欧洲政治组织，1961年7月18日至19日，在巴特戈德斯贝格召开的一次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一致通过了共同的欧洲政策，甚至连戴高乐本人对这个最后声明也没有发表反对意见。但过了不久，戴高乐

就改变了主意，他决定在巴黎建立一个委员会，其主席是当时法国驻丹麦的大使，忠诚的戴派人物克里斯蒂昂·富歇。委员会开始就建立“国家联盟”问题起草条约。戴高乐的目的是反对建立一个联邦的欧洲，他需要的是英国人被排斥在外的国家联盟，戴高乐对其心腹们说，把法国的领导强加于德国已经够难了；他不能指望把法国的领导强加于英国。麦克米伦错误地认为，他的欧洲概念与戴高乐的欧洲概念差不多，这会有利于彼此达成协议。但是，戴高乐把英国看作是美国在欧洲的“特洛伊木马”。麦克米伦唯一能够糊弄法国的就是断绝与美国的特殊关系，或者无论如何，声明准备执行一项“欧洲的”防务政策，即戴高乐式的不受美国支配的政策。但他不能这样做，即使他能够这样做，戴高乐还会找到其他借口来排斥英国。

出于广泛联合的考虑，1963年底，戴高乐派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前往北京，做半官方的了解情况的旅行。富尔对新中国的成就获得了深刻的印象。但是这次访问的真正目的是探索中国是否同意与法国互派大使。1964年1月27日，法国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在1月30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明了他与中国建交的理由。他说：“法国不得不考虑现实，特别是考虑这样的事实：在亚洲，没有中国的参加，就不能办成任何大事。”

同中国建交，再次表明了戴高乐做视美国的指挥棒。

本着同样的精神，戴高乐于1963年3月15日前往墨西哥进行国事访问。在这个美国的后院，他发表了几次演说，号召法国和墨西哥进一步加强联系。当他接到邀请他在归国途中顺便拜会约翰逊总统的信件时，他却提议在法国马提尼克岛会见，这使得白宫大为恼火。会见的事就此告吹，戴高乐按照预定计划，在瓜德罗普岛和马提尼克岛作了短暂逗留后，于3月23日回到了巴黎。

4月16日，戴高乐发表了一篇挑战性的演说，公然拒绝依靠美国的威慑力量，并声称法国有权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发挥作用。他以从未有过的最为惊人的言词表明他倾向于中立主义，他指出“两霸”正力图瓜分世界。他摆出十分好斗的态度。同年4月，在东南亚条约组织部长会议上，法国代表团主张同意南越中立，赞扬柬埔寨拒绝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保护。4月27日，法国撤回在盟国法军司令部的法国海军军官。谈到越南问题时，戴高乐谴责美国人企图在印度支那取代法国，并主张这个半岛的所有前法国殖民地实行中立。1965年2月8日，他还写信给越南胡志明主席，谴责外国（美国）的干涉和扩大战争，并于同年5月，主动从东南亚条约组织撤回了本国的工作人员。

总之，戴高乐在重新当政的11年间，使法国民众的生活深深地印上了他的烙印。他的外交政策旗帜鲜明，充满了对霸权的藐视，并始终强调尊严和独立。甚至不赞成这一外交路线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条始终如一的新路线。它的总方针就是重新选择盟国，寻求法国与盟国间的新平衡。法国在保持与西方盟国友好关系的同时，开始寻求同苏联缓和紧张的局势，进而达成谅解，最后进行合作，同西方盟国保持着一定距离的法国，退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了本国的核“打击力量”，并拒绝了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要求。该共同体经历了多次艰难时刻，曾按法国总统一人的意愿进行了改组，共同体屏弃大联合和逐渐成立跨国政权的方针，希望组成“多国的欧洲”。在该组织内，六个参加国都保持各自的全部主权。法国与德国签订了一项协议使两国言归于好。反对美国在越南执行的政策，反对以色列的中

东政策，反对国际货币制度等等。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条外交路线表达了戴高乐在争夺势力范围的微妙角逐中顽强地促进法国强大的愿望，同时又表明了戴高乐是掌握力量与和解之间分寸的巨匠。

与争取大国地位的外交成就相比，戴高乐在经济方面并没有取得惊人的进步。1958年底，法郎贬值，法国经济生活的基础受到全面的考验。共同市场首先发挥了作用，使法国经济有了起色，负债累累的局面得到了改善。然而，通货膨胀悄悄地来临了，逐渐地侵蚀已取得的经济成果。与此同时，社会局势一年比一年紧张，导致了1968年5月的学生造反和随之而来的总罢工。为了克服危机，重新恢复经济活力，戴高乐决心在教育，劳资关系、经济结构、分配制度等方面进行一场“深刻革命”，并着手制订计划，准备交给议会和各政党进行讨论。

到了1969年春，随着年月的推移，戴高乐身体越来越不支了，人们对他已经不再抱有多大的希望。不希望他1972年任期满后继续执政，但是这位倔强的老人还有惊人的一手，他宣布，他是否继续任职要取决于全民对他改革计划表决的结果，如果失败了，他就退休，就像他已说过的那样，4月27日。投票结果，赞成票占47.58%，反对票占52.41%，晚上11点。特里科给戴高乐打电话。问公告可否发表？将军回答说可以。午夜，全世界都确切地知道了这件预料中的事。戴高乐将军的最唇正式声明如下：

我将停止执行共和国总统的职务。这个决定自今日中午生效。1969年4月28日上午11时。

从此，夏尔·戴高乐又回到了科龙贝村的拉布瓦瑟里。他不再干预国家的事务，专心致志地撰写他的回忆录，欲知退休后的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三十一章 夕阳西下

重行改革惹人怨，年迈体弱不竞天；
秋风萧瑟吹枯叶，将军英明永垂年。

1969年4月20日，即举行公民投票前七天，戴高乐将军在爱丽舍宫小礼拜堂，参加了由他的侄子弗朗斯瓦·戴高乐神父主持的弥撒，仪式结束之后，他在私宅接待了他的儿孙们。戴高乐对他们说：“我知道这次公民投票要失败。从德斯但声明不赞成公民投票法那时起，我就知道肯定要失败，我将失去独立派的票！”

有人要问：戴高乐明知失败为什么还要举行公民投票：他其实没有必要使自己陷入遭人民公开拒绝的窘境；在过去风云激荡的十年中，他一直统治着人民。如果他不怕被人指责藐视议会程序的话，他本可以利用戴派的多数使他的建议获得通过。

不过，戴高乐有他自己的考虑。

1969年4月，戴高乐已是79岁的人了。他对朋友和亲属早就透露，他需要六年的时间来写他当政时期的回忆录。在这种情况下，他对正常的程序和法学家们的建议比平时更不耐烦，他年事已高，傲慢日甚，即使他真在投票中胜利了，他也不见得会任职到第二个任期届满。

戴高乐的儿子海军少将菲利普透露，如果他父亲取得胜利，戴高乐也打定主意，要在80寿辰以前退休，以免遭到贝当元帅一样的命运，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他在公民投票中会遭到失败，但他依然我行我素。他的传记作者克罗泽说：“戴高乐对于做戏的兴趣丝毫未减；他宁愿在一个有声有色的失败后立即辞职，而不愿随着时间的消逝平淡无奇地走下政治舞台。他的这种选择确实有点英雄气概，这正是他的一个特色。至少可以说，他是明知不可为，却有勇气试一试。正如登山运动员在一座无法攀登的山峰面前面临失败一样，他在政治上的自杀也是壮丽的。”

戴高乐引退之后，决定不参预任何与官方有联系的活动，不愿意同现任部长们通信谈论“国务”问题。他无论如何不愿给人这样的印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似乎他在“幕后操纵”，按照将军喜欢用的词汇来说，他“退休了”。因此他永远不再干预公务，除非因国家制度和重大的政治抉择引起争执，或者遇到有人想利用他来掩护他所不同意的行动这种特殊的情况。他说：“我很清楚他们会另搞一套！但他们别想借我的名义来干这件事。我已经不再继续工作了。当然一切都两样了。这将是他们的事。”当戴斯克里安上校在戴高乐面前提起过去经常把将军纠缠不休的问题时，将军对他说：“那么，请答复和你交谈的人：目前发生的事情已经同戴高乐将军不相干了，他完全是局外人，同这一切完全脱离了关系，说他除了他的回忆录外，别的什么也不考虑了！”

在公民投票刚一结束，戴高乐就来到了科龙贝拜访的前助手们面前，他偶尔流露出满意的心情，即离职已经“成功”。他表示自己服从历史对他的引退所作的判断。他对博兰古说：“总该有结束的一天。我也该下台了。要善于下台！你要承认，这样离职很好。我在历史面前作了一个很好的退场，因为我把全国的注意力吸引到‘参与管理’法国前途的问题上来了。”周围的一些人对此随声附和，说：“你的引退是高尚的。这同你的杰出身分，同你的光荣历史是相称的。”

事实上，戴高乐是故作镇静。他最喜爱这样的论点：“好吧，不错，我是被击败了。但是问题也清楚了，不必犹豫了。”他补充说：“我当时有必要弄清楚，法国人民是否还想作一次努力，是否愿意同我站在一起开始一个‘参与管理’的阶段。我被击败了，我下台了。他们没有追随我。国家解除了我对它的义务。然而，这次否决我的公民投票是1968年5月事件自然的结果……区域改革是我能为法国效力的最后一件事。现在我已无事可做，只能写我的回忆录，对我来说，这将是我为法国效力的唯一方式！”

后来，戴高乐苦闷的心情常占上风，4月30日，他对一个晚辈说：“他们没有否决戴高乐。他们否决了奋斗。他们选择了不再奋斗的道路。他们选择了当小民族的道路。我将是最后一个试图有所作为的人。既然他们已不愿进行改革，何必再让戴高乐领导法国人呢？为了日常的例行公事，他们不需要戴高乐。”他还补充说：“我发现反对我的还是那些人，即被勒令闭嘴的那帮人。”“我相信未来是不由凡人掌握的。”此后，他还是不断重复这样一句话：“如果上帝假我岁月！”

4月28日中午，阿兰·波埃以参议院议长的身分接任共和国临时总统。戴高乐的所有部长都保留原职，只有勒内·加比唐一人除外。因为加比唐曾声明，即使给他代理总统的职位，他也不愿在波埃手下工作。戴高乐哀伤沉默。在戴高乐离职不到48个小时，乔治·蓬皮杜宣布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当总统候选人，他没有向戴派人士征求意见，但是他确实给戴高乐将军写了信，其要旨并不是要求老头子同意他的行动，而是请他不要干预其事，他说他决心使戴高乐主义长存不衰。出乎一些人的意料，戴高乐立即复信，并祝他成功。

戴高乐离职后，拒绝领取作为前总统应该享有的年金。他对金钱从来不感兴趣，再说他依靠稿费和自己在法国农场的收入足够生活的了。戴高乐从国家接受的唯一东西，就是武装部队拨给他的、坐落在布雷特大街的一座不大的平顶房屋。房屋里有一个小小的办公室，挂有生丝挂毯，摆着一张红木办公桌。他收到了从法国各地寄来的大量信件，他亲笔回了其中的一些。

戴高乐决定在总统竞选期间离开法国，免得蓬皮杜为难。作为对戴高乐的最后一次效劳，谢瓦勒里极端秘密地作好一切安排，让他们夫妇去爱尔兰度假。德姆维尔给他们提供了一架专机——神秘—20。5月10日，星期六清晨，飞机在圣迪齐埃空军基地降落。它的驾驶员先得到的命令是：等候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并把他带到一个没有详细说明的目的地。当日上午10点50分，神秘—20飞机在考克机场着陆，从舱里走出了神秘人物。爱尔兰共和国总理约翰·林奇在那里迎接前总统戴高乐。将军夫妇从下榻的苍鹭湾饭店可以观看海景。他在新的孤独生活里竟奇妙地感到十分自如。不久，这位法国巨人和他那不爱抛头露面的妻子在爱尔兰农村散步的照片就登载在全世界的报刊上了。

在巴黎，法兰西代总统阿兰·波埃，风度翩翩，一下子成了法国深受欢迎的人物。有一个阶段，民意测验结果说明，他甚至比蓬皮杜更得人心，然而在6月1日的第一轮投票中，蓬皮杜轻而易举地领了先，获得了法国本上选票的43.3%。第二名是彼埃，占23.42%。第三名是共产党候选人雅克·社克洛。

戴高乐在苍鹭湾饭店包订的时间是一个月，但他早就住得不耐烦了。5月23日，他搬到北部的卡舍尔湾。6月4日，贝尔纳·特里科到卡舍尔湾来

看望将军。与往日一样，特里科和戴高乐详细地分析了选票的数字。他这次离开竞选场虽属自愿，但是这种失意还是给他带来了不安。特里科走后，戴高乐和他的随行人员到肯马尔伯爵的侄女比阿特丽斯·格罗夫纳夫人的家里作客。他在那个庄园的一座小农舍里，等候着6月15日第二轮总统选举的结果。蓬皮杜正式被选为共和国总统，获得1100万张以上的选票，占总票数的58.21%，但仅是全部选民应有票数的37.5%，因为弃权人很多。波埃的票数将近800万张。戴高乐没等看到最后结果就上床睡觉了。第二天上午他给新总统发了一份电报，完全表明他真实的意思：“由于国家和个人的一切原因，我向你表示衷心的祝贺。”

1969年6月19日，戴高乐回到了科龙贝，安居下来写他的《希望回忆录》。法国外交部为他提供了帮助，给他配备了一个由皮埃尔·路易·布朗领导的研究班子，从那时起，戴高乐把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建立他这座最后的文字纪念碑上了。6月20日，蓬皮杜总统进选雅克·沙邦-戴尔马担任总理，这样就实现了戴尔马洋洋自得的预言。新内阁不包括马尔罗和德姆维尔，这些人都访问过戴高乐。戴派左翼人士勒内·加比唐已被罢官，失去官位的还有即将卸任的教育部长富尔。“合作”的政策显然已“寿终正寝”了。

尽管戴高乐继续保持沉默，但是从科龙贝投射出来的巨大身影使他的“继承者”望而生畏。他会不会再插手政治呢？很多人在1969年秋冬至1970年对此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有人认为，如果蓬皮杜在对外政策上的步子迈得太快，例如立即向英国敞开欧洲的大门，那么戴高乐只要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批评总统，就可以把政府搞垮，快到9月底时，有消息说，将军将从10月份开始迁入他在布雷特伊大街的一所平房里。一时人心浮动，有些人感到恐惧，有些人则产生了激动的期待心情。不过“叛徒们”无须惊慌，信徒们也白白高兴。戴高乐并不想插手政治。

戴高乐在撰写回忆录的余暇，还没有放弃出国旅行的嗜好。1970年6月3日，他去西班牙旅行。6月8日，他在马德里郊外的豹宫与佛朗哥将军一起进餐。戴高乐即使在国外旅行期间，也没有中断他继续撰写和修改书稿的工作，然而，他的回忆录最终没有写完，第一卷《复兴》写的是1958—1962年的事，于1970年出版，并立即成为畅销书。第二卷《努力》，只完成没有标题的两章。戴高乐在给皮埃尔·路易·布朗的一封亲笔信中写明第二卷将有七章，其中两章写政治，两章写经济与社会，两章写外交事务，最后一章写哲学。在最后一章中，戴高乐计划对法国、欧洲和世界作出评价。原计划还有第三卷《终点》，要写1966—1969年的事。

如果戴高乐将军在访问西班牙一年之后还健在的话，那么，1971年6月18日那天，他就会身在中国，1970年3月2日，法国驻华大使艾蒂安·马纳克致函将军，第一次提到中国之行的可能性。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我过去由于你本人同胡志明主席的会见没有能够实现而感到遗憾。胡志明在他的遗嘱里清楚地表明，如果假以岁月，在他的祖国解放以后，他愿到各友好国家致谢。这次会见如果实现，那将是一桩非常伟大的事情，也是四分之一世纪以后多么好的精神补偿！唉！死亡竟破坏了这样伟大的事情。

“毛泽东现在还健在。你所谈论的关于中国的一些思想，从本质上接触到这个国家的命运问题。中国人总是带着钦佩的心情同我谈到你。有一天我告诉周恩来先生说，我在这里，在北京，曾接到你的信。当时他停下脚步来，默然不语，然后，他对我说：‘我们对戴高乐将军怀有最大的敬意。你能替

我把这话告诉他吗？’在巴黎，中国大使去年 11 月曾向我表示，他曾三次试图获得访问你的机会。他很惊奇，作为自由法兰西老前辈人，我自己竟然没有要求去看您。

“有一件大事可做，我的将军，对于法国，对于历史，是一件大事；对于未来，对于保持我国的光辉形象，也是一桩大事。这个行动从现在起会使我国处于未来局势的中心，而且历数十年不衰；这个同您相称的、永世不忘的行动，世界上只有您能够既明智又自由地完成：这就是远行中国。有了这样一件大事，现代世界历史就完整了。

“我的将军，这就是我久久下不了决心对你说，最后还是决定对你说的话……”

戴高乐将军对中国怀有良好的情感。他称中国是“一个比历史还要古老的 国家”；他说中国人是“真正的人，自豪的人”。他对新中国的领导人和解放后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十分赞赏，他说，“只有毛泽东才具备必要的威望，使某些重大的事业得以在中国完成，也只有他的领导才能使中国从当时的不发达和无政府的状态中摆脱出来。”戴高乐希望来到北京后，看看长城，访问中国革命圣地延安。再到古都西安，然后还要到上海、南京、广州等地访问，他称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是个历史悠久、资源丰富而又幅员辽阔的国家。然而，命运之神，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他最终没有完成访问中国的宿愿。

1970 年 11 月 9 日，戴高乐由于心脏病猝发去世。仅差两个星期，他就整整 80 岁了。他死前并没有任何疾病和不适的迹象。他在逝世那天，还像往常一样撰写回忆录。

大夫经过简短的检查，诊断为动脉瘤引起胃动脉破裂，将军不省人事，就是由于动脉突然破裂。他的面容在几分钟内变得很苍白。双手也同时发白，据大夫说，将军没有痛苦，而且不知道自己会死。

戴高乐夫人始终保持着镇定，很能控制自己，她一刻也没有失去理智，抑制着悲痛，并且立即面对她应该独自处理的那些问题，因为她的儿女没有一个在身边。她要若盖神父打电话给在巴黎的布瓦西厄将军，向他宣布将军之死，并请他通知菲利普·戴高乐。这位教士只对布瓦西厄说：“你的岳父刚刚离开我们……”

蓬皮杜总统于次日早晨 8 点半得悉此事。中午，他向法国人民做了如下的广播讲话：男女同胞们：

戴高乐将军逝世了。法国失去了亲人。

1940 年，戴高乐将军拯救了我们的荣誉。1944 年，他领导我们走向解放和胜利。1958 年，他把我们从内战的威胁中救了出来。他使今天的法国有了自己的制度、独立和国际地位。

值此举国哀悼之际，让我们当着悲痛的戴高乐夫人和她的儿孙之面向他鞠躬致敬。让我们估量一下感激之情加在我们身上的责任，让我们向法国保证，我们决不辜负我们所得到的教诲。愿戴高乐永远活在全国人民的心中。

11 月 10 日，爱丽舍宫发布了将军关于他的葬礼的遗嘱。这遗嘱早就写好了，从来没有改动过。事实上它见于 1952 年 1 月 16 日戴高乐亲手交给蓬皮杜的一封信里。信是密封的，规定在他去世后才许启封。现在启封的时间到了。信中写道：

我希望在科龙贝教堂举行我的葬礼，如果我死于别处，我的遗体务必运

回家乡，不必举行任何公祭。

我的坟墓必须在我女儿安娜安葬的地方，日后我的夫人也要安息在那里。墓碑上只写夏尔·戴高乐（1890—）。

葬礼要由我的儿子、女儿和儿媳在我的私人助手们的帮助下安排，仪式必须极其简单。我不希望举行国葬。不要总统、部长、议会代表团和公共团体代表参加。只有武装部队可以以武装部队的身分正式参加，但参加的人数不必很多。不要乐队吹奏，也不要军号。

不要在教堂或其他地方发表悼念演讲。国会不要致悼词。举行葬礼时，除我的家庭成员、我的解放功勋团战友和科龙贝市议会成员以外，不要留别的位子。法国的男女同胞如果愿意的话，可以陪送我的遗体到达它的最后安息地，以给我的身后遗名增光。但我希望静默地把我的遗体送到墓地。

我声明，我事先拒绝接受给予我的任何称号、晋升、荣誉、表彰和勋章，不论是法国的，还是外国的，授予我上述任何一项，将违背我的最后愿望。

戴高乐写的这些话，18年以后实现了。1970年11月12日举行他的葬礼这天，在法国本土和海外属地普遍规定为国丧日。各部部长和国会议员都未参加。只有几个曾任过部长、抗战时代戴高乐的战友参加了村教堂的葬礼和在当地教堂墓地举行的入土仪式。那天，法国男男女女四万人，从法国各地自行来到科龙贝为戴高乐将军作最后的送行。

也有盛大的祭礼，但只限于巴黎。11月12日，几十万巴黎人冒着倾盆冷雨向爱丽舍宫行进，在凯旋门，在26年前戴高乐检阅军队的地方，人们向他们的将军肃立致敬。

一代伟人去世了，尽管对于他的功过是非评说不一，但有几点却是法国人民所公认的，也是写在历史书上的。这就是：

戴高乐拯救了法国的荣誉，也拯救了法国本身；法国和戴高乐其实基本上是同义词。

维希政府是非法的，因为贝当与纳粹分子签订了停战协定。它没有继续战斗，而是投降了，放弃了一半以上的国土，并且后来与敌人合作。

戴高乐在1940年6月18日的呼吁给了他“合法地位”；此后，他一直是国家法统的监护人和保卫者，甚至在他不任职期间也是如此。

是戴高乐恢复了法兰西共和国的伟大声誉。

这就是戴高乐留给法国人民的遗产，也是他在法兰西历史上写下的光辉篇章。对戴高乐的个性和统治历史，一位法国问题专家用下面几个词作了概括，那就是：“无畏、尊严、爱国、顽强、独立、坚定。他的战友和他的敌人都认为：他是一位历史巨人。”

戴高乐年表

1890年11月22日 夏尔·戴高乐出生于里尔，是巴黎圣母玛利亚学校教师亨利·戴高乐及其夫人让娜·马约的第三个孩子。

1897年 夏尔·戴高乐被送往安多盎求学。

1910年10月10日 夏尔·戴高乐进入圣西尔军校学习。

1912年10月1日 戴高乐于圣西尔军校毕业，被授予少尉军衔，奉命赴贝当担任团长的驻阿拉斯的步兵第33团供职。

1914年7月28日—8月4日 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8月15日，戴高乐在比利时境内迪南负伤，因作战勇敢受到表彰。

1915年3月15日 在香已尼前线的梅斯尼尔—雷斯依尔吕斯第二次负伤，伤愈后晋升为上尉。

1916年3月2日 戴高乐指挥的步兵第10连在都奥蒙阵地几乎被敌全歼。戴高乐上尉被误传受伤“阵亡”，被迫授一枚最高荣誉十字勋章，并在全军通令表彰，说他“在激战中以身殉国”。实际上，他伤后未死而被德军俘虏。

1916年3月—1918年10月 戴高乐在俘虏营五次逃跑未遂，五度被易惩罚营。直到1918年11月11日停战后才重获自由。

1919年6月28日 凡尔赛和约（对德和约）签字。

1919—1920年 戴高乐上尉应募赴波兰第4战车师供职，该师组建于法国，其宗旨是同红军作战。战争结束后，戴高乐又留波兰一年，担任朗贝托夫军事学院战术教员。

1921年4月7日 戴高乐与饼干制造商女儿伊冯娜·旺德鲁结婚。10月被任命为圣西尔军校战争史讲师。后到陆军大学进修。

1924年6月 被派往美因兹的莱茵区法军司令部供职。发表第一部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

1925年 成为贝当元帅最高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办公室幕僚，并经常在报刊上就军队建设问题发表文章。

1927年 晋升为少校，指挥驻特雷夫的轻步兵第19营。

1929—1931年 赴贝鲁特到法驻地中海东部地区部队司令部供职，负责伊拉克、伊朗和埃及事务。

1932—1936年 在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处任职。开始参加政界活动，认识保罗·雷诺。

1932年 出版《剑刃》。1934年出版《建立职业军》。

1937—1939年 晋升为上校，在梅斯任坦克第507团团长的。出版了《法国和它的军队》一书，引起了与贝当的一场冲突。

1938年9月30日 希特勒同张伯伦、墨索里尼和达拉第签署了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协定。

1939年3月15日 德军进入布拉格。希特勒宣告“捷克斯洛伐克再也不存在了！”

1939年9月1日 德军大举入侵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戴高乐上校受权指挥第5集团军坦克部队。

1940年5月14日 德军在侵占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三个中立国家后，又大举进攻法国。

1940年5月15日 戴高乐奉命指挥第4装甲师。5月25日晋升为准将。

1940年5月26日—6月4日 在德军进攻包抄之下,被围困在加来地区的英法军队,被迫从敦刻尔克港经海上撤退。

1940年6月5日 戴高乐任副国务秘书,负责国防事务。6月6日至17日,又被任命为保罗·雷诺内阁的国防和陆军部次长。两度飞往伦敦执行使命。

1940年6月14日 德军占领巴黎。

1940年6月15日 雷诺内阁辞职。

16日, 戴高乐由英返法后拒绝签署停战要求,于17日重返伦敦。

1940年6月18日 戴高乐在伦敦发表广播演说。号召法国人民反对投降,继续战斗。

1940年6月22日 法国战败,法代表在贡比涅停战协定上签字。贝当政府向希特勒投降。

1940年8月2日 戴高乐将军被贝当政府图卢兹第17区军事法庭缺席审判,判决死刑。

1940年8月 在伦敦签订丘吉尔—戴高乐关于自由法国章程的协议书。在戴高乐的号召下,整个法属赤道非洲支持自由法国。

1940年9月23日 法英出征达喀尔失败。

1940年10月27日 戴高乐在伦敦成立帝国防务委员会。

1941年6月22日 德军入侵苏联。

1941年9月24日 法兰西民族委员会成立。

1941年12月7日 日本偷袭珍珠港,英美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戴高乐乘机在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加强军事行动。

1942年11月8日 艾森豪威尔将军统率的英美部队,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海滩登陆。希特勒发出占领法国在非洲殖民地的命令。

1942年12月24日 维希政府的海军上将达尔朗在阿尔及尔被刺杀。

1943年2月2日 历时180天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结束,苏军共歼敌150万人。斯大林格勒战役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1943年5月30日 戴高乐抵达阿尔及尔。6月3日,成立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由吉罗和戴高乐两位将军共同担任主席。

1943年6月26日 戴高乐进入获得解放的突尼斯。

1943年7月3日 吉罗被任命为法国部队总司令。戴高乐单独主持法兰西全国解放委员会的领导工作。秋天彻底清除了吉罗。

1944年2月1日 戴高乐正式建立内地军。

1944年6月3日 为了迎接法国全国解放,在阿尔及尔成立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

1944年6月6日 英美盟军在法国北部诺曼底登陆,开辟了第二战场。

1944年6月14日 戴高乐抵达解放了的贝叶。

1944年7月6日 戴高乐赴美访问,受到罗斯福接待。

1944年8月19日 巴黎开始起义。戴高乐领导下的勒克莱尔师第一批装甲部队8月24日抵达市政府大厦,宣告巴黎解放。

1944年8月25日 戴高乐进入巴黎,在蒙特巴那斯火车站接受德国卫戍部队签署的投降书。

1944年8月26日 戴高乐在自由法国的部长和将军们以及抗战运动的领导人陪同下，登上星形广场，在近200万巴黎居民的欢呼声中穿过爱丽舍田园大街，走向圣母院，去唱感恩赞美诗，然后到市政厅。临时政府宣告成立。

1944年9月9日 改组临时政府。

1944年10月23日 苏英美各强国承认法国临时政府。

1944年12月2日 戴高乐到苏联访问，于10日签订法苏协定。

1945年2月4—11日 英美苏政府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的雅尔塔举行会议，签订《雅尔塔协定》。

1945年4月12日 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由副总统杜鲁门继任总统。

1945年5月8日 德国凯特尔元帅代表德国最高统帅部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从此欧洲战争停止。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天皇发表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年10月21日 法国全民投票表决，屏弃第三共和国，一致赞成新宪法。

1945年11月6—21日 戴高乐被法国议会选举为临时政府总理，组成新的政府。

1946年1月20日 戴高乐辞去临时政府总理职务。

1946年5月5日 法国全民表决，否决宪法提案。

1946年6月2日 选举新议会，19日乔治·皮杜尔接替费利克斯·古安担任政府总理。

1946年6月16日 戴高乐在贝叶发表演说，9月29日在埃皮纳尔讲话，反对宪法提案。

1946年10月13日 全民投票表决，批准宪法。

1947年1月16日 樊尚·奥里奥尔被选为共和国总统，任命保罗·拉马迪埃为内阁总理。

1947年4月7日 在斯特拉斯堡宣布成立“法兰西人民联盟”。

1952年1月26日 戴高乐写下遗嘱，希望死后在科龙贝教堂为他举行葬礼，把他的遗体安葬到他女儿安娜的墓地，不要举行国葬，不要追授荣誉、称号等。

1952年3月6日 “法兰西人民联盟”分裂。这是该联盟解散的开始。

1953年5月6日 戴高乐退出政坛，回科龙贝村隐居，着手写回忆录。

1954年 《战争回忆录》第一卷《召唤》出版。

1958年5月13日 阿尔及尔发生暴动，成立由马絮将军担任主席的公共安全委员会，马絮求助于戴高乐，信赖戴高乐。

1958年5月15日 在阿尔及尔，萨朗将军高喊出：“戴高乐万岁！”当晚，戴高乐宣称：“我已经做好了接管共和国权力的准备”。

1958年6月1日 法国国民议会为戴高乐将军举行授权仪式，并委托其制订新宪法。

1958年9月28日 全民投票通过新宪法。

1958年12月21日 戴高乐当选共和国总统。

1959年1月8日 就任总统，任命米歇尔·德勃雷为第一任总理。

1959年9月16日 宣布阿尔及利亚人享有自决权。

1959年12月10—13日 戴高乐在承认马里独立的同时，宣布同意解

散法兰西共同体，其非洲成员要求在尔后的几个月内获得独立。

1960年2月13日 在雷冈附近的撒哈拉沙漠爆炸了第一颗法国原子弹。

1961年4月22—25日 在阿尔及利亚发生“将军暴动”。

1962年7月3日 阿尔及利亚于7月1日投票后宣布独立。

1963年7月 法国拒绝参加关于停止某些核试验的莫斯科条约。

1963年8月 发表关于不干涉越南的宣言。

1965年7月1日 法国决定不再参加共同市场部长会议，并召回其在布鲁塞尔的代表。

1966年1月 宣布法国脱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1967年5月16日 再次拒绝不列颠参加共同市场。

1968年6月23—30日 戴高乐派在议会选举中获胜。

1969年2月2日 戴高乐在坎培尔宣布就地方化和塞纳问题举行全民投票。4月27日，尽管戴高乐反复发出号召，但所提出的草案仍被全民投票否决。

1969年4月28日 戴高乐将军宣布停止执行共和国总统职务，隐居科龙贝，开始撰写《回忆录》第四卷。

1970年11月9日 夏尔·戴高乐逝世。

